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下

莊練著



中華書局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下

莊練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67113

中華書局

167113

後序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全書共分三册，上册於民國六十七年一月出版，在時隔半年之後，中册相繼問世；現在下册亦告排校竣事，出書在即。因綴數言，以爲後序。

寫作此書的最初構想，已經是六、七年前的事了。當時我覺得，坊間所出中國近代史方面的書，雖然佳作如林，其體例不免大致相同，只是其內容或因作者之觀點有所不同，致有繁簡之異而已。這些書可能是寫作極爲成功的大學用近代史教材，也可能是甚有實用價值的考試用參考書，其一般的長處，是能對中國近代歷史的演變經過，提供一個清楚而完整的說明，但却不一定能使讀者對這些歷史事實發生興趣。這其間的道理很容易了解——一百數十年來的近代史事頭緒紛繁，讀者如果無法把握住其中的若干關鍵事實，便很容易因目迷五色之故而畏難却步。於是，反倒是宮廷秘辛與人物瑣談之類的掌故軼聞，更能吸引讀者的興趣，引爲茶餘酒後的談助，如前所述的通史體近代史著作，並不能成爲人們所喜愛的讀物。這當然不是很好的現象。因爲一般所謂的掌故軼聞，大都眞贋雜出，內容更不免涉於誇張，渦分偏嗜掌故軼聞而誤信其中的說法，難免不使讀者對歷史發生誤解，與歷史學之研究目的恰好背道而馳，其影響之惡劣可知。錢穆先生曾

經在國史大綱的序言中說，「一國的國民對本國歷史的了解愈深，愈足以激發他的愛國心。」可知歷史教學乃是國民精神教育中的重要環節，其重要性實不容忽視。我國近一百年來所遭受的內憂外患，創深痛鉅，其中的因果關係，全部包括在清末民初的歷史記載之中。不了解這一段歷史的了解，因此我設想了這一寫作計劃，打算透過敍述重要人物生平事蹟的方式，來剖析清代後期歷史演變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軼聞之趣味，亦能掌握歷史事件之重心，以作爲通史體近代史著作的輔助讀物，而其先決條件則應以信實爲主，決不可因注重趣味而歪曲歷史，致流於膚淺浮薄一途。這一構想孕育雖久，苦於缺乏支持的力量，一直不敢付之實現。六十五年夏天，青年戰士報新文藝版的主編胡秀先生約我寫稿，我提出了這一寫作計劃，胡先生欣然接受。於是我在兩年半中陸續寫成了曾國藩等二十二人的傳記，合共十四篇，總計凡六十萬字，集在一起，就成了這部「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感謝胡先生的大力支持，使得我的寫作計劃在歷時兩年半之後終於完成。除此之外，對於青年戰士報廣大讀者的熱愛，也應在此申致感謝之忱。如果沒有胡主編和讀者們的支持，我的寫作計劃很可能會半途而廢，即使空有理想，也還是不能終觀厥成的。

我對於近代史本沒有深入的研究，當初之作此構想，也只是覺得大可一試而已。想不到一經著手，即能博得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足證以這種方式來介紹歷史，乃是不無意義的事。出現在這部書中的傳記人物，在清末歷史上都有其代表性。由於他們的思想行事與他們在政治上所處的

地位，終於使歷史發展的趨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透過他們的生平事蹟，頗的內在原因。至於我撰寫這些人物傳記的取材範圍，除了參考正史的記載以外，、筆記、雜聞之類，凡是可供了解某些歷史事件之用的材料，都已在經過一番甄並蓄，藉以加强文字敍述的正確性與趣味性。惟選別擇之後兼收不能算是成功，其因爲如此，所以我覺得，這部小書的寫作雖然我的謹嚴態度，却是差可自信的。

這些年來，出版界對於中國近代史資料的大有這些資料的大量刊印流傳，對於學術研究的幫此書，得益於這量刊布，很多珍貴資料根本無法爲人所見，自然更談不上研究利用了。筆者寫成難免，更望關心些資料的地方很多，理當於此一併申致感謝。筆者才疎學淺，書本書的讀者不吝指正，是爲至盼。

莊　練

民國六十八年一月四日寫於南港



(1)榮祿

工於心計而善觀風色，乃是榮祿的最大特點。所以在庚子拳亂發生之初，他雖然也與載漪剛毅一樣是縱拳釀亂的禍首，最後却能安然脫身事外，坐享尊榮，而死謚文忠，與載漪剛毅之永被惡名相比，榮祿是最幸運的



(2)慶親王奕劻

貪鄙無能而唯利是圖，這當是慶王奕劻的蓋棺定論。由於他之貪財，所以袁世凱得以財利玩弄之。由於他之無能，所以袁世凱終於掌握了清朝末年的軍政大權。不過，奕劻之所以能被大用，慈禧太后亦不能辭其責。總而言之，則都是袁世凱的金錢所發生的作用。



(3)載振

慶親王奕劻之長子，標準的紈袴乳臭；生平長技，只是聲色犬馬，而奕劻却使他出任農工商部尚書。因此他纔會被袁世凱所牢籠，成爲利用他來結納奕劻的工具。



(4)袁世凱

清朝的內閣總理大臣，民國的大總統，中華帝國的洪憲皇帝。由這些頭銜，可以看出袁世凱之反覆多變。從前曹操被人稱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袁世凱彷彿似之。只因清朝末年人才寥落，所以袁世凱終於能以他的奸雄之才玩弄清廷於股掌之上。



(5)蔭昌

光緒末年的滿清權要，多半庸劣貪鄙而碌碌無能，蔭昌即其一例。辛亥革命時官居陸軍大臣，却不能帶兵作戰，因此造成袁世凱再度出山的機會。



(6)瞿鴻禨

以一介書生而敢於在慶、袁勢力滔天之時出來反抗慶、袁，瞿鴻禨的膽識與抱負，很值得後人欽佩。只可惜袁世凱手下的智囊太多，瞿敗袁勝，從此清末的政治便無可挽救了。



(7)岑春煊

在光緒末年，岑春煊以強項勇悍著稱於世，在當時的內外大臣中，只有他的聲望可以與袁世凱相匹敵。所以瞿鴻禨策動倒慶倒袁計劃時，要以岑春煊爲重要的幫手。入民國後，還在廣東主持過反袁運動。



(8)盛宣懷

在清代末年，以官員身份從事各項新式交通事業的興建，因緣時會乘機營私聚斂，終於使他成爲全國首屈一指的大富豪。其生平事業之較有可稱者，只有辦理慈善事業及興建新式教育兩項。最後在郵傳部大臣任內推行鐵路國有政策，不但因此而點燃了革命之火，也斷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9)載澤

宣統年間，少年親貴爭出攬權，載澤以鎭國公而官拜度支部尚書，掌握財政大權，在親貴諸黨中別樹一幟。盛宣懷之得爲郵傳部尚書，得力於載澤之援引爲多。所謂鐵路國有政策，亦是他所贊成的。



(10)李蓮英

慈禧太后跟前最得寵信的總管大太監。在清代末年，他是爲慈禧太后賣官納賄的代理人，朝中的高官顯要，都得伺其顏色官場現形記中所描寫的「黑大叔」，就是他。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目錄

1	照片	
2	榮祿	
3	慶親王奕劻	
4	載振	
5	袁世凱	
6	蔭昌	
7	瞿鴻禨	
8	岑春煊	
9	盛宣懷	
10	載澤	
11	李蓮英	
1	後序	
1	端王、剛毅與榮祿	
75	袁世凱與慶親王	
199	瞿鴻禨與岑春煊	
259	盛宣懷	

下冊

端王、剛毅與榮祿

發生於清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〇〇年）的庚子拳亂，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場空前巨變。此一亂事，直接造成了八國聯軍的武裝干涉，其後乃以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恢復和平。而辛丑和約中我國喪失主權之重，不但是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積數十年難以償還，各國並得在使館區及北寧鐵路沿線駐兵，馴致國防門戶盡失，堂奧洞開；尤其糟糕的是，俄國人藉出兵之機而佔領了遼吉黑三省，以致東北淪入俄國的勢力範圍，更爲此後的日俄戰爭及日本侵略東北種下了禍根。追溯這一場亂事的起源，固然是由於我國的民智落後及全國上下普遍痛恨外國侵略而起，而當時執政人物的態度，尤爲具有決定性的關鍵要素。凌霄一士隨筆中曾有如下一段話，說：

「光緒戊寅，曾紀澤奉簡出使英法大臣，召對時，言及教案。曾氏謂：『中國臣民，常愾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西后曰：『可不是麼？我們此舉，何能一日忘記，但是慢慢要自強起來。你方才的話說得很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是時西后之見解如此。後竟中風狂走，倒行逆施。盡其心理，公讞可忍而私忿不可忍也，罪魁之貫，舍彼其誰？乃諉過臣下，誅殺多人以自解於讎，毫無悅

怍之意，誠所謂哀莫大於心死矣。」

光緒戊寅，卽是光緒四年。那時德宗光緒有後來的戊戌政變及洋人反對廢立之故，所以慈禧太后同時垂簾聽政。由於還沒心他的安危，並且公然反對慈禧廢光緒而另立溥儁，看她與曾紀澤的對話便可知道。但在戊戌政變之後的，由於各國列强對光緒表示同情，不但關、經元善等人給予政治庇護，於是乃使慈禧的理性企圖，又將慈禧所切齒痛恨的康有爲、梁啓超能忍公讎而不能爲之喪失，而義和團的仇教排外主張乃得到慈禧的贊同。凌霄一士隨筆所說慈禧忍私忿，指的便是這一事實。此書中另有一段續論此事，說來更見具體，亦爲引敍如下：

「庚子義和團之亂，召八國之兵，遂有辛丑條約之訂立，創深痛鉅，中國蓋幾於不國矣。故事後道及義和團，莫不痛加詆斥，視爲妖孽。然溯其動機，蓋起於洋人以傳教爲侵略之陰謀，入教者挾外人之勢魚肉良民，無所不至，有司迎合政府懼外之心理，務抑民以伸教，民間疾苦，無可告訴，義憤所激，遂取仇外以自衞之行動。而外人鎗砲之可畏，人盡知之，義和團乃以『諸神附體，鎗砲無靈』之說起而號召，蚩蚩之氓，翕然附和，亦固其所。西后方銜外人以國事犯待康、梁，不肯引渡之怨，復以欲謀廢立，見格於外交團，驟聞義和團有神術足以殲外人，因利用之以洩忿，而大禍成矣。梁啓超嘗論此事謂：『義和團實政府與民間之合體也，而其所向之鵠各異。民間全出於公，愚而無謀，君子憐之。政府全出於私，悖天不道，普天嫉之。』實爲中肯之語

。」

這一段話，把當時義和團所代表的人民仇外思想，與政府利用民衆運動以圖達不正當企圖，分析得極爲清楚，足可使我們知道庚子拳變之由來，究竟爲何。但議想，固不僅由外國列强之侵略而來；外國傳教士之恣肆凌虐，中國奸民藉教會勢力小民積怨難伸，日久必求報復洩忿，此方是人民仇外思想之形成主因。胡思敬國聞案」一條就說：

「甲午議和以後，中國畏敵如虎，教士勢力日益滋長，奸民失業者從之如歸。浸而告訴無門，私相仇殺，或以口語相怨惡。教士受教民播弄，遇事不關白地方官，輒訴之領事。領事詰外部，外部得夷書一紙，慤然恐開邊釁，即請旨嚴詰督撫。督撫責州縣保護不力，不問事曲直，輒劾罷之。於是外吏以媚夷爲得計，選人捧檄出都，不暇問缺肥瘠，聞屬額手稱慶。報館懼封閉，奸商苦關卡需索，出貲賃隣取洋旗，十居八九。粵人籍叢林，議改學堂，順德某僧挾金赴洋行保險，遂免。近十餘年來，民畏官，官畏督撫，督撫畏外部，外部畏公使領事，內外隱忍，層累壓制，民積怨不伸。好亂者掉弄筆舌，因之鴟張破，浸成不可收拾之勢。考世變之積非成是，牢不可者，當知中國之弱不弱於甲申、庚子之失敗，而弱於總理衙門外務部之媚夷，可嘆也！」

胡思敬所說的情形，雖然已是庚子拳亂以後的事，但外國教士之橫行恣肆與中國教民之倚勢

欺壓良善，則是在庚子拳亂以前早就普遍存在的事實，否則拳匪就不可能以燒教堂及殺二毛子作爲號召人民普遍仇外的口實了。梁啓超說，義和團的排外運動是政府與民間結合而成的，這話實在很有道理。不過，慈禧太后雖是一手促成拳亂的罪魁禍首，而她之所以決定走上此一道路，也還是受了當時一班當政人物的影響。由於這些當政人物各有不良企圖，多方慫恿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從事排外運動，最後方使慈禧太后作成此一錯誤決定。追源禍始，慈禧無可卸脫，當時那些當政人物之導致慈禧太后蹈犯此一重大錯誤，厥罪亦復相當。這一層，研究近代史的學者專家們早就有了共同的結論。只是，一般認爲幫同慈禧太后闖下這一大場滔天大禍的執政大臣，除了端王載漪與軍機大臣剛毅二人的罪孽最重外，較輕一些的，亦只是毓賢、徐桐、啓秀、趙舒翹、載勛、載瀾、英年等人而已。這些人在簽訂辛丑和約時經聯軍當局提出要求懲兇，業已由清政府分別按斬首、賜死、流放等分別定罪處置，而其中獨無榮祿。榮祿不僅如此，在和約簽訂以後隨同慈禧及光緒回鑾，仍舊在京中做他的領班軍機大臣，安享尊榮，以迄於死；後世史家，亦不曾有人做過摘奸發伏的工作，正確地指出他在庚子拳亂時所犯的罪孽，實應與端剛諸人同科。爲此，我要把端王與剛毅、榮祿這三個人放在一起來寫，藉以說明他們在造成庚子拳亂這一件空前大變之中，所扮演的是些什麼角色？以及在歷史上應當擔負何等樣的責任？

載漪，本是宣宗道光帝第五子惇親王奕誴之次子，於慈禧爲姪，於光緒則爲堂兄弟。奕誴有八子，其中有封爵者凡五人：長子載濂，貝勒加郡王銜，庚子拳亂後革爵，由四子載瀛襲貝勒

，次子即載瀾。三子載瀾，五子載津，俱輔國公。

清朝的制度，除了奉旨「世襲罔替」的親王可以世世承襲親王以外，其餘封爵，自親王以至輔國將軍，在父死子繼時照例要降一等承襲。所以奕譞雖爲親王，其長子却祇能襲封貝勒加郡王銜，餘子只能封公。奕譞在道光二十六年初封爲惇郡王，光緒十五年奕譞死，其長子載瀅封貝勒，加郡王銜。到了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拳亂，載濂因庇護拳匪被外人指爲禍首之一，革爵，改由載瀛襲爵。在這裏，看起來便不免有了些問題：既然奕譞一支下的承襲爵位最高不過貝勒加郡王，而且已由長子載瀅承襲，奕譞的次子載漪何以反能被封爲郡王呢？

端郡王載漪的封爵，原本是由瑞親王綿忻的封爵降襲而來。綿忻是清仁宗嘉慶皇帝之子，排行第四，爲排行第二的宣宗道光帝之弟，早在嘉慶二十四年就被封爲瑞親王。綿忻死於道光八年，只有一個兒子奕約，當綿忻死時尚祇滿一週歲。奕約長大後襲封瑞郡王，改名奕誌。到了道光三十年奕誌死時，連兒子亦沒有，得有封爵的皇子因無嗣而致「國除」，未免可惜，繼立的咸豐帝就叫奕譞的第二個兒子載漪前去承繼，襲爵爲貝勒。這樣一來，奕譞就有兩個兒子得封爲貝勒了——如其不然，載漪頂多只能封個輔國公，離貝勒還差兩等，要想封爲郡王，差得更遠啦！封建時代的皇帝，在自己的家族要等於就是族長。他利用皇帝和族長的特權，指定由某人承繼某人的爵位，作爲此人的嗣子，誰也沒有反對的餘地。可是，這誰可以繼承誰又不可以繼承，就是皇帝的權衡了；他要藉此照應他父親一支下的叔伯弟兄姪兒，這些人當然可以藉此多沾潤澤。載漪

由惇王的次子出繼爲瑞王的嗣子，由此而得封貝勒，正此之類。可是綿忻與奕約的本生父瑞懷親王綿忻傳敍此云：

「咸豐十年，進封端郡王。循故事，宜仍舊號，更名端者，述旨誤，遂因命以惇親王子載漪爲奕誌後，襲貝勒。光緒十九年，加郡王銜。十九年九月，授爲御前大臣。

所謂「述旨誤」，乃是軍機大臣承奉皇帝或是太后的旨意時把載漪應封爲瑞郡王誤寫爲端郡王之謂，既然已經寫在書面上，就沒有再加更改的道理。所以綿忻與奕誌之後，照例只能襲封貝勒。他之所以能够進封爲郡王，似與他之善於趨承鑽營有關係。

載漪出爲奕誌後，由於軍機大臣在撰寫書面旨意時把載漪應封爲瑞郡王誤寫爲端郡王之謂，乃是軍機大臣承奉皇帝或是太后的旨意後退至直廬擬具書面的旨意時，就糊裏糊塗地變成「端王」了。

光緒皇帝的皇后葉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內姪女；她的父親桂祥，就是慈禧太后的親弟。桂祥有三個女兒，長女即是後來尊崇爲隆裕太后的光緒皇后，次女即端郡王載漪的福晉，三女則是輔國公載澤的夫人。桂祥之弟兆祥亦有一女，嫁與貝勒載澍，後因夫妻反目之故，被兆祥之妻赴慈禧太后之前，竟慘遭痛責，並長期禁錮高墻，形同罪囚，由此可見慈禧母家勢力之大。

載漪娶桂祥之次女爲妻，不知道是否出於慈禧之指婚與否？但不管是出於慈禧之指婚與否，載漪在這件婚事上必然居於主動的地位，否則他又如何能得到慈禧太后的歡心，至於要以姪女嫁與載漪爲

妻，藉以加强彼此間的親誼呢？光緒大婚，在光緒十五年之正月；其後不久，載漪就由貝勒進封爲郡王。由這一連串先後而來的變化，可知載漪能得慈禧之歡心，而其原因則與他之善於趨承阿諛大有關係。到了戊戌政變發生，光緒失歡於慈禧，慈禧欲行廢立而先以載漪之子溥儁爲大阿哥，儼然是皇太子的地位，載漪在慈禧跟前極爲得寵的事實，也就更加明顯了。

清史瑞懷親王綿忻傳內所敍的載漪事蹟，極爲簡略。而私家文集中又別無載漪傳記，不得已祇好從筆記及野史中去搜輯一鱗片爪，藉作瞭解載漪其人之用。日本吉田良太郎所輯西巡回鑾始末記卷二，有一條說：

「端邸以近支王公，謀竊神器，其驕暴樂禍，性使然也。或傳其父惇親王有隱德於太后，故太后親之。戊戌政變，漪與其兄載濂，其弟載瀾告密於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營，而禍自此始。大阿哥既立，欲速正大位，其謀甚亟，而外人再三尼之。故說者謂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憤，實私仇，誠篤論也。」

這條記載說到載漪之得爲慈禧所倚信，事因戊戌告密之功，不知其說何據。一般而言，戊戌告密，袁世凱告之榮祿，榮祿又告之慈禧，載漪兄弟在這裏面所扮演的是何角色？不能詳。另外則郭則澐所撰的十朝詩乘卷二十三，有一則云：

「國朝自康熙後不立儲宮，光緒初元，懿旨於異日繼統承祧者，固已權衡至當。至是東朝再

訓政，忽別議爲穆宗立嗣，蓋預爲廢立地也。近支中惟端王福晉出入椒掖，承眷特隆。吳納賽宮詞所謂『佛香高閣盤旋上，親挽簾輿有福金』者，卽詠其事。溥儁得立，實由此。此時朝士雖無敢昌言抗議，而私憂竊嘆，每見篇章。黃公度感事詩云：『誰知高后垂簾日，又見成王負扆圖。』又云：『怪事聞呼奈何帝，侮詩敢唱厲憐王』，皆寓諷諫。李亦元陶然亭題壁云：『車走雷聲不動塵，千門馳道接天津。杜鵑九死魂應在，鸚鵡餘生夢尙新。抱瓜黃臺成底事？看花紫陌已無春。漢家陵闕都非故，殘照西風獨愴神。』詞婉義嚴，則春秋之筆也。」

由這一條記載，更可知道載漪福晉因係慈禧姪女又特被寵眷之故，不但載漪因此而得封爲王，並且連他的兒子溥儁也因此而沾了光，得立爲大阿哥，隱隱然要取光緒而代之了。只是，溥儁之得立爲大阿哥，雖由慈禧對載漪夫妻之寵信而來，却未能得到各國使節之贊同，好事多磨，遂致載漪因此而遷怒及於洋人。李希聖庚子國變記敍此，云：

「戊戌八月，者，皆以攻康有爲名，稍與齟齬，則目爲新黨，罪不測。張仲炘，黃桂鋆密疏言：『皇上得罪祖宗，當廢。』太后心喜其言，然未敢發也。上雖同視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危狀，告天下。各國公使又亟請之，太后不得已，召入。出語人曰：『血脈皆治，無病也。』太后聞之不悅。已而康有爲走入英，英人庇焉。遂以李鴻章爲兩廣總督，欲詭致之，購求十萬金。而英兵衞之嚴，不可得。鴻章以狀聞，太后大怒曰：『此

讎必報。」時方食之，無所成而返。

載漪恐，遣人風乃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爲大阿哥，天下譁然，經元善等連名上書，至二千人言。太后及載漪內各公使入賀。太后亦召各公使夫人飲，甚歡，欲遂立溥儁。各公使不聽，有違將以兵力脅歸政，日夜謀所以報。會江蘇糧道羅嘉杰以風聞上書大學士榮祿言事，謂『英人因盡攬利權』。榮祿奏之，太后愈益怒。……」

慈禧太后因外而愈益憤怒，遂欲「必報此讎」，其情形大致如上。只是，上文所說，江蘇糧道羅嘉杰奏報「英人將以兵力脅歸政」而「榮祿奏之」之說，據胡思敬國聞備乘卷四所記，則又以爲奏其事者乃是端郡王載漪。原書「孝欽仇恨外人」一條說：

「康黨既敗，太后再出垂簾，外人頗有違言，上海各國領事因欲聯盟逼太后歸政。江蘇道員羅嘉杰聞其謀，密告政府，電函爲端郡王載漪所見，懷以奏太后。太后大惡之，噤不敢發。及己亥謀廢立，英公使私探其情於李鴻章。鴻章力辨其誣，因留之飲酒，徐試之曰：『頃所言，僕實毫無所聞。設不幸而中國果有此事，亦內政耳，豈有鄰好而肯干人內政乎？』英使曰：『鄰國固無干與之權，然遇有交涉，我英認定光緒二字，他非所知。』鴻章以告榮祿，爲太后所知，益恨之刺骨。此庚子拳亂事件的史料極多，其中有一種名爲「景善日記」的，據說乃是庚子拳亂時一位

退職居家的前任內務府大臣景善親筆書寫的日記，記載庚子拳亂發生時京中逐日動態及政府要員的言行議論，史料價值極高，很久以來，都被中外史家視爲研究義和團事件的重要史料。此日記中，在光緒二十六年的五月廿四日，也記有外國使館致函清政府要求慈禧歸還政權之說，原文如下：

「今日召見王公、六部尚侍、九卿等垂詢一切。嗣由端王、啓軍機、那閣學、將各使適才致送之照會呈覽。該照會竟敢請老佛立時歸政，將大阿哥革職，仍請皇上復位，兼之由彼族請皇上允准，一萬洋兵來京爲彈壓地面。剛相云，以未曾見慈顏如此之怒容。康梁之變，雖大發雷霆，尚不如此之甚也。老佛有言：『彼族焉敢干預予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現老佛定准立決定死戰，慈意所屬，雖沐恩甚深之榮相，亦不敢勸阻，恐生意外之故也。」

上文所說的「啓軍機」，即軍機大臣之一的啓秀；「那閣學」，即內閣學士那桐；「剛相」，即協辦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剛毅；「榮相」，則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榮祿。以上諸人，俱係滿人，在辛丑和約締定後，除了榮祿與那桐，都被聯軍方面指爲縱容拳匪，釀禍召釁的罪人，分別由清政府定罪有差。再據同一書的後文所記，則榮祿在後來曾經查明，此一引起慈禧太后極端震怒，決定不顧一切地與各國開戰的照會四款，原來是端王載漪授意軍機章京連文冲僞造，藉以刺激慈禧發怒，達成載漪、剛毅之宣戰目的者。果如所說，則庚子拳亂之所以會終於釀成八國聯軍的滔天大禍，載漪的罪孽，實在是死不足惜。只是，此一所謂史料價值極高的「景善日記」，在民國

廿九年時，曾經史學家程明洲先生考證，實係出於僞造，其目的蓋爲另一牽禍要人榮祿洗脫其罪名。所以日記中不但處處記述榮祿之竭力反對縱拳釀禍，以見其忠誠爲國之高尚品格，即使榮祿本人曾有縱拳釀禍的行爲，亦不惜嫁罪他人，以謀爲榮祿脫禍。上文所引述的照會四款，便是極顯著的一例。程明洲先生的考證原文，見於燕京學報第二十九期，其中本來沒有深究此一款的首先提出之人，究竟是榮祿還是載漪。但我們若留心在別的有關史料中探索，便可查明此一事件的眞相，並確信程明洲先生的考證結論極爲正確。

庚子拳亂發生後，清廷方面，有五大臣先後因反對與各國開戰而被頑固份子指爲勾通外國的「漢奸」，慘遭刑戮。這五大臣，乃是太常寺卿袁昶、吏部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時稱爲「五忠」。袁昶在生前寫有日記，關於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慈禧因外國照會脅迫歸政而致大怒一事，日記中亦有記載，但其內容却與景善日記所說的完全不同，引敍如下：

「決戰之機，由羅糧道嘉杰上略園相國書，稱夷人要挾有四條，（原注云：『相出示同列，其一條稱請歸政，不知確否？各公使無此語，豈出於各水師提督照會北洋耶？北洋不以上聞，而羅輕啓當國者，此人乃禍首也。』）致觸宮闈之怒。端邸、徐相、剛相、啓秀等又力主懲治外人，推桿之幾遂決。推原禍本，蘇糧道羅嘉杰密稟大學士榮祿所稱夷人要挾四條，多悖逆語云云，乃五月二十三等日聖慈所由激忿，王貝勒等衆情所由憤怒，兵衅所由驟開。然羅嘉杰所

稱，即非各國提督照會裕祿，亦非天津各領事揚言此說。各外部大臣，係爲保護使臣，助剿亂民，斷不干預中國國家時戰未交綏，何所施其要挾？可知羅語妄誕不根，拿問，訊明嚴懲不可。」

袁昶在庚子拳亂時原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對於外交事務頗爲熟諳，也這一番推測分析，深合實情。假如當時執掌實際政權的軍機大臣榮國情勢。他的糧道羅嘉杰的此一密稟之後，先經過一番研究推敲，或與當時熟悉外情的許景澄袁昶等人詳密考慮，確定其消息來源並不可靠，便那就不致因招當在奏明慈禧太后之後，治以輕率密稟，實爲禍來誤會而釀成後來的滔天大禍了。

關於這一層，後文所引的吳永「庚子西狩叢談」中另有詳細論述，可知此事不當而起，榮實因榮祿之處置，張皇入告，比之羅嘉杰之輕率，其咎甚重，而竟亦不加分辨召禍的「戰犯」，榮祿幾乎亦列名其中。只因榮祿長袖善舞，又能清廷懲治釀釁之枝旋，終於使榮祿得以安然脫身事外，不但坐加太保，卒贈太權大臣李鴻章爲之斡旋，終於使榮祿得以安然脫身事外，不但坐加太保，卒贈太忠，終其身榮寵無比。由於他之終身居於顯要，當他便需要洗刷他當年造成此一大禍的罪愆，甚至不惜僞造史料，以便嫁禍他人。程明洲先生考定了景善日記出

於僞造，景善日記中有關這一部份的記述，便可知道是榮祿嫁禍載漪的詭計之一了。榮祿之爲人如何？日人佐原篤介所撰的「拳事雜記」中有一則名爲「記客談某中堂事」，所指卽是榮祿，頗可與程明洲先生所說相參看。

「拳事雜記」原文說：「惟庚子九月，有客造余廬而問曰：『頃者剛毅既死，吾子以三大罪論定之說，誠當矣。雖然，自戊戌八月以後，北京政府執大權者，某中堂與剛毅並稱。奪政之事，某中堂謀最多，事後則剛毅負謗獨深，某中堂不及也。及排外議起，某中堂主持最先，事敗則外人又以其罪並歸剛毅，亦不及某中堂，其果操何術，抑比之剛毅有巧拙之分耶？』余答之曰：『是誠然矣。雖然某中堂內主陰陽，外博時望，海內人士，爲之延譽者甚多，非詳語之則不足以盡事實而抉幽隱。吾子其粗略言其所以，願卒聞之。』客曰：『某中堂之給事內廷也，在三十年前；及初得志任步軍統領時，與今上師傅常熟相公爲最不協，而與提督董福祥稱最善，任西安將軍時，深結之。暨重入京師任尙書，親見兩宮嫌隙日深。是時上倚常熟，委任甚隆，某中堂則大恨，而無如之何，益自親附於太后。數預宴見，陳密謀，因力言董福祥可任，召赴京師，又令御史某上奏，請太后觀香山京營兵，厚加賞賜以要之，俾應緩急。謀既定，則先以全力退常熟相位，以翦其羽翼，已則任直隸總督，爲北門鎖鑰，以制京師。復謀奏請太后幸天津，觀操，乘間出京，以制諸軍，將以其時行大事，皆某中堂之謀也。及八月事發，某中堂乘傳直驅京師，遂入政府。先是，軍機章京林旭與某中堂有舊，曾入其幕中，七月間，方爲上信任。某中堂恐

所謀萬一不成，則無以自立於上前，故其時致林信，通殷勤，多寓依託。至是乃使御史奏促誅之，而外對人言極力保全而不得也。與端邸尤至密，大阿哥之立也，實某中堂一人主謀，剛毅並不預聞，事後剛猶恨之。以屢電，欲悉誅之。賴仁和營救，得免與大獄，而謀廢立，西人每力阻之，尤恨經求經甚急，西人復力保之，則又團適起京師，因力保可用於太后之前。至五月二十日，遂奉命督兵親攻使館。痛剿匪，則大不懌，以書致聶曰：『貴部裝束頗類西人，故團民不無誤犯。團忠義之忱，似不宜行剿戮，惟公愼之』云云。方攻使館命下，上焦甚，無如何節制，如何？』某中堂直對曰：『若董敢如此，臣得以軍令斬之！』上默然。此當日情事如此。及後數日見事不順，則又持兩端。因又有電致南方一舉，則用意。然則合前後觀之，某中堂之視剛毅，孰巧乎？』余曰：『噫，拙乎？孰巧乎？』一翻覆，黨派歧出，是非恩怨之說日以淆亂，余不能辨。請以子所言，公諸當世可也。』」

這一段話洋洋灑灑，幾一千言，概述榮祿之善於投機取巧，兩面討好，事敗則諉過於人，可說曲盡其態。凡此所述，由於在清末以來的稗官野史中極少見有如此坦率明白的敍述之故，看來頗與榮祿之生多口碑，卒諡文忠的眞實情形不盡符合，因此又不免使人懷疑這所說究竟是否實在？因此我們需要先將榮祿的生平事蹟覆按一番，以爲查證比較之用。

榮祿，字仲華，姓瓜爾佳氏，乃是滿洲的正白旗人，初以父祖餘蔭賞主事，屢遷至戶部侍郎

兼總管內務府大臣。光緒嗣立，榮祿已官至工部尚書兼步軍統領，甚得慈禧太后之倚信。其後乃因意圖排擠軍機大臣沈桂芬之故，反爲李鴻藻、沈桂芬、翁同龢所合力排斥，出爲西安將軍，淹滯不振者幾二十年。到了光緒二十年，方因得到恭親王之汲引，再授步軍統領。由此再陞尚書，晉授協辦大學士，重復又見繼用。關於他因與沈桂芬交惡之故而左遷西安將軍，二十年不調的情形，筆者前撰翁同龢一文時亦曾提及。榮祿與翁同龢本來私交甚篤，由於翁同龢在這件事情上出賣了他，所以他恨翁刺骨，後來翁同龢之被排擠去官，未嘗不是由於榮祿的修怨報復之故。在這方面，佐原篤介的敍述可謂頗能得其肯綮。翁同龢是帝黨，當然要攀附慈禧太后，藉帝后不和的情勢助后傾帝。戊戌政變，雖因袁世凱之告密而起，而榮祿在得到袁世凱的密報以後立卽專程晉京面稟慈禧，慈禧隨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一舉逮捕新黨，盡翻朝局，光緒因此被囚，慈禧再出臨朝，凡此卽是榮祿後來以軍機大臣而兼掌北洋兵柄，成爲朝中最具實權的宰相之由來。佐原篤介文中歷敍他在戊戌政變前後的宦途升沉及投機善變情形，大致與榮祿的實際行事相合。文中的「常熟」相公，卽翁同龢。至於他厚結甘肅省提督董福祥及驅令董軍圍攻北京使館的情形，很多史料都爲他儘量洗刷，如前述之「景善日記」，迹象更爲明顯。引敍一段如下：

「六月初四日。戌刻，剛相來談，云：董軍門今早至榮相府第請謁，因意欲借大砲也。先是，司門者未敢回上，令董等候一小時之多。於伊入見之後，頗有暴躁之態。榮不應，隱几而臥。

1167113

董不悅，乃榮相，當不難邀允，大臣早已退值，准其進見？適老佛畫竹字花，雖大怒董之無禮，命太監將伊帶進。老佛言以『又以使館盡燬入告乎？從上月以來，聞知此耗已有十次，所惜者，不眞也。』董面奏以『奴才應請慈恩將榮祿革職，伊實漢奸，心謀不軌，雖迭蒙老佛之命，令將洋人從速滅盡，仍不肯借我軍所用之大砲。』老佛益怒，命伊緘默，云以『汝挾有夙仇，妄言他人所不敢言。汝本係甘肅土匪，竊浪效力，積有微勞，予恩寬大，既往不究。但現時汝之舉動形同寇賊，大有尾長不掉之勢。今日汝豈非曠典耶？現命立時退出，再不許擅行入內，免有他患』，等因。主要意思在說，當庚子拳亂北京使館被圍攻時，董福祥所統率的甘軍，久攻使館不下，其原因全在董軍缺乏攻堅所需的大砲，故而亟亟向統領武衛軍的榮祿索討。假如不是榮祿之堅持不予，董軍一得大砲，使館就非被攻破不可。那時，使館中人勢將盡遭屠戮，而此後辛丑和約中的賠償數目也更將大到不可收拾。就此而論，庚子拳禍之未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實在是榮祿的居中調護之功。按，此卽是榮祿所自誇自詡的「功績」，而其實際情形並不如此。他不具論，卽以董福祥在兵敗被譴以後所寫給榮祿的一信而言，所暴露的事實，就是與此十分不合的。茅乘梵天廬叢錄記此云：

「甘肅提督董福祥受榮祿指，統兵入京，紀律不嚴，率意魯莽，圍攻使館。和議成，有旨革職降調。董以受榮之欺，怨之甚，上榮稟曰：『中堂閣下。謹稟者：祥負罪無狀，僅獲免官，承手書慰問，感愧交併，然私懷無訴，不能不憤極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隸麾旄，忝總師戎，一切舉動，皆仰奉中堂指揮，無一敢專擅者。此固部將之分，而亦敬中堂捨身體國，故敢竭駑力，攖衆怒，冒不韙而效馳驅。戊戌八月時，中堂欲爲非常之舉，七月二十九日電飭祥統兵入京，祥立刻奉行。去年拳民之事，累奉鈞諭囑攻各國。祥以事關重大，遲疑未決，承中堂驅策，故不敢不奉命惟謹。後又承鈞諭及面囑累次，『圍攻使館不妨開砲。』祥始尚慮得罪各國，殺戮其使，恐兵力不敵。祥承此重咎，又承中堂諭謂：『義力攘夷，禍福共之。』祥是武夫，無所知識，但恃中堂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祥雖愚騖，竊不解其故。夫祥於中堂，其力不可謂不盡矣。中堂欲撫拳民，則祥冒死從之；中堂欲攻外國，則祥拼命死鬬。而今獨罪於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且有欲得中堂之元者。祥以報國爲心，自拼一死，將士咸怨，祥不能彈壓，惟中堂圖之。』榮得稟，急送五十萬金，將士賞賚有差，董乃已。」

上面的這段記事說出了一件很隱秘的事實——庚子拳亂之時，由於董福祥屢受榮祿之指揮進攻使館，所以在辛丑和約簽訂之後，榮祿因此而頗受董福祥的挾制，至於不得不斥巨金以使其緘口不言。假如榮祿在拳亂之時沒有驅使董軍進攻使館的事實，榮祿對董福祥又有何忌憚可言？而

董福祥的信中更曾透露，當亂事未成之時，榮祿也是贊成招撫拳匪而用之的！然則佐原篤介所說，榮祿於拳事初起時本與端王剛毅等主張相同，及義和團董福祥軍屢攻使館不下，始知事機不順，然後又陰持兩端，致電南方諸省表示未嘗贊成對外國宣戰而力不能挽回，以爲預先卸責之地，實在可說是史家的直筆，既無諱飾可言，亦不曾冤枉了他。江庸所撰的趨庭隨筆，亦有一條類似的記載說：

「庚子拳匪熾時，前參謀總長張懷芝子志，時方爲榮相武衞軍礮隊長。一日，詔諭榮相礮轟東交民巷，榮祿乃召子志轟擊。子志不奉命，問榮祿：『太后眞欲燬使館耶？上諭給中堂，懷芝走卒，不知有上諭。果決意轟使館，請中堂發手諭。』榮祿局促曰：『太后不聞礮聲，吾不能覆命。』子志笑曰：『太后欲聞礮聲，此易事耳，今夜當有礮聲。』榮祿喜，語子志曰：『汝退，好小子，有出息！』子志爲榮祿所激賞，由此始。」

這也是一條很明顯的證據，足以證明榮祿在慈禧太后決定圍攻北京使館時，他不但不敢抗違慈禧的意旨，而且對礮轟使館的諭旨亦奉命惟謹，並不顧慮到使館攻破之後將會造成何等嚴重的後果。但當張懷芝堅持要榮祿頒發手諭始能執行此一命令時，他却躊躇退縮了。張懷芝爲什麼堅持要由榮祿頒發書面的命令以後方能付諸執行？是不是由於此事所可能造成的後果太大，到時深恐榮祿拒絕承認曾經由他下令作實彈轟擊，以致張懷芝將有可能成爲替罪的羔羊？還是榮祿屢次有過這種食言背信之事，以致張懷芝不敢相信他的口頭命令之故？這些，都已經是難以明瞭的事

了。不過，由榮祿之躊躇却顧，不難看出他雖然對慈禧太后奉命惟謹，對于可能發生的嚴重後果，他却又不肯自擔責任。由此可知他是一個善持兩端之人。善持兩端的人必定善於見風轉舵，隨機應變。以這樣的性格，當慈禧決定接受載漪與剛毅的撫拳主張時，他應當只有迎附而不致諫阻；何況端王在當時深得慈禧之寵信，他又何敢顯爲抗拒，以致爲自己招來不測之禍呢？在這裏，我們還可以舉出另一段證據，以證明榮祿附和慈禧及載漪的仇外思想之實情。小橫香室主人所輯清朝史料，卷下內一條云：

「庚子以前，北京勁旅，以神機、火器兩營爲最。榮祿又新練一營，名之『虎神』，皆不知其命名之所在也。榮祿語其所親曰：『今之爲患於中國者，非洋鬼子乎？夫洋者，羊也。惟虎吞羊，惟神制鬼，故曰虎神。』後聯軍入都，此營不知所終。」

榮祿在庚子拳亂以前執掌京畿兵權，所以他可以練兵，也可以創立新營。他以「虎神營」來對付爲患中國的洋鬼子，其愛國思想無可厚非。只是他之創立虎神營適在拳匪起事之時，而此營創立之後，又是專門交付與端王載漪，使他可以藉兵力而肆其張牙舞爪的仇外行動的。由此而言，榮祿之創立虎神營，便明顯地寓有迎合慈禧與端王之意了。然則榮祿在拳匪初起時確曾有過附和撫匪袒拳的行動，自無可疑。清史榮祿傳不作此言，後來所流傳的稗官野史又竭力標榜榮祿是明白事理而始終反對拳匪之人，無寧是很失實的記述，需要加以糾正。

費行簡所撰的近代名人小傳，對榮祿頗曾作不客氣的批評。如記述他早年的仕履則說：「晉

太子少保，年僅三十，時號爲寵臣云。」記述慈禧欲行廢立大事時則說：「后數思廢帝，祿老謀，知未可卒行，乃勸后存帝虛名。」記述其貪財納賄之情形則說：「其在樞府，權植財納貨，門煩於市。」記述其智能權術，則說：「趨蹌合度，工善酬酢，與人語不其意以去。」以這樣的人才，自然適合於趨奉酬應。何況貨賄既多，以其餘財灌輸宮結交慈禧左右的給事大佬及進獻太后之用，自然更足以博慈禧之歡心了。由這些地方更可知道，榮祿確實是一個長袖善舞的政治動物，最適於專制時代的官僚政治。當清政府與各國，朝命曾派榮祿與李鴻章及奕劻同爲全權大臣。各國以榮祿所統的武衛軍曾經圍攻使絕接納。李鴻章及奕劻同爲全權大臣。各國以榮祿所統的武衛軍曾經圍攻使榮祿至行在軍機處轉電奏，請將榮祿召回西安行在，慈禧方於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六日降諭，令辦事。在此以前，榮祿徘徊於定州獲鹿一帶，既不敢遵旨入京議和之故，拒赴西安行在，其內心之焦慮惶恐，莫可名狀。而既至西安，慈禧太后又多方爲之庇護開脫，終於得免列入肇禍諸臣的名單之內，而榮祿亦得以利用他的權勢與地位，來僞造有利於他的文獻紀錄，以求脫免於千秋的罵名。吞舟漏網，而附從者得罪，這就是董福祥致榮祿函中譏刺備至的原因了。

以上所述，目的在將榮祿附和慈禧載漪等人的袒拳撫匪行爲查勘清楚，以免讀者錯誤記載所矇蔽，誤信榮祿乃是庚子拳亂時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實際說來，他的咎戾，僅次於載漪與剛毅，而應與徐桐、啓秀等人同科。更因他當時身居中樞重任，甚得慈禧太后倚信之故，

他的錯謬行爲，所造成的不良後果乃更爲嚴重。說到這裏，我們便應該回過來再談義和團與載漪剛毅的事。

義和團本係白蓮教之支流餘孽。白蓮教於嘉慶年間作亂於川陝一帶，清政府擾攘數年，方將大股匪剿滅，而其餘孽仍舊在民間秘密潛伏，未能悉數剷除，「離卦教」的，後來就逐漸演變成了八卦教、義和拳，成爲義和團的前身。羅惇曧「拳變餘聞」說：

「義和拳源於八卦教，起於山東堂邑縣，舊名義和會。東撫捕之急，潛入直縣，乾字拳先發，坎字繼之。坎字拳蔓延於滄川靜海間，白溝河之張德成爲之魁，設壇於靜海屬之獨流鎮，稱天下第一壇，遂爲天津之禍。乾字拳由景州蔓延於深州冀州，而涞水，而定興固安，以入京師。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支，皆出於義和會，其後皆稱義和團。」

根據清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山東巡撫張汝梅所上的奏摺，所謂義和會，乃是各地民間基於「自衞身家，守望相助」而組織的鄉團，其目的專在防禦盜賊，並非專與洋教此時的山東，已因民衆仇視外國傳教士欺壓良善之故，而爲義和拳所逐漸滲入，邪教爲義民，有意袒護。所以在地方上則鼓勵民衆仇教排外，奏報朝廷則混稱鄉曾任山東巡撫時的前一任巡撫，張汝梅任山東即李秉衡，是張汝梅調職後的繼任山東一我也。」「鑑帥」「毓賢，後爲拳禍罪魁之一。他曾對人說：「義和團魁首有二，其一鑑帥，其

巡撫，便是毓賢，李秉衡與毓賢二人，到了張汝梅繼李秉衡爲山東巡撫時，這種情勢已經逐漸形成了。

李秉衡是清代末年有名的廉吏，在當時甚著循聲。當庚子拳亂時八國聯軍攻奉命督師勤王，戰敗兵潰，自殺殉國，不愧是臨危授命的忠節之士。只可惜他在歷史上留下了祖拳釀禍之人，「拳黨」人物的惡名，說起來實以致奪官削謚，在是很可惜的。

由李秉衡的傳記資料看來，他本是遼東海城縣人，字鑑堂，以佐雜官直隸時，受及李鴻章，不次拔擢至知府，曾爲北直廉吏第一。其後因事降調同知，山西巡撫張之洞奏調爲文案，薦授朔平知府，漸陞至浙江按察使。光緒十年，中法兩國因越南問題發生戰爭，李鴻章奏其「廉公有威」，請改調廣西，以便整飭吏治，簡練軍實。到廣西不久，巡撫潘鼎新兵敗革職，由李秉衡護理巡撫，在職期間，與督辦軍務馮子材分任戰守，和衷合作，遂有諒山大捷。欽差大臣彭玉麟與兩廣總督張之洞極讚他能調和主客各軍，以致軍心齊一，克奏大功。自此以後，李秉衡的聲譽日起，終於以佐雜起家的非正途出身之人，居然開府山東，做起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來了。

他在做山東巡撫時，治績亦甚有可稱，砥勵廉隅，澄清吏治，在同時的疆吏中稱爲賢者。然而他之扶植義和拳而加以獎許，實爲義和團得以興起的主要原因。羅惇曧拳變餘聞記此云：

「拳禍始於毓賢，成於載漪剛毅，人所習聞，然最初實爲李秉衡。光緒乙未，秉衡撫山東，仇視西人。山東有大刀會，主仇西教，秉衡恒獎許之。丁酉，大刀會殺二教士，德人請褫秉衡職

，不許，轉秉衡川督。德人憾不已，乃命開缺。德人堅謂不足蔽辜，卒革職去。毓賢以至藩司，秉衡所最親善也。及爲東撫，循秉衡之舊，護大刀會尤至。」

又云：

「山東大刀會仇視西教，毓賢嬖借之。匪首朱紅燈倡亂，以滅教爲名，毓賢命濟南府盧昌詒查辦。匪擊殺官兵數十人，自稱義和拳，建『保清滅洋』旗，掠教民數十家。毓賢庇之，出示改爲『義和團』。匪樹『毓』字黃旗，掠教民，焚教堂，教士屢函乞申理，總署令保護，毓賢均置不問，匪勢愈熾。……」

光緒乙未，即是光緒二十一年；丁酉，則二十三年。由此可知，義和團始起的時間便是在這一段時間內，而最先加以扶植嬖借的則是李秉衡，其後乃有毓賢。李秉衡爲什麼要扶植拳匪邪教？這是一個頗難索解的問題。若以外國方面的記載爲參考，則聯軍統帥瓦德西的拳亂筆記曾說：

「中國排外運動之所以發生，乃由於華人之漸漸自覺，外來新文化，實與中國國情不適之故。更加建造鐵路之時，漠視墳墓，以致有傷居民信仰情感。重以近年以來，瓜分中國常爲世界各國報紙最喜討論之題目，復使中國上流階級之自尊情感深受刺激。最後更以歐洲商人時常力謀損害華人以圖自利，此種閱歷，又安能使華人永抱樂觀？至於一二牧師作事毫無忌憚，以及許多牧師爲人不知自愛，此則吾人不必加以否認懷疑者。」

這些話足以說明，由于西方勢力之侵入與中國人深受侵略壓迫之故，自高階層的上流社會人

物以至低階層的一般民衆，對外國人都存着普遍的惡感；加以外國傳教士之利用教會勢力欺壓愚民，遂使頑固守舊的民衆反感愈深。陳恭祿中國近代史說：「山東爲拳匪發難之地，其民迷信深痼，風氣强悍，樂於戰鬪。會遇凶年，人民艱於得食，一方面感受德國侵略之刺激，蠢然思動。無如外人之鎗砲銳利，而力不能勝之。其能勝之者，自羣衆心理而言，惟有神道，義和團之說遂起。」這一論點，若與山東省在此時所遭遇的外國侵略事實而言，誠可謂若合符節。故宮博物院所編印的清季外交史料「中德山東教案類」的文件，僅以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而言，就多達十五件。其因教案糾紛擴大而爲膠澳事件及鐵路事件的來往文件，更多。所顯示的事實，便是由傳教糾紛而引起：

一、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兗州府發生毆傷德國教士案。德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提出强硬抗議，要索多端。山東巡撫李秉衡以德國要求無禮過甚，不肯曲從，並自請處分。

二、前案未結，二十三年十月，鉅野縣又發生德國傳教士二人被匪殺死事件，德國乘機出兵强佔膠澳。清政府交涉甫有端倪，十二月間，忽又有曹州府驅逐教民殺害洋人說。德國乘機盡反前議，並增加多項要求。最後膠澳卒爲德有，清政府並允許德國修建膠濟鐵路，以路權予德。

三、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德國鐵路公司所僱路工，與高密縣大呂鄉鄉民發生衝突，初則口角，繼則互毆。鄉民因憤而拔去路樁，德兵遂以保路爲名，開鎗擊斃鄉民二十餘人。山東巡撫毓賢賠償樁價及兵費銀三千四百餘兩，而置高密鄉民之被殺者於不問，事始得已。

四、光緒二十六年正月，高密鄉民以鐵路阻擋流水而發生暴動，圍攻鐵路局之工程處。德國指稱山東地方官保護不力，調兵遣將，大肆威脅恐嚇，經新任巡撫袁世凱飭營捕獲爲首二名，餘衆逃散，事始得已。

從光緒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歷任的山東巡撫是李秉衡、張汝梅、毓賢。張汝梅以善酬應及工經營著稱，宦囊甚豐而政績無聞。至於李秉衡與毓賢，都是在地方上很有表現的「賢吏」。他們不滿意德國侵略者及外國傳教士之恃勢橫行，壓迫良善，對於那些倡言滅洋滅教的會匪有所左袒，自然是無可厚非的事。只是，他們以爲袒拳卽所以保民，滅教卽可以滅洋，這種觀念，所犯的錯誤就太大了。尤其是毓賢，其人思想頑固而知識落後，誤以會匪所倡言的神權迷信思想爲可信，以爲中國如欲盡驅洋人，卽應借重會匪所憑仗的神力，這種謬妄荒誕的錯誤認識，更使當年的教匪餘孽得以乘機發展，與民衆仇教排外的思想相結合，造成了一股不可遏阻的力量。於是乃有後來的庚子拳亂事件。

毓賢，就是劉鶚在老殘遊記中所描寫的「清官」玉賢，其行事之刻毒與頭腦之頑固，讀過老殘遊記的人對他一定留有深刻的印象。凌霄一士隨筆中曾有一段批評他的話，說：「毓賢官山東曹州知府時，卽大著酷吏之名。然勤政事，勵操守，嚮亦日起。上官力薦之，遂洊歷封疆。在晉屠殺外僑，慘無人理。然仇外實秉朝旨，而以積忿外侮之憑陵，遂躬爲屠伯而不顧。其事至謬，其心則不無可諒，不學無術害之也。」此云毓賢之行事荒謬是由於「不學無術」所害，其論點極

爲正確。而且不僅毓賢一人如此，卽是當時一班竭力爲拳匪張目的當政人物，如剛毅、載漪、徐桐、啓秀等人，又何嘗不是一些「不學無術」之徒？盲動的羣衆，盲目的仇外思想，存心以神權迷信欺惑民衆的拳匪，再加上一些不學無術的當政領導人物，這一切的一切，合起來就成了光緒二十六年的庚子拳亂，說起來眞是可嘆之至。

毓賢於光緒二十五年二月繼張汝梅爲山東巡撫，至同年十月，卽命毓賢來京陛見，而另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毓賢之召還，據清史本傳所記，是由於他繼任山東巡撫之後，「護大刀會尤力。匪首朱紅燈搆亂，倡言滅教，自稱義和拳，毓賢爲更名曰『團』，建旗幟皆署毓字。教士乞保護，置勿問，匪浸熾。法使詰總署，乃徵還。」此時清政府對山東民教衝突迭起所持的態度，是「著袁世凱嚴飭各屬，遇有民教之案，持平辦理，不可徒恃兵力，轉致民心惶惑。」如遇「拳民聚衆滋事，萬無寬縱釀禍之理」，但亦「不可一意剿擊，致令挺而走險，激成大禍。」可知此時清政府對拳民的態度，已因李秉衡毓賢的影響而不主張一力剿滅。清史毓賢本傳說他在交卸山東巡撫之職，回到北京以後，「至則謁端王載漪、莊王載勛、大學士剛毅，盛言拳民得神助」。這些當政人物相信了毓賢的說法，覺得這些具有神力的義和拳衆正可作爲驅除外國勢力之用，於是使得清政府的對外政策起了根本變化，而義和團入京矣。

義和團由山東入京，有直接與間接的兩種因素。直接的因素當然是由於載漪、剛毅等人的吸引；間接的因素則由於袁世凱繼任山東巡撫後，對拳匪採取不客氣的剿捕政策，以致拳匪無法在

，東存身，由北面向直隸發展，遂致蔓延及於河北省的南部，寖假而至於京師。吳永庚子西狩叢談記此云：

「直隸拳匪，初發生於新城，而盛行於滿水，旬日之間，天津、河間、深、冀等州，遍地皆是。其時大阿哥已立，其父載漪頗恃攬權勢，正覬國家有變，可以擠擯德宗，而令其子速正大位，聞之喜甚，極口嘉歎。諸親貴因爭竭力阿附，聲邀新寵。大臣中亦尚有持異議者，謂：『究近邪術，恐不可倚恃。』然太后意已爲動，顧猶持重不卽決，乃派剛毅趙舒翹前赴保定察看。剛、趙皆爲軍機大臣，甚見嚮用。覆命時，剛阿端王旨，盛稱拳民有神術；趙又阿剛，不敢爲異同。於是派端總率團務，端益跋扈恣肆，而順、直拳匪同時並起矣。」

光緒二十六年初的軍機大臣，共計六人：領軍機禮親王世鐸，其餘五人則分別爲文淵閣大學士管兵部事仍節制北洋海陸諸軍榮祿，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剛毅，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王文韶，禮部尚書趙舒翹。禮王世鐸名義上雖爲領班軍機大臣，其實庸碌一無作爲。王文韶與趙舒翹均爲漢軍機大臣，王文韶軟熟圓滑，時稱之爲油浸枇杷核，其作官之訣竅爲「多叩頭，少說話」，可見他之得爲軍機大臣是出於剛毅之汲引，以致事事阿附剛毅之意旨而不能有所執持。其餘的三個滿軍機大臣，啓秀以諂事道學家徐桐起家，素著清名，只因他之得爲啓秀也是排外人物中的健將。榮祿號爲慈禧之寵臣，自戊戌政變後入軍機，一直最得慈禧太后的倚信。剛

毅爲與榮祿爭奪權勢而互相傾軋，不但挾載漪以自重，而且汲引趙舒翹入軍機以增厚自己的力量。榮祿至此，亦不得不見風使舵，以迎合慈禧及阿附載漪作爲對抗剛毅之法。載漪剛毅在政府中彼此不協的情形，高樹所撰的「金鑾瑣記」一書中曾有記述，說：

關於榮祿與政府的最高決策階層中得勢的原因，在此。

「榮仲華相國爲堂官時，考筆正，剛毅與考，文尚未通。後官至協揆，同爲樞臣，在直廬午酌，剛有不豫之色，以酒杯擊案有聲。榮相問何事？剛曰：『公與崑曉峯各佔一正揆缺，我何時得補正揆？想及此，是以快快。』榮笑曰：『何不用毒藥將我與曉峯毒斃？』二公從此如水火。」

「正揆」即內閣大學士，以別於協辦大學士之稱爲「協揆」。清代的制度，內閣大學士額設四人，滿漢各半。剛毅於光緒二十年以禮部侍郎入軍機，二十二年陞尚書，二十四年再陞協辦大學士，始終兼軍機大臣。而此時在內閣的大學士，漢大學士是李鴻章與徐桐，滿大學士是崑岡與榮祿；這崑岡，便是前文所說的崑曉峯了。崑岡於光緒二十二年四月由協辦陞大學士

不但無法與榮祿爭權奪勢，甚至連補個大學士好與榮祿並駕齊驅的希望也不能實現，如之何不使剛毅氣憤塡膺呢？於是他必需要另外設法。這所設想出來的辦法，便是拉攏未來的太上皇載漪作幫手，以便共同來對付榮祿。據小橫香室主人所輯清朝史料卷下，「剛毅導拳匪入京」一條說：

「孝欽后憤外國之庇康梁，必欲報仇，益恨德宗，思廢之，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儁爲大阿哥，將於庚子正月行廢立，剛毅實主之。力引載漪居要職，寵眷在諸王上。」

溥儁之被立爲大阿哥，我們已經知道是出於榮祿的獻議。現在剛毅爲了要與榮祿互別苗頭，所以他更建議立溥儁爲皇帝，而且就在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的元旦舉行。這一項建議雖因慈禧的不敢付之實施而並未能成爲事實，但是他的另一項建議却得到了慈禧的贊同——就是委派載漪爲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臣兼管虎神營，外交及兵權並歸掌握，權勢遠出當年的恭親王奕訢之上。自載漪出任政府要職之後，榮祿在慈禧太后面前的聲光，頓時就減低了許多。這在剛毅固然自詡爲得計，而另外的問題，也就來了。

剛毅因爲要與榮祿爭權之故而竭力援引載漪，載漪本人，亦很希望在兒子得立爲大阿哥攬權怙勢，好爲未來的廢光緒而立溥儁有所幫助，所以二人意氣相投，甚爲合拍。恰好在前此不久時，因爲慈禧太后以光緒名義降詔立溥儁爲大阿哥，明白宣示是爲穆宗同治皇帝立嗣，隱爲廢立之漸，曾經引起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等人的干涉。慈禧大爲震怒，欲將經元善繩之以法，而竟因國際保護之故，致使慈禧對之無可奈何。於是不但慈禧因痛恨經元善而仇視外人，端王載漪

亦因溥儁之不能速登大位而遷怒洋人，憤無可洩。關於這一件事的經過情形，趙鳳昌所撰的惜陰堂筆記中曾有詳細記述，先爲引述如下：

「經蓮珊元善，上虞芳洲善人之嗣。蓮珊讀書好學，著有趨庭紀述。席其先人之業約五萬金。光緒八九年間直隸大災，蓮珊盡携此五萬金航海至津，親赴災區散放。從此每遇各省水旱，盡力籌振，奉旨嘉獎至十一次。旋北洋創議商辦電報，派盛杏生（按卽盛宣懷）督辦，蓮珊卽與蘇人謝家福招股三十餘萬附入，方能著手，蓮珊卽任上海電局總辦。向留心中外政治，痛中國之不振。予於光緒十五年自粵調鄂，過滬識之。甲午大東溝海軍一熸，至馬關條約，愛國之士羣起，如康長素梁卓如諸君，均集海上，頻相討論，予亦時與諸君晤。至戊戌而新舊衝突，宮廷生隙，旋立大阿哥之命下，遽違本朝祖制。蓮珊感德宗有志振作，甚不慊於此擧。其時盛杏生在京，卽電請上言挽回。杏生覆電僅一語，云：『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蓮珊得此電，以爲大局垂危，乃以候選知府銜名，逕電總理衙門王大臣，大意言此擧有違祖制，中外惶惶，請收回成命。深宮震怒，消息至滬，鄭陶齋卽力勸其姑往澳門暫留，當日卽行。旋杏生與何梅生電，謂經事由予祖護，言官併欲劾予。旋知都下喧傳此事時，御史余誠格卽參盛杏生，謂經係盛用之人，應勒令交出。盛卽上奏：『經係臣辦事所用之人，康有爲乃是余誠格之門生。』此奏針鋒相對，前覆經電，僅作空洞之驚人一語，惹出一場煩惱，關係之際，措詞欠酌矣。立儲本違祖制，內外廷臣竟無一人敢言，乃待疏遠閒員突然電請，蓮珊可謂朝陽鳴鳳，足傳千古。江督鹿傳霖密派道員洪

某來滬，言鹿欲予勸蓮珊回滬，僅辦永遠監禁，決無他慮。予卽告之曰：『我與彼固摯交，此時一親友就獄以候不測之誅？一旦有旨嚴辦，鹿亦何能抗？將來史筆，書兩江總督鹿傳霖殺經元善，亦殊不值。卽指爲康黨。蓮珊著有趨庭紀述刻本，載答康之信，責備甚周，足證不能以康黨罪之。書在此，可帶回寧，望芝帥再思之。』洪去，自此寂然，想已納予言，因恐由粵就近拏辦，予爲函致合肥傅相幕僚徐慶陞，勸合肥勿承內降。合肥卽延爲宕案。經則安居澳門礮臺，爲國際保護。至拳禍事畢，逐以上這段話，述慈禧痛恨經元善，至欲百計鈎致而不能得之情形，甚詳。以下另有一段，則是敍述廢立之謀如何爲外交使團所阻的情形，說：

「戊戌以後，立大阿哥以前，西后急欲行廢立。已亥，合肥在大學士任，一日，法使訪詢果有此事否？外國視一國君主無端廢立，決難承認。午後榮祿往訪，傳西后意旨，欲探外使口氣。合肥卽以今晨法使言述之。合肥知都下不可居，謀出外，旋督兩粵。同時榮祿密電探江督劉新寧。劉覆電有『君臣之義久定，中外之口難防。』李既不能助，劉又有違言，事卽難舉，不得已而先立大阿哥。乃忽有閉員放言高論，謂違祖制，干怒可知。榮祿祇探兩人，因湘淮軍僅存之碩果，不無顧慮，而先探其意，外此疆吏，蓋可置之。榮祿早年爲清流彈劾罷職，南皮，清流推爲黨魁，榮向不與通函電，亦在可置之列。傳言同有電詢，非悉當年之情事者也。」

這一段話論述經元善電請收回立大阿哥成命一事，是在慈禧採詢廢立不成之後，所以經元善此舉更干慈禧之怒云云，讀之當可知慈禧與載漪等人之積忿，至此當更深一層。只因經元善避居於澳門礙臺且受國際保護，非中國官方之力所能及，積憤既深，自然更增加了對洋人的反感。這也就是凌霄一士隨筆等書所說的，慈禧與載漪之所以要策動庚子拳禍，其動機全在「報私仇，非公憤」之由來了。慈禧女流無識，載漪紈袴不學，他們的錯誤荒謬行爲都有理由可說。剛毅身爲軍機大臣，負有「平章軍國重事」的大責重任，在這重要關鍵上如何可以不爲慈禧載漪等人譬說利害，導致他們從正當的途徑上去謀求富國強兵之道，以爲「君子報仇，三年不遲」的長遠打算，反而以神權迷信的義和團來作「扶清滅洋」的愚蠢行爲，置國家民族的命運於孤注一擲呢？在這一方面，剛毅的思想與作爲，看起來便覺得他比慈禧與載漪還要荒謬離奇。

據清史剛毅傳所記，剛毅本是滿洲的鑲藍旗人，由繙譯生員考取筆帖式，官刑部司員。曾經參預楊乃武小白菜與崇厚辱國兩案的審理工作，以此爲慈禧太后所知，先陞郎中，由郎中外放爲廣東的惠潮嘉道。一遷江西按察使，再遷廣東布政使，三遷山西巡撫。自光緒六年到十一年，前後不過六年的時間，就由刑部直隸司員外郎超擢至二品的巡撫，陞遷之速，一時無兩。到了光緒二十年，更由廣東巡撫內調爲禮部侍郎，簡充軍機大臣，儼然成爲柄國的重臣了。自此以後，他的官階愈陞愈高，先則尚書，繼則協辦大學士，駸駸乎與慈禧的寵臣榮祿並駕齊驅。

榮祿之爲人，甚有智略權術，看他在光緒二十五年對付徐桐崇綺請廢光緒帝的那一套，就可知道他極擅於機變，而且他的幕府中也頗有人才。至於剛毅，雖然在慈禧太后看起來頗有幹練之稱，其實則並不如此。費行簡撰近代名人小傳，說他「未嘗學問，而剛愎自是。嫻習例案，以爲當官能事畢。迨任封圻，設館課吏，以爲人材盡在於此。然所課則申呈文結格式及赴官期限，皆人所盡知者，實不關吏治也。所至惟科房吏書言是聽，蓋此輩皆熟於成案，毅奉之若神明焉。」這段話對剛毅的挖苦似乎過分了一點，但是他所舉的既然皆是事實，我們似乎無法加以懷疑。就事實而論，剛毅的出身既然只是一個熟諳滿洲文字的繙譯生員，服官以後所長期接近的又祇是刑部的一些文書例案，如之何不使他以爲當官之能事盡在於此呢？清末野史所傳的許多笑話，關于剛毅的便有好幾條。凌霄一士隨筆嘗爲之辨正，以爲「世傳其種種笑柄，如以『追奔逐北』爲『追奔逐比』，『瘦弊』爲『瘦斃』，稱孔子爲孔中堂，皆惡之者甚其詞，不足信也」云云。然而言之者既然繫繫有據，我們似乎亦沒有理由一概相信牠們是無的放矢。例如劉聲木所撰的萇楚齋隨筆就說：

「滿洲剛子良中堂毅，任廣東臬司時，嘗輯洗冤錄異證四卷，經驗方歌訣二卷刊之，似非胸無點墨者。乃北京傳其一詩，甚覺風趣，云：『堯帝降爲王堯舜驚，皐陶掩耳怕呼名。若賢曾舉黃天覇，遠佞能驅翁叔平。一字難移惟瘦死，萬民何苦不耶生？』因中堂平日素喜稱堯王舜王，皐陶呼爲皐陶（按應讀作「皐遙」）。保舉將才龍殿颺，面奏云：『此臣之黃天覇』。翁叔平中堂

同龢出軍機，中堂極喜，語人曰：『此舉可謂遠佞人矣。』洗冤錄中凡刊『痩死』者，中堂謂乃『痩死』之訛。『聊生』每誤作『耶生』。此詩可謂謔而虐矣。」

上文所說剛毅以龍殷飆爲他的「黃天霸」，亦見於江庸之趨庭隨筆，云：

「剛毅在蘇撫任，奏保周蓮、龍殷飆。吳人爲之詩云：『文有周蓮武殷飆，看他才具亦平常。如何竟作人才保，笑殺滿洲剛子良。』逮剛內用，猶面奏云：『龍殷飆爲奴才之黃天霸』，京師一時傳爲笑柄。周官福建布政使，闒茸無聞。龍官曹州鎮總兵，光緒卅一年曹州匪起，魯撫楊士驤以釀亂劾去之。」

這些記載充份寫出了剛毅之愚妄無識。當國大臣之識見如此，無怪乎義和團所編織的神權迷信思想能爲他們所接受了。但即使如此，剛毅也還是頗有可取之處的。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舉其死後家無餘貲一節，指其不貪；又謂其並無鴉片煙的嗜好。這兩點，正是造成清末政治風氣普遍敗壞的主要因素，剛毅在這些地方能够卓然有所表見，足見他之能邀慈禧太后的寵信，不無道理。再看當時極端迷信義和團的神權思想而竭力主張用之以對敵洋人者，亦有很多著有一節之長的有名人物。如徐桐，乃是當時公認爲最有學問道德的理學家；如李秉衡，毓賢，則是當時最有名的清官與能吏。剛毅在這些地方，似乎也被慈禧太后看作是李秉衡毓賢一流的人物。

封建時代的統治者們最看重臣下的操守。他們以爲，居官而不貪污的人，當國家面臨危難的時候，就不致因顧戀身家財產而不肯竭忠盡節，這樣的人必定是忠臣，是可以倚信的。惟其因爲

封建時代的統治者們存有這樣的想法，所以他們不但鼓勵清廉之臣，也願意加以不次之拔擢，以作爲一般臣僚之表率。李秉衡以出身佐雜微員而得至封疆大吏，毓賢以居官清廉與奏革陋規而得慈禧之嘉賞，都是這一類的事實。剛毅在刑部充任司官時，以勤能受知於慈禧，及出爲外官，又能清廉自守，卓著循聲，自不難由此一帆風順地入軍機，擢卿貳，卒致大用。然而無論是這些人物的道德與操守各有可稱，他們的學問與識見實在太淺薄愚陋。慈禧太后誤以他們的見解行爲與道德操守一般地可信，那就不免要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似地自蹈危地而不知了。庚子拳亂時的情勢，不幸正是如此。在這些釀禍召釁的主要人物中，頭腦比較清楚的，應數趙舒翹。無奈他在重要關頭上所表示的意見，並不能爲慈禧所接受，這樣一來，後果就太嚴重了。

趙舒翹在清史中與徐桐、剛毅、啓秀、毓賢等人同傳，可知他亦被列爲首禍諸人之一。然而他的情形實在與徐桐、剛毅、啓秀、毓賢等人並不一樣。這只要看他在拳禍初起時的表現，便可知道。

趙舒翹，字展如，同治十三年進士，由刑部主事累陞至郎中，出爲安徽鳳陽府知府，不十年，擢至江蘇巡撫，遷轉之速，可與剛毅相比。所以然的道理，則以他居官甚有清名，足以與剛毅李秉衡等人媲美。後來他由巡撫內調爲刑部侍郎、陞尚書，乃是因爲他曾經久官刑曹，諳熟律令，政府當局有意倚用之故。剛毅與榮祿爭權，爲求增厚自己的力量，需要汲引朋類以爲黨羽，而趙舒翹當年曾與剛毅同官刑部，頗爲相得，因此加以援引，於光緒二十五年入爲軍機大臣。軍機

重資歷與官爵，趙舒翹入軍機最後，官位祇是尚書大學士的剛毅，及巳陞協辦王文韶之後；何況刑部尚書在六部尚書中序列第五，又比序列第三的禮部尚書啓秀差了一截。由於這幾種緣故，趙舒翹在同時的六個軍機大臣中，祇能屈居「打簾子」的軍機大臣，而且需要事仰承剛毅的意旨。小橫香室主人所輯清朝史料卷下，「剛毅導拳匪入京」一條說：「及拳匪據涿州，朝議剿撫不決，乃命兼管順天府事尚書趙舒翹，同府尹何乃瑩馳往解散。剛毅慮舒翹或戾己意，自請繼往。」剛毅於此時自請與趙舒翹、何乃瑩同往涿州，其目的顯然是要運用他對趙舒翹何乃瑩的影響力量，儘量作適合其結果仍然差不多。關於這一點，吳永「庚子西狩叢談」中的論述最爲詳盡，需要加以引述。原書說：

「拳匪之事，當剛趙查驗時，是一禍福轉捩關鍵。如此時能將眞實情狀剴切陳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證據，認定主張，一紙嚴詔，立時可以消弭。過此以後，烏合蟻附，羣勢已成，雖禁遏亦已不及。後來釀成如此大禍，趙剛二人，實不能不負其全責。太后謂其「死有餘辜」，確係情眞罪當。剛之爲人，愚陋而剛愎，或眞信拳匪之可恃，亦未可定。趙則起家科第，歷歷京外，開藩陳臬，並皆卓有政聲，而且學問淹通，持躬廉正，此兒戲鬼混之義和團，能否成事，明白易曉，決不至於不能鑒別。第以刦於剛勢，不敢立異　遂致興之駢殉，身陷大戮而死負惡名，未免太可惜矣。」

此云趙舒翹不比剛毅之愚陋無識，彼明知義和團爲兒戲鬼混而不能成事，竟敢顯爲異同，遂致慈禧爲之蒙蔽，誤信拳匪可用，終於釀成大禍，其說甚有見地。但其實在情形則尚不至此，原書中亦曾詳細記述，云：

「近聞某公言及趙事，則尤不覺爲之扼腕。謂當拳匪在涿州時，太后命剛、趙往，趙獨挈何君乃瑩同行。何字松生，本刑部老司員，殊幹練有卓識。二人回京之不可恃，何因爲趙擬就一摺，言之頗甚剴切。趙審閱再三，似礙於端、剛，躊躇不敢上。末謂：『上摺太著痕迹，不如面陳爲妥。』乃先赴榮相處詳悉報告，再見太后覆命，亦經一一據實奏陳。而彼時太后已受魔熱，詞色頗不懌。先時，趙之僚友曾有以大義相責者，趙出告人，謂『幸不辱命，我對軍機、太后均已盡情傾吐，應說盡說，撫心自問，庶幾可無罪矣。』後來點派帶團差使，並無其名，趙益自引爲幸，謂『從此可以脫離關係』云云。某公所言，委係得之當時事實，並非泛泛。準此而論，則趙於拳匪並未有阿附之事。最後賜盡上諭中，祇坐以『畢竟草率』四字，且有『查辦拳匪亦無庇護之詞』等語，即據太后口中所言，亦足證明其始終未言拳匪可靠，參稽互考，情節昭然。祇因當時稍有瞻顧，少此一摺之手續，又夙因剛援引，相處親密，致後來中外責言，均以剛趙並舉，李文忠亦有『剛趙袒匪』之電奏，空言無據，無法辨白，卒陷於不測之大戾。然則彼之失足，不在查驗拳匪之役，而在於受剛援引之時。因失其親，同抱千古蘭濘之恨也，悲夫！」

按，費行簡撰近代名人小傳中，有趙舒翹傳，「舒翹任監司，爲近百年來良吏第一。及入樞府，乃碌碌隨剛毅後，罔有建白。治奉命撫拳匪，一奉命於殺，不敢持異同。坐此爲外人指摘，竟賜死，人無矜其冤者，是可嘆也！」

據此云云，可知趙舒翹在後來已被公認爲阿附剛毅而欺矇慈禧之人，雖枉死而無人矜其冤，還眞是所謂千古寃獄了！由於趙舒翹的寃獄莫伸，後世之人，也就只知道趙舒翹與剛毅扶同欺蔽，而不知道慈禧太后當時已深信載漪、剛毅之言，決心利用義和團從事排外運動，而根本置趙舒翹的直言讜論於不顧，這實在是很可惜的。誠如吳永庚子西狩叢談所說，清政府對義和團的剿撫政策，此時正爲關鍵性的決定時刻，不言剿而言撫，後來的發展，便非政府力量所能控制。在這一件事情上，載漪與剛毅固然如慈禧太后所說的「死有餘辜」，而慈禧太后自己又當如何呢？

李秉衡毓賢袒護拳匪的仇外行動，載漪迷信義和團的神力和法術，剛毅有心利用義和團的排外行動來達到他的政治目的，其結果當然會使仇恨洋人的慈禧太后大爲心動。此時如果再有慈禧所看重或倚信的人物從旁搆煽，那就很容易使這個不知識不足的老婦人走上錯誤的道路，眞的以爲洋人當滅，中國當興，其機會便在此時了。在這時候表示其重要意見與言論的，第一是道學家徐桐，第二便是慈禧太后身邊的親信太監們。

日本人佐原篤介所撰的「拳亂紀聞」中，有一條說：

「當圍匪滋事以後，太后曾召見諸大臣，商議剿撫事宜。諸臣皆無定見，惟徐中堂叩首力爭

，當團匪立意扶清滅洋，實是中國義民，不宜剿辦，以挫其氣。太后以徐爲老臣，所言必不誤，故一意主撫。」

又，王守恂撰「杭居雜憶」記義和拳事云：

「拳匪入京時，太監在孝欽左右爲之先容，謂燒燬教堂，祝禱則火起；且指燒何處，火若聽命，決不延燒他處。孝欽亦神之。大柵欄老德記藥房賣藥，與教無涉也，拳匪率人燒之。此火一起，不可復遏，將北京精華之地一炬成空，直延到正陽門箭樓。拳匪見燒及國門，事已不妙，相率向火祝禱，而火愈猛，自日中燒至日末方熄。次日晨起，拳匪偃旗收械，不見蹤跡，余以爲此事或有轉機歟？未一日，依然勢力膨脹，反勝於前，不解其故。嗣聞人言，太監對孝欽云：『此次延燒正陽門，神仙降言，係因皇上作事不好，天示之罰。』大合孝欽意旨，以此拳匪氣燄不稍退步，轉加厲也。」

徐桐是清朝末年有名的理學家，思想頑固而排外甚力。他在光緒二十二年就做到了體仁閣大學士，雖然資序在李鴻章之後，却以崇尚宋儒學說而惡西學如讎之故，甚合慈禧太后的胃口。所以在戊戌政變以後就極蒙慈禧之優禮，每次上朝至令太監爲之扶掖，以示光寵。慈禧欲廢光緒而立溥儁，徐桐與同治皇后的生父蒙古狀元崇綺，同爲最熱心的贊助人之一，以此與溥儁的生父端王載漪最爲投緣，時人將他稱爲「南山四皓」之一。義和團起事，載漪與剛毅導之入北京。徐桐出門親自迎接，「謂中國當自此强矣」，語見清史徐桐傳。慈禧太后以爲徐桐是有學問的理學名

臣而其言可信，豈知他在這方面的認識，並不比愚妄無識的載漪和剛毅高明，相信他的話，其實也就與相信載漪剛毅的話一樣。至于義和團所宣稱的各種神術，說穿了其實都祇是一些騙人的玩意，只是在拳匪勢大之時，沒人敢冒險開罪拳匪以求得證而已。慈禧太后的親信太監們在此時爲拳匪所作義務宣傳，又將火災延燒及於正陽門一事稱說是神仙示罰光緒云云，恰恰投合了慈禧的意之所好，於是連本來已被戳穿的謊言也被包瞞得天衣無縫了。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與最負學問道德盛名的朝中大臣，都像這樣鄙陋無識，縱使朝中尚有若干明白曉事之人，亦決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在舉朝風靡的情況之下起得了迴轉乾坤之作用的。庚子拳亂之終將演變成燎原之禍，至此已明白如見。

自光緒二十六年的三月間開始，京師拳亂，漸見具體。兩個月之後，慈禧就以光緒的名義頒發詔書，明白宣佈與各國交戰。自此以後，就是圍攻使館及八國聯軍之役。在拳禍醞釀漸成的這段時間之內，載漪、剛毅、徐桐、榮祿以及慈禧太后諸人的言行舉動，在在都對大局居有直接的影響。爲了易於明白起見，需要先將當時所有這方面的記載擇要作一概括的敍述，以見一斑。

柴萼梵天廬叢錄卷二「庚辛記事」云：

「拳匪起於山東，而大禍之發，乃在直隸，東省得安閒無事，則巡撫袁慰庭剿匪之功不可沒也。東省義和團，創始於嘉慶時，蔓延至於直隸，數十年來，人俱視之爲邪教。及毓賢任東撫，頗尊信之，於是直隸古城、清河、威縣、曲周等處之匪漸漸南下，流入東昌之冠縣，自冠縣及於

東昌各屬，再由東昌、曹州、濟寧、兗州、沂州、濟南等處潛萌滋長，至己亥秋間，其勢大熾，然仍出沒黃河以西，而以直隸爲老巢。十一月間，袁慰庭到任，試拳匪妖術不驗，斬之以狗。即毅然以調和民敎，緝辦拳匪爲務，出示剴切曉諭，始派道府大員督同營隊搜捕，並令各屬懸賞購緝。先後拘獲匪首王立言等數十人，置諸極刑，格斃散匪無算。不及兩月，匪勢日衰，地方一律安靖。匪於東省不能駐足，則盡遁而至直隸。……」

己亥，卽光緒二十五年，翌年卽庚子。袁慰庭，卽袁世凱；直隸，卽是現在的河北省。這一段記事，說明了拳匪由山東入直隸的原因，是由於袁世凱做了山東巡撫之後，以强硬的手段對付那些不肯解散歸農而隨處以妖術欺惑愚民的敎匪，剿捕殺戮，不遺餘力，以致拳匪無法在山東立足，不得不北向直隸發展之故。袁世凱因此被義和團痛罵爲漢奸、二毛子，街頭巷尾並貼滿了辱罵袁世凱的文字，然而山東境內的義和團畢竟因此而肅清了。與袁世凱之態度恰好相反的，是此時的直隸總督裕祿。當袁世凱主張對拳匪採取剿捕殺戮的態度時，「裕祿承風指，忽主撫。」（清史裕祿傳中語）於是拳匪由山東北竄直隸後，無所阻擋，發展極爲迅速。梵天廬叢錄「庚辛紀事」記此，續云：

「庚子春間，北直保定、遵化州、綿州一帶，喧傳有神師降世，專收幼孩爲徒，敎以咒語，云能召請先朝名將護身，敎以練拳練刀，功候滿足，卽能鎗砲不入，刀箭不傷。未幾，卽日盛一日，强年壯丁，學信從之，鄉野村莊，莫不有壇，始大張義和團旗號。嗣後從者愈衆。直隸總督

裕祿不之禁，且迷信之。迎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至署，黃蓮鼓吹，百官屏息侍立，如天神降。因是練拳從之者尤衆。更名曰義和團，日夜操練刀矛拳法。」

裕祿，是滿州的正白旗人，在清史中與徐桐、剛毅、趙舒翹、毓賢等人同傳，後來被洋人指爲縱匪作亂的首禍諸人之一。因爲他早在北倉兵敗之後便已引罪自殺，所以未遭顯戮。由他之迷信義和團並以黃蓮鼓吹恭迎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至總督衙門，奉如神明的態度看來，裕祿的頭腦，大概亦與端王載漪、莊王載勛、及剛毅等人差不多。

遣張德成與曹福田，在北倉兵敗之後携帶清政府所發的巨額餉銀逃走，中途被獲囚繫，當年所自詡自誇的神功法術毫不靈驗，可知遣些匪徒所用來欺世惑衆的，不過是些邪門妖法而已。然而上自皇太后王公大臣，下至鄉里愚民，都以爲義和團果然擁有抵禦洋人鎗砲的法術，那就實在太糟糕了。自此以後，「太后遂欲令拳匪滅洋。匪得密旨，因於『滅洋』之上，加『扶清』二字，而滔天之勢成矣。」（庚辛紀事）下面所引，乃是李希聖的庚子國變記，以其紀事時間較爲明白，故與庚辛紀事等書雜引之。

庚子國變記：

「而義和團自山東浸淫入畿輔，衆亦漸盛，遂圍涞水。縣令祝芾請兵，直隸總督裕祿遣楊福同剿之，福同敗死。進攻涿州，知州龔蔭培告急。順天府尹何乃瑩揣朝旨，格不行，蔭培坐免。太后使刑部尚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後往，導之入京師。剛毅等復命，均力言拳民無

他心，可恃。遂焚鐵道，毀電線，至者數萬人，城中爲壇場幾滿。其神曰洪鈞老祖、驪山老母，來常以夜，燎而祠之，爲巫舞欲以下神。神至，能禁槍砲全不燃。又能指畫空中，則火起，刀槊不能傷。出則呼市人向東南而拜，人無敢不從者。以仇教爲名，至斥上爲教主。太后與載漪謀欲引以廢立，故主之特堅。」

又柴萼梵天廬叢錄庚辛紀事：

「四月二十九日，將京津鐵路各車站焚燬，遂乘勢佔據涿州，聲言涿州兵備空虛，洋兵將來，顧爲代守。由是城中萬頭攢動，刀矛林立，如將有大敵者然。朝廷命尚書趙舒翹，順天府尹何乃瑩馳至涿州，相機辦理。剛毅以趙與己志趣不同，恐致決裂，言於朝，願自請行，准之。乃亟馳往，則趙與何已先在。召匪首入見，諭以朝廷德意，不得暴動。而匪首以毓功亭軍門（按卽提督聶士成）嘗痛剿其黨，銜之次骨，答言：須將軍門斥革，始可從命，否則當與一戰。趙以軍門辦事認眞，且其罪尚不至斥革，況宿將無多，正資倚畀，豈可遽言斥退？何亦以其言爲然，不從所請。剛既至，力言拳民可恃，靣不可用，反覆討論，堅持己意。其時何已爲剛言所惑，亦力翻前議，唯唯從命。趙以剛勢出己上，且審此係內廷意，與辨無益。乃微笑言：『既二公意議相同，諒非無見。僕不才，當先回京覆命。』剛則與匪首密商一切。五月十三日，董福祥奉召入都，宣稱已命義和團充先鋒剿滅洋人，我軍爲之後應。聞者駭走。……」

以下再引李希聖的「庚子國變記」：

「五月初十日，俄使恩格爾思上書言：亂民日益多，英法藉之將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方睦，逾二百年，義當告。總理衙門得書，不敢上。俄使欲入見，乃封奏焉，亦不答。

「十四日，以禮部尚書啓秀、工部侍郎溥興、內閣學士那桐，入總理衙門，而以載漪爲管理。

「十五日，日本書記生杉山彬出永定門，董福祥遣兵殺之於道，剖其尸。

「十七日，拳匪於右安門內火教民居，無老幼婦女皆殺之，一僧爲之長。

「十八日，往宣武門內火教堂。又連燒他教堂甚衆。城門盡閉，京師大亂。連兩日有旨，言拳匪作亂當剿。而匪勢愈張。

「二十日，焚正陽門外四千餘家，京師富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盡矣。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

「是日，召大學士六部九卿入議。太后哭，出羅嘉杰書示廷臣，相顧逡巡，莫敢先發。吏部侍郎許景澄言：『中國與外洋交數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惟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今後民巷使館，拳匪日窺伺之，幾於朝不謀夕；倘不測，不知宗社生靈，置之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言：『衅不可開，縱容亂民，禍至不可收拾。他日內訌外患，相隨而至，國何以堪？』慷慨晞歔，聲震殿瓦。太后目攝之。太常寺少卿張亨嘉言：『拳民不可恃。』

倉場侍郎長萃在亨嘉後，大言曰：『此義民也！臣自通州來，通州無義民不保矣！』載漪、載濂及戶部侍郎溥興和之，言『人心不可失』。上曰：『人心何足恃？祇益亂耳！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鮮之役，創鉅痛深，效亦可覩矣。況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合而謀我，何以禦之？』載漪曰：『福祥驕，難用，敵器利而兵精，非囘之比：『董福祥剿叛囘有功，以禦夷，當無敵。』上曰：『福祥驕，難用，敵器利而兵精，非囘之比。』侍講學士朱祖謀亦言祥無賴，載漪語不遜。上嘿然。羣臣皆出，而載漪剛毅遂合疏言：『義民可恃，其術甚神，可以報仇雪恥。』載濂亦上書言：『時不可失，敢阻撓者請斬之。』聞者莫不痛心，詆爲妖孽，知其必亡，然畏太后，不敢言也。

「是日，遣那桐許景澄往楊村，說夷兵，令無入。道遇拳匪刼之歸，景澄幾死。其後，夷兵援使館者，亦以衆少不得達，至落垡而還。

「二十一日，又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太后曰：『皇帝意在和，不欲用兵。余心亂矣，今日廷論，可盡爲上言。』兵部尚書徐用儀曰：『用兵非中國之利，且衅不可自我先。』上曰：『戰非不可言，顧中國積弱，兵又不足恃，用亂民以求一逞，寧有幸乎？』侍讀學士劉永亨言：『亂民當早除，不然，禍不測。』載漪曰：『義民起田間，出萬死不顧一生以赴國家之難，今以爲亂，欲誅之，人心一解，國誰與圖存？』上曰：『亂民皆烏合，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爲兒戲？』太后度載漪辯窮，戶部尚書立山，以心計侍中用事，得太后歡，太后乃問山。山曰：『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效。』載漪色變，曰：『用其心耳，何論術乎？立山敢

廷爭，是且與夷通，試遣山退夷兵，夷必聽。」山曰：『首言戰者載漪也，漪當行；臣不習夷情，且非其職。」太后曰：『德親王亨利昔來遊，若嘗爲供給，亨利甚德之，若宜往。』山未對，載漪詆立山抗辯，太后兩解之。罷朝，遂遣徐用儀、立山、及內閣學士聯元至使館，曰：「二十二日，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載漪請攻使館，太后許之。聯元頓首亟言曰：『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鷄犬皆盡矣。」載瀾曰：『聯元貳於夷，殺聯元，洋兵自退。」太后大怒，召左右立斬之，莊親王載勛救之而止；聯元，載勛包衣也。協辦大學士王文韶言：「中國自甲午以後，財絀兵單。衆寡强衆之勢既已不侔，一旦開衅，何以善其後？望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擊案罵之曰：『若所言，吾皆習聞之矣，尙待若言耶？若館前去，令夷兵毋入城，否者且斬若！」文韶不敢辨。上持許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靈何？」太后陽慰解之，不懌而罷。自是陳景澄。

「太后意既決，載漪、載勛、載濂、載瀾、徐桐、崇綺、啓秀、趙舒翹、徐承煜又力贊之，遂下詔褒拳匪爲義民，予內帑銀十萬兩。載漪即第爲壇，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內中。由是燕齊之盜，莫不掫腕並起而言滅夷矣。

「城中日焚刼，火光連日夜，煙燄漲天。紅巾左握千百人，橫行都市，莫敢正視之者。夙所不快者，即指爲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王培佑以首附義民，擢順天府尹。士大夫諂諛

干進者，又以義和團爲奇貨。當是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設壇焉，謂之保護。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等合奏言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端不可開，其言至痛切，不聽。

「遂以載勛、剛毅爲總統，載瀾、英年佐之，籍姓名部署，比於官軍。然拳匪專殺自如，載勛剛毅不敢問。

「二十三日。德使克林德入總理衙門，載漪伺於路，令所部虎神營殺之。亂初起，令各國公使皆返國，期一日夜盡行。各公使請緩行，故入總理衙門議，而德使死焉。克林德已死，許緩行，又請遷入總理衙門，各公使不敢出。

「二十四日，遂令董福祥及武衞中軍圍攻交民卷，榮祿自持檄督之，欲盡殺諸使臣。砲聲日夜不絕，屋瓦自騰，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髮，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洋兵才四百，四面爲營壘，穿地道，令教民分守之，人自爲必死，皆奮。圍攻五十餘日，晝夜番戰，苦相持。董軍及武衞中軍死者，無慮四千人，拳匪亦多有傷亡，皆引退。

「二十五日，下詔宣戰，軍機章京連文沖草也。以法領事杜士蘭索大沽砲臺爲詞，其實砲臺先於二十一日失守矣。時有詔徵兵，海內騷然，召羽書相望。乃以載漪、奕劻、徐桐、崇綺主兵事，有請無不從。政在軍府，高下任心。奕劻枝梧其間，噤不敢言，取充位。桐以暮年用事，尤驕橫。太后亦以桐舊臣，更事久，以忠憤號召揣摩取富貴之士，負當時大名，思登用其言以風動天

下，遂遣倉場侍郎劉恩溥往天津招集拳團，至十餘萬人，傳太后旨，賞給之。來者日益多，頗不得賞，則公爲寇盜，虜略殺人，脅取財物，不能應，輒夷其宗。自天津以南，民大徙，乃候於道，遮殺之，坐死者又十數萬人。……」

以上所述，自光緒二十六年春間拳匪由山東竄入直隸爲始，至同年五月正式降詔宣戰，欲恃義和團的神術盡驅洋人，以爲「扶清滅洋」的中興大計，其經歷過程極爲明晰。由上面的敍述，可以使我們發現如下一些問題。

一、慈禧之決定用義和團來驅滅洋人，剛毅的招引，與載漪、載勛、載濂、載瀾、徐桐、崇綺、啓秀、趙舒翹、徐承煜等人的大力贊助，都是舉足輕重的關鍵因素。在上面這些縱拳釀禍的重要人物中，祇有趙舒翹是漢人，他是否確實曾與上述諸人一樣地力贊拳匪，也還是很可懷疑的問題，其餘則幾乎一律都是滿洲顯要，載漪、載濂、載瀾、載勛是皇族，崇綺是皇室懿親，徐桐、徐承煜父子隸漢軍旗，而漢軍旗的假滿洲人一向以滿洲奴才的身份爲榮，也就與眞正的滿人無異。這些人之外，再加上仇殺洋人最多的毓賢，與同罪而倖免於罰的榮祿，凡是名單上有的，可說無一不是當權的滿洲顯要人物。這些滿洲顯要人物爲什麼人人都會迷上義和團的神權思想？又爲什麼只有這些滿洲顯要人物是信拳最深而竭力主張利用義和團來從事排外行動的人？這問題實在很使人迷惑。宣統之世，滿人爲了排斥漢人而組成所謂「皇族內閣」，這是由於狹隘的種族觀念與權利思想而來的政爭，其動機容易使人瞭解。而當庚子之時，滿人的政權既未受到漢人的威脅，便

沒有理由要以發動對外戰爭的方式來鞏固自己的統治權。那麼，這些滿清顯要們又爲什麼要在此時發動這一場莫名其妙的對外戰爭呢？由於這個問題之難以解釋，我們只好假定，他們之所以要如此做，主要原因，大概是由於他們的愚昧、無知、與自私。愚昧無知使他們對世界大勢缺乏認識而迷信義和團的神力，自私則使他們誤以爲藉此可以達到某種利益——慈禧與端王載漪希望藉此以行廢立大事，其他的投機趨附之人則希望藉此分一杯羹，以便同沾實利。載勛、載濂、載瀾、與剛毅，都是這一類人；徐桐與崇綺早已列名爲商山四皓，也可視爲一坵之貉。啓秀以迎合徐桐起家，榮祿交是最擅長投機的人物。算來算去，只有毓賢的仇洋排外思想比較單純。所以，這些首禍人物雖然都打着扶清滅洋的招牌，其純粹出於愛國動機的，實在少之又少。

二、當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三次「叫大起」討論宣戰問題時，雖然主戰派與反對派的言論都表現得相當激烈，但是慈禧太后似乎早已成竹在胸。所以儘管自光緒皇帝以至許景澄、袁昶、王文韶、劉永亨、朱祖謀、立山、聯元等人相繼發言反對，慈禧的主張早已打定，誰性命也送掉了。關於這件事情的前後始末，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言之頗詳，可以參看，引述如下：

「予狃於此事（按係指進言罷斥大阿哥溥儁事），以爲幸有進言機會，凡理所應言者，均當言之。但有一次則險碰一大釘子。一日入見，奏對事畢，太后與皇上同座倚窗匡上。予見太后意尚閒暇，因乘間奏言：『徐用儀、許景澄、袁昶三臣，皆忠實爲國，當時身罹法典，當然必有應

得之罪，願論其心迹，似在可原。據臣所聞外間輿論，頗皆爲之痛惜，可否亮予昭雪？」方言至此處，意尙未盡，突見太后臉色一沉，目光直注，兩腮迸突，額間筋脈悉賁起，露齒作噤齗狀，厲聲曰：「吳永，連你亦這樣說耶？」予從來未見太后發怒，猝見此態，惶悚萬狀，當卽叩頭謝曰：「臣冒昧不知輕重。」太后神色略定，忽將怒容盡斂，仍從容霽顏曰：「想你是不知道此中情節，皇帝在此，你但問皇帝。當日叫大起，王公大臣都在廷上，尙未說着話，他數人叨叨切切，不知說些什麼，哄着皇帝。至賺得皇帝下位，牽着許景澄衣袖，叫「許景澄你救我」，彼此居然結著一團，放聲縱哭，你想還有一毫體統麼？你且問皇帝，是否實在？」皇上默無一言，予祇得叩頭，謂：「臣實不明白當時情形。」太后復霽語曰：「這難怪你，偺們宮裏的事，外間那裏知道？你當日尙是外官，自然益發不明白了。」予見太后意解，始逡巡起立。莽遇此勢天雷電，忽而雲消雨霽，依然無迹，可謂絕大喜事，然予眞已汗流浹背矣。……

「後有耆舊某公，爲述當時眞狀，謂此番叫起情形，實誤於上下隔膜。先是，有浙人羅某，常奔走榮文忠門下，一日，不知從何處捕得風影，急投榮處密報，謂：『各國已分頭調兵來華，決定攻打北京，與中國宣戰』云云。榮素持重，此次竟爲所惑，逕自繕密摺，入宮呈奏。太后得奏，當然著慌，既懼且憤。端、莊等正喜師出有名，益乘間竭力蠱煽，且哄且激，太后遂亦主張開戰，因此乃宣叫大起。故太后一到場蒞座時，開首卽言：『現在洋人已決計與我宣戰，明知衆寡不敵，但戰亦亡，不戰亦亡，同一滅亡，若不戰而亡，未免太對不起列祖列宗，故無論如何不

得不爲背城借一之圖。今當宣告大衆，諸臣有何意見，不妨陳奏』，云云。當時似有數人發言，不甚清晰。朱古薇閣學祖謀曾出班陳奏，謂『舉民法術，恐不可恃』。一旗員即從旁搶言曰：『舉民法術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議，臣特取其心術可恃耳。』聯學士元繼續發言，其言頗戇，謂：『如與各國宣戰，恐將來洋兵殺入京城，必至鷄犬不留。』太后色變。即有御前大臣大聲叱之曰：『聯元這說的是什麼話？』太后意正合憤，正於此時，皇上望見許文肅，即下坐執其手曰：『許景澄，你是出過洋的，又在總理衙門辦事多年，外間情勢，你通知道。這能戰與否，你須明白告我。』許奏言：『開教堂傷害教士的交涉，向來都有辦過的；如若傷害使臣，毀滅使館，則情節異常重大，即國際交涉上亦罕有此種成案，不能不格外審愼』，等語。皇上固知萬不能戰，而却於端、莊，不敢逕宣己意，以文肅久習洋務，特欲倚以爲重。聞許言，深中其意，因持其手而泣，文肅亦泣。袁忠節班次與文肅相近，亦從旁矢口陳奏，一時忠義奮發，不免同有激昂悲慨之態度。許奏語本極平正，太后似亦未甚注聽。第見皇上與之相持，三人圍聚共泣，疑二公必有何等密語刺激皇上，不覺大觸其怒，即注目厲聲曰：『這算什麼體統？』德宗乃始放手。故上諭中有『語多離間』之詞。當時頗疑此諭出於端、莊矯旨，其實兩公之死，即由於此。究其瘢結，蓋太后已入榮言，以爲各國業經決定宣戰，故開此會議以謀應戰之方略，是戰與不戰已無復擬議之餘地。而廷臣中多半不知就裏，或以爲尚是片面商議和戰問題，或則以爲政府已得有宣戰實據，因之不彼此多陳奏，鋒針相對，以至愈激愈偏。後來退班出宮，彼此互訊此項消息，茫然不知何

來？軍機既未呈報，總署亦無照會，方始大家愕異。蓋榮相上次密摺，外間固絕無人當時明白內容，祇須將洋人並無宣戰事實委曲開釋，未嘗不可消解，乃彼此均走入岔人已決戰而尙主張不戰，則惟有降之一法，宜其不能相入也。大風起於蘋末，蟻穴足羅某之一言而釀成如此掀天大禍，當亦彼所不及料者矣。」

上文所說的「羅某」，卽江蘇糧道羅嘉杰；榮相，卽榮祿。榮祿因誤信羅嘉杰所四款並奏之慈禧，慈禧因而大爲發怒，決計與洋人開戰云云，這在前面所引的袁昶日記中已有記述，只是僞造的景善日記則說是端王載漪與啓秀、那桐等人所呈進的各國照會，若以庚子西狩叢談所述內容互相參看，可知照會之說全出誣捏，其目的不過在爲榮祿洗脫罪名。由此可以知道，慈禧之決定與各國宣戰與拳匪之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完全由榮祿的這一件密摺而起，所以榮祿在庚子拳亂一事中所應擔負的責任甚大，他後來之得免列名爲首禍諸人之一，實在太僥倖。瞭解到這其中的實情之後，我們對於榮祿在當時的各種作爲，也應該另有一番不同的認識纔是。

根據上文所引李希聖所撰的庚子國變記說，慈禧既決定與各國交戰，「遂令董福祥及武衞中軍圍攻東交民巷，榮祿自持檄督之，欲盡殺諸使臣。」這一條記述對榮祿非常不利。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節制北洋海陸軍，所建武衞軍共分五支，前軍爲士成駐蘆臺，後軍董福祥駐薊州，左軍宋慶駐山海關，右軍袁世凱駐山東，他自己所直接統轄的中軍駐南苑。拳亂事起，董福

軍亦由榮祿調之入京，所以當時在京的武衛軍，即是榮祿自統的中軍，與董福祥所統的後軍。既然榮祿在當時是持撤親督武衛軍進攻使館，「欲盡殺諸使臣」的激烈份子，他的立場，應當便是主戰派。然而景善日記却說：

「二十四日，酉刻，走訪賢弟剛相，詢以今日召見之情勢。……先由榮相泣叩天恩，披瀝密陳，言以洋人本無禮，中國本應宣戰，乃端王與軍機大臣所主張攻擊使館一舉，實爲非計之至。今禍亂日亟，愚妄之見，不敢不冒死瀆陳於聖明之前，以春秋之義，兩國搆兵，不戮行人，蔑視各國公使，即蔑視其國。若任令圍匪攻燬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爲大恥，連合一氣，致死報仇，以一國而敵各國，愚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務須維持大局，廟社不驚，萬民幸甚，無所不可。義和團尚未攻擊使館，惟從今以後，未便再行攔阻。朝廷不得已之苦衷，非臣子所知，惟榮祿如此之愚，實非逆料所及也。所請萬難採納，勿庸再爲瀆請，准其立時下朝，等諭。嗣由榮相叩請聖安。立退。……」

果如所說，不但攻擊使館的不是榮祿的武衛軍，榮祿更是竭力反對攻擊使館的開明人士了。由此推論，則榮祿當時之「持撤」督率各軍進攻交民巷使館，「欲盡殺諸使臣」云云，又可看作祇是他之被迫而出此，並非他的本意。所以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中所說的，「使在東交皆館民巷，南迫城墻，北臨長安街，武衛軍甘軍環攻之竟，榮云不能克。或相實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砲，且

陰致粟米瓜果，爲他日議和地也」云云，看來又似有可通之處了。但如我們再看另一類記述，則榮祿在這件事情上的責任，竟有較此更爲清白乾淨的哩！

陳夔龍所撰的夢蕉亭雜記卷一說：

「端親王載漪少不讀書，剛愎自用。自己亥冬間其子溥儁立爲大阿哥，朝中視線均集於該邸，滿大臣中竟有先遞如意，希冀他日恩寵者。所管虎神營，於神機營外獨樹一幟。庚子拳匪亂起，一意提倡之。維時某相國（指徐桐）、某上公（指崇綺）均授溥儁讀，皆篤信拳匪，恃以仇教滅洋，漪遂深信不疑，謂拳可恃。步軍統領莊親王載勛，右翼總兵其弟載瀾復附和之。凡拳民入京，赴莊王府掛號，即爲義民。旬日之間，亂民集都城不下數萬，均首纏紅布，手持短刀，殺人放火，晝夜喧囂，有司不敢過問。各公使館由天津調兵入京自衞，苦於兵數無多，僅於東交民巷東西巷口設卡駐兵，與我相持。董福祥一軍，經調紮正陽門東安門一帶保護內廷，嚴飭不准與洋兵衝突。董福祥帶武衞後軍，歸榮相節制。詎載漪暗相結納，引爲己用，福祥亦以滅洋自任，榮相再三戒飭，竟不聽命。……」

同書另一條又說：

「董福祥圍攻使館，相持日久。一日，端邸忽矯傳旨意，命榮文忠公以紅衣大將軍進取。紅衣大將軍者，爲頭等砲位，國朝初入關時，特用以攻取齊化門者，嗣後並不恆用，弃藏至今。砲身量極重大，非先期建築砲架不適於用。以地勢言，此項砲架，須建立於東安門內東城根，城外

即御河橋，橋南西岸，迤邐數十步即英使館。統計由城根至使館不及半里，各國公使參隨各員並婦孺等均藏身於館內。該館屋宇連雲，鱗次櫛比，倘以巨砲連轟數次，斷無不摧陷之理，不知該邸何以出此種政策。此砲放出，聲聞數里，宮中亦必聽聞，亦斷不能演而不放，文忠心頗憂之。繼得一策：以砲彈準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砲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囑砲手，準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轟然發出，勢若雷奔電擊，已超過該館屋脊視線，出前門，直達草廠十條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頂穿成巨窟。該商等十數家環居左近，一時大驚，紛紛始議遷移。越日，收拾銀錢帳據，全數遷往貫市暫住。厥後洋兵入城，各種商號均遭損失，西號獨克保全，不傷元氣，未始非此砲之力。各使經此番震撼，益頗悖悖。余私謂李文忠公曰：『當日演放砲彈時尺碼若不加高，恐使館已成灰燼，各使亦難幸存。不過肇禍愈烈，索款愈多，求如此時之早定和局，戛戛乎其難矣。』文忠亦以爲然。」

照此書的前一條所述，董福祥的武衛後軍所以會參加進攻使館之故，一是由於端王載漪的收買，二是由於董福祥的個人野心，所以榮祿雖爲統帥，董福祥竟敢不聽他的戒飭，違令進攻。這所說的，不但與庚子國變記中所記述的事實不符，亦與董福祥後來寫給榮祿的信中所說，「祥辱隸麾旄，忝總師戎，一切舉動皆仰奉中堂指揮，無一敢專擅者。」「去年拳民之事，累奉鈞諭嘱攻各國，祥以事關重大，遲疑未決，承中堂嚴加驅策，故不敢不奉命惟謹。後又承鈞諭及面囑累次，圍攻使館不妨開砲。祥始尚慮得罪各國，殺戮其使，恐兵力不。敵祥承此重咎，又承中堂

諭謂，戮力攘夷，禍福同之。祥是武夫，無所知識，但忭中堂而爲犬馬之奔走耳。今中堂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祥雖愚騃，竊不解其故」云云，完全是背道而馳的事。榮祿對於董福祥的全是事實，然則陳夔龍卽使有心爲人開脫，豈不等於是辭無可辯解，那就等於承認董福祥所說的全是事實，然則陳夔龍卽使有心爲人開脫，豈不等於是一不描尙可，越描越黑」的作僞招狀嗎？劉聲木所撰的萇楚齋隨筆，曾說陳夔龍是「榮黨」，所以他雖然在夢蕉亭雜記中竭力辨說他並非榮黨，亦仍是徒勞無功的「越描越黑」。由萇楚齋隨筆比對陳夔龍存心爲榮祿開脫罪名的記述，更可知道劉聲木所說的話很有道理。一事如此，他事可知。然則夢蕉亭雜記誇詡榮祿在庚子拳亂時保全北京使館之功的後一條記事是否可靠，亦就很有問題。

庚子拳亂時，有一個在教會機構中任職的中國人鹿完天，因拳匪圍攻使館之故，他亦處身在包圍之中，日夕在槍林彈雨中過着萬分危險的生活。根據鹿完天所寫「庚子北京事變紀略」一書中所敍的圍城實況，則圍攻使館區的清兵不但擁有洋槍洋砲，且有能發射極大砲彈的大砲。此日的炸砲所發射的大砲彈，從六月初一日早晨開始發射。此日的紀事記云：

「初一日早六點鐘，自皇城內打來大炸彈，西花園西北隅望樓連受數彈，卽傾倒矣。炸彈重十餘斤，上有螺絲，中裝生鐵，落地開裂，方圓十餘步內外，撞之卽成粉碎。十點鐘，又將大官房脊背打崩，院中飛鐵齊鳴，丁丁有聲，合院惶恐，中外畏懼，婦女皆藏暗室。」

自清兵從六月初一日開始以大炸砲轟擊使館房屋起，「庚子北京事變紀略」幾乎逐日都有大

炸砲轟擊使館區的紀錄，少則一日發射十數砲，多則數面夾攻，處處崩牆倒屋，致死或受傷的，多是避難其中的教民。到了六月十六日，又改用更大的砲位發射二三十斤重的砲彈。「幸中兵不明算法，長短遠近，酌量不準，每從城牆越過，至城外始落。」所以連日以來發射雖多，不是過高，就是過低，竟不能對使館外圍防線造成突破的作用。到了六月廿一日，砲聲漸稀。至是日下午兩點鐘，更有榮祿所派清兵搖白旗，持名片前來議和。自此攻擊改尚西什庫教堂，而使館區暫時得到安寧。由這些記述可以知道，庚子拳亂時武衞軍對使館的攻擊，不是不曾使用大砲，也不是只發空砲或測距故意過高，眞是使用之人不善射擊而已。

這種由於不善射擊而致未曾造成重大損失的事實，是否卽是出於榮祿的授意？目前已經無法查考；但若與榮祿在攻擊甫經開始之時，便持檄親自督戰的情形看來，彼此之間，似乎頗有矛盾。是不是榮祿在後來業已發覺義和團法術不靈而使館難破，因亟圖補救而改用這種釜底抽薪之法的呢？根據某些史科的記述，這種情形，正大有可能。

胡思敬驢背集卷二：

「交民卷被圍月餘，比、荷、意、奧使館，華俄銀行，日本筑紫辦館均燬。唯英使館最堅，墻厚八尺，高二丈有奇，其大可容千人。十一國使臣初議聚而守之，後知失策，乃分派日意兵守肅王府，英兵守翰林院，美德俄法各分段拒守。其東有法教堂名『北堂』，其西有意教堂名『仁慈堂』，選練教民二千四百餘人，分二隊爲使館聲援，捍禦甚力。」

這條記載，一則說英國使館的墻垣極爲高厚，再則說使館防軍在比荷等國使館盡燬之後，改向外擴展，攻佔肅王府、翰林院及連絡法、意兩國之教堂，守禦甚力。以此與李希聖庚子國變記所說的，使館守軍「四面爲營壘，穿地道，令教民分守之。人以爲必死，皆奮」的情形合看，便可知道使館守軍是以濠塹及堡壘構成堅固陣地，易守難攻，所以使館日久不能攻下。使館難攻而議和團的神仙法術不靈，日久相持，必有後患，聰明如榮祿，當然會有他的打算了。吳永庚子西狩叢談說：

「團攻使館久不下，衆意稍懈。榮相見大勢弗順，已紓回改道，隱與使署通消息，或稱奉詔送瓜菓蔬菜，至東交民巷口，聽洋人自行取入。一面設法牽制兵匪，使不得急攻。」

據此云云，則榮祿倘使眞有令武衞軍只發空砲或測距故意放高之事，也必定是屬攻不下以後的事，並非一開始便曾有此「保護」措施的。榮祿之善於見風使舵，隨機應變，在這裏有了明顯的證據。事情過去了之後，他爲了湔洗自己的惡名，自然需要設法製造許多言過其實或似是而非的記錄，以資轉移視聽，混淆耳目，庶幾可以使人黑白難分，甚或至於顚倒黑白。景善日記如此，夢蕉亭雜記亦然。所不同的是，前者出於他的主動僞造，後者則承其指授而已。

不過，即使榮祿能夠僞造記錄以湔洗他的禍首之名，當時的輿論，還是留有許多不利於他的記錄，足以使我們看清他的眞正面目。例如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的中外日報「論北京死難諸臣」一文中，就說：

「鄙哉徐桐，以道德欺世，忠孝傳家，晚節不愼，致與榮、剛作賊。」

此文以榮祿與剛毅並論，同稱之爲「賊」，則其名譽之惡劣可想。又同年十月初二日中外日報「戊巳間訓政諸大臣論略」一文中說：

「榮祿剛毅並以貴緣貴顯，得至大官。榮給事內廷，恭親王尤狎之，任步軍統領多年。剛浮沈部署，逮不能及。迨得政後，其意反抗皇上，故太后因而用之，其寵任遂與榮埒。大抵榮險而巧，剛悍而愎，每欲舉大事，榮陰謀於室，剛公言於朝。榮起於但貪富貴，剛出於有所憾恨，此其顯殊。至其同爲國賊，同釀國禍，則二人之所共謀，雖及沒世，不能別也。而近日議者，見剛已死，則從而下石，誾榮猶貴，則爲之遊說。欲以拔之入地，舉之升天，難哉，難哉，難哉！」

這一段話亦以剛毅與榮祿同稱，謂之國賊，指爲同謀，然則榮祿當年確實曾經與載漪剛毅同爲禍國殃民之事，亦是更顯而易見的事了麼？所不同的是，剛毅愚愎而榮祿聰明，剛毅所行之事，明顯而榮祿隱蔽，榮祿善於見風轉舵而剛毅則至死不悟，所以他們之間的禍福休咎，到後來也就有了明顯的分別。更何況載漪剛毅後來都成了萬衆指目的元兇罪魁，一切禍害都轉嫁到他們的頭上，榮祿就更可以利用他的顯貴之身，僞造歷史紀錄，以爲自己洗脫罪名。於是，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便只是清史榮祿傳中所加於他的讚譽之辭，歌頌他於庚子拳亂時對使館有如何如何的調護之功，而景善日記等僞造的史料又從而證實之，如之何不使這一位漏網的巨魁不成爲安邦定國的功臣呢？榮祿之善變，反映出了端剛諸人之頑梗不化。爲敍述便利起見，仍以前法摘抄有關史

料加以排比，以明瞭當時的變化情形。

日本任原篤介所輯「拳亂紀聞」云：

「六月廿四日，下午四點鐘，甘軍在王府大街長安牌樓北，與奧使署洋兵開仗，槍砲聲大作，竟夜不絕。聞此役係榮中堂發令，飭董軍開仗。又是日匪攻天津租界。

「廿五日。未刻，甘軍攻破奧國使署，縱火。天津紫竹林一帶，已被團匪燒成一片荒地。

「廿九日，天津又復大火。

「六月初一日，攻英使署。至夜，槍聲愈密。

「初二日，拳匪華兵復攻天津租界，相持至七點鐘之久，兵匪大敗。

「初四日，華人在城南乾清門東面海德門上置砲一尊，其他各城門上雖亦均安設砲位，尚未開砲攻打使館。

「初六日，在京各西人現俱被圍於英使館中，情形危急。

「初七日，北京團匪勢欲稍衰，故圍困使館亦較前大鬆。

「十一日，各國聯軍總統調齊兵士六千名，攻擊天津城，聶功亭軍門即於是役陣亡於天津城西八里臺地方。

「十三日，洋兵佔據天津。」

「十七日，

上述資料來源，乃是上海方面的外國報紙輯錄各方來電所作的新聞彙報。其未記京中使館被圍情形之故，係因電報不通，不悉雙方戰事情形使然。其後乃據泰晤士報訪員瑪禮孫所發電信，知使館被圍以來，各使署官兵之陣亡及受傷者不知凡幾，幸各公使及眷屬尚安好云。其時各國已組成聯軍，由天津出發攻向北京，以解使館之圍。以下所記，則是李希聖所撰的庚子國變記。

「六月二十九日，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三召見寧壽宮，語移日。秉衡主戰，且言拳民可用，當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聞天津敗，方旁皇，得秉衡言，乃決。遂命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

「七月初三日，殺許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

「初十日，北倉失，裕祿走楊村。

「十一日，楊村又陷，裕祿自戕死，宋慶退蔡村。敵方得天津，畫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倉，炸砲居陣前，更番迭擊。馬玉崑大敗，退至武清，不復能戰矣。榮祿以聞，太后泣，問計於左右。以新斬袁許，無敢言者。

「十三日，以李鴻章爲全權大臣。時已停攻使館，使總理章京文瑞齎西瓜菽麥問遺之。是日，李秉衡出視師。

「十五日，張春發、萬本華、夏辛酉敗於河西務。陳澤霖自武清移營，聞砲聲，一軍皆潰。秉衡走通州。

「十六日，太后議西幸，陰戒榮祿董福祥以兵從。計已定，或謬言秉衡軍大勝，乃止。自北倉之敗，又圍攻使館，誓必破之以洩憤。

「十七日，通州失，李秉衡死之。乃召宋慶馬玉崑守京師，駐南苑。是日，殺徐用儀、立山、聯元。

「十八日，太后聞秉衡軍敗而哭，欲遣王文韶趙舒翹至使館乞和，榮祿曰：『不如與書觀其意。』遂遣總理衙門章京舒文持書往。時方攻使館，舒文至，乃止。自北

「十九日，東兵自通州踰時而至，董福祥戰於廣渠門，大敗。

「二十日，黎明，城破。董福祥走出彰義門，縱兵大掠而西。是日，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無一至者。拳匪在城中者尚數萬人，俄頃而盡。

「二十一日，天未明，太后青衣徒步而出，髮不及簪，上素服及后隨之。至西華門外，上坐英年車，太后坐載瀾車，從者載漪、溥儁、善耆、奕劻、載勛、載瀾、載澤、剛毅、趙舒翹、英年、及內監李蓮英，諸宮人皆委之而去。是日駕出西直門，日暮，抵昌平貫市，上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

「二十二日，出居庸關，至岔道。

「二十三日，暮，至懷來。

「二十六日，至宣化鷄鳴驛。」

「二十七日，至宣化。是日，載濂、載瀅、桂春至，令百官赴行在。留三日然後行。

「八月初二日，至懷安，命奕劻回京議和，許便宜行事。

「初六日，至大同，留三日。以載漪爲軍機大臣，載瀾爲御前大臣。

「十四日，至崞縣、原平。以榮祿爲全權大臣，夷人拒不納。拳亂起，祿以武衛中軍攻使館，董福祥又祿所部也。夷人誅首禍，祿名在約中，乃求解於李鴻章，鴻章出之。至其所以脫，事秘，世不盡知也。祿內主拳匪附載漪，而外爲激昂，稱七上書爭之不能得，頗揚言自解，世或多信之。

「十七日，至太原。

「二十日，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連名劾載漪、載瀾、載勛、剛毅、英年、趙舒翹庇拳匪。奏至，上呼載漪等嚴斥之。太后色不怡。久之，乃謂王文韶出草詔，自載漪以下，得罪有差，然甚輕。

「八月初八日，幸陝西。

「十七日，李鴻章至京。

「十八日，至聞喜。剛毅以病留，太后使何乃瑩護視之，三日而死。是日，以奕劻爲全權大臣。

「二十日，李鴻章奕劻等合劾載漪等罪重法輕，請嚴議。時德美書請殺首謀，乃並奏焉。久之而論分別圈禁遣戍。

「二十日，至平定而還。

「九月初四日，至西安，居北苑。夷議首禍，持令李鴻章領武衞中軍，榮祿赴行在。及載漪出軍機，剛毅死，李鴻章爲祿初由保定走太原，剛毅忌之，勒還之。載漪出軍機，剛毅死，李鴻章爲祿初由保定走太原，剛毅忌之，故復用。

「十一月初三日，日斯巴尼亞等十一國使臣以約來與奕劻、李鴻章，爲綱十二，勖鴻章不敢議，乃奏聞焉。太后得約，度不許，兵且重懲首禍諸臣，太后意終庇之，見約無之，喜過望，詔報奕劻鴻章盡如約。自各國請，常悁慄不自安。及德西過李鴻章曰：『今罪人方居中用事，吾當自引兵河，不速誅首謀，西安必不保。』太后不得已，恨甚，許之。往取之，鬱鬱久居此，無益也。』鴻章遂疏言：『聯軍將渡河，不速誅首謀，西安必不保。』太后不忍決。瓦正月初三日，賜載勖自盡於浦州。

「初四日，賜英年，趙舒翹自盡。

「初六日，殺毓賢於蘭州。

「初八日，殺啓秀、徐承煜。載漪、載瀾論永戍新疆。董福祥奪官歸甘肅。

「八月二十四日，自西安啓蹕。

「十二月初二日，至開封。

「二十日，廢溥儁，仍食八分公銜俸，即日出宮。」

綜觀載漪、剛毅等人一生最偉大的事蹟，就是迷信義和團的神權思想而掀起庚子拳亂，最後則以締結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了結此一場空前大禍。所以，歷敍庚子拳亂的大概情形以至和約簽訂，首禍諸人分別依照外國列強的要求從嚴懲處，載漪與剛毅二人，至此應可結束。只是清史載，載漪等人的列傳對於首禍諸人之末路遭際與禧太后對這些人的態度，一概沒有記載，前引李希聖庚子國變記亦語焉不詳，尚不足以使人完全瞭解庚子拳亂與這些人的眞正關係。需要另外引據有關的資料，在此作一補述。

剛毅之死，清史本傳祇說他「道遘疾，還至侯馬鎭而剛毅死，其餘亦得到極悲慘的下場慈奪原官。」庚子國變記所述與此相似，皆不詳其死因。其後各國請懲禍首，以先死免議，追「剛毅從駕西奔，適患痢疾。念禍由己肇，懼不免死，方秋暑酷熱，瓜正熟，剛日坐輿中食西瓜不絕口，座下置馬子一，身踞其上，痢下注亦不絕。由此以迄於殤，卒稽大戮。此爲當時侍從某學使言，信可證也。」

「馬子」是南方人家的便器。剛毅自知縱拳釀禍而懼罪不免，這「馬桶」，或者是他在到太原而屢遭光緒詬斥之後，乃是南方有的感覺。在此上前，他總以爲，策動義和團以從事仇洋排外，乃是慈禧太后所完全同意的，若論釀禍的罪魁，慈禧太后當爲第一號主謀。基於禍福與共的道理，只要太后不倒，他的安全就不會有問題。但自播遷出奔以來，光緒以幾廢之身，居然屢次對之詈斥，而慈禧默不表示意見，加以中外輿論之指責，使他懍然憬悟到，

慈禧太后或者會犧牲他們這幾個幫兇人物來保全她自己。與其到那時因被各國指爲罪魁禍首之故而慘遭慈禧之毒手，不如自己及早打算，尚可倖逃顯戮。於是，他藉患痢疾的機會多方加增自己的病勢，終得如願以償。這是他自覺罪孽深重的自知之明，雖然覺悟得晚了一點，總還比另一些冥頑不靈的人稍爲聰明些。此外諸人，則儘有懵然不知大禍之將至者。梵天廬叢錄庚辛紀事中另有一條，說：

「行在頑固黨有謂何乃瑩者曰：『肇禍諸臣，究竟何如？』曰：『亦不過做王允耳。』或曰：『擬之蝮庇胄，似乎相當。』何語塞。」

王允是三國演義中設計連環計而使董卓呂布自相火併，卒爲漢獻帝除去大憝巨奸的忠臣，以之與縱拳釀禍諸人相比，似乎不倫。至於蝮庇胄，則是宋寧宗時因輕開邊釁而被金人指爲禍首的當朝宰相，最後由南宋政府曲徇金人之請，將蝮庇胄殺死之後函首請罪，方纔得到金人的諒解，其遭遇很像清政府無法拒絕聯軍之要求，而將毓賢、載勛等人分別斬首賜死一般。何乃瑩亦是庇拳釀禍者之一，他們在闖下大禍之後居然還以王允自比，實在可說是至死不悟。倒是趙舒翹的遭遇，說來頗爲可憐。庚辛紀事：

「前尚書趙舒翹之賜令自盡也，據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諭，本欲定爲斬監候罪名，已由臬司看管，家屬均往臬署侍候。先一日，太后謂軍機曰：『其實趙舒翹並未附和拳匪。但不應以「拳民不要緊」五字覆我。』趙聞，私幸老太后可以貸其一死。二十九日，外面紛傳，洋人要定趙『斬

立決』之罪，於是西安府城內紳民咸爲不服，聯合三百餘人在軍機處呈稟，願以全城之人保其免死，軍機處不敢呈遞。至辛丑正月初二日，風聲愈緊。軍機等自晨六時入見太后，至十一時始出，猶不能定趙之罪。而鼓樓地方業已聚集數萬人，有聲言欲劫法場者，有聲言如殺大臣，吾等卽請太后回京者。軍機處見人情洶洶如此，入奏太后，不如賜令自盡。至初三日，上諭乃下。是日晨八時降旨，定酉刻覆命。於是岑中丞衙命前往，宣讀諭旨畢，趙跪謂中丞曰：『尙有後旨乎？』岑曰：『無。』趙曰：『必有後旨也。』其時趙夫人謂趙曰：『我夫婦同死可耳，必無後命矣。』遂以金進。趙吞少許，午後一時至三時，毫無動靜，精神猶大足，與家人講身後各事，又痛哭老母九十餘歲見此大慘之事。其時趙之寅友親戚往視者頗多，岑中丞始止之，繼亦聽之。趙謂戚友曰：『這是剛子良害我的！』岑見趙語音宏亮，竟不能死，遂命人以鴉片煙進。五時，猶不死，又以砒霜進。至是始倒臥呻吟，以手捶胸，但說難過而已。其時已半夜十一時，岑急曰：『大人何不用皮紙蘸燒酒，捫其面及七竅，當氣閉也。』岑如法捫之，共捫五次，久之不聞聲息，而胸口始冷。夫人痛哭後，亦遂自盡。趙之體最爲强旺，故不易死，又有意候旨，故服鴉片煙不多，以期延捱時刻，希冀不死，如照吳永「庚子西狩叢談」所說，當是因爲他自知並無縱拳釀禍及欺矇慈禧之事，不當與載勛、英年等人同科，希望慈禧最後必能分辨其中的差別而收回前旨。殊不知道，此時的慈禧，已因聯軍要求懲兇的壓力太重而急求自保，無法再爲趙舒翹疏理冤

瑞枉。於是，趙舒翹終於不免冤死，而且死得很慘。比起前述諸人，他是最值得同情的。此外則毓賢雖亦未能逃過一死，他的表現却相當不錯。李杕撰拳禍記上編說，毓賢在蘭州奉旨處斬時，慷慨就義，毫無難色。既無載勛之滿腹怨恨，亦不像英年之哭泣畏死。臨刑之前，毓賢並自撰輓聯二副，其一曰：

「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終沉三字獄。」

其二曰：

「君恩我負，君憂誰解？願諸公斡旋補救，切須早慰二宮心。」

「臣死國，妻妾死臣，誰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嬌女七齡，髫稚難全，未免致傷慈孝治。」

「我殺人，朝廷殺我，夫復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載，歷官三省，涓埃無補，空嗟有負聖明恩。」

字裏行間，一心一意以爲他所導致的仇教排外運動是爲了救國救民與上報聖主之恩，雖志願未酬而慷慨就義，耿耿愚忠，大節凜然，看了還眞教人大爲感動。辛丑和約簽訂以後，某些外國與論頗以爲庚子拳亂的發生原因，主要由于外國侵略對中國的壓迫太甚，因侵略者之壓迫太甚而致中國民衆仇教排外，其責任應由外國侵略者負之，不可全歸咎於中國民衆之愚昧無知。由毓賢的行爲表現，頗可證明這些外國輿論的所見不差。毓賢在當時社會中是頗著廉聲的清官，他之

仇教排外，完全出于狹隘的愛國情操，其間並未夾雜有個人的私怨。雖然因他之愚昧行爲導致後來的庚子拳禍，深爲人所痛恨，但是他這種因愛國而仇外的熱情，總還是值得同情的。比諸慈禧、載漪、剛毅諸人之企圖利用民衆的愛國情操來達成他們的政治目的之卑劣動機，毓賢的行爲要高尚得多。所以，毓賢之慷慨赴死，與徐桐之城破自盡，及崇綺之投水自殺，縱使不能說得上是以一身殉其理想，總還不失爲有骨氣的負責態度。比較起來，最使人看不慣的，是端王載漪那種臨難苟免，全無悛禍之心的惡劣作風。

李杕拳禍記上編「懲治罪魁」中一條說：

「端王載漪隨兩宮至西安，既而至寧夏，及奉旨發往極邊，謂人曰：『這已是皇上的恩典了，咱們尚等什麼？快些往新疆走，不要動皇上的怒了。』急問左右曰：『咱們大阿哥有罪乎？』曰：『不聞旨。』端王曰：『却不與他相干，諒無妨也。』嗣以西人念國親之誼，不願深求，故端王雖褫爵，而發邊之令未行，至今在寧夏。」

另據柴萼梵天廬叢錄所說，則端王確曾發往新疆，在新疆居住二十年，至民國十一年，忽私自回京。外交團大譁，北洋政府乃將他押往新疆，永不許回，云。柴萼之書，成於民國十四年，端王此後的生死如何？不詳。僅祇由上面的事實而言，則他似乎頗以倖逃顯戮爲得計，不但全無悔禍之心，並且還因不耐荒涼岑寂而想重新回到北平的繁華故鄉來。然則此人之全無廉恥之心可想，比之諸賢之慷慨就戮，與徐桐崇綺之自辦一死，豈不是差得太多？慈禧太后倚仗這樣的親貴

人物爲心胥，自難怪要爲國家民族招來如許一場滔天大禍了。最後，則要一說慈禧立意要行廢立大事的另一個中心人物——大阿哥溥儁的後來。

溥儁於光緒二十六年被立爲大阿哥。養於宮中，隨卽以徐桐、崇綺爲師傅，開弘德殿教讀，儼然儲貳。這一年，溥儁十六歲。慈禧以光緒蓄意與之反抗而欲改立溥儁爲帝，不明瞭內情的人，一定不能知道這溥儁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他是否具備繼立爲君的條件？這一點，就需要看看當時的各種有關紀錄。

清人葉伯高於溥儁得立爲大阿哥之後，曾有詩詠之，郭則澐十朝詩乘卷二十三曾加轉錄，中一首云：

「北場南館好驅車，博簺彈棊樂有餘。周鼎輕重君莫問，楚弓得失子原虛。龍潛邸宅堪歸否？駐角山川竟舍諸。日月光輪誰望氣？賀蘭山下白雲居。」

這首詩的前兩句，明明在譏諷溥儁祇是一個性好冶遊作樂之人，佻僬不足以當大器。據郭則澐說，這些事情，「固都人所共聞共見者。蓋不待撤號歸蕃，識者知其不稱矣。」費行簡撰慈禧傳信錄，說溥儁雖舉止佻僬非大器，而頗有小慧，亦甚能得慈禧之歡心云。其說如下：

「儁雖慧而佻浮，素涉獵小說家言，風流自喜。出入慈寧，殷勤承順，趨蹌合度，頗得后驩。交時與諸奄戲謔，衆樂其不持威儀，爭於后前誦其賢。獨隆裕知其非令器，嘗爲桂祥言：『此

人若眞繼統踐大位，國祚必喪厥手。』世謂儁嘗戲后侍女，適爲隆裕所見，嘗面斥之，說固有因矣。后戒儁勿朝帝，或在慈寧與帝值，請安後亦不交一言。后偶令講史，德宗適至，聞其舛錯，嗤之以鼻。后怒，揮令帝退，然自是不復課儁講讀。高慶恩（儁之師傅）告予，儁慧，好爲詩賦，而記憶力弗强，誦過輒忘。而徐桐則以帝王學不在章句，每爲儁講釋大學衍義，兼及朱程語錄。儁則不待辭畢，已欹几垂頭睡矣。」

又記其在西安時之生活行動云：

「報章載其出隨諸奄滋擾劇闈，或宿土娼家，然皆譬說。第嘗策馬遊近郊，而必白后始敢出。平居擧止頗佻僅不自重，亦喜戲劇。然工屬對，且能爲小詩。高慶恩爲予言，嘗以『朔方十郡耕牧策』命對，卽應曰：『秦中千古帝王州。』雖聲未盡調，而字義工整，時方西巡，言尤有當。所作雁字詩，有『聊將天作紙，揮洒兩三行』，亦工切。又『望終南』詩：『入夜宮中燭乍傳，則斐然成章矣。宋伯魯謂此慶恩自作，簷端山色轉蒼然。今宵月露添幽冷，欲訪枘臺第五仙』。

據此云云，則溥儁雖佻僅輕浮，不樂讀書，而其人頗有詩才。假使清室不亡，而又沒有大阿哥這一場公案，也許溥儁在當時的皇子中，也還是能以詩詞名世的風雅之士哩！然而自有大阿哥這一場公案之後，皇太子當不成，嗣皇帝更做不成，等到清社既屋，他以後的命運就艱難了。關於溥儁後來的遭遇，高伯雨所撰聽雨樓雜筆中曾有記載。據高先生說，民國三十一年北平淪陷於

日本時，他曾看到故都某報署名瘦記者所寫的一篇「大阿哥近狀訪問記」，對溥儁當時的生活潦倒情形，有很詳細的記述，抄錄一段如下：

「大阿哥於回北京時，即住於瀛貝勒府中，尙有僕人六十。二十五歲時，大阿哥告假六月，同安那善旗省親，亦於是年結親。民元返京，即住地安門外三座橋邊夾道之達王府現址矣。是時生活已漸不裕……固定進項已絲毫皆無，更慘之命運遂迫目前，只有典當度日矣。……大阿哥今年五十八歲，他的夫人小他一歲。膝前一子，任警界，收入頗尠。兒媳一，孫子一。人口雖然不算繁多，可是說出來也許不會令人相信，他老人家的每日三餐，幾乎每日都不能獲得一飽了。……在生活高壓之下，他日夕都爲衣食問題所困，終於在去年四月間左目失明……九月，右眼又失明。……現在，大阿哥已經是一個與世隔閡的人了。……以枯槁極端的手臂扶住了床欄，用沉鬱的語氣，吐出如下沉痛令人酸鼻的話來：『現在我是一個房子地畝都沒有的人了，寄居在親戚家，可說是分文也沒有收入。她（原注：指大阿哥之妻）每月從娘家拿回來的錙銖錢二十幾塊，也只好充作家用上了。可是，這二十幾塊怎麼能够用呢？……我們現在每日三餐的粗糲都不能够飽了的。唉！一轉眼四十餘年，宮中生活，儼如昨日事，也許是當年享受太過所致吧！』語聲哽澀，令聞之者有一段同情憐憫而且荒涼的感情充塞在意識裏。……」

自民國三十一年瘦記者作此訪問，以至民四十五年高伯雨撰聽雨樓雜筆，時間又隔了二十多

國年。不知道大阿哥溥儁尚健在否？不過，僅由瘦記者的那篇訪問記，我們也可知道溥儁的晚年生活甚爲淒苦。皇子皇孫的末路如此，誠然令人可悲。但假如溥儁在廢黜之後能够專心講求實學，實實在在地做人，而絕不憧憬當年做大阿哥時的黃金生活的話，卽使在鼎革之後，他也不致成爲末路皇孫而有此可憐遭遇的。所以這也不能說是慈禧太后害了他，實際上他更應對自己負責。

以他當年曾爲庚子拳亂之「禍根」的事實來說，經此一番劇烈波折之後而竟然仍迷戀舊日的宮中生活，此人實在也太不長進。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假如大阿哥溥儁當年眞的做了皇帝，那後來的情形又會如何呢？

袁世凱與慶親王

一

民國初年的歷史，受北洋軍閥的影響太大。自從袁世凱帝制失敗以後，北洋軍閥各分派系，連年爭鬪。他們內則過阻革命運動的發展，外則屈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其甚者更且勾結外國勢力鎭壓革命，終於使 國父所辛勤領導的國民革命，亙十餘年之久陷於軍閥勢力的阻撓，無法得到眞正的成功。北洋軍閥的鼻祖，是民國的第一任大總統，後來又背叛民國而自做皇帝的袁世凱；所以，民國初年，國運之杌隉不安，袁世凱個人所造的罪孽最大。但這畢竟是現代史的範圍了，非作者所揭櫫的「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這個題目所能賅括。爲此，筆者此文，雖然亦寫袁世凱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却只能寫他在清朝歷史上的那一部分；入民國以後的那一部分，需要另外放在現代史中去寫，以免近代史的範圍過度擴充，而「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這部書，也將變得非驢非馬，貽譏方家。這一點，是筆者需要在這裏預先聲明的地方。

說到袁世凱在清朝時代的事蹟，就難免不與李鴻章、榮祿、慶王奕劻，與慈禧太后這幾個人相牽涉；李鴻章、榮祿與慈禧太后，都是筆者所已經寫過的人物，現在只好把袁世凱與慶王奕劻

放在一起寫，藉以見他們二人相互影響的實際情形。

清朝是滿清人建立的政權。爲了維護滿人政權的安全，滿清政府歷來的政策是重滿而輕漢，非不得已，兵權與政權決不輕假漢人。賢如胡林翼，若不是他能捧出一個滿人官文來作他的傀儡，他在湖北的一切施爲，就決不可能如此暢所欲爲。曾國藩雖然有辦法平定太平天國，他也仍然需要朝中的軍機大臣肅順文祥及恭王奕訢等人對他能作充份的倚信與支援。而李鴻章之能够興辦各種洋務建設及北洋海軍，先則仰賴恭王，繼則倚深倚醇王，亦是極爲明顯的事實。同治光緒以來，柄國的重臣，習慣上都是與皇室關係極深的親祿雖非親貴，但他與慈禧太后沾有戚誼，又極得「疏遜遠臣」的身份，如果要希望入參大政，隱握朝權，也非得要能攀附上一位親貴重臣不可，而此人卽是慶王奕劻。由於奕劻後來被袁世凱的權術與貨賄所籠絡，幾乎變得事事惟袁世凱之言是聽，袁世凱方纔能够以他的機謀詭詐之心，大施其縱橫捭闔之術，由此大力擴展其北洋系的軍事勢力，並在軍政各界廣布腹心，終於造成了他潛移清祚的龐大力量。奕劻與袁世凱的關係如何，在此可以見其大概。

從前人批評三國時的曹操，曾說他是一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自三國以後，類似曹操這樣的人物還眞不少，最顯著的例子，就可以舉出比較著名的司馬懿與劉裕。他們這些人大都具有卓越的才識與能力，當國家面臨危難的時候，憑藉他們的才能建立顯赫的功業，奠安社稷，功

在國家，在當時亦是人所共睹的事。但因他們畢竟具備奸雄的本質，並不能如諸葛亮郭子儀之謹守臣節，終身不改。所以不須多久之後，他們就由舊皇朝的大功臣變成了新皇朝的創業之主，不但忠貞之節一無可稱，而且還被後世之人視爲得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的奸臣賊子，其聲名實在很不光彩。曹操司馬懿劉裕之後的歷代篡竊之主，大多如此，袁世凱殆亦屬於此一類型。

作爲一個曹操司馬懿式的奸雄人物，必定有他的很多奸雄事實。我們若從袁世凱入民國以來的種種作爲看，諸如暗殺異己，摧殘革命，違背約法，背叛民國，以及僞造民意，帝制自爲等等，俱皆彰彰在人耳目，正無須筆者爲之逐一臚列。如果撇開這些劣跡昭彰的重大事實不說，從很多小事情上着眼，我們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袁世凱這個人，實在是一個慣於詭詐欺騙的不義之人。下文先引述有關他的三段記事，然後再加論列。

第一段記事，見於柴萼所撰的梵天廬叢錄，有袁世凱的軼事七則，中一則云：

「袁項城讀書甚少，在前清時，雖以治兵見稱，然其兵學知識亦非自讀書而得。名譽既著，乃居然以兵家自命，孫吳不足當其一盼也。繼思古今學者，必有著述以傳於後世，兵學何獨不然？況中國言新式兵學，尤推己爲開山之祖，於是著書之心愈熾。然窘於材料，且苦筆難達意，乃謀諸門客某君。某君，文人也，何知兵事？然剽竊成書，則其所長。聞言卽獻策於項城：一、搜羅外國兵學書譯本，采輯其精華，以供我使用；二、編輯練兵時所有公牘函件及營規示諭等類，以充我材料。蓋前者爲理論，後者爲事實，只須略事點竄，便已成書，他人覽之，洋洋大文章也

，何患不鴈孫吳而軼司馬乎？項城聞之，心然其說，佯叱之曰：『吾所謂著述者，名山千秋之業，豈比生員應試，以抄襲挾帶爲能事乎？』某君聞言，自愧而退，而項城自此亦不復言及著書事。久之，以他故辭某君去。於是別召一客，使之代筆著書，且授以方法，一一如某君所言。此客見項城言有條理，知其於著述之事閱歷甚深，不敢輕視。未幾書成，名之曰『治兵管見』，一時王公大臣閱之，頗加稱許。而項城贈代筆者數十金。其人嫌其輕，項城怒曰：『此書全係發揮我之意見，間有參考之書，亦我所指點采擇，君不過一抄寫之吏耳。我贈君數十金，已待君厚矣，何不自量也！』某聞其言，不敢與論而罷。」

王伯恭蜷廬隨筆中有「袁項城」一則，敍述袁世凱在朝鮮時的一段軼事說：

「程仲清者，名超詣，皖南尚齋都轉之族，與余固有鄉誼。粵東張制軍樹聲函薦小軒軍門，到漢城時，小帥已移戍金州，乃寄居慰亭營中。一日清晨，仲清冒雪來訪，謂承慰亭荐往軍國衙門作書記，月修三十金。吾意欲得四十金，又住所尚未議定，求君加言培植。余聞大喜，答以軍國衙門止我一中國人在彼，君來作伴甚妙，增添十金，亦非難事。住所更可勿慮，吾桂山洞賜第八十餘間，君來同居，亦自寬綽，飲食所需，吾可供應。仲清聞吾說，欣喜過望，因留，向夕始去。吾匆匆忘問其慰翁係向何人推薦？因函問慰亭。乃答書云：『敝友程仲清承推轂，感極感極。』余見而大詫，次日親往問之。慰亭曰：『吾恐其不能勝任耳。』余言初無難事，況吾在彼，詎不關助？慰亭亦唯唯，留吾深譚竟日。又次日，余問李涴西參判，答言：『袁公曾略

言之，未深說也。」余告以程君人甚端正，慰翁再說，可卽允許。房屋卽住我處，不必另尋。浣西亦漫應之。越三日無消息，余因函招仲清。來擬令其催問慰亭。去人歸，則仲清已於昨日比趁寶清輪船回廣東矣，咄咄怪事。險數日得信，寶清輪沉於海，全船無一生者。又月餘，上海報載徽州程君已作波臣，其母夫人聞耗驚痛，自樓上躍下跌死，其妻睹此慘狀，自縊而亡。仲清固無子，其家遂絕。因歎謂慰亭曰：『君若多一進言，何至罹此浩刼？』慰亭見報後，哀而祭之，余亦往會，何故又復求君？彼既求君，吾卽置而不問。』余不覺然曰：『此吾之褊心，爲彼來求我。』慰亭曰：『君若早說不問，我非不可荐者，眞乃吾人不淺。』慰默然無語。他日見茅少笙，偶然道及是事，少笙亦忿然曰：『君尚未知耶？慰亭得君函後，往告仲清曰：吾已爲君荐妥，不意王君媚嫉心重，向其執政諸臣大肆詆毀，事遂不諧。於是仲清一怒而去。置而不問，猶飾詞耳！』余聞是言，無更說，驚駭而已。」

按，王伯恭在光緒八年至十年間，曾因合肥相國李鴻章之奏派，與馬建常同往朝鮮辦理對外交涉，此時袁世凱亦因隨吳長慶軍定亂而駐紮朝鮮，因接受袁世凱的建議創練新軍，上文所說的軍國衙門，卽是主管練兵事務的機關；所謂李浣西參判，卽是朝鮮的中國制度，中央政府分六部治事，不過其名稱不曰「部」而曰「曹」，以避免僭擬上國之意。兵曹，卽是清朝的兵部；其尙書稱爲「判書」，「參判」則是侍郎。至於茅少笙，則是其時在袁世凱所領慶軍副營中擔任書記一職的茅延年，

字少笙，官候補州判。茅延年居世凱幕中，對于袁世凱的種種行事知之最詳，所以他能够把袁世凱處置此事的眞正隱情告訴王伯恭。

其不知名人所輯的「袁世凱軼事」，中有「毒計殺妾與其僕」一條，其時間在袁世凱擔任山東巡撫之時，內云：

「袁之姬妾，是時共有五，相傳五妾名紅紅，素有聲於京津花叢中，袁居小站練兵時，乃候補同知段芝貴以重金購置贈袁，謀得右翼軍提調者。姿首邁衆，尤工琵琶，且事事善解人意，袁極愛之，以故寵擅專房。顧楊花逐水，性本輕狂，雖侍袁無虛夕，於心猶以爲未足。會袁有甲乙幹僕二，美於姿，嘗給役於內室，紅紅一見醉心，兩挑之，久之遂入港，雖兩足共着一靴，輒無妒意。袁每日起絕早，入辦事室，夜深始歸寢，以故紅紅得恣情顚倒焉。詎事機不密，袁微有所聞，僞爲不知。一日午後，袁突入，瞥睹紅紅與甲僕並坐臥榻密語，見袁至，僕驚而逸。袁捕得之，閉諸密室，紅紅長跪地上，涕泣求恕。袁作和易之語曰：『妓事余不汝怪。余行年四十，老且將至，汝正屆妙齡，烏有不厭棄侏儒而狎裙屐少年者？揣汝意旨，舍彼殆無當爾顧盼也。果爾，吾必償汝願。』紅紅疑其紿己，誓與甲僕絕。袁遽出利刃，叱曰：『若以吾言詰汝，而故作假惺惺狀態乎？汝悅彼，實告我，乃公將曲予矜全，否則行飲汝以刃！』紅紅畏其威，囁嚅曰：『固所願也。』袁故躊躇曰：『吾室中盈尺地，不甘任野鴛鴦雙宿雙飛，惟有慫彼挾汝潛逃，庶稍全余之顏面。』紅紅泣曰：『妾安忍舍君而去？』袁怒叱曰：『弗去余必殺汝。』紅紅不得已

諾之，袁乃去。紅紅啓密室，使甲出，告之故，乃摒擋飾物，與甲作次晨偕行計。袁僕婦說於乙僕曰：『紅姨憎汝甚，將隨甲遠匿他方，汝尚不知耶？』乙僕怒，謂待紅不薄，欲入而詰之。僕婦急止曰：『若爲主人知，均不免矣。』乙求計於婦，婦曰：『盍要於路而殺之，歸報玉人，匪惟得厚賞也，且消滅汝與姨私通之痕跡。』乙韙其說，明日，果殺甲及紅紅於城外，斷兩首返報袁，謂甲姦姨而拐逃。袁色立變，謂曰：『紅姨將赴泰山行香，昨請諸吾，吾令甲僕隨之往，汝胡事汚其名譽，又斷送兩條生命？然殺人者死，律有明條，余弗汝貸也。』於是不容置辯，叱衞士戮乙於階下。蓋袁久知三人曖昧事，因假手於乙，以殺兩人，又殺乙以滅口。對于家人尚用此欺詐之手段，則信乎袁之一生無往不施以詭譎也。」

上面三個故事中所反映的袁世凱個性，一、三則是欺詐詭譎，第二個則是度量褊狹而忮刻不能容人。工於欺詐而好以詭譎手法行事的人，也許可以用使貪使詐的方法得到短暫時間的成功；但如在欺詐詭譎之外再加上忮刻褊狹的度量，則在他得到暫時的成功之後，亦仍然不免會因猜防之心過盛之故，而導致心腹黨羽之離貳，終致造成全盤事業之分崩離析。這雖然只是理論性的推測，但若以此後袁世凱的一生事蹟看來，他之成功與失敗，又未嘗不是由于這些因素的影響。古人曾有所謂「觀人於微」的話，在未曾敍述袁的一生事蹟之前，先把他這些性格方面的特點提出來一說，對於瞭解他此後的一切行事施爲，必定是有很多幫助的。

袁世凱在清朝末年是舉足輕重的顯赫人物。入民國以後，先做總統，再做皇帝，其種種作爲更是荒誕怪異，駭人聽聞。然而即使是這麼一個距今不遠的歷史人物，對于他的家世與出身，也已經有了很多錯謬離奇的傳說。民國初年，大詩人劉成禺所撰的「洪憲紀事詩本事注」一書，引述辰谿蕭壽昌所撰的「袁世凱紀略」，說，袁世凱之父名袁甲三，由侍郎陞雲貴總督。母程，知書。又，洪憲人物薛大可所撰的「一代梟雄幻夢中」，說袁世凱在弱冠時曾考中一名醃秀才，只因八股功夫不深，科舉無望，且因急功近名之故，遂按照當時慣例，費銀二千數百兩，捐得一個候選同知的空銜，準備投軍，以爲保舉得官的地步。又，近人章君穀所撰的袁世凱傳，由中外雜誌社出版以來，傳誦一時，書中却說他的生母姓劉而嗣母姓朱，其嗣父保慶乃是生父保中的堂兄。又說世凱有三兄，長世敦，次世廉，次世傳，云。凡此所述，都不曾仔細查考袁世凱的有關史料，難免信口開河，誤人太甚。殊不知道，民國項城縣志與項城袁氏家集的有關資料中，在這些方面都有很清楚的紀錄可查，不應該顚倒黑白，以鹿爲馬，馴致是非錯謬，眞僞不辨。爲了澄清視聽起見，下面應該先將袁世凱的世系及家族提出一說，然後再及他的出身。瞭解了這些之後，對于他成年以後的事業發展關係，就可以有比較正確的認識了。

袁世凱之曾祖，名耀東。曾祖母郭氏，賢德而知書，教育子孫，極爲成功。所以袁家自耀東

以下，代有顯宦，儼然成爲世族大家。

耀東有四子，長名樹三，即是袁世凱的祖父。樹三祇是一名廩生（秀才），以教讀爲生。樹三之弟甲三，進士出身，官至漕運總督，督辦皖北軍務欽差大臣，在剿捻戰爭中甚著功績。甲三之弟鳳三、重三，這兩支的子孫中沒有顯赫的人物。若以耀東的孫子一輩而言，比較發達的仍當數袁甲三的一支。甲三的長子保恆，中進士，入翰林，官至刑部左侍郎，若不是因染患時疾而致不幸早死，其此後的仕途遠不止此。保恆之弟保齡，舉人出身，在李鴻章幕中甚得李之倚信，後以直隸候補道負責旅順海防，對于袁世凱在朝鮮的事業曾有很大的照顧。樹三兩子，長名保中，即是袁世凱的生父；次名保慶，則是袁世凱的嗣父。袁家自耀東以來，四代同居，保中在孫輩中排行最長，是老大。以下依次爲世凱之嗣父保慶，及袁甲三的兩子保恆、保齡；至于鳳三與重三的幾個兒子，就排行五六以後了。袁世凱是袁保中的第四個兒子，上面的三個哥哥，分別是世昌、世敦、與世廉。章君穀撰袁世凱傳，以爲世凱之三兄名世傳，其實世傳乃是袁保齡的第六子，比袁世凱小得多。這一世系次序，袁克文所撰的「洹上私乘」中亦有記載，可以參看。

袁世凱的生母姓劉，不錯；只是袁保齡的妻子姓牛而並不姓朱，所以章君穀的袁世凱傳以世凱之嗣母姓朱，顯然是牛字多寫了兩筆的結果。這些事實雖然不很重要，但由此不難知道，文人記事，大抵不甚經心措意，所以不但袁世凱的譜系關係會有錯誤，有關他的出身，亦難免輾轉訛。最顯明的事實，自然是薛大可所說的袁世凱會中秀才及捐官同知這兩點。

據沈祖憲、吳闓生合撰的「容菴弟子記」卷中書科中書。」文誠是袁保恆死後的謚名。袁保照例可得獎敘，由於袁保恆身死之故而移獎其子保敘，因此由中書科中書陞爲秩居五品的候補同秩從七品。他在光緒七年時投入吳長慶的軍中，翌年又隨吳軍東渡朝鮮定亂有功，由吳長慶列摺而得。至於秀才部分，則可以參看凌霄一士隨筆：

凌霄一士隨筆：

「袁世凱之知名，起於在吳長慶戎幕時。張謇自撰年譜記其初入吳幕事云：『項城袁慰廷世凱至登州，吳公命在營讀書，屬余爲是正制藝。詢子姪。文誠公以地當強敵，兵不能分，主不救，命赴袁端敏公（按卽袁甲三）軍求救。端敏以事積忤族里，衆欲苦之，故挈其家舊部數十人；姪篤臣（按卽世凱嗣父保慶之字）以紳士力薄，孤城垂危，主救。遷延時日，而廬江陷，贈公殉。嗣與文誠絕不通問，而與篤臣訂兄弟之好。端敏復命隨營讀書以示恤，義不應命。今留慰廷讀書，所以報篤臣也。』慰廷爲篤臣嗣子，先是實無可展布，故公有是命。旋予幫辦營務處差。赴吳公，以吳公督辦海防，用人必多也。而防務於袁甲三及其子保恆，而德其姪保慶之主救，故『長慶父廷香殉難廬江，長慶以大營不救，不慊此爲吳袁兩家之關係。長慶初意，實欲世凱從審留保慶嗣子世凱在營讀書以報之，時保慶已卒。

治學業以從事科舉也。世傳世凱嘗師事謇，固非無因。又據謇子孝若所撰先父季直先生傳記云：

『這時吳公的大本營，已經從浦口移到山東的登州。在光緒七年的四月，有一天，袁忽然來到登州，求見吳公，想謀事。吳公因爲從前他的先人和袁的嗣父篤臣是換帖的兄弟，有這個交情，就答應留他在營中候事，並且招呼我父替他改改文章。袁雖然是河南秀才，但是文理不大好。我父替他改文章，總是不很客氣，塗改得一塌糊塗。同時周公家祿也替他改文章，就比我父客氣點，加些圈兒了。所以袁很畏憚我父，而喜近周公。』於張袁之關係，言之尤詳。惟謂世凱爲秀才，則非；世凱未嘗遊庠，特曾以監生應鄉試耳。長慶之先人與保慶換帖，亦誤。」

考之沈祖憲吳闓生所編的容菴弟子記，並未提到袁世凱曾在那一年「進學」的話，可知凌霄一士的辨證很有道理。清代的生員，俗稱秀才，照例稱爲「進學」。又因各地學校照例設在文廟旁，而進學先要叩謁文廟，因爲籍隸各省府、州、縣學之故，所以考入各地學校的秀才們，照例稱「進學」。又因各地學校照例設在文廟旁，而進學先要叩謁文廟，所以有此誤會，則是由于他曾兩赴鄉試不第，別人以爲他既具備應鄉試的資格，當然一定有秀才的身份。殊不知道，清代的科舉制度，童生可以援例納銀捐爲「監生」，而監生一樣也可參加鄉試，中了之後，就是舉人，不一定要先中秀才。如筆者前此所寫的左宗棠，就是以監生應鄉試

而得中舉人的。又如翁心存的孫子，翁同龢的姪兒翁曾源，在翁心存死後，由監生欽賜爲舉人，恩准與還年的新科進士一同參加殿試，竟然得中狀元，更是監生應科舉得捷的空前佳話。袁世凱不曾中過秀才，與他的參加鄉試並無關係，若因此而推定他具備秀才身份傳記，當然錯了。這雖然也是小事，但由此不難看出，袁世凱雖然是民國時代的顯赫人物，有關他的傳記資料，却常常發生錯誤，值得大家的注意。

科舉考試時代以八股文取士，俗稱爲「制藝」。制藝文字做得好，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而成爲大魁天下的狀元，並不意味此人的學識才能如何超人一等。如光緒時力主對日作戰的翁同龢、張謇、文廷式等人，前兩個是狀元，後一個是榜眼，他們的主張，結果是造成割地賠款的慘痛失敗。袁世凱不是進士、翰林，甚至連科舉考試時代最起碼的秀才功名也沒有弄到一個，也並不意味他的才識不如他人。這其中的問題是，當時的科舉考試，由於考試方法不適當之故，既不能選拔眞正的人才，也無法使具有雄心壯志的人才甘心受其牢籠，苦心孤詣地必欲在此求得出路。如袁世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從世凱的早年事蹟看，早期的他，乃是一個事業心極重而進取心極爲旺盛的功名之士。班超投筆從戎，志在建功絕域，博取封侯之事業。袁世凱因兩次參加鄉試不利，立志要在其他途徑上開拓他的未來前途，其志趣不能說不對。只是當時科舉考試的思想尚且深入人心，在一般人看來，世家子弟而不能從科舉考試中博取一個「正途出身」的光榮資格，總不免是門第之羞。所以不

但袁世凱的長輩要希望袁世凱應科舉考試，即是他早年所投奔的這位父執吳長慶，和周家祿督促袁世凱在營中讀書用功，好再次參加鄉試，以報答世凱生父保慶的交誼。無奈袁世凱實在不是一個能夠收束心性，專心從事學問文章之人。吳長慶和張謇對他的管束，實在使他太難過。恰好天從人願，朝鮮發生內亂，朝命吳長慶率同他所指揮的慶軍六營三千人東渡朝鮮平亂，袁世凱的治事之才，在這一事件中有了良好的表現，使得吳長慶和他的頂頭上司李鴻章都對他另眼相看，於是終能使他在科舉考試之外，開始了事業發軔之基礎。

三

光緒八年壬午的朝鮮內亂，起因於國王生父李昰應與王妃閔氏之間的政爭。當時的朝鮮國王李熙，乃是由旁支入繼的，在他卽位之初，因爲年止十二歲，所以由生父李昰應執政，稱爲大院君。大院君李昰應是一個頗富于才略的守舊派政治家，執政十年，固然使秩序安定而王室的權威提高，但因他極端守舊之故，對於當時甚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與極爲腐敗的貪污風氣，都沒有適當的改善，而且對外則採取極端排外的閉關政策，招致通商各國的普遍不滿。所以當韓王李熙親政之後，李昰應的施政措施，便成了政敵的攻擊目標。此一敵對力量的首腦人物，則是韓王李熙的王妃閔氏。

閔氏在韓國是世家巨族，在朝鮮政壇上甚有勢力。韓王李熙懦弱無能，親政之後，政權落入

王妃閔氏之手。閔妃結合了她家族的諸閔，對退出實際政治之外，而朝鮮政治上的種種改革，亦即相繼出現。最重要的一點，親日派勢力日見增長，不但政府要員先後前往日本遊歷，更招聘日人代爲訓練新生徒學習日本傳入的各種技藝，以是日本勢力造成朝鮮糧食的缺乏與物價之上漲。親日派自因希望革新而引進日本的成功經驗，其用意未可厚非。只是日本人對於朝鮮早就稱爲開化黨，意思是尋求政治革新，却是開化黨人物所未曾看到的。日本接近而致朝鮮首先蒙受日本壟斷貿易之害，這種情形，大院君後，閔氏政權所實行的軍事改革，又因糧餉不足，無法如期發放兵餉達十三個月之久，臨時發放的，發出來的竟是陳腐惡劣的壞米。兵士與倉吏發生衝突，政府不知及時疏導而反加强力鎮壓，於是引起大規模的暴動。息影家居的大院君李是應眼見製造事變的安撫而暗中加以鼓煽，於是事態趨於嚴重。韓王在知悉事情眞相之後，因爲李是困難。馬建忠撰「適可齋紀言紀行」論此云：

「朝鮮素敦禮教，尤重倫理，故自六月初九日之後，是應入踞宮中，國王至無一人敢以一旅靖難者。固由勢力不足，亦以骨肉而朝臣亦皆引鏡顧影，惴惴焉若不終日，卒

之變，非臣子所敢言者。」

大院君在暴動發生後乘機嗾使亂兵圍攻諸閔第宅，並進犯宮闕，其政敵閔鎬謙、金輔鉉等多人被殺死，閔妃得洪在羲之掩護，易服逃走，藏匿民間，否則亦必難逃一死。至於駐在漢城的日本公使館，亦在暴動時被襲擊，日本公使花房義質率館員逃至仁川，乘英艦返日。於是政權又重復落入大院君之手。當此之時，由於日本公使花房義質將漢城暴動、使館被攻、日人倭本禮造等被殺及公使館其餘人員悉數逃出等情形電告日本政府之故，日本內閣決定派兵至朝鮮問罪。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得知此一消息，急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因母喪丁憂，由兩廣總督張樹聲署理。在與總理衙門緊急磋商之後，決定立即派兵前往朝鮮定亂。這定亂的責任，就落在當時駐登州的慶軍統領吳長慶的頭上，負責協助的，則是北洋海軍水師提督丁汝昌，與北洋幕中的道員馬建昌。其中丁汝昌的責任是派遣兵船運送吳長慶的兵員與裝備赴韓，馬建昌的責任則是協助吳長慶辦外交。

光緒八年的朝鮮內亂，由於清政府迅速調派吳長慶之軍前往朝鮮，先將大院君李是應誘致來營，隨即聲明朝廷旨意，將大院君押送上「登瀛洲」一兵船送回天津聽候朝旨處置，然後出動三營兵力，將盤踞於漢城以東枉尋里、利泰院兩地的亂軍加以剿平，所以亂事迅即平定。日本雖然亦已派遣水陸軍到達仁川，準備作興師問罪之用，但因內亂已靖，無隙可乘之故廢然而返。就事論

事，清政府能在此一戰役中以宗主國之地位代替朝鮮內亂，不但迅赴事機，立奏消遏此後的亂萌，可說是非常合宜的舉措。朝鮮國王李熙及閔妃以下的全國軍民，因清政府的奠安社稷之功，清朝中國在朝鮮的聲望，因之因應得宜與吳長慶之操縱合度，當然應居首功。但此也一舉而增高了許多。論功行賞，張樹聲速出兵朝鮮，袁世凱的幫助實在很大。又，吳軍久未從事作戰，軍中暮氣頗深，其部隊的紀律又頗多不戢，若非袁世凱之大力整頓，他的軍譽就會蒙受惡劣的影響。因此他認爲袁世凱雖似紈袴子弟，不肯用功讀書，於處事治軍兩方面，却頗有長才，值得稱道。凡此種種，都是袁世凱能從慶軍中發跡的重要原因，值得提出一說。由此不但足以窺見袁世凱的實際才能，對於他此後以練兵起家的事實，亦可以多一些瞭解。

張謇自撰年譜，光緒八年六七月記云：

「吳公奉督師援護朝鮮之命，屬余理畫前敵軍事。時同人率歸應鄉試散去，余丁內艱獨留。而措置前敵事，手書口說，晝作夜繼，苦不給，乃請留袁慰廷執行前敵營務處事。七月三日，拔隊，聞命至是，七日耳。」

又，張謇之子孝若所撰張季直傳記云：

「那時吳公幕中人才，却也濟濟，但是重要機密和筆墨的事，吳公却是信託我父一人擔當他去主持辦理。朝命下來，急如星火，差不多立刻就要出發，但是所有的準備都要我

處理，又一件不能耽誤，所以我父計劃出發和前敵的軍事，寫奏摺，辦公事，實在忙得不得開交。嘴裏說，手裏寫，白天忙不了，夜間接續辦，實在是煩苦得很。在這時適當鄉試的時候，吳公叫袁世凱去考舉人，袁心裏實在不情願，嘴裏又不好意思回，我父當時一個人對付內外各事，實在也忙不了，就對吳公說：『大帥不要叫慰廷去考了，就讓他幫我辦辦出發的事吧！』我父這樣一說，吳公自然立刻就答應了。於是我父就派袁趕辦行軍應用的各種物件。那曉得限他五六天辦好的事，他不到三天就辦得妥當齊備。我父很稱讚他有幹才，就接下來派他執行前敵營務處的差使。……」

由上面的兩段話，可知袁世凱對於處理實際性的事務很有幹才，所以纔能將限他五六天辦好的行軍應用之物，在三天內就全數辦好。準備工作既然迅速完成，部隊的開拔自然就可迅速。張謇說，吳軍之開拔，自閏命至出發只七日，袁世凱之功不可沒。由於吳軍之迅速開拔，使得日軍之調動相形落後，於是主動之權方能操之在我，吳長慶對此，自然十分明瞭。至於袁世凱如何參贊吳長慶的任務執行，以及如何協助吳長慶整飭慶軍的軍紀？這在沈祖憲吳闓生所撰的容菴弟子記一書中，頗有誇張的描寫，可以參看。容菴弟子記卷一：

「清軍以久無戰事，紀律稍弛，分起開行，稽查難周，姦淫擄掠，時有所聞，吳公以爲恥，商請公設法整飭。部將多吳公舊侶，素驕縱，復多讒阻。公因曰：『禁騷擾不難，得帥信非易耳。』吳公默然。晚日，滋擾愈甚。公入帳，請吳公出外，仰觀山坡遺物堆集。吳公問何物？公曰

：『兵丁掠民間什物，其粗劣者委棄於道也。』又曰：『王師戡亂，紀律若斯，遺笑藩封，玷辱國體，帥其勉旃，我請從此辭矣。』吳公大驚，變色誓曰：『請汝放手爲我約束，有聽讒謗者，非吳氏之子孫。』控姦戕其婦者，公乃傳令各營，有入民居及雜伍者，斬。適有犯令者，立斬數人傳示。有韓紳然仍未絕。公白吳公曰：『徒戮兵丁無益，其約束不嚴之官弁，須加懲治乃可。』吳公然之，檄公總理前敵營務，徒步往查，親督搜捕，竟日夜不食，卒獲犯手刃之，厚恤韓紳家，滋擾稍斂，聲乃振。分統提督黃仕林泣訴於吳公，謂公枉殺。吳公瞋目叱責，遂無敢再進讒者。兵民由是相安，韓人謳思，歷久不忘。」

又云：

「清軍由南陽水原進發，抵韓京南門外支帳屯紮，道員馬建忠建議以是應赴華，然後捕其餘黨。張督樹聲採其策，密檄施行，議俟是應來營答拜，即舁之行。吳公令公密爲布置。是應至營，護從甚衆。公遣兵阻於外，引是應入與吳公筆談。是應寒暄畢，覺有異，書曰：『將軍將作雲夢之游耶？』吳公尚支吾不忍發，公握刀在側，曰：『事已露，遲則生變。』即促人扶是應入肩輿，星夜趨馬山浦，登兵輪送天津。」

關於後一條記述袁世凱促吳長慶速將李昰應執送中國一事，既是直督張樹聲檄令執行之政府決策，吳長慶在執行時，應該沒有徘徊瞻顧之餘地。容菴弟子記寫吳長慶此時之濡需不忍，其

目的正欲藉此反襯袁世凱之果斷明決，而其實並不正確。只是，袁世凱之屢促吳長慶整飭軍紀，以致招來吳軍部屬之普遍反感，則似乎頗能道出袁世凱後來與吳長慶不能水乳相投的原因所在。

四

袁世凱爲何不能與吳長慶水乳相投？可以看王伯恭蜷廬隨筆中所透露的消息：

「光緒壬午之冬，余奉合肥相國奏派，偕馬相伯舍人往朝鮮，應其國王之聘。率六營駐防漢城，袁慰亭司馬權營務處，居三軍府。其居三軍府也，蓋與吳帥不甚水乳，藉爲朝鮮練兵之名，遂別樹一幟。」

一般的記載，都以爲袁世凱之所以會在朝鮮替國王李熙訓練新軍，乃是由於朝此大亂之後，深感朝鮮舊有的軍隊裝備窳劣而完全不合時代的需要，爲求革新軍政，逐步淘汰無用的舊軍，因計劃另建新軍，而商請吳長慶調用袁世凱代爲主持練兵事宜的。看了王伯恭的記述，則袁之練兵，其原因在於袁世凱自覺與吳長慶有了意見，爲了「別樹一幟」以求有所建樹，乃自請於朝鮮國王的。這一說法，不見於其他有關人士的筆記，但在朝鮮方面却有相似的記載，可以證明王說不訛。朝鮮金昌熙所著東廟迎接錄云：

「袁曰：『我前晤雲養，勸其急於練兵，以制全局，以懾外侮，而竟歸淡漠，如何可也？何

不乘我軍在此，擇選精卒，由我軍訓練幾日，再授以自統，原非大難事。何不先試練一營五百人，以觀後效。能有勁旅三千人，政可行，侮可捍，然將才不易也。如值中邦一朝有事，或恐不暇顧及，何不圖自立，以爲長久之計？』我曰：『下官短見，惟望天兵長留。』袁曰：『我士卒恐不能久留。』……袁曰：『貴邦產五金、人參、牛皮、絲、麻、材木，得人以理，指日可富。且地多荒蕪，宜急種桑，開闢疆土，使民勤勞，練之一年，不難大理。每年能籌數十萬銀餉，可養精兵三四千，多不過萬，足可使日人永不敢啓鯨吞之心。……』」

上文所說的「雲養」，指朝鮮政府中親華派的重要人物金允植，時正爲國王李熙所信任；「天兵」，則指清朝中國派在朝鮮的軍隊。朝鮮不能自強，當時人的想法，是希望借重中國軍隊的駐防，以便代爲捍禦疆圍。這當然是很不合情理的事，但因朝鮮君臣除此之外計無所出，所以也只有存此依賴之想。袁世凱知道其中的癥結在於朝鮮政府無治兵理財之人，所以通過金允植與金昌熙的關係，說動了國王李熙，使他覺得必須自立自強，方可永絕日本人的覬覦之心。於是，朝鮮國王李熙同意採納袁世凱的建議，挑選各地民兵之精壯者五百人，交付袁世凱代爲訓練。論其動機，固非國王李熙所自請，而係出於袁世凱之多方勸說。由此看來，王伯恭說，袁世凱因與吳長慶有了意見參差，然後希望藉爲朝鮮練兵之名，以求別樹一幟，正是當時的事實。袁世凱隨吳軍渡海東征，甫經建立大功，爲何就與吳長慶有了「不甚水乳」的情形？這倒是很值得注意的問題。

推測其可能的原因，大概還是由於袁世凱在爲吳長慶整飭軍紀時，因爲少年氣盛而致意氣飛揚，得罪了吳軍的許多高級幹部。如果袁世凱在此時更有令人難堪的言論與舉動，自更容易更起吳軍將領之反感了。這在兩年之後，亦有事實可稽。兩年之後，即是光緒十年之十月，朝鮮政府中的親日派希圖引進日本勢力，藉以擺脫清政府的拘束，於是再度發生中日兩國間的衝突。其時吳長慶軍已奉令調回三營戍守金州，吳長慶自己亦已病卒於金州軍中，留在朝鮮的三營戍兵，由提督銜的分統吳兆有統率，袁世凱會辦營務。當亂事發生時，叛亂的主謀份子金玉均謊稱清軍作亂，哄騙國王李熙親書手諭，請日本公使竹添光鴻率軍入衛，日軍因此得以進佔王宮，並設防阻止清軍進入。此時韓王已入日軍及亂黨之手，內外消息隔絕，清軍不能取得韓王的同意，無法入宮定亂，情勢甚爲急迫。當此之時，幸虧袁世凱當機立斷，決定攻入宮中救出被脅持的韓王，於是方能扭轉局勢，完全打破了親日派與竹添公使所設計的陰謀。而慶軍諸將領在當時，亦很能與袁世凱同心協力，共建大功。但在沈祖憲吳闓生所著的容菴弟子記中，却把吳兆有張光前等一班慶軍將領一個個都描寫成了闒茸無能的貪生怕死之人，不但與事實顯然不符，當然也更容易激起慶軍各將領的忿怒。容菴弟子記的原來文字如下：

「十八日，公集吳張商救護策。二將謂：無北洋令，不敢輕動。公曰：『渡海請命，其何能及？』乃會商致書韓王，請往護。黨徒矯覆阻止。遂遣泰安兵船送書北洋，並令先經旅順，請子久公（按卽袁保齡，時駐旅順）電告。越旬餘，始得北洋覆電，令堅壁自守，以待調停。……十

九日，韓擧國惶恐，廷臣金允植南廷哲等泣請救王。市民糾集十數萬，將作亂。沈舜澤，備印文求帶兵救王。公集吳張二將議入宮，二將請遣書竹添詰問，不報，黨徒誤以王赴他島，另立幼君，附日背華。公奮起曰：『我輩統兵防韓，若國，咎將焉歸？且韓既附日，韓亂黨必斷我歸路，合兵攻我，何由回國？』吳張不得已强，公曰：『防韓交涉，係我專責，如因擧衅獲咎，我一人當之，決不累及諸君。』諾。乃囑陳樹棠函告各駐使以擧兵之故，卽議分兵進援。吳張皆不敢任中堅，願分駐馬山浦者，兵祇四哨，毅然任中路，由宮之敦化門入。吳抄其左，張抄其右。公令將士猛進還攻，至王居行數武，內開槍迎擊，公所練之韓軍憑牆夾擊，彈如雨下，公之左右前後，兵卒傷亡樓臺，朴泳孝督日人兵數十人奮進，仰攻失勢，頃刻間死傷過半。日兵院後夾攻，黨衆不支，遂逃避。公麾兵進躡，遇向震屋瓦。至後院山坡下，見兩兵掖吳兆有倉皇走避，兆有跣足號哭。公問其故，擊逃潰，莫知所之。』公笑曰：『汝作此態，敵人其免汝耶？勿亂我軍心，速歸公仍麾衆前進，聞日兵已歸使館，日暮，遂收隊。達旦，迄未見張光前一兵。遣人視之，乃在宮西金公歎曰：『淮軍暮氣，何至此耶？』」

這一段文字，充分寫出了袁世凱在危機當前，局勢瞬息萬變之時，不但能毅然擔起責任來作當機立斷之決定，而且身先士卒，奮不顧身，所以能以四哨之衆，一舉擊破宮中日軍之抵抗，粉碎了親日叛黨負隅頑抗之目的，於大局之終得底定，厥功甚偉。在這段文字的描寫之下，留韓慶軍的另二營領兵將官吳兆有和張光前，不但遇事畏葸不前，而且貪生怕死，全無軍人氣概。互相對照，愈益可見光緒十年的朝鮮叛黨作亂，是完全倚賴了袁世凱一人之獨撐危局，方能挽回頹勢的了。實際上的情形如何，王伯恭的蜷廬隨筆中亦有若干描敍，可以參看，引述如下：

「甲申（按卽光緒十年）九月，余有事返上海。甫登岸，卽聞朝鮮大亂，逆臣洪英植與其駙馬朴泳孝鈎串倭人，瓜分八道，謬告國王云中國兵變，誘王至別宮，招日本兵護之。又矯王令，傳見執政大臣之忠鯁者，至卽斬之，一時各國使臣皆杜門自衞。中國防營雖知有變，而無人傳告，亦不敢輕出兵隊，惟擐甲以待。遣人詗察，則宮門緊閉，消息不通，民人之圍繞宮外者殆近數萬人。忽見趙寧夏之首級出，同聲驚號，爭以頭觸宮牆。牆圮，見倭兵百餘人，持槍外向，慰亭所練之五百人亦在其中。吳兆有見事已急，率三營馳往救之。洪英植令五百人放槍相拒，此五人譁曰：『吾身著吳老帥所賜之軍衣，今反擊吳老帥之兵乎？』各以槍仰空發響，於是中國軍士始魚貫而入。顧未知國王所在，遍覓不得。慰亭曰：『國不可一日無主，王有姪，年六歲矣，我輩當共立之。』兆有聞而大怒，擬摑其面。遂向軍士叩頭曰：『我等在朝鮮，專爲保護國王也；如王無尋處，我卽死於此間，不出宮矣，諸子弟宜努力。』軍士齊聲應命。旋有人報，頃見國王

尙在後苑小屋中。兆有立刻率三營官及茅少笙馳往，國王已改倭裝，將逃矣，蓋英植等紿其以中國人造反也。王見兆有等，大駭，欲起避。兆有伏地大哭，且爲之叩首。王知無他意，心始安。兆有請王移至慰亭軍中避亂，王諾之。英植在側力阻，兆有乘勢扶王出。少笙亦手挽英植同行，擬擒其到軍正法。甫及階，倏有韓人自階側揮利刃砍斫之，首墮，少笙跳而免。王既至副營，日本公使竹添光鴻聞信，遁還本國。是役也，微兆有在，國卽亡；若用慰亭改輔幼主之策，國亦亡。是時余適還上海，後遇少笙，詳爲余言。」

茅少笙卽茅延年，上文已曾介紹；他當時是袁世凱所統慶軍副營的書記。王伯恭所記述的這段話，由於他是根據茅延年的口述而記錄的，其中當然不免錯誤。但他所說的吳兆有平亂之功，一定不錯，因爲這是此事的重要關鍵，卽使細節稍有舛誤，大前提決不會差錯。看王伯恭所記袁世凱營中書記茅延年關於此事的評述，則袁世凱並不是主要的決策之人，冒險攻入王宮，亦不是袁世凱一人之力。而且袁世凱當時還主張另立幼君，若非吳兆有之反對，更幾乎將造成朝鮮之大亂。以此而論，則袁世凱在甲申事變平定以後，或許便卽是以類似容菴弟子記中所述的內容，到處宣傳，抑人揚己，雖言近汚衊而在所不惜。如其不然，容菴弟子記中的誇張內容，又是何所據而云然的呢？甲申事變，袁世凱誠有定亂之功，但他將同時僚友的功績一筆抹煞而全歸於己，這種作風，無疑會使他自己蒙受極大的不利。由此可知，他在光緒八年因類似之事而招來吳長慶之不滿，亦正是大有可能的。

五

項城袁氏家集有一卷袁保齡的家書，其中有幾封袁保齡寫給袁世凱的家信，世凱與吳兆有齟齬的消息。其時袁世凱已因在朝鮮大遭物議之故，藉母病請假回至河南項城原籍，閉門思過，韜光養晦。保齡作書誡勉，云：

「汝舉動總不免鬧，是一大病。家世清白，實無餘資，貧者士之常，原不怕人笑我，況我既不貪得，不妄取，亦復從何鬧起？我家先世節儉，樸素起家，端敏公及汝父之儉約，無人不知。汝此次朝鮮之功，衆論昭然，而喫吳某如此大虧者，即受鬧字之病。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怨天尤人，有何益耶？」

上信中所說的吳某，即吳兆有。其後，李鴻章爲了要送大院君李昰應回朝鮮，打算利用他的親華態度牽制朝鮮國內的親日勢力，看中了袁世凱是有用之才，示意袁保齡函囑袁世凱回津銷假，以便護送李昰應回國。袁保齡遵照李鴻章的指授寫信回家，說：

「汝既至津，帥必有一番優禮，可一吐半年胸中悶氣。大丈夫赴湯蹈火，在所不避，況此地尚非湯火乎？但不可無臨事而懼之心，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識見，更可增一番聲價，甚爲汝盼之。——汝在津千萬勿談孝庭一字短處，此事關人福澤度量，非僅防是非也。……」

吳兆有字孝亭，袁保齡囑咐袁世凱到天津後千萬不可談論吳兆有的短處，其用意一在避免旁

人以爲袁吳互相攻擊，二在故示涵宏之量。但由此却可以使我們看出，袁世凱與吳兆有之間的仇隙一定很深，否則袁世凱當不致一跌而告假回籍，而且一住就是半年的。袁吳的仇隙由何而來，除了，就甲申平亂時的那一番爭執，以及袁世凱可能過度標榜自己而致觸怒於吳是他藉一會辦營務處」的名義無視吳兆有的分統地位，多方凌轢藐視的事實了。

張季子文錄卷十一，載有張謇所撰的「致袁慰亭函」，歷數袁世凱在朝鮮建功以來的囂張跋扈之態，及反顏不顧吳長慶、張謇、朱銘盤等人當年對袁的提拔之恩，其中的指責極爲嚴厲。關於袁世凱與吳兆有的分統三營之營務的部分，照原函中所說的情形，是：

「司馬（按，俗稱司馬故）所謂營務處，即指袁世凱，以其官居『同知』，處也；會辦朝鮮防務，孝亭會辦也，公牘具在，文理昭然。而司馬札封稱『欽差北洋大臣會辦朝鮮防務總理營務處』，將不屑於此耶？則不應受事。借北洋以欺人耶？則人不可欺。言官劾左寶貴者，列舉，與左寶貴何異？此其一。

「營務處是差使，而官則同知，五品耳。於鎮將以此愚瞽東人耶？則東人不盡無知。將用札，亦當用札耶？事例乖謬，此其妄稱『欽差』『欽命』字樣，不知司馬此務處者，於實缺提辦，同見國王，便當孝亭居左，一。

「既爲孝亭會辦公事，便當會孝亭前銜。自尊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致使將領寒心，士卒怨涕。司馬將謂勢力可以懾人，權詐可以處

世耶？不學無術，此其一。

「內地官職，惟實缺出則張蓋，若營務處、營官，從未見有用之者。乾嘉間册使東臨，國王迓以肩輿，曾被詔旨申飭。而司馬居然乘輿張蓋，制五色馬旂，呵殿出入，平時建兵船黃龍大旂。不知自處何地？擅存亭何地？置國家體制於何地？此其一。……

「此次國王來函，無一不稱曰『袁會辦』，而孝亭轉似在牽連得書之例，此得謂非司馬之心思力量手眼之所構耶？……」

吳長慶於光緒十年三月因中法戰機急迫而奉令調防金州，將所部六營一分爲二，自帶三營，而以其餘三營交吳兆有分統，留防朝鮮。吳兆有的官銜是記名提督，秩居武一品。留防營管帶，則分別是張光前，方銘三與袁世凱。張光前是記名總兵，秩武二品，方銘三的官秩不詳，至於袁世凱，則不過是文職五品的候選同知而已。吳長慶在朝鮮時，已將軍中的副營交袁世凱管帶，到他移防金州時，命吳兆有分統留防朝鮮的慶軍三營，而以袁世凱爲會辦防務的「營務處」。所謂營務處，本是清代特有的軍事體系，其性質略如現代部隊中專爲首長料理有關作戰任務的參謀處。袁世凱被任命爲留防慶軍三營的「營務處」兼司會辦防務，顧名思義，當然是爲分統三營的副帥吳兆有料理營務及會同辦理朝鮮防務；吳兆有既爲三營的分統，袁世凱就只能算是他的副手兼參謀主任。然而若如張謇致袁世凱信中的所說情形看來，袁世凱雖是吳兆有名義上的副手兼參謀主任，他在朝鮮的種種作爲，自公文具銜及行文體制，出入儀仗等等，無一不是儼然防

軍主帥的模樣，根本無視於吳兆有的存在。最不堪的，還是他以慶軍營務處而自稱爲「統大臣會辦朝鮮防務總理營務處」，使得朝鮮君臣弄不清楚他究竟是受北洋大臣所直接派遣？還是應受吳長慶與吳兆有之節制？而他以五品文官的身份，居然以下行文的格式，對官居總兵的營將一律用「札」飭，更不免使人對他的狂妄僭越感到氣憤。林明德撰「袁世凱與朝鮮」一書，說袁在甲申事變建立功績之後，聲勢譽望，盛極一時，但不久即陷於逆境之中，潰到內外兩方面夾攻。「內有防營諸將的嫉忌與傾軋，外有各國的流言毀謗，尤其竹添的嫁禍，日本激烈的反華懲袁論調，使他受到『擅啓釁端』的非難。於是有吳大澂、續昌兩欽使的前往調查。袁氣憤之餘，毅然脫離慶軍，乞假歸省。」就事論事，來自各方面的毀謗與責難也許不免有過甚其辭的地方，而袁世凱在朝鮮的目空一切，驕狂跋扈，無寧是有很多具體事實的。吳兆有、張光前等慶軍將領反對他，毀謗他，儘管袁世凱亦可以反唇相譏或抵賴不認，但有一件事情却是他所抵賴不掉的，就是在亂事平定之後，袁世凱擅自挪用兵餉以從事撫卹善後一事，顯然已越出了軍事行動的範圍。吳兆有等據此稟訐，袁世凱就無辭可辯了。王伯恭蛻廬隨筆記此云：

「鮮朝甲申之亂，一時重臣，悉爲亂黨誅死，慰亭皆優恤其家，倉卒無錢，借軍餉貸用。事後，稟請合肥作正開消，合肥批斥之，謂『該管帶純以銀錢買結韓人之心，實屬荒謬，所請著不准行』。且札飭吳兆有，責令該管帶借用之餉，照數賠補。慰亭之叔子九觀察，復寄函痛訓之，令速爲賠補。……於是慰亭交卸營務回籍，所借兵餉，則售產以償之。」

袁世凱在光緒十年時，還祇有二十六歲。二十六歲的袁世凱，不但充分顯示了他，並且還具有不惜金錢以買結人心的器識，足見袁世凱這個人，實在具備作大事、作領袖的條件。袁世凱軼事中有一條說：

「袁世凱嘗對人言，天下無難事，惟有金錢自能達到目的耳。是以袁之一生，處政海潮流中，事事能着先鞭，固由於手段靈活，其大半亦依賴黃金勢力也。」

胡思敬撰「大盜竊國記」一書中論袁世凱，亦說：

「世凱生平，濫交汚取，俯視一切，不問家人生產。自其少時，即好爲游蕩。偶得數金，輒呼朋飲酒，頃刻而盡。後既得位，益顧盼恣睢，有炙手可熱之勢。每幸一姬，輒有犒賞。宴客備致珍錯，一席之費，不減中人十家之產。內外大臣趨之若鶩。其橫絕古今，爲諸奸所不及者，敢於用財，視黃金直如土塊；敢於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論資格而已。名利爲天下所爭趨，故小人皆樂爲效力。」

自古以來的成功人物，除了「知人善任」的要素以外，亦需要以爵祿與名位來驅策天下的人才。袁世凱敢於用財而並不斂財自肥，即此一點，已足以使那些志在自肥身家的小人物能得充分的滿足而甘爲其效命奔走；更何況他的揮霍豪邁，看起來更像是漢高祖的豁達大度，惟才是用，又使人覺得他實在具備一個開國帝王的恢閎度量而爲之欽佩顫倒呢！曾居袁世凱幕府，爲總統府秘書長的張一麐，也曾說他：

「其虛懷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過人，兩目奕奕有神，凡未見者俱以爲異。與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於其門者，如過江之鯽。然所用無私人，族戚來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給月廩，不假事權。屬吏苟有贓私，必嚴劾治罪。總督本兼鹽政，時長蘆及永平七屬鹽務餘利鉅萬，又灤州煤礦、啓新洋灰公司皆蒸蒸日上，每曰：『彼等拉余入股，余拒之。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吾爲一省長官而近利，何以責人？』故袁氏所有股票，皆段芝貴以黑龍江巡撫罷斥後虧賠過多，項城爲出貲彌補而以股票作抵，非袁氏所固有也。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財，非當世貴人所能望其項背。使遇承平之世，豈非卓卓賢長官哉！」

張一麐說這些話的時候，袁世凱已官至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由他所說的種種情形看來，此時的袁世凱，除了不用私人，不有私財，精力過人，及人人皆能如其意而去的應付本領，在早年的袁世凱身上，已頗能看出端倪之外，其虛懷下士，煦煦和易這兩點，似乎便是他一度在朝鮮遭受挫折打擊之後，逐漸銷磨其驕矜之氣所培植出來的。這當然表示他性格方面的圓融、成熟、與含蓄，與他在朝鮮時代的飛揚跋扈，已不可同日而語。不過這畢竟是袁世凱在幾經捶練之後所得到的改進，此時尚不足以語此，所以纔會因驕矜狂妄，凌轢同僚而招致慶軍將領的普遍不滿。不過，對於應付他人的本領，此時大概亦已到了得心應手的地步，不但派來調查的欽差大臣吳大澂受袁世凱牢籠，即是在袁世凱回到天津之後，當時的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對他也極爲賞識。關於吳大澂受袁世凱牢籠之事，胡思敬所撰的大盜竊國記中曾有記述，云：

「時法事未結，朝旨戒用兵，命吳大澂東渡，主和解。大澂中途與幕客羅豐祿謀，欲誅世凱以謝日人，豐祿力諫。及入王京，居南別院，王不來見，而陰輸情於日大使井上馨。大澂恚甚，召詢世凱。世凱挾王來謝，復從旁以危詞怵之。翌日，又導大澂答拜王，濟賄朝民，植木牌於道旁，上書袁大司馬功德。大澂見而疑之。世凱佯怒，令拔去，及反，復植如故，雖鞭之勢莫能止。自是大澂以世凱能得民心，倚以爲助。既而日使拒大澂，不與議事，往拜亦不見，大澂大窘，恐無以復命。世凱復爲畫策，由王請大澂出爲區處善後。大澂乃勸王勤政恤民，効忠睦鄰，不敢及他事。其實王之睦鄰，不啻不來，日使之不會議，皆世凱居中播弄，而大澂不悟也。大澂歸，盛稱世凱才智。……」

據王伯恭蛻廬隨筆所說，當吳大澂啣命至韓時，袁世凱爲了博取吳大澂之好感，曾執贄稱爲弟子。及大澂回，則二人已結爲姻親云。由此可見，袁世凱對於以權詐機變之術牢籠他所欲利用之人，總是可以無往而不利的。容菴弟子記說，吳大澂回到天津時，對李鴻章盛稱袁之才能，說是：「公向謂張幼樵爲天才奇才，我見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張幼樵卽張佩綸，李鴻章對於吳大澂之極力爲袁世凱吹噓，李鴻章對袁也要另眼相看了。所以以前，雖因挪用軍餉結好韓人之事遭受李鴻章之訓斥，及至回到項城原籍稱病不出，李鴻章反倒要寫信給袁保齡要他代爲敦促袁世凱再度出山。一番挫跌，愈增身價，袁世凱的手段，在此已可見及一斑。

六

李鴻章要袁保齡勸令袁世凱再出，目的是打算派袁世凱護送大院君李昰應回國，然後命袁世凱代替原來的商務委員陳樹棠，作爲中國政府派駐朝鮮專司通商及交涉事務的監督。這兩項任務都很重要，非普通人所能承擔，而李鴻章覺得袁世凱頗合理想，因此一再告知袁保齡代爲催促。至於大院君李昰應何以需要送回朝鮮？以及商務委員陳樹棠何以必需更迭？這就與當時的朝鮮局勢大有關係了。

發生在光緒十年的朝鮮內亂，雖因袁世凱吳兆有之迅赴事機而得以立刻解決，但其中所包涵的意義，却很不簡單，而且其未來的發展正大有可憂。李鴻章譯署函稿中載有光緒十年九月二十五日袁世凱自朝鮮寄來之一稟，觀其內容，可以約略顯示甲申變亂之發生原因，抄錄一段如下：

「朝鮮君臣爲日人播弄，執迷不悟，每浸潤於王，王亦深被其惑，欲離中國更思他圖。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國兵力難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鮮，更不能啓釁俄人。乘此時機，引强鄰自衞，即可稱雄自主，並駕齊驅，不受制中國，並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見，舉國之有權勢者半皆如是。似此情形，竊慮三數年後，形迹必彰。朝鮮屏藩中國，實爲門戶關鍵，他族偪處，殊堪隱憂。該國王執拗任性，日事嬉遊，見異思遷，朝令夕改，近時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設法杜其覬外之心，異日之患，實非淺鮮。卑職謬膺重任，日思維繫，不避艱險，竭力圖維。初猶

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既開，人心漸岐，舉止漸異，雖百計誘導，似格格難入，俱廢。大局所關，不敢壅於憲聽。近聞福州臺灣同時告警，東洋訛傳最多，韓人不久必有新聞，鬼蜮之謀，益難設想。……」

按，光緒十年甲申的朝鮮變亂，發生在此年的陰曆十月十七日晚間，亂事之平，則在十月二十日。袁世凱此稟，寫於亂事發生前的二十一天，其中已隱約可以看出當時朝鮮局勢的潛在危機。爲什麼當時的朝鮮會存在這種潛在的危機？其中原因，可由三方面來說明。一是日本野心家久已存有吞併朝鮮的企圖，利用明治維新成功的事實，誘使朝鮮的親日份子從事日韓合作，希望藉此達到其染指朝鮮之目的。二是朝鮮國內的維新派眼見日本維新成功的實例，希望效法日本的成功經驗，致朝鮮於富强，以便進一步擺脫清朝政府的控制，所以日韓關係漸見融洽。第三種原因，則是因爲中國當時正因越南問題與法國作戰，不但在越南方面的陸戰節節失利，馬江挫敗，更使南洋海軍的艦隊在極短時間內就被法國艦隊所燬，而法軍不久更登陸基隆，臺灣情勢亦岌岌可危。日本及朝鮮的親日派，都認爲中國這時決無餘力顧及朝鮮，正可及時謀取獨立，於是乃有十月十七日夜間的變亂，打算引進日本勢力以支持國王，先造成事實上的獨立，然後爭取各國的承認，到時清兵既然不能立足，自然非放棄對朝鮮的控制不可。甲申之變，朝鮮方面的主謀之一金玉均，在政變失敗後逃往日本，曾將政變經過寫成一本極爲詳細的「甲申日記」，其中透露了不少當時朝鮮維新人士對于臣服中國的不滿，和爭取獨立的理想，非常值得注意。

金玉均的甲申日記，是用陽曆爲記時標準的；光緒十年的陰曆十月十七，便是陽曆的十二月四日。在事變發生前的一個多月，卽陽曆之十月三十日，日本公使竹添由日本返抵漢城。翌日，金玉均往訪竹添，竹添說：「若有他國贊助貴國之改革，君等當以爲如何？」金玉均答：「吾自三年以前，愚見所至，以爲獨立我國，變革舊習，非藉乎日本外無策，終始勤與於其間。然因貴政府之變幻無狀，因貽吾黨之良具（？）無比……」陽曆十一月一日，另一個親日派份子錦陵尉往見竹添，竹添對他說：「清國之將亡，爲貴國有志於改革之士，不可失此機」云云。二日，朝鮮國王李熙接見竹添公使，密語移時。竹添聲明，去年日本政府之所以退還朝鮮賠款四十五萬元，「此我皇上特爲貴國養兵之費，以爲獨立之資。」繼論當前時局，謂中法之戰清國將亡，朝鮮當從歐美之法改革內政，速圖獨立，此爲日本政府之深切願望云。李熙對竹添的進言作何答覆，日記中並無記載。但既未加以駁斥，想來亦有願聽之意。所以到了十一月廿九日李熙召對金玉均之時，彼此就考慮到，假使朝鮮決定依附日本，以致中日兩國因朝鮮問題而發生戰爭時，日本究竟有沒有取勝的把握？這時的雙方對話如下：

「余徐曰：『但日清兩國交戰，最後勝敗之數，未可預料。今日與佛（指法國）合，則勝算決在日矣。』上曰：『然則謀我獨立之策，亦不在於是乎？』余對曰：『誠如聖教。然如殿下肺腑之臣，無非仰附於清，爲狗羊之役。日本雖欲使獨立，似不可得。……』」

金玉均託斥朝鮮政府中的親華派爲甘心作中國工貢的狗羊，而以日本之誠意幫助朝鮮爭取獨

立爲可信，雖然基於愛國的立場無可厚非，其政治見解却未免太幼稚。試看日本在挑起中日甲午戰爭後打敗中國，置朝鮮於日本的掌握之中，那時爲什麼不將朝鮮的獨立自主權還之朝鮮呢？並且在不久之後，公然宣佈合併，以致朝鮮因此而亡國，其昔日之友誼又在何處呢？由此可知，日本人此時結好朝鮮政府中的親日派，無非希望挑撥中韓之間的藩屬關係，先求脫離中國之羈絆，然後伺機加以吞併。而當時朝鮮政府中的親日份子與國王李熙，都只是一些識見淺陋的愚妄之徒，誤以日本之甘言美辭爲可信，於是在不知不覺間受其誘惑而不察。甲申之變，雖在袁世凱之果敢行事及慶軍將士之同心效命下迅速敉平，但如朝鮮君臣的觀念之後，應該有所體認的。

李鴻章派袁世凱護送大院君李昰應回朝鮮，乃是光緒十一年八月間的事。這是他與總理衙門經過再四籌議之後所定的決策，其目的是希望藉送回大院君之事，加强朝鮮國內的親華勢力，以抵銷朝鮮國王李熙與閔妃一黨日益增加的離心趨向。倘若大院君回國以後，能够在政治鬪爭中取得上風，自必可確保中國在韓的地位。這一意向，在袁保齡寫給袁世凱的信中亦曾明白透露。袁氏家書卷六致世凱任函云：

「厥得電音，遠懷差慰，送大院君一行，雖不帶兵去不及有兵護行之穩妥，然細思此事，亦無甚可慮。朝鮮雖昏，尚不至有衞輒拒父之事，彼都人士，亦尚知震懾國家威靈。但恐他年終有

一關，懸揣仍是李勝閔敗。石坡梟雄，王與妃皆非其敵，牝雞退聽，亦李氏宗社之福也。」

但是，雖然李鴻章與他的幕僚都存有這種想法，而送回大院君之後，這一著棋預期的作用。原因是大院君業已去國三年，他當年所培植的政治勢力，業已在這三一派當權人物剷除淨盡。大院君回到朝鮮之後，孑然一身，無兵權、無黨羽，根本餘地。何況他當時業已年屆七十，衰老多病，無復當年的雄心壯志，所以終於也無，以與閔妃派人物一較短長。所以，餘下來的問題，倒是需要袁世凱運用他的縱橫衝樽俎了。

七

經過光緒十年的甲申政變之後，日本政府藉口清軍防營首開釁端，以致日本使館被焚，衞兵被殺，在經過談判締約之後，規定中日雙方均不得在朝鮮駐兵，以後朝鮮如有內亂定之時，無論中日二國那一方面首先出兵，均需照會通知對方。由于此一條約，慶三營兵力被撤回了，袁世凱再到朝鮮之後，他的官銜雖被陞爲「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委員，但手下並無一兵一將可以指揮調遣。時當「朝王外雖感德，內則趨向不專，陰有擇强自庇之意，倭兵甫撤，俄使旋來」（李鴻章致總理衙門函中語），袁世凱究竟要用甚麼方法來消弭亂萌，以加强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實在是很艱巨的任務。

袁世凱於光緒十一年八月送回大院君以後，便以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通商委員名義駐朝鮮漢城，主持中國與朝鮮之間的交涉與通商事務，直至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之戰發生前奉調回國，其第二次留韓時間凡九年，不但遠比第一次留韓時爲困難。原因是自從光緒十年的甲申變亂以後，朝鮮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已有很大的轉變。他們眼見中國多年以來備受外國列强的侵略，國勢凌夷，無力振起，而猶復不肯放棄對屬國的鈐束，難免不生反感。而自對外通商開放以來，新知識與新觀念陸續輸入，美國日本更一再鼓勵朝鮮自力更生，於是亟亟尋找獨立自主以求擺脫中國的羈絆，提高本身的政治地位。前引李鴻章致總署函中所說的「倭兵甫撤，俄使旋來」，卽指袁世凱未曾送回大院君之前，俄國駐日公使館的參贊施貝耶曾由日本前往漢城，向韓王李熙面致俄國可以調停日韓糾紛，並予保護之意。韓國政府鑑於日本的態度兇橫，深恐中國或將犧牲朝鮮的利益以遷就日本，自然很希望能得另一强國的保護，因此遣使前往海參崴接洽俄艦保護朝鮮沿海，並派員訓練朝鮮軍隊。此事後經李鴻章得悉，飭令駐韓商務委員陳樹棠干涉，而韓王堅不承認，但朝鮮與俄國所議的保護密約，仍在秘密進行之中。爲此，李鴻章當時很想利用大院君爲推翻朝鮮現政府的手段，來澈底打消朝鮮的聯俄企圖。袁保齡寫給袁世凱的信中，便有關于此一計劃的詳細指示，說：

「凱姪如晤。

詢魯軒，知現所得者文憑之存本，並未向俄人破臉，甚好。朝之君臣既不認賬，此時此事卽可延

宕下去，一字不必提，專心做搆亂召變文字，以便韓民有變，石老可藉詞出頭，中國可借題發兵，乃爲上上文字。陸軍既到，國已易主，俄雖暴，不能向我無端尋釁。俄雖强，又無如韓人舉國上下一心，不服他何也。……」

上文所說的「石老」，即前一函中所曾說到的「石坡梟雄，王與妃皆非其敵」，俱指大院君李是應。李鴻章爲什麼要想利用李是應來發動另一次新的政變，以圖推翻朝鮮的現政府呢？很顯然地由于他畏懼俄國勢力的侵入。以當時在朝鮮半島相互角逐的中日俄三國而言，俄國最强，而中日均非其敵。爲了排除俄國勢力進入朝鮮的可能，李鴻章既然無法壓迫韓王與閔妃斷絕與俄勾結，亦只有不擇手段地來一個釜底抽薪之法，使得俄國無機可乘。然而，李鴻章的這種想法，又豈是朝鮮政府所樂聞的呢？他們因維護民族自尊心而尋求獨立，因尋求獨立而亟望得到外國列强的援手，本是他們既有的權利，中國雖是朝鮮的宗主國，亦一樣是外國人身份，如何可以喧賓奪主，完全無視朝鮮本身的權利呢？所以，當李鴻章決定送回大院君之後，朝鮮國內的閔黨人物即刻看出他的眞正意圖而竭力表示反對。由于反對無效，大院君還是被送回朝鮮，閔黨人物便以各種手段對大院君施以迫害，如殺戮大院君所帶之從人，禁止臣民與大院君往還等均是，雖經袁世凱運用各種方式竭力調停，仍歸無效。「結果是袁世凱保護大院君的各種干涉態度愈積極，朝鮮政府內的反華派勢力反而愈形活躍。他們深恐袁世凱會利用大院君的聲望製造政變，來推翻韓王李熙，乃不顧一切地進一步與俄國連繫，以資對抗。於是乃有第二次的「韓俄要結

」。

第二次的「韓俄要結」，發生於光緒十二年的八月間。其時俄國已在漢城設立使館，透過朝鮮政府中親俄份子的連絡，朝鮮國王李熙正式致函俄使韋貝，要求俄國保護。俄使將韓王的來函內容拍發長電回俄，被袁世凱查出其中內情。由于當時朝鮮的電報歸中國管理經營，電報局職員亦爲中國所派，所以袁世凱立刻命令封鎖對外電訊，以阻止俄使發電，同時更將實情報告李鴻章。李鴻章因北洋海軍兵力不足，又深恐武力干涉將引起各國之疑忌，不敢照袁世凱的意見調兵前往實行廢立。但仍一面照會俄使不可接受朝鮮的請求，一面暗中調兵遣將，作必要時的出兵準備。袁世凱得悉李鴻章已爲其實力後盾，即向韓廷展開軟說硬逼的干涉。韓王李熙不得已，只好向袁世凱辯稱致函俄國請求保護之說並無其事，袁世凱所得密函副本則係奸人僞造云云。同時，俄國方面亦聲明並無保護之說。一場極端緊張的軒然大波，終於因袁世凱之因應得宜而告平息。在李鴻章看來，袁世凱的應變定亂之才確有可稱；而就事實來說，則袁世凱所忠實執行的干涉政策，徒然只爲中韓之間業已存在的感情裂痕增加其深度與寬度，對于中韓外交的全盤趨勢而言，其影響是很不好的。

李鴻章全集的電稿部分，光緒十五年二月初八日曾發袁世凱一電，告誡他在執行對外交涉時，態度不可惡劣。電文又說：

「洪使函告，去臘俄外部大臣向洪言：『袁某性情急躁，辦事過火，殊欠和平，與韓官及各

國公使不睦。韓王每作一事，袁卽疑他國慫恿。與俄使亦甚不和，似非所宜……」云云。所言汝毛病甚是，要痛改。」

又，張佩綸撰澗于集書牘六，「致李蘭蓀師相」函中論袁世凱失誤朝鮮之罪，云：

「寓津七年，日慮此作杞憂。合肥託大，釀成此禍，諸將已伏其辜。而禍端萌自方。小李賣父誤國，天地不容，自已終身廢棄。盛亦累經彈劾，於盛宣懷，結於李經之，終爲財色冥殛。獨袁以罪魁禍首，而公論以爲奇才，直不可解。花房之役，攘吳朝，而一味鋪張苛刻，視朝鮮如奴，並視日本如蟻，怨毒已深，不足論。雖曰欲尊中土匪之起，卽倭所使，電稟日數十至，請兵往剿，彼豈不知親家翁（按指光緒十年派往朝鮮之欽差吳大澂，後與袁結爲親家。）之約者？無乃太疏。求翼長不遂，與葉（按指葉志超）爭分不相見，指牙山使之屯箚，致入絕地。旣囘津門，所與合肥論者，皆無甚高論嘉謨。而與諸葛，實則全無影響。……袁且推子久舊交，亦何取雌黃後進？第此公大言不慚，全無實際，而究其所爲，驕奢淫佚，陰賊險狠，無一不備。公以通家子弟畜之則可，以天下奇才目之，則萬不可。所以不能已於言者，旣已誤合肥矣，更恐誤國，更恐誤公，與之實有恩而無怨也。斯人不用，吾言不效，此信作夢囈觀，則大幸耳。」

張佩綸在寫給李鴻藻（蘭蓀）的信中如此痛詈袁世凱，雖然看似言詞過分刻毒，但如細按實

際，却又不能說是全無影響。張佩綸在光緒初年亦曾被李鴻章目爲天下奇才，而袁世凱在當時亦有天下奇才之稱。以這一個天下奇才來痛罵另一個天下奇才，究竟誰是誰非，研究起來，倒也是頗爲有趣的事。

前引李鴻章致袁世凱書，已說他在朝鮮辦理外交，因性情急躁，辦事過火，而致與各國公使不和。若以其他記述相參看，則袁世凱之在朝鮮，因其態度惡劣而致引起朝鮮君臣之極端反感，其情形尚不止此。林明德撰「袁世凱與朝鮮」一，曾說

「袁世凱在朝鮮進步份子的反感，而造成其對中國的離心傾向。漢城政界與外交界，大多認爲袁世凱是驕橫專斷，盛氣凌人，常以『上國』辦事大臣自居，一味以權謀術策控制朝鮮，不但蔑視朝鮮的目標，是加强中韓宗屬關係，自易採取積極干涉韓政的態度，因此難免引度和官吏，甚至藐視韓王李熙。韓廷在袁的高壓政策下，不得不虛與委蛇，而其嫉視中國的干涉，以及要求朝鮮自主的願望，與日俱增，甚至無日不在窺伺機會，以擺脫中國的控制。這可說是袁的高壓政策所引起的一種反動。」

袁世凱藐視朝鮮國王李熙，在李鴻章致總署函中亦有敍述，說袁曾詈罵韓王謂：「此等昏庸，斷難與之相處」，足見其蔑視韓王之深。此外則劉成禺在他所撰的「相老人九十八年聞見口授錄」中，引述九八老人馬相伯的話說：

「袁世凱在韓京，任意侮辱韓廷君臣。」

這些紀錄，加上張佩綸所說的袁世凱「視朝鮮如奴」，「視日本如蟻」，頗足以看出袁世凱

當年以「總理」身份駐紮朝鮮時代的氣燄與聲勢。平心而論，袁世凱二次駐韓，以强化中國宗主權爲目標的各種措施，雖不免有時操之過急，但其建樹畢竟不凡。只是，他以高壓手段控制朝鮮的結果，並不能促進中韓關係的改善，反而增加了雙方的隔閡，則不但他的高壓手段值得檢討，他那種盛氣凌人的驕妄態度更大可非議。當然，中韓關係之趨於惡劣，其根本原因亦不僅此。另外一部分原因，還是由于朝鮮人士當時已深受世界潮流的影響，亟謀開拓本身的前途，而袁世凱一味忠於執行清政府的決策，在很多地方都對朝鮮的自主趨向加以不合理的干涉與限制，即使袁世凱的態度如何和悅謙虛，最後仍然不免招來韓人的反對。然則袁世凱的態度不當，固不能說是惡劣的主要原因，只是對他亟欲改善中韓關係的希望，發生相反的效果而已。

張佩綸說，袁世凱在朝鮮的措施「一味鋪張苛刻」，又因蔑視日本之故而結怨極深，馴致日人唆使韓國亂民起事，而世凱猶復「冥然不覺」，凡此指責，在其他文獻紀錄中亦頗有相關的資料可尋。例如民國初年曾旅行韓國的姜馥森，在他所撰的旅行記中便說：

「漢城總領事館佔地三、四十畝，有亭臺樓閣之勝，在海外所有的使領館中，要推朝鮮的爲第一。因爲昔年袁世凱爲駐韓大臣時，就駐在這裏。他要隨便圈購多少地，就是多少地，可見當時勢力之膨脹了」（逸經第卅一期載）

這可說是張佩綸批評袁世凱「鋪張」二字的小註。至于日本人與袁世凱結怨甚深的情形，則可以由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發生以前，日本人密謀殺袁一事看出具體的事實。葉恭綽撰「太平洋

會議前後中國外交內幕及其與梁士詒之關係」一書中說：

「先是，袁世凱於十九世紀末，以道員爲中國駐韓商務總辦，在東學黨起事前後，日本正橫行無忌，密謀殺袁，事爲唐紹儀所知。唐時在中國駐韓海關任職，遂與稅務司穆倫德告知英國領事朱爾典請求援助。復得朱同意後，唐卽於夜半手持兩槍兩刀，乘着雙馬，護送袁世凱到江邊，登上朱爾典所準備的英國兵艦，隨後把袁氏送回天津。計袁等到江邊時，距日人密謀動手的時間，才差十幾分鐘。」

據葉恭綽說，這是唐紹儀後來親口告訴他的，想必確有其事。證以李鴻章全集譯署電稿中此時所得的袁世凱來電說：「凱等在漢，日圍月餘，視華仇甚。賴有二三員勉可辦公，今均逃。凱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於國事？痛絕！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義平待輪，乞速示」云云，則日本人之眞欲以圍困或暗殺的手段將袁致死，確實是不錯的了。然則唐紹儀所說袁世凱於夜半逃出漢城，以及其他記載傳說袁世凱易服逃走等等的話，應該都是指的同一件事。當時袁世凱並未生病，他之向北洋稱病求退，其實只是情勢急迫的飾詞。由此可見，袁世凱在朝鮮橫行霸道地作威作福多年，其最後的下場倒是很難堪的。袁世凱未離漢城之前，中日兩國間的戰機已如箭在弦，等到他一離開朝鮮之後，戰事隨卽爆發。其結果則是北洋軍海陸俱敗，日軍於席捲朝鮮之餘，更進兵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兩路深入內地，最後終以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議和了事。其詳細情形，人人皆知，這裏可以無須贅述。

張佩綸指責袁世凱是釀成中日甲午之戰的罪魁禍首，後人每以爲此卽是當時的公論，其實不然。袁世凱之引起日人仇恨，一是由於他在光緒八、十兩年的朝鮮內亂中兩次粉碎了日本勢力進入朝鮮的企圖，二是他後來出任駐韓商務委員以後對日本利益的多方阻撓，所以日本人必欲殺之而後快。至于日本凱之干涉破壞，中日朝鮮之戰亦必遲早發生，只是首當其衝之人不是袁世凱而已。袁世凱在失誤的責任有二：第一，是他不應該以驕矜凌蔑的態度對待朝鮮人士對中國的離心趨勢，予日本以可乘之隙。第二，是他不應該在東學黨亂事發生以後，日本已有乘機出兵干涉之企圖，並一再敦促中國出兵代朝鮮平亂。李鴻章誤信袁世凱之言，以爲中國出兵不致引起日本的干涉，殊不知此正是日本的誘敵之計，等到他們發覺錯誤之後，局勢已經無可挽回了。袁世凱失誤朝鮮的眞正責任如此，除此之外，所加給他的任何罪名，都不免是過甚其辭。這一層，只要看李鴻章在和約簽訂以後的態度，便可明瞭。

王伯恭蟫廬隨筆說：

「中日和約既定，恭親王一日問合肥云：『吾聞此次兵釁，悉由袁世凱鼓盪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對曰：『事已過去，請王爺不必追究，橫豎皆鴻章之過耳。』恭親王遂嘿然而罷。」

李鴻章在當時所以要這麼說，當然因爲他本身乃是主持對日交涉的決策之人，而袁世凱不過執行他的政策指示，卽使其中或有錯誤，亦當由他自己擔負最大部分的責任，不可因有人指責袁

世凱之魯莽釀禍，便即諉過於袁。這雖是李鴻章的負責態度，亦可知袁世凱在這一事件中應負的責任，確實只能到此爲止，無法再予苛求。但話雖如此說，當時的朝中顯要，並不就能人人都像李鴻章那樣地大度能容，何況袁世凱在此一事件上也確實有他應負的責任，如何能因李鴻章之一言而洗刷乾淨呢？於是，袁世凱多年以來的紅運，到此又逢到另一頓挫，以後的發展如何，就需要另外的機緣了。

八

袁世凱是十分熱中於功名利祿的事業中人，他很富于機變，當然懂得如何製造機會，把握機會。由于甲午之敗，李鴻章變成衆矢之的，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都已經一蹶不振，當然不可能再對袁世凱大力支援。何況李鴻章之倒霉，袁世凱確實有他該負的責任，李鴻章對他寬容，已經十分難得，事實上也不可能對他再有什麼提拔幫忙了。處在這種情形之下，袁世凱必須辦別政治氣候，另外找一株可以蔭庇的大樹，以謀東山再起。吳永庚子西狩叢談中記述袁世凱爲翁同龢作說客，意欲李鴻章告老乞休，以便騰出一個內閣大學士的缺額，好讓翁同龢頂陞協辦，就是袁世凱巴結翁同龢的實表現。但翁同龢雖然貴爲帝帥，眞正有權勢的實在另有其人，此即是在慈禧太后跟前極爲得寵，而說話又最有力量的榮祿是也。王伯恭蛻廬隨筆記述袁世凱如何結交榮祿，其事甚爲曲折而有趣，抄一段原文如下：

「是時項城在京，雖有溫處道之實缺，萬無赴任之理。設從此畢誤，心知不甘。憶昔在吳武壯朝鮮軍中，以帥意不合，借題爲朝鮮練兵，因禍爲福，此次師故智，正合時機。乃招致幕友，倣居嵩雲草堂，日夕譯撰兵書十二卷，以效法西洋當時朝貴中，惟相國榮祿深結主知，言聽計從，顧素昧生平，無梯爲主。書成，無術進獻。念又偵知豫公獨與閻相國敬銘相得，閻爲路閏生入室弟子，又申以婚姻，非路氏接。偵知八旗老輩有豫師者，最爲榮所信仰；因念路氏子弟有在淮安服官者，家於淮安，而項城之言不足以動之。必與路氏相稔，居其幕中爲上客，由辛甫北來之妹夫張香谷，係漢仙中丞之子，亦家淮安，介以見豫師，由豫師以見榮文忠，層遞納交，果爲榮文忠所賞。項城遂執贄爲榮相之門生，而新建陸軍以成，駐於小站周剛敏盛波之舊壘。但項城初不知兵，一旦居督練之名，雖廣用教習，終慮軍心不服。於是訪求賦閑之老將，聘爲全軍翼長，庶可以鎮懾軍隊。適淮旅順革職，永不敍用者，正無處投效，聞小站新軍成立，徑謁軍門。項城見而大喜，遽以翼長畀之。桂題亦不知兵，惟資格尚深耳。項城更說榮相，以五大軍合編爲武衞全軍，以宋慶爲武衞右軍，聶士成爲武衞前軍，董福祥爲武衞後軍，其中軍則榮相自領之，兼總統武衞全軍。榮相樂其推戴，且可弋取統屬文武之名也，德項城甚，有相見恨晚之感。復用項城之策，令諸軍各選四將送總統差遣。比至，令此十六人者各用一二品冠服乘馬在前引導，榮相顧盼自喜，以爲人生之榮，無過於此。……」

袁世凱想盡各種方法以達到結交榮祿之目的，及至榮祿採納他的練兵意見，他後半生的功名事業，就奠基於此了。不過，王伯恭的敍述雖然曲盡其詳，事實方面難免仍有錯誤。因爲袁世凱自朝鮮鎩羽而歸，已是光緒二十年的事，建議練兵，又在中日和約簽訂之後，而閻敬銘於光緒十四年罷相，十八年病卒，豈能在此時爲袁世凱利用作結納榮祿之用？凌霄一士隨筆對於此事的說法，則是：

「中國自甲午之後，以爲非改革軍制不足以圖强，其得風氣之先者，袁世凱也。時世凱已簡浙江溫處道，由督辦軍務處奏留差委，因遊說當局，以新法練兵，且條陳一切辦法，並拜西后惟一寵臣榮祿之門。於是光緒二十一年冬恭王奕訢、慶王奕劻會同軍機大臣奏請變通軍制，在天津新建陸軍，而荐世凱『樸實勇敢，曉暢戎機』，堪充督練，並請假以事權，俾專責任，先就胡燏芬所練定武軍十營爲根本，再加募馬步兵各隊，足七千人之數，奉旨允行。定武軍本駐距津七十里之新農鎭，今稱小站，爲舊日淮軍統將周盛波駐兵之地。世凱既受事，修繕廢壘，擴充營基，以德員司教練，步伐整齊，軍營日盛，有壁壘一新之概焉。」

所謂督辦軍務處，乃是清廷在甲午戰爭爆發後所特別組織，以恭王、慶王、李鴻藻、翁同龢、榮祿等人主持，專門負責爲皇帝從事參謀作業，以獻替謀議的。其後戰事雖已結束，而督辦軍務處仍未結局，隱然成爲較軍機大臣更高一層的中樞。由中日戰爭文獻彙編所收的袁世凱致李鴻藻大談舊軍失敗之因，及西

法練兵之要，其中就會說到：

「至此次軍務，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無術。其尤足患者，在于軍制冗雜，事權分歧，紀律廢弛，無論加何激厲，亦不能當人節制之師。爲今之計，宜急懲前非，汰冗兵，節糜費，退庸將，以肅軍政。亟檢名將帥數人，優以事權，厚以餉糈，予以專責，各裁汰歸屯紮，認眞整飭，並延募西人，分配各營，按中西營制律令參酌改革，著爲成憲。必須使統將以下均習解器械之用法，戰陣之指揮、敵人之伎倆，冀漸能自保。仍一面廣設學堂，精選生徒，延西人著名習武備者爲師，嚴加督課，明定升階，數年成業，即檢派夙將中年力尚富者，分帶出洋，遊歷學習，歸來分殷最予以兵柄，庶將弁得力，而軍政可望起色。……」

這一番話，我們現在看起來，覺得實在太膚淺而卑之無甚高論，可是在當時，也許還眞是當國者所未曾前聞的高見呢！李鴻藻是袁父保慶的老師，所以李鴻藻可算是袁世凱的「太老師」，而袁則對之自稱「小門生」。由前引張佩綸致李鴻藻信中對袁世凱痛加貶斥的情形看來，如果李鴻藻相信張佩綸的話，就應該對這位小門生揮而去之。可是李鴻藻似乎並未十分信任張佩綸對袁的貶斥，他將袁的信與翁同龢、榮祿等人共同傳觀，一致認爲其說法與見解甚有道理，於是，在袁世凱回到北京以後不久，便有旨召見，交予督辦軍務各王大臣差委。這年七月，他在寫給其弟世顯的信中說：

「抵京來忙甚，日在車馬泥塗奔走。諸大老均甚優待，聖恩極厚。惟內事甚遲緩，辦事甚不

易，只隨班奔走而已，似未能久居於此，暫留以備顧問，而赴任直無可望。……」

由此可知，袁世凱的練兵建議，在此時已曾受到重視，所以然之故，則因他在光緒朝鮮練兵著效，此番再提西法練兵之說，自然容易使人相信他是有經驗而有見識之人。他此時所下榻的住處，就是王伯恭所說的嵩雲草堂，而赴任無望，亦如王之所說，然則他之想到以練兵之策干謁榮祿，以爲晉身之階者，亦應卽在此時了。他如何會想到交攀榮祿？大概也還是他知悉榮祿對他所提的練兵意見頗有好感，因此方纔想到進一步纂輯兵書，並多方尋求可資利用的關係攀附榮門，執贄稱爲弟子，以謀進一步的拉攏趨奉了。影響清末民初歷史至鉅的北洋軍閥，想不到便在這種情形之下產生的？這倒是頗難懸揣的問題。

據說，袁世凱所著的「兵書」頗多。但現在所能見到的，却只賸下兩種了。一是光緒二十四年新建陸軍所印的「新建陸軍兵略錄存」；一是光緒二十五年新建陸軍所印的「訓練操法詳晰圖說」。由于此二書都是遲至光緒二十四年以後方纔成書的，不合於光緒二十一年袁世凱藉此以爲干謁榮祿之用的條件，所以，被傳說爲袁世凱利用欺詐之術攘奪他人構想以爲自己著作的那部「新建陸軍兵略錄存」、「訓練操法詳晰圖說」而言，不過是略似步兵操典而增加一些制度法令方面的成案，湊成書集，殊無足觀。很可能地，當袁世凱藉翻譯外國操典及編輯規章成案以纂成這些「兵書」時

，在清朝中國還是創始之作，人皆詫爲未見，目爲奇書，所以榮祿纔以袁世凱爲練於加以援手汲引的。何況袁世凱深通揣摩逢迎之術，凡可以結歡固寵者，無所不用易使榮祿引爲知己，深恨相見之晚的了。袁世凱之發跡北洋，至此乃確定了他的基

王伯恭蜷廬隨筆記述袁世凱當年在朝鮮練兵的情形說：

「於是王以五百人屬其督練，慰亭欣然受命，延一王姓新自德國歸者爲之教習中排班進退，慰亭憑几觀之，余亦時得目焉寓。朝鮮民氣謹懦，視上國如帝天，雖無不懍懍。慰亭使譯者傳諭五百人云：『中國練兵非汝國兒戲比，苟不聽約束者，立刻軍法從事。』五百人咸股栗聽命。每日操演時，王教習持鞭睨其旁，呼曰：『左足起』，五百人悉舉左足，高下如一，有參差者卽揮鞭痛扶。步伐進退前後左右如之，放槍舉礮亦如之。教練甫半月，慰亭請國王及吳帥閱操，居然可觀。國王大悅，吳帥賞戰衣人各一襲。於是慰亭有能咨合肥，謂其才可獨當一面云。」

看上面的這段記述，袁世凱當年在朝鮮練兵，大概亦如戰國時孫子之練婦人爲刑峻法怵人心目，使之不敢不聽從約束，所以卽使是齊王宮中的宮女，亦一樣可以金鼓號令，使之整齊劃一。如果在嚴刑峻法之外，更結之以恩德利祿，必更可收得心應手之效。袁世凱平生揮金似土，慣以利祿要結人心，對於此道自然更是出色當行。所以，小站練兵不過只有數月之久，

「甲午中日之役失敗後，軍務處王大臣鑒淮軍不足新建陸軍督辦。該軍屯兵天津小站，於乙未冬成立。當立甫數月，津門官紳嘖有繁言，謂袁君辦事操切，嗜殺擅權，不受北洋大臣節制。高陽雖不護前，因係原保，不能自歧其說，乃諷同鄉胡侍御景桂，撫拾多款參奏，奉旨命榮文忠公祿馳往查辦。文忠時官兵尚，約余同行。甫抵天津，直督王文韶傳令淮練各軍排隊遠迎，旌旗一色鮮明，頗有馬鳴風蕭精壯，專練德國操。馬隊五營，各一律四尺以上，整文忠馳往小站。該軍僅七千人，勇丁身量忠默識之，謂余曰：『君觀新軍，與舊軍比較如何？』余謂素不知兵，何能妄參末議？但觀表面，新軍參用西法，生面獨開。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須保全，以策後效。』迨參款查竣，即以擅殺營門外賣菜傭一條，已干嚴譴，其餘各條，亦有輕重出入。余擬覆奏稿，請下部議。文忠謂一經部議，至輕亦應撤差，此軍甫經成立，難易新手，不如乞恩姑從寬議，仍嚴飭認眞操練，以勵將來。覆奏上，奉旨俞允。時高陽已病，仍力疾入直，閱文忠摺怫然不悅，退直後病增劇，嗣後遂不常入直，旋即告終，足見其惡之深矣。袁逾年升直臬，仍治軍事。……」

按，上文所說的「高陽」，即李鴻藻；「常熟」，則翁同龢。李鴻藻曾支持袁世凱的練兵建議，筆者在上文中已曾作此推測，由陳夔龍的記述，可知此說不虛。而翁同龢則是李鴻章的對頭

，李鴻章卵翼袁世凱，翁同龢因此亦對袁不滿，雖然袁世凱亦曾努力結交攀附，並無結果，其情形亦可由上引夢蕉亭雜記中見之。只是，李鴻藻本爲支持袁世凱練兵之人，何以在幾個月之後就必欲去之而後快呢？是不是張佩綸對袁的批評在這時已經發生效力，致使李鴻藻覺得袁世凱實在是一個狂妄誇大而跋扈驕恣之人，不可賦予大任，故而要借此將他逐去，以免將來爲患國家呢？這一個問題，現在已無從答覆。不過，袁世凱之得以在這一參案中保全，顯然是出於榮祿的大力蔭庇。榮祿頗善相法，在夢蕉亭雜記中屢有記述。看袁世凱的相貌，肥碩重厚而富有威嚴，自然是富貴功名之人。榮祿以他的相法推測，袁世凱的未來前途必然十分發達，何況他在小站練兵的成績卓然可觀，再加上執贄拜門的情誼，自然應該保全。殊不知道自此以後，袁世凱的功名事業果然直上青雲，然而所以致此之因，則並非完全由於袁世凱的學識才能與品德。於是，袁世凱脫穎而出，對於國家民族的命運，就不是好兆頭，而榮祿對袁的保全，所產生的結果自然也就不能說是有利於國家的。

九

小站練兵，奠定了袁世凱以北洋勢力控制中國的始基。他此時所訓練的新兵雖然爲數不過七千人，而自清末以至民初，所有關係中國命運的北洋人物，此時幾已全在他的麾下。如清末曾任三省總督，民國時出任袁政府的國務卿，後繼黎元洪爲總統的徐世昌，此時乃是袁世凱的「營務

處」。民國以後著名的北洋軍閥段祺瑞、馮國璋、陸建章、曹錕、段芝貴等人，此時都在他所練新軍中擔任幷兵或中、下級軍官。這些人經由袁世凱的提拔，在清光緒宣統之時，已經歷陞至中上級軍官（師長），掌握了清末所練各鎮新軍的大部分軍權。由於他們之效忠於袁，如之何不使袁世凱隱然成爲全國軍界的領袖人物呢？這當然都是後話，在這裏可以不須多贅。在此需要一提的，是當時一位外國觀察家對袁世凱練兵成績的批評。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英國海軍司令貝思福受英國聯合商會主席之委託，前來中國考察政治軍事。他曾於此年九月十三日到小站參觀袁世凱所練新軍，據他在「保華全書」卷三，「論中國水陸兵備」一章中所述他所見的新軍情形說：

「當各隊操演之時，各兵類皆年力精壯，身材適中，操法靈熟，步式整齊。先在本營操場操演陣式，後至曠野操演兩軍攻擊之陣式，各將幷與兵丁等皆嫻習口號，熟諳行陣，可想見該軍紀律之嚴明矣。惟砲隊則尚待整頓。若照現在情形，祇能於操演之時聊備一格，未足以爲臨陣之用也。」

又說：

「中國兵力之弱，其源由於發餉之多尅扣，此弊幾於通國皆然。但我觀袁公發餉之情形，而嘆袁公之清廉爲人所不能及矣。袁公於發餉之日，親自督率委員，按名給發，無絲毫尅扣之弊。

假使中國統兵大臣皆能效法袁公之發餉，則兵無缺額，餉不虛糜，華人何嘗不可成勁旅耶？」

貝思福的觀察，不但對袁世凱頗多贊揚，後一段話更極爲欽佩他的清廉。袁世凱當年在小站練兵的實際情形如何？在此不難見其一斑。大致而言，小站新軍的訓練雖有可觀，究因未曾用於實際戰爭之故，對於他們的作戰能力，難有正確的評估。但因他們的操法新穎，陣容整齊，在當時究屬一時之選。所以袁世凱的聲譽，不久便可因榮祿之賞識與貝思福之推讚而馳名中外。而袁世凱重視兵餉，每月務必躬親給發。以杜絕剋扣中飽之弊，這一點，對於他的練兵成敗，關係也是很大的。

按照袁世凱所奏定的練兵章程，小站新軍的軍餉頗爲優厚。營長稱爲統帶，月支薪白銀一百兩，外加公費銀三百兩。班長稱爲頭目，月支薪白銀四兩五錢。兵士稱爲正兵，月支薪白銀四兩五錢。光緒中葉，白米的價格是每石銀一兩五錢左右，所以每兵的月薪可買白米三石，合現在的幣值四千餘元。四千餘元的月薪，現在只能抵到一個普通工人，但在當時，因就業機會不多，而待遇普遍低微的緣故，這個數目看起來就很優厚。民國初年以賄選總統馳名一時的北洋軍閥曹錕，據說其早年曾經做過販布及教書的工作，都因爲收入太少，無法餬口，所以纔投入軍中去當一名「正兵」的。由此可知，在袁世凱練兵時所定的兵餉，一般應可說是很優厚的。兵餉厚而長官全無剋扣，每經若干時日，就可因訓練或考試而得晉升，前途有望，當然更能鼓勵士兵之上進心，操習自必更爲努力。當時袁世凱的軍中，設有各種「行營兵官學堂」，計有德文學堂、砲兵

學堂、步兵學堂、騎兵學堂等名目，所招學生，皆由兵弁中考試而來。兵弁能入行營兵官學堂接受教育訓練，就具備了士官或軍官的任用條件，一旦低級軍官中如有缺額，就可由畢業學生中拔補。清代末年，因袁世凱小站練兵發軔於先，北洋新軍陸續建立，不久即由一鎮擴充爲四鎮。這些出身於小站新軍行營兵官學堂的兵弁，因此不乏陞遷的機會，北洋勢力亦因此而逐漸擴充至於各地。凌霄一士隨筆記此云：

「世凱以練軍著效，歷直隸按察使而擢侍郎，並進籌餉之策，西后以爲然，遂設練兵處，以奕劻領其事，世凱會辦。奕劻奉世凱爲導師，以劉永慶爲軍政司正使，段祺瑞爲軍令司正使，王士珍爲軍學司正使，王英楷馮國璋等咸任要職，皆取之北洋；練兵大臣如徐世昌、鐵良，又世凱所推薦也。練兵計畫，定全國練新軍三十六鎮，先由北洋入手。袁世凱銳意經營，不久，北洋四鎮相繼告成（第四鎮即由武衛右軍改編），兵力之厚，甲於各省。其糧餉處設於津，以張鎭芳董其事。諸鎭之兵權餉權悉在世凱掌握，遇事毫無掣肘，北洋聲勢益炙手可熱。……」

袁世凱藉建立新軍以擴張他的政治權力，這雖然是後來的事，但其趨勢却自此逐漸明晰。不過，在他以浙江溫處道督練小站新軍發跡開始，以至他成爲北洋系軍閥的開山祖師爲止，這中間還有兩樁極重要的事，直接關係到袁世凱的鴻猷大展，不可不在此先加敍述。

前引凌霄一士隨筆已曾說到，袁世凱因小站練兵有效，而由浙江溫處道升爲直隸按察使，那是光緒二十三年六月的事。到了光緒二十四年的八月，袁世凱再由直隸按察使開去本缺，以侍郎候補，專責辦理練兵事宜。按察使係文官正三品，侍郎則正二品，看起來雖然不像是異常的超遷，其實不然。因爲清代的官制有京官與外官之別，京官望重而外官望輕，雖然是同樣的品秩，在遷轉時却大有差別。例如各省的布政使秩從二品，內調時多半是正三品的太僕寺卿，或從三品的光祿寺卿。各省的按察使秩正三品，與京官中的大理寺正卿同秩；但內調時往往只能得正四品的鴻臚寺卿或大理寺少卿。其中原因，便是由於京官的品級一般要看得比外官稍高的緣故。袁世凱原官直隸按察使，如循序陞遷，最多只能得同品的三品京堂，驟陞二品的侍郎，顯然是恩命異常的峻擢。他之所以能在此時得此異常的恩命，實在是由於牽涉到一場極大的政治活動之故。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就是康有爲梁啓超所主持的維新運動因慈禧太后的干涉而告失敗，光緒帝被幽瀛臺，慈禧太后再出垂簾的歷史性重要時刻，史稱「戊戌政變」。政變的發生，據說由於新黨人物眼見舊派的反對力量太大，新政無法推行，而慈禧太后乃舊派人物奉爲反對新政的主要力量，非除去慈禧及其重要黨羽榮祿，則皇帝的地位不保，新政實施無望。所以經由康有爲譚嗣同將皇帝的密詔一道交付予袁，命袁世凱超擢侍郎，命之來京陛見，並由譚嗣同將袁世凱同等人的獻議，

他在囘天津後宣讀詔旨，將榮祿處死，然後由袁世凱接統榮祿所轄各軍，卽率兵進京，圍頤和園除去慈禧，庶幾舊派人物無法再擁慈禧以阻撓新政，而光緒的地位亦可確保。然而因爲袁世凱的反覆多詐之故，光緒的密詔，被他當作出首告密以進一步取得慈禧和榮祿倚信的機會，於是政變迅卽發作，光緒被幽，康梁逃亡，六君子被殺，戊戌維新運動也因之而夭折，但袁世凱的官運却自此日見亨通，不久卽外放山東巡撫，騰踔日起，駸駸大用了。關於這一段往事，陳蘆龍夢蕉亭雜記中曾有扼要的敍述，說：

「戊戌四月，文勤（卽王文韶）內召，文忠（卽榮祿）出領北洋。袁君夙蒙恩遇，尙能恪受節制。維時新政流行，黨人用事，朝廷破格用人，一經廷臣保薦，卽邀特簡。袁熱中賦性，豈能鬱鬱久居？倩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轉託某學士密保，冀可升一階。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補，舉朝驚駭。某學士以承筐菲薄，至索鉅款補酬，聲殼之下傳爲笑話。袁君邊旨來京，預備召見。入見後傳聞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傳旨，卽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卽以袁某補授，並帶兵入京圍頤和園。……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將變，惘惘囘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來謁，但言他事，絕不詢及朝政。袁請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世凱奉命而來，有一事萬不敢辦，亦不忍辦，惟有自請死。』文忠笑謂究係何事，何忽遽之甚？袁袖出一紙呈閱，並覩文忠氣色行事。文忠閱竣，正式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無非恩澤。但承旨責在樞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願自首入京，束身司敗，豈能憑爾袖中片紙，便可欽此欽遵？』袁知事不諧，乃大哭失聲，

長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談。』因賚夜乘火車入京晤慶邸，請見慈聖，均各愕然。越日，奉硃諭以『朕躬多病，恭請太后訓政』，時局爲之一變。首詔文忠入輔。慈聖以袁君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亂犯上之事，委之黨人，並以身家保之，袁得安其位子之間，從此多事矣。」

據此云云，姑令來京召見。袁最機警，諂事東朝，前事不憚悉委之主坐，而宮闈之地，母則戊戌政變時袁世凱雖奉密旨誅榮祿的反應，如榮祿見旨而自裁，則他的任務即順利完成，如榮祿置之不理，則以苦肉計之法哀祈榮祿相救，進可有功，退亦不致有害。榮祿將袁世凱所告密一事關係之大。關於這一段往事，袁世凱後來曾自撰「戊戌日記」一文，由而翻，可知袁之告密一事關係之大。關於這一段往事，袁世凱後來曾自撰「戊戌日記」一文，由其家屬刊載於民國十五年的申報，極言他當時並無引。欲知袁世凱當時是否確有告密之事，可以用比對史料之法研究其中有無漏洞，藉以推定袁世凱所說政變前的晤榮情形是否可靠。抄錄戊戌日記中最重要的一段如下：

「初五日請訓……請安退下，即赴車站，候達，略述內情，並稱：『皇上聖孝，實無他意，但有羣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罪實在下。必須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語未竟，葉祖珪入坐，未幾，佑文亦來。久候至將二鼓，不得間，只好先退晚餐，約以明早再造詳談。次早，榮相枉顧，以詳細情形備述，榮相失色大呼寃曰：『榮某若

有絲毫犯上心，矢必誅我。近來屢有人來津通告內情，但不及今談之詳。」予謂此事與皇上毫無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藥而死。籌商良久，無善策，榮相囘署，復約佑文熟商。是晚，榮相折簡來招，楊莘伯在坐，出示訓政之電，業已自內先發矣。」

這段話所揭竭力注重的地方有二，第一是說他在囘到天津後所透露給榮祿的，只是光緒有旨命他殺榮之事，而不曾告榮以密旨的內容，所以兩天所商量的，只是如何應付詔旨而不致使榮祿爲難之事。結論尚未商決，而楊崇伊（莘伯）已將慈禧再出訓政的消息帶至天津，始知朝局已變。由於這天早上榮祿尚在天津訪袁密商，可證榮祿未曾入京告密。榮祿既未告密，自然更沒有袁世凱向榮告密之事。第二則是說明袁世凱在八月初五日囘至天津時，業已天黑，是晚與榮所談無結論。以上所述，如以其他史料所記互相考訂，便可知其並不實在。

劉鳳翰撰「袁世凱戊戌日記考訂」，引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天津國聲報所載，「練兵大臣袁慰亭侍郎於初五日早赴宮門請訓，即於是日出京，乘坐十一點四十分鐘火車，至下午三時到津。……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時頗爲熱鬧」云云。既然袁世凱在八月初五日的下午三時就已囘到天津，爲何他在戊日記中要把這天囘到天津的時間改說成爲「日已落」的傍晚時分？夏秋日長，日落後已將七時，由三時至七時，中間相差約四小時。以實際情形而論，袁世凱於此日下午三時間可以實時間可以將密詔情形稟告榮祿，而不必等到第二天；榮祿也儘有時間可以策動慈禧實行政變，不至於在第二天早上還到袁的住處來「枉顧」詳談。所以，

袁之所以要把到津時間由下午三時說成七時，目的顯然是在掩飾此一事實，使人誤信榮祿在八月五日晚間尚未與袁商定辦法，自更不致黃夜進京策動政變。其更進一步之目的，則更在藉變造史實之法洗刷自己的告變惡名。却不料我們現在還能看到天津國聞報的當日記載，可以看出袁世凱戊戌日記中僞造史實的證據。然則袁世凱企圖消滅告變惡名的努力，顯然也就是白費心機了。清人蘇繼祖所撰的戊戌朝變記，對於此事更有十分明白的記載，說：

「八月十三日，復有人問榮相曰：『袁世凱曾奉密詔乎？』曰：『然。』『詔中曾有殺公言乎？』曰：『然則袁世凱先一同謀而又出首，首鼠兩端，此人亦不足取也。』榮相曰：『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

這段記述，距戊戌政變的發生時間只有七天，而榮祿的談話明白如此，更可知袁世凱確有告變之事。所以，縱使袁世凱喙長三尺，亦無法卸脫此一賣主求榮之惡名。陳夔龍夢蕉亭雜記所說，袁世凱向新黨中人活動保舉以求升官，曾派某太史入京轉託某學士具疏薦學，根據近人的考證，此「某學士」即徐致靖，「某太史」即徐世昌。袁世凱志求升官而謀之新黨中人，新黨人物恰因需有兵權之人以便除去榮祿，於是看中袁世凱雖熱中升官，却無意爲皇帝賣命，終於使新政失敗而袁世凱個人却得到榮祿和慈禧的倚信。光緒二十五年五月，袁世凱補爲工部右侍郎。同年十一月，署理山東巡撫，翌年二月眞除。凡此遷擢，俱由戊戌政變中的告密之功而來，可知袁世凱之善於投機取巧，以及他在此一告變事件所得到的實際利益爲

如何。

十一

光緒二十三年德佔膠州。自此以後，山東省就增加了很多對德交涉事件。更因德欺壓山東當地人民，老百姓在氣憤之餘，起而武裝抗暴。這種武裝抗暴運動被義和拳所滲透利用，終於逐漸釀成拳匪的仇洋排外運動。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德國兵在山東、蘭山一帶滋事，清政府爲防範起見，命袁世凱率領小站新軍，以操演行軍陣法爲名，開往山東德州等地，採取監視戒備措施。此時義和團的仇洋排外運動已在各地日見蔓延，巡撫庇護倡導，因之亂事日見擴大。德國公使向清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毓賢因此被調回京，山東巡撫一職，即命在山東領兵的袁世凱署理，三個月以後正式補授。袁世凱任山東巡撫後，一反前任對於他以後的陞官進爵，幫助甚大。容菴弟子記卷二敍此云：

「二十六年春二月，補授山東巡撫。公來東省，攜帶所練軍隊同行。時東省濟南府屬拳會猖獗，公遵派道府，督同牧令紳耆分投解散，轉飭莊團嚴密查拿，復派營隊屯紮梭巡，其著名兇悍迭滋事端者，購緝偵辦，一面剴切出示嚴禁。拳匪見公設施一反毓賢之所爲，謠言四起。又見公隊伍精整，知反抗亦無倖，於是黨魁皆赴津保，乾字拳蔓延於深冀，由冰定興以入

京，坎字拳蔓延於滄州靜海，黨魁張德成曹海田皆爲裕祿所崇奉。時親貴已迷信妖法，陽言勸誡而陰飭部吏嚴捕，故山東秩序安寧，得爲東南之保障無益，乃我行我素，痛剿義和團，使山東省在庚子拳亂時得以保境安民，全省寧謐，關係甚大。因爲自庚子拳亂發生以後，直隸及山西二省迅卽陷於極度混亂之中，拳匪藉尋殺洋人及「漢奸二毛子」爲由，到處焚燒殺戮，無論城市鄉間，都被害甚慘。爲供電報通信用的電桿電線，亦都被拳匪指爲妖物，任意斫毀，以致京津各地的對外電訊亦既然不通，最迅捷的辦法，只有將電報發往山東濟南，請山東巡撫袁世凱改用奏摺由驛差遞送。

如此一來，山東撫署無形中成了各省與京師之間的聯絡中樞，地位頓形重要。加上袁世凱更能善用他的這一樞紐地位隨時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南互保等等，頓時就使袁世凱的聲名日高，與劉坤一、李鴻章、張之洞一樣地成爲全國觀瞻所係的中流砥柱人物了。但袁世凱之所以在此一時期內能有如此果敢明決的作爲，其實應拜山東藩司張人駿之賜。凌霄一士隨筆有關於此事的記述，說：

「袁世凱以戊戌告變受知西后，任山東巡撫，緝逐義和團，保護外僑，使山東秩序爛然，遂致大用。然當時定議，實決於藩司張人駿之言，袁獨擅其名耳。蓋袁氏始猶有用拳衆意，遲回審顧，未能卽決。張人駿動以利害，曰：『公試揣此類妖懼怍西后之指，

妄之徒，古來有能成大事者乎？如料其能成，所牽率而獲重咎也。』袁大悟，稱善者再，遂一意以拒拳保僑爲事矣。魯人恨教民拳衆之排外思想，見袁氏竭力壓迫之，皆大憤，而以漢奸二毛子詬袁氏，委巷間亦文句者，儼若今之貼標語呼口號也。迨京津禍變既成，衆始一變其論調，而歌頌袁撫臺不置。京津官紳避難者麕集濟垣市面繁榮氣象，倍於平日，言及袁撫臺，莫不曰山東福星，中國偉人也。然非張人駿之片言定計，魯亦危矣。張氏不自表襮，故知其事者不多。厥後張氏歷官督撫，安靜而知大體，亦清末執筆人徐一士作此說法，想必有其事實根據。果如所云，則袁人成事，而當初的輿論反應既然對他極爲不利，他能持之以恆，堅定不移，其決心之堅毅，亦殊有可稱者。而據義和團文獻彙編所載有關義和團上諭所錄內容看來，當時朝臣中反對袁世凱雖然是因東痛剿拳匪的人甚多，以致彈劾之奏迭上，袁世凱能够不爲所動，更不容易。凌霄一士隨筆論此云：

「袁少年讀書從叔保恆京寓時，保恆嘗戒之曰：『汝思慮太多，防患太深，遇大事恐難立斷。』可謂知姪莫如叔矣。袁氏爲人，有術而無學，重利害而輕是非，張氏以利害之說動之，宜其折服。至謀定以後，行以堅毅，固袁氏所長耳。」

據此云云，則袁世凱在義和團之亂時能有如此卓犖不凡的表現，亦可說是機緣湊泊，適逢其

會，與他的學問及才識無關。而他既是一個重利害而輕是非的人，如果利害關係足於是非的抉擇時，那就不免會因過分重視利害得失，而致不惜背信負義的了。試看國大總統之後，居然會因想做皇帝之故而不惜食言背信，自毀誓言，就可知道凌霄一士隨筆的說法不無道理。不過，他在也是袁世凱賴以成功的本錢，值得加以重視。

十一

庚子拳亂之後，接着而來的是辛丑和約。李鴻章以身份充任全權大臣，負責與八國聯軍談和。其後和議雖成，李鴻章却因俄人佔我東北不肯交還之故，憂急痛心，竟至病卒於北京賢良祠行館。直隸總督也是很爲人所注目的重要職位，居然會被袁世的資望與地位，未免出人意外。因此後來很多人傳說，，乃是出於李鴻章遺疏中的力保，慈禧太后爲了眷念老臣盡瘁國事，所以纔予勉强說法，徐一士在他所撰的「榮祿與袁世凱」一文中曾予辯駁。他舉出李鴻章的遺摺原文爲證，證明李鴻章當時並未保薦任何人繼任直隸總督，袁世凱之所以能得直督，仍是得力於祿爲其奧援之功。徐一士說：

「遺摺內容若是，並無保薦何人繼任等語，外戍告變，簾眷已隆，拳亂保障地方，聲譽亦著，兼有榮祿爲奧援，其擢督畿輔，固不必有鴻章遺摺之保薦也。」

慈禧對袁世凱深爲倚信，除得力於榮祿之蔭庇外，袁世凱在很多地方也確實曾有特出的表現。最特出的一點，就是他接收外人交還天津的管理權後，在天津所推行的治安措施。根據辛丑和約的規定，八國聯軍交還天津以後，中國政府不得款無異剝奪了中國政在府本國領土內的駐兵權，雖將整個天津市區包括在內，中國軍隊如果不能在天津駐紮，則市區內的治安勢必無法維持，政府儀關又如何能行使其統治權力呢？所以，辛丑和約中的這一條款，無異對天津方面的中國政府機關加上了一道束縛，究應如何解決，處理起來十分棘手。但因袁世凱之善於機變，這一個棘手的問題，終於也還是得到了巧妙的解決。

所謂巧妙解決的辦法是，袁世凱在定期接收聯軍當局交還天津之前，先從他的武衞右軍內選拔行將退伍的年老兵士三千人，略施短期的警察訓練，使之熟諳警察服務的規定，然後改換警察制服，稱之爲警察，在接收期屆之時，由地方官率領進入天津，以一千五百名駐紮天津市區，一千五百名分佈西沽、塘沽、山海關、秦皇島等地負責治安及警備事宜。由於這些「巡警」本來就是曾受新式訓練的軍隊，對於行軍作戰警備地方等事均十分熟練，擔任治安維持及軍事戒備，自然十分順利；更因這些人已由軍隊改稱警察，與租界二十里不准駐兵的條件亦不衝突，所以外國

領事對此也無法提出反對。當辛丑和約簽訂，聯軍交還天津之時，河北省境內的拳匪餘孽潛伏尚多，隨時都有聚衆起事的可能。若無軍隊彈壓緝捕，地方治安大有可慮。倘若眞因拳匪滋擾而致引起聯軍當局的干涉藉口，中國的主權勢必又要因此而遭受侵害了。所以，袁世凱的機變，終於使此一困擾的問題有了解決的辦法。張一麐古紅梅閣筆記論此云：

「自庚子亂後，拳匪餘孽伏處天津，苟有生謂項城，按法律宜從寬典。項城答之曰：『刑亂用重』之義，所謂水懦火猛也。不二年，津埠治安爲各省冠，有六個月不見竊盜者，西人亦爲歎服。」

清代末年，權勢最爲顯赫的總督有三：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兩廣總督岑春煊。據胡思敬國聞備乘的記述，此三人在當時各有爲人所稱的特徵。張之洞用財如水，稱爲「屠財大員」；岑春煊最好劾人，每次參劾屬吏，自監司以至佐貳微員，動輒百餘，時稱「屠官」；而袁世凱則殺手甚重，自小站練兵以至在山東剿捕拳匪，在天津搜殺拳匪餘孽，殺人不計其數，時稱「屠民」。張之洞屠財與岑春煊屠官，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袁世凱好行殺戮，如果配合上他的揮金如土及不惜以名位爵祿羈縻人才的幾項特點來說，無疑已使他具備了奸雄行事的條件。今更濟之以心狠手辣的殺戮，就足以使那些因利祿而甘心爲袁世凱奔走效命之人，畏威懷德，共效擁戴之誠，而不敢輕易萌生異志。奸雄行事，大

多如此，然而這也正就是他們所藉以發展勢力的條件，歷觀前史，一一不爽。

袁世凱作了直隸總督以後的最大便利，便是他可以運用的財利更多了。有了錢，他自然更可以發揮他的銀彈攻勢來開拓他的政治事業。說到這裏，我們需要先看一則掌故，藉以瞭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名下所管的「羨餘」經費，究有多少？「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卷上，記有譜主梁士詒在光緒二十九年時所說的一段話，云：

「予來天津，住於督署，有時亦住關道署。在督署與于晦若（式枚）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編書局總辦之夫馬費，俱由淮軍銀錢所送來。繼思淮軍裁撤已久，何尚有銀錢所名目？當時祇將夫馬費照收，不便詳問。後於徐頌閣（郙）師席上晤仁和王薆石（文詔），談及李文忠（鴻章）公忠體國，廉介可風，舉其事曰：『當甲午之後，李文忠赴日議約，離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列册交代，有淮軍銀錢所存銀八百餘萬兩。此係文忠帶兵數十年，由截曠，扣建而積存者。如果我王某人帶兵，此款是否應該交出，尚費斟酌，然文忠淡然置之。及後既列作公款，我離任後，由榮仲華而至袁慰亭，中經庚子之亂，此款獨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練兵之需，氣象雄潤，是受李文忠之蔭也。』予乃恍然於淮軍銀錢所送夫馬費之故，益以服李文忠之廉潔。當甲午乙未之毀，而文忠不一言，其度量亦逾越尋常矣。」

按，梁士是詒光緒二十年甲午科的進士，曾點翰林。由於翰林生活清苦，所以於光緒二十九

年應直督袁世凱之聘，到天津來充任北洋編書局的總辦。梁士詒在民國政府中曾充任總長、內閣總理，乃是交通系政客的巨頭，其發跡則由於袁世凱之提拔。上文所說到的「截曠」與「扣建」，俱是清代軍隊制度中的專門用語。清代行募兵制，入營當兵，稱爲「頂名吃糧」。因爲兵餉的預算是全年性的，而兵員之出缺與頂補，中間難免日期不相啣接，這不能啣接的兵餉需要按日扣除，謂之「截曠」。又，清代用陰曆，月餉以每月三十日額計，如遇小月二十九天，稱爲「小建」，需要扣除一天，只按二十九天實發，其名謂之「扣建」。李鴻章統率淮軍二十餘年，此項截曠與扣建銀積至八百餘萬，並不繳之國庫，於是使袁世凱有了一項可以自由運用的貲財，其動支情形可以不受戶部之干涉。而袁世凱在受任直督之後，一再建議訓練新軍，以致北洋新軍由一鎮而增至四鎮。兵員愈多，不但訓練及開辦經費極爲龐大，其截曠與扣建所存，爲數自亦可觀。以這些巨額金錢用於政治賄賂，所產生的效果豈不十分驚人嗎？胡思敬撰大盜竊國記，就有關於這方面的記述，說：

「是時創辦新軍，各省增派練兵經費凡千餘萬，皆滙歸北洋，順直善後捐餘存二百餘萬，又創辦永平七屬鹽捐，又奪盛宣懷京漢鐵路交唐紹儀，累歲無報銷，天津財幣山積，任意開支，司農不敢過問。奕劻初入政府，方窘乏不能自舒，世凱進賄動輒三、四十萬。又與其子載振結盟爲兄弟，傾貲以媚宮闈，名曰進奉。閹宦宮妾，靡不各飽所欲，於是譽言日進。孝欽蹙聞左右之言，亦深信不疑。……」

袁世凱在光緒末年之所以能够大事擴張新軍，把持北洋軍權，最得力的棋子，就是以巨額金錢賄賂奕劻及進獻宮廷，以取得慈禧的信任。寫到這裏，本文中的另一位主角慶親王奕劻，亦就要上場了。

十三

奕劻是光緒末年最得慈禧倚信的領軍機親王，其見信的時間雖晚，其充任政府主要職位的時間則甚早。他之所以遲至光緒末年方能組領中樞，乃是因爲慈禧所最親信的權臣榮祿死了，領軍機大臣的寶座。奕劻上臺，袁世凱的勢力就更加得到迅速發展的機會。若是榮祿尚在，袁世凱就決不敢如此肆無忌憚。關於這一點，清末以來的很多載籍，都有相似的記述。如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三「榮祿權略」一條說：

「袁世凱統武衛軍，歸榮祿節制，雖倔强不敢自恣。嘗遣人至京師覘榮祿動靜，得其一言以爲喜戚，如安祿山防李林甫然。」

又，徐一士撰「榮祿與袁世凱」云：

「榮祿簾眷最隆，而胸無城府，工策畫，富權謀，世凱對之猶心存畏憚。迨榮祿卒，慶王奕劻以樞垣領袖當國，貪婪外無所知，世凱遂玩之於股掌之上矣。」

又，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榮祿傳」云：

「其在樞府，權侔人主，務植財納貨，門煩如市，類似奕劻而少明敏。嘗告錫良：『袁世凱雖告密，其人雄鷙，未可信也』，是非劻所及矣。」

由此可知，榮祿雖亦如奕劻之貪貨賄，袁世凱却不能藉賂遺以左右之，其原因便是由於榮祿深知袁世凱具有奸雄之資，需要加以防範，所以袁世凱才不得不對之敬畏有加。郭則澐撰南屋述聞，對此更有明白的記述，說：

「先公在樞直，與瑤圃師同爲榮文忠倚重，每有大事，文忠恒就諮焉。一日在軍機堂，文忠顧先公曰：『慰庭欲以直督兼領山東，君意如何？於昔亦有例乎？』先公悚然曰：『往昔鄂文端、年羹堯雖有類似之例，然皆以用兵暫資節制，非今所宜援。』文忠韙其言。既而歎曰：『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駕馭之，異日終當出頭地。』又嘗於直廬中語及變法，文忠曰：『是事得失，關係甚鉅，行之不善，適足以召亂促亡。上既決行之，吾亦不敢諫阻，異日之變，或病軀不及見耳。』其言皆有前識。」

「南屋述聞」一本專記軍機處掌故的書，作者郭則澐的父親名郭曾炘，當時以光祿寺卿的職銜充任軍機處的領班章京，與榮祿的關係很深。由榮祿與他的談話中，可以知道榮祿對袁世凱實多提防裁抑之心。正由於榮祿對袁世凱存有提防裁抑之心，所以袁世凱更需要以小心謹畏的態度掩飾自己的野心，以免招來不測之禍。至於榮祿所說到的變法，就是袁世凱出任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之後，從增練北洋新軍開始，所奏請朝廷開辦的各種「新政」，如興學堂、廢科舉，辦實

業，改官制等。這些「變法」措施對後來的政治變化。都有很大的影響。榮祿以爲若「行之不善，適足以召亂促亡」，足證他的思慮甚爲周密深遠，非奕劻之容易爲袁所左右可比。凡此俱是榮祿與奕劻秉政時期的主要差異所在。由於榮死劻繼，袁世凱的時代，就要出現了。

在沒有說到袁世凱如何利用奕劻以發展他的勢力之前，應先將奕劻的生平及其性格等提出一說，以便讀者對他能有大致的瞭解。

奕劻的祖父，是清高宗的第十七子慶僖親王永璘。據說當清高宗還沒有決定以那一個皇子繼承皇位之前，皇二十五子顒琰，亦卽是後來的清仁宗嘉慶帝，曾與他的這位哥哥閑聊，問他將來有何願望？永璘說，他也不希望能够繼承皇位，只望分府以後，能够得到和珅的府第，就很滿足了。和珅是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寵臣，當時的權勢炙手可熱，不但他家中的財寶堆積如山，他的那座住宅，更是富麗堂皇，華貴無比。永璘沒有與顒琰競爭皇位之心，在顒琰當然大爲放心。後來嘉慶繼位，因清算和珅而抄沒其全部家產，和珅的華麗住宅，也就眞的賜給了永璘。不僅如此，嘉慶爲了答謝永璘當年所表示的謙退，還特別降旨，准將永璘兒子所應襲的郡王爵位，恩予再襲一次。所以永璘死後，其子綿懋承襲郡王，綿懋無子，以儀郡王綿志子奕綵爲後，所襲的仍是郡王。道光二十二年，奕綵因服中娶妾得罪，下宗人府議處，永璘的第六子綿性覬覦襲爵，行賄鑽營，與奕綵同遭處罰——奕綵革爵，綿性則發往盛京安置；盛京，就是後來的瀋陽。奕綵死後，

始以綿性子奕劻承嗣，初封輔國將軍，繼封貝子，咸豐十年加封貝勒。據文廷式聞塵偶記所說，奕劻因爲是綿性之子的緣故，本無襲爵之望。所以他早年時先出繼於別房爲子，然後再由別房轉繼爲綿志之後，方能繼纘慶僖親王的封爵，封爲貝子，這裏面的關係，還眞是十分曲折的。

費行簡撰「近代名人小傳」，說奕劻是「罪宗」之裔，「工書翰，習繪事，而貧甚，幾不能自存。」由於他住在方家園，與慈禧太后的母家爲鄰，常爲慈禧之弟照祥代筆寫信問候慈禧的起居，所以慈禧也漸漸知道奕劻頗通文墨。他後來之所以能漸見嚮用，一方面固是然由於這一淵源，另一方面也靠攀附恭王奕訢，爲之汲引，所以逐漸出任要職，接近權力核心。文廷式聞塵偶記說：

「其初由恭邸援引時，謬爲清謹。光緒九年以後事權漸屬，遂事貪婪。後又與承恩公桂祥爲兒女姻親，所以固寵者無所不至。召戎致寇，其罪浮於禮親王世鐸云。」

桂祥也是慈禧的親弟。奕劻與桂祥結親，與慈禧的關係拉得更近了，所以他的爵位與官職也更加顯赫了。同治十一年，加郡王銜，授御前大臣。光緒十年，命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替甲申朝變後恭王所空出的職位，並封爲慶郡王。光緒二十年，進封親王。庚子拳亂後，奉旨與李鴻章同爲全權大臣，議和。至辛丑和約簽訂，有旨以親王世襲罔替，其地位駸駸乎超出近支的一班親王之上了。費行簡說他以「非近支，無軍功」，而能循序封至親王世襲，「清室數人而已」。所以然之故，卽是由於他深知結歡固寵之術，終慈禧之世寵信不衰，所以纔能以罪人之子而陞

至最高的顯秩。清代末年，奕劻最以貪庸著稱。其貪鄙之狀，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中曾有十分露骨而不堪的描寫，抄一段如下：

「劻初入樞府，取搢紳，以硃筆識各缺優劣於上，遇外省來謁者必詳諮，故所考甚確。嘗被酒，對鹿傳霖論陝西牧令缺肥瘠，指別確當。傳霖兩任陝撫，凡幾十年，媿弗如也。又其接客，必曰：『子姑俟，行得膏腴地矣。』是卽索賄隱語也。其所御案上，置篋纍纍，皆銀券鈔票金條之屬，亘十日則計某賄某人進，某人已放某缺，然後列簿而移券鈔等入內庫。」

奕劻領樞，是光緒二十九年三月榮祿死後的事。在此以前，他雖然也是督辦軍務大臣，但因權位不尊，所以得賄的機會不多。等到他作了領軍機大臣之後，情勢頓時就轉變了。首先是袁世凱，卽刻以當年趨承榮祿的態度來趨承他。劉厚生撰張謇傳記中曾說到這一點，云：

「在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以前，袁世凱所最注意的，僅僅是一個榮祿。其時慶王爲外務部領袖，亦居重要地位，而世凱之所餽贈，並不能滿慶王之慾。慶王曾對人發牢騷說：『袁慰亭只認得榮仲華，瞧不起咱們的。』但榮祿自辛丑回鑾之後，體弱多病，時常請假，照病勢推測，恐怕不能久於人世。於是慶王有入軍機的消息，爲袁世凱所聞，卽派楊士琦賫銀十萬兩送給慶王。慶王見了十萬兩銀子一張銀號的票子，初猶疑爲眼花，仔細一看，可不是十萬兩嗎？就對楊士琦說：『慰亭太費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楊士琦回答得很妙，他說：『袁宮保知道王爺不久必入軍機，在軍機處辦事的人，每天都得進宮伺候老佛爺，而老佛爺左右許多太監們，一定向王爺道喜討

賞，這一筆費用，也就可觀。這些微數目，不過作爲王爺到任時零用而已，以後還得特別報效。」

慶王聽了，不再客氣。不多幾時，榮祿死了，慶王繼任。入軍機之後，楊士琦的說話，並不含糊，月有月規，節有節規，年有年規，遇有慶王及福晉的生日，唱戲請客及一切費用，甚至慶王的兒子成婚，格格出嫁，慶王的孫子彌月週歲，所需開支，都由世凱預先布置，不費王府一錢。那就完全仿照外省的首府、首縣伺候督撫的辦法，而又過之。」

袁世凱仿外省首府首縣伺候慶王，這在榮祿時代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不過，慶王繼任後，對於袁世凱這種態度的反應，與榮祿並不一樣，則可斷言。因爲榮祿並不因袁世凱之利誘而對之恩禮有加，反之，奕劻則因袁世凱的巨額賄賂而完全爲袁的金錢所收買，凡百舉措，無不惟袁世凱之指授是聽，於是，奕劻雖居領軍機之任，事實上無異是在替袁世凱作傀儡而已。劉厚生說：

「弄到後來，慶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簡放外省督撫藩臬，必先就商於世凱，表面上說請他保舉人材，實際上就是銀子在那裏說話而已。」

劉厚生的這種說法，看來頗涉誇張，其實很有根據。凌霄一士隨筆就曾記述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如何利用奕劻之關係發展北洋勢力，其言如下：

「西后惟一寵臣榮祿死後，奕劻代爲軍機領袖，權勢日盛。其人貪庸而好貨，袁世凱傾心結納，餽遺甚豐，並與其子載振結兄弟交，奕劻奉爲謀主，甘居傀儡。慶、袁之交既固，世凱遂遙

制朝政，爲有清一代權力最偉之直隸總督焉。東三省實行省制，主之者世凱，意在擴張勢力，所謂大北洋主義也。丁未三月，徐世昌簡東三省總督，並授爲欽差大臣，兼三省將軍，地位冠於各督。奉、吉、黑三巡撫則唐紹儀、朱家寶、段芝貴。四人皆出袁薦，東陲天府，悉爲北洋附庸，固見世凱后眷之隆，而奕劻之爲袁盡力，自亦非尠。段芝貴以直隸候補道驟加布政使銜署理黑龍江巡撫，其破格擢用，視同治元年李鴻章之撫蘇，沈葆楨之撫贛。而李、沈均曾簡實缺道員，且值軍務正亟之時，情事猶不侔，至勳名物望非其時之李、沈比，更不待論。命下之後，輿論譁然。先是，西后以東三省將行省制，命載振、徐世昌出關視察，蓋亦世凱所主張，而世昌之督東，慶、袁似有成議，西后似亦內定矣。過津，晤世凱，小作勾留。世昌居行轅，載振則居督署。段芝貴以父日陞與世凱稔交之關係，且事世凱甚謹，世凱甚賞之，屢任要差，稱紅道，時充北段巡警總辦，以親昵，隨時出入督署，爲司庶務，於載振供張伺應甚周至。會世凱在督署演戲款欽差，載振賭歌妓楊翠喜，驚爲天人，贊歎不絕。芝貴認爲一絕好機會，欽差既行，即代購翠喜以待之。而世凱於此次會晤，即將三省督撫暨其餘要職商定，開一名單，交載振轉致奕劻，多世凱夾袋中人物。載得翠喜，自深感芝貴。惟謂芝貴以道員超領封疆，悉賴乎是，則尚非事實。蓋世凱爲芝貴謀黑撫，爲就東三省擴張北洋勢力大計劃中之一着，其政治上之意味，實重於區區載、段私人關係也。至相傳芝貴並以鉅金賂奕劻，以奕劻本受北洋之奉養而供驅策，事之有無，不足深

計矣。」

上面這段話，把袁世凱如何利用財賄結納慶王奕劻的情形，說得十分詳盡。文中並本受北洋之奉養而供驅策」爲言，則奕劻之成爲袁世凱的傀儡，事實更十分明顯。前面，李鴻章督直時代，積存於「淮軍銀錢所」的羨餘之銀，多至八百餘萬兩；其後袁世凱收鐵路餘利及賑捐餘銀併歸北洋，以致天津督署中的財貨山積。這些鉅大的財利，若是劻勗這樣志在營私自肥之人做總督，不過是設法侵吞入己而已。但袁世凱是胸懷大志的奸他雖有發財機會，而並不以發財爲職志，所以他要把這些鉅款用來發展他的政治勢力，買之力來達到其結交權要之目的。其對象一爲奕劻，一爲奕劻之子載振，則紈人，更不在袁世凱的眼中了。繼袁世凱之後出慈禧，一爲奕劻，若奕劻之子載振，則紈說到袁世凱揮霍之鉅，云：

「直隸爲各省領袖，屏蔽京師，自五口通商，特設北洋大臣，以直督兼任，形勢較要，體制亦較他行省爲肅。李文忠歷任廿餘年，歿後存款，不下千餘萬，繼任某制軍，藉以爲練兵之用，不三年支銷殆盡。復奏淮由各省合籌，練兵經費歲約數百萬，竭天下之脂膏，供一己之揮霍，而竇藏竭矣。」

他所說的「繼任某制軍」，指的就是袁世凱。袁世凱任直隸總督，自光緒二十七年底至三十三年六月，前後計五年有半。如照上文所說，則袁世凱在直督任內所耗費的金錢，何止三、四

千萬？這些錢，大部份用在編練北洋新軍，小部份用來灌輸權門，結納朝貴，及豢養幕僚賓客，所以北洋的財利確實可以欵動天下，而袁世凱的聲名與權勢，自亦蒸蒸日上。說到這裏，我們可以談一則有關奕劻的小故事，以見奕劻在出任軍機領袖之後，如何因袁世凱之賄賂而變得突然富有的事實。

十四

陳恆慶撰「諫書稀菴筆記」，中有「姜侍御」一條，說：

「姜侍御繼娶爲王氏，有嫁貲鉅萬，入門以來，用度浩繁，數年貲罄。王氏不能食貧，不免詬誶其夫，反目者日數次。侍御聞樞廷王爺有百萬之款存滙豐洋行，洋行司事與侍御相契，乃秘商一計，令侍御奏參王爺貪　，存儲洋行者數百萬。上命大臣率侍御往查，洋司事分給侍御二十將款支出，入於私囊，王爺　怒而不敢言。迨查無實據，侍御以誣參革職，洋司事乃暗改賬簿，萬。驟得鉅貲，乃市新房，設庖廚，以悅婦人。予見閱微草堂筆記有家貧年荒，婦人自鬻其身以養其夫，今侍御自鬻以養其妻，正作對比。都人贈一聯云：『辭却柏臺，衣無澣濯多；安居華屋，家有牝鷄。』」

凌霄一士隨筆談到上面的這段記事，說：

「按此爲光緒季年奕劻事，蔣御史，非姜也。陳恆慶曾官臺諫，不應誤記其姓氏，殆以同官

而諱之歟？」

其說甚是。此蔣御史，實在是光緒末年的御史於其內情較爲詳盡而得肯綮，引述如下：

「勛益無忌憚，取賄日富，皆以貯之外國銀行所辱，銜之，言於御史蔣式瑆：『勛某日新貯貲六此款我二人朋分之，君可富；若勛不我託，我必以，更必獲大用。實告察辦者，則勛必罷樞要，君式瑆落職，竟分勛果託是司事注銷存據，遂以察蔣式瑆劾奕劻貪汚而以鉅款存於英商滙豐銀行的事，上距奕劻由督辦政務大臣兼外務部總理之入軍機，不過只有十一個月。奕劻能撈錢的機會不多（政務大臣與外務部都不是可以貪汚的要職）

據光緒東華錄所記，乃是光緒三十年二月間，即使他論職，此款中的大部分是出在不到一年之內積貲百萬之多，顯而易見地，此款中的大部分是出于袁世凱之進奉，而袁則取之於北洋的存積，藉公款爲納賂之計而已。舉此一事，可知袁世凱以鉅款收買奕劻，確爲當時的事實。而奕劻既貪得世凱之鉅賄，自然也就樂受推戴，甘心作其傀儡而不疑了。奕劻除了前述東三省新設督撫人選悉聽袁之安排外，其他內外要職，亦惟袁世凱之意向是從。胡思敬國聞備乘記此云：

「光緒末年，小人階之以取富貴者，捷徑有二。一曰商部，載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凱主之；皆內因奕劻，而藉二楊（指楊士琦、楊士驤）爲交通樞紐。當袁世凱初蒞北洋，梁敦彥方任津海關道，凌福彭任天津府，朱家寶任天津縣，楊士驤、趙秉鈞以道員在直隸候補。不二三年，敦彥官至尚書，家寶士驤均躋節鎭（朱家寶吉林巡撫，楊士驤山東巡撫），福彭升藩司，秉鈞內召爲巡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而攀附以起者，嚴修以編修在籍，辦天津學堂，遂擢學部侍郎；馮汝騤與世凱聯姻，遂擢江西巡撫；吳重熹爲世凱府試受知師，遂擢河南巡撫；唐紹儀舊從世凱駐朝鮮，甲午之變，出死力護之以歸，故遇之加厚，既奪盛宣懷路政畀之，郵傳部開，又用爲侍郎，一手把持部務，案卷合同，盡爲所匿，尚書張百熙雖屬世凱姻婭，不能與之抗也。紹儀既得志，復引用其同鄉梁如浩、梁士詒、陳昭常等，皆列要位。士驤又引其弟士琦入商部。徐世昌久參世凱戎幕，鐵良亦嘗從之練兵，既入軍機，始稍稍携貳。世凱不由科目出身，遇投帖稱門生者，大喜，必力援之。定成晚入其門，遂長大理院。方其盛時，端方、陳夔龍、陳璧、袁樹勛無不附之。……」

由上面這段話可以看出，當奕劻入爲軍機領袖後，由于他與袁世凱之互相結納，凡是袁世凱所意欲汲引之人，都可經由奕劻的薦舉，而得到慈禧太后的顯擢，上述諸人，即是其實例。試將上面所列舉的這些人名作一統計，經由慶、袁二人之汲引而得居內外要職的袁黨人物，軍機大臣有徐世昌和鐵良二人，尚書有梁敦彥，侍郎有嚴修、唐紹儀與趙秉鈞，京卿有定成，丞參有楊士

琦、梁士詒、梁如浩等，巡撫有朱家寶、楊士驤、馮汝騤、吳重熹，藩司有凌福彭入上開名單之內的，尚有發表爲黑龍江巡撫不久即被參降調的段芝貴。清代的制度最高的行政長官，尚書與侍郎位居卿貳，更是國家重要官職，至于軍機大臣，則更重臣了。袁世凱以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的身份，年的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曾、左、李三人官職雖尊，總不過只是一個外省的袁世凱那樣地竭力提拔親朋故舊以發展他的私人勢力。袁世凱之所以要這樣做，固爲其奧援，亦由于他本人具有强烈的政治慾望，朝政。而且不僅此也，除了上面這些政治界的勢要想藉培植黨羽的方式來製造派系力量，以便把培植的軍事勢力之外，袁世凱以持權力，左右訓練新軍方式所爲六鎭，六鎭新軍由一鎭漸漸擴展而爲四鎭，再擴充而軍中的重要幹部，幾乎悉由小站練兵時代的校尉級軍官陞充而來。這些人以爲他們的事業前途悉出于袁世凱之提拔，其效忠於袁方面的力量總加起來，就使袁世凱儼然成爲清末政壇的中心人物。相形之下，與他些重要人物，如都只是月亮前的星星，看起來實在使人覺得十分黯然失色。

自從李鴻章、劉坤一等一班宿望重臣相繼辭世之後，張之洞算是疆臣中的前輩人物了。但張之洞素來驕倨自大，目空一切，輕易亦不肯薦舉屬吏。所以他後來雖然官至大學士，入參軍機，却沒有一個得力的人可以作爲臂助。比起袁世凱之多方推轂，廣通聲氣，明顯地可以看出他的力量決非袁世凱之所以能在後來成爲北洋軍閥的首領，這是極重要的一項因素。綜觀北洋人物中的顯部份人物都很有做事的能力。這些人之能够被袁世凱收諸麾下，不能不說是出于袁世凱的賞識拔擢。可以舉得出來的實例，一是徐世昌，一是趙秉鈞，一是段芝貴。

民國七年至十一年曾任北京政府大總統的徐世昌，乃是河北省的天津縣人。早年在河南遊幕爲生，因此得與袁世凱相識，兩人結爲好友，交誼甚篤。袁世凱本人連秀才都不曾中過一個，徐世昌却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而翰林，在科舉考試中一帆風順，一直做到翰林院的編修，出身至爲清要而華貴。但翰林官的身份雖然清高，而漢人中的翰林，陞遷却甚不容易。原因是翰林三年一選，教習及格者，按其進士殿試的甲第，狀元授爲翰林院修撰，從六品；榜眼與探花授爲編修，正七品。如果進士而不是鼎甲，則經由庶吉士教習散館的翰林，二甲進士授編修，正七品，三甲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從七品。而且不論是修撰、編修與檢討，這些翰林官在翰林院內都沒有補缺的希望。所謂缺補，往往前後數榜所積壓的修撰，編修和檢討多至二、三百人，尚且沒有正式的編制名額，正式的翰林院實缺官員，或者是詹事府、國子監中的

相當員缺。未佔實缺的翰林，陞遷沒有希望，一輩子只能算是掛名的虛銜，月支數百元車馬費而已。這樣一直到庚子事變及辛丑回鑾，徐世昌仍是翰林院的編修，比較容易有得缺希望的「上書房」、「南書房」等差使，也不能得；究竟何年何月，到此時尚不足六年，爲恐影響他將來的陞遷，因此由袁世凱報請當時的直隸總督王文韶具疏轉奏，請求免扣他在小站幫辦練兵的年資。却不料所奉到的旨意，乃是：

「徐世昌准其在營效力，所請免扣資格之處，著毋庸議。」

年資既然不能免扣，勢將影響徐世昌以後的前途。因此徐世昌只好仍回翰林院候缺，小站營務處只能算是翰林院的編修，不但未補一缺，也從未點過一次鄉試考差，從未派過一次外省的學政，甚至連

徐世昌點翰林，是光緒十五年的事。那時袁世凱已在朝鮮做商務委員，所帶的官銜是候補道，袁世凱以實缺道員在小站練兵，徐世昌仍是七品，比翰林院編修大得多。光緒二十一年，袁世凱已在朝鮮做商務委員，所帶的官銜是候補道，試差學政，生活甚爲窘迫。袁世凱很想把他借調到營務處來幫忙，藉資調劑，陞補。但因翰林院規定，編檢補實，必須扣足實際在院服務年資六個月，到此時尚不足六年，爲恐影響他將來敍報勞績，缺一日不可。徐世昌點翰林後，曾丁母憂回籍守制二十七個月，到此時尚不足六年，缺一日不可。但因翰林院規定，編檢補實，必須扣足實際在院服務年資六個月，到此時尚不足六年，爲恐影響他將來的陞遷，因此由袁世凱報請當時的直隸總督王文韶具疏轉奏，請求免扣他在小站幫辦練兵的年資。却不料所奉到的旨意，乃是：

「徐世昌准其在營效力，所請免扣資格之處，著毋庸議。」

年資既然不能免扣，勢將影響徐世昌以後的前途。因此徐世昌只好仍回翰林院候缺，小站營務處只能算是翰林院的編修，不但未補一缺，也從未點過一次鄉試考差，從未派過一次外省的學政，甚至連比較容易有得缺希望的「上書房」、「南書房」等差使，也不能得；究竟何年何月，

，實在渺茫得很。王蛻翁蘭隱齋筆記中有一條關於徐世昌的記載說：

「向來翰林遷轉，雖有六年資格，而每遇缺出，必以二十人引見，皆爲首者得之，異數也。朱不數日放湖南鹽道以去。」

九人隨班而散，俗謂之抬轎。光緒壬寅之冬，國子監司業出缺，吾鄉朱延熙引見居首，以爲可得矣，散朝後，普請成均官長於東華門外九和興酒樓。未終席，得報司業已放徐世昌而散。徐之班次在十三，越級得之，異數也。朱不數日放湖南鹽道以去。」

按，翰林陞轉雖以應陞者二十人開列引見，其位列第一者照例出於翰林院掌院大學士之安排，其得補亦照例必是此人，餘者陪榜而已。徐世昌在這次應陞的名單中列名十三，當然不過只是照例的陪榜，何嘗眞有補缺之望？然而他居然能由第十三名的候補者越次而得，實在太使人驚意外。其中原因，則係由於袁世凱在慈禧太后面前的竭力保薦。沃丘仲子所撰的「徐世昌」一文說：

「迨囘鑾，世凱迎駕，面奏世昌學兼文武，才清幹濟，特宣入對。孝欽見其體貌英挺，音吐優揚，大喜。諮以直魯軍防，條對明晰。翌日，后告榮祿曰：『徐世昌或足繼李鴻章後乎？』其期許若此。」

就事實而言，徐世昌的風度、儀表、學問、與器識，都可算是政治人物中的上選，所以他能在袁世凱死後成爲北洋軍閥所一致推戴的領袖，若非其爲衆望所歸而才德足稱，又何能當此？袁世凱以多年的交誼，深知徐世昌可以成爲他政治事業上的得力臂膀，所以竭力加以扶植。既補國

子監司業，秩正六品。第二年，商部成立，袁世凱又在尚書載振之前竭力誇讚徐世昌的才能，於是載振又奏請以徐世昌補授商部右丞，秩正三品。光緒三十年，署兵部侍郎。三十一年，授兵部左侍郎，署尚書事。旋改巡警部尚書，補軍機大臣。距離他以翰林院編修補國子監司業時，不過只有四年。這四年之中，他由正七品的編修驟陞至從一品的尚書，躍握之速，爲有清一代漢大臣所未有。所以然之故，則因袁世凱之竭力扶植，與奕劻之從旁推轂也。自徐世昌入直樞，與奕劻之從旁推轂也。自徐世昌入直樞，與奕劻之從旁推轂也。自徐世昌入直樞

之夢，侈談策畫，正觸趙忌，此車站遇刺之由來。宋案出，秉鈞退處直隸都督。當時南方要人來京者，沈秉堃、林述慶皆讌後暴死，獨王芝祥每公食自具杯筷，非他人先食決不下箸，得免。蘄州黃季剛時爲趙秘書長，趙宴客，季剛必在座。酒貯鴛鴦壺，一鴆一酒，秉鈞美爲漢器。季剛曰：『予每宴心震，恐鴛鴦壺之錯酌誤傷也。』有姚玉芙者，現隨梅蘭芳管事，年幼時，美姿儀，善應對，曾侍趙智菴供燒烟之役。智菴一日在烟牀，問玉芙曰：『汝視我對待各方如何？』玉芙曰：『大人與客談話，人人不同，此不可及。』翌日即辭去玉芙，知玉芙識破本領，恐生內憂也。……」

由上所紋，則趙秉鈞的出身實在只是山東巡撫衙門中的一名巡捕。袁世凱能够識英雄於未遇，並加以不次之拔擢，卒成爲智囊中的重要人物，尤其可以知道袁世凱對于收羅人才之細大不捐，從無出身高低之成見預存於胸中。袁世凱之能够成爲偉大的領袖人物，與此有重要關係。

至於段芝貴，其人之出身略如趙秉鈞。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一：「袁世凱有妾與其僕通，事覺自殺，僕竊藏而逃，久之不獲。巡捕段芝貴爲懸賞募得之以獻。世凱大喜，贊其才，令捐道員，密疏保薦甚力。」據此，則段芝貴雖因其父與袁世凱有舊之故，得以在袁世凱部下供職，其人固未嘗讀書，而且其最初的職務祇是巡撫衙門中的一個「巡捕」，與趙秉鈞的情形一樣。清代制度，督撫衙門中的巡捕，照例由在省當差候補的佐雜班中派員充任，其本身的官職最高不過縣丞，秩居八品，最低則只是未入流品的巡檢與典史等官。所以當段芝貴以歌伶楊翠喜獻於奕劻之子載

振時，御史趙啓霖具疏參劾，劾疏中就說：

「臣聞段芝貴人本猥賤，初在李經方處供使令之役，繼在袁世凱署中聽差，旋爲時未久，百計賓緣，不數年間，由佐雜以至道員。其人其才，本不爲袁世凱所重合，無微不至，雖袁世凱亦不能不爲所蒙。……」

清代末年，仕途冗雜，捐班出身的「貲郎」充斥內外。趙秉鈞與段芝貴能得袁世凱之信任，當然不難由佐雜微員援捐官之例捐爲候補道。既然官至道員，就可以由督撫委派差使，然後經由明保密保等等方式補授實缺，不數年間，就可以陳臬開藩，由兩司而至督撫。所謂朝裏有人好做官，即此之謂。光緒末年，袁世凱的勢力炙手可熱，再加上奕劻爲之奧援，趙秉鈞與段芝貴雖然都是未補實缺的捐官道臺，一樣可以內陞侍郎，外署巡撫，說來實在駭人聽聞。但由貴的出身看來，袁世凱屬下的北洋人物，流品可謂龐雜。大概袁世凱的用人標準，不論出身，論品德，只要其人小有才能，即能量才任使，雖使貪使詐不忌。這就好像曹操當年所頒的魏武三詔令，其用人的標準是「惟才是擧」，雖盜嫂受金，負汚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一無所拘。由于這個原因，所以袁世凱的屬下賢不肖並進，龍蛇混雜，一時稱爲人才薈萃。這就很像是自古帝王開基的規模，而尤其與魏晉以來篡弒相仍時的奸雄主的情形相似。情勢如此，自難免使忠君愛國的志士爲之憂心。於是，袁世凱的揮大略，自亦難免遭遇打擊挫折。最顯著的事例，一是改訂新官制案所遭受的詬責與挫敗，一是因

楊翠喜事件而引起的奕劻父子被參案。這兩件事嚴重的。

十六

說到袁世凱當年以直隸總督遙執北京朝政時中的描寫，來形容其一斑。金鑾瑣記中，共有三際情形爲如何。第一首云：

「衞士持鎗似虎熊，桓溫入覲氣何雄。玻璃窗內頻探望，暗暗心憂兩相公。」

其下注云：「項城在湖園入覲，衞士如虎如熊，有桓溫入覲之概。王、瞿兩相國在玻璃窗內觀之，觀後憑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第二首云：

「如雲騶從劍光寒，內監驚疑駐足看。裝飾猙獰誰不畏，滿身都畫虎皮斑。」

其下注云：「項城荷鎗衞士，以黃布裹頭至足，畫虎豹頭，虎皮斑文。王公大臣騶馬見之皆辟易，宮監亦却立呆看。查東西洋無此軍服，惟中國戰場有之。項城入京城，以七六想。」

第三首云：

「怒馬鳴車孰敢當？舍人奔避入朝房。偏言海外眞天子，內監讕言亦太狂。」

其下注云：「西苑當值下班，項城衞士驅逐行人，山人與徐博泉奔入朝房。行道者搖首曰：『太兇猛』。有一魁梧內監高聲嚷於道曰：『難道袁某非海外天子耶？』無人與辨。京中豈海外之比？況在宮門口，何得如此？此卽淸室禪位之影響，洪憲天子之先聲。」

上引詩中所說的「湖園」，卽頤和園；王、瞿兩相國，指當時的軍機大臣王文韶與瞿鴻禨；山人，則是金鑾瑣記作者高樹之自稱。這些詩以袁世凱與晉末的權臣桓溫相比，又稱之爲海外天子，足以想見當時人對這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觀感如何。瞿鴻禨後來成爲袁世凱之政敵，立意要把慶、袁二人的聯合勢力逐出政壇，未始不由於此。

改革新官制案發生於光緒三十二年，其事爲淸政府預備實行立憲之先聲。淸鑑綱目卷十五，光緒三十一年七月記云：

「自日俄戰爭後，日本以區區三島，戰勝強俄，一時公論多歸功於立憲，而專制不如立憲之說，遂騰佈於萬國。甚者謂，是役也，匪直日俄勝負所由分，實專制國與立憲國優劣之所由判。於是俄國國民有實行立憲之要求，俄皇不得已，於一九〇六年下宣佈立憲之詔。於是中國人民亦紛然並起，向政府要求立憲。時孝欽太后當國，以專制暴戾聞於世，對於立憲問題本至鑿枘。顧自庚子以來，信用載漪，縱容拳匪，開釁列强，既犯天下之大不韙；而辛丑回京，大阿哥被黜，廢立之謀未遂，恐帝他日一旦親政，攘奪君權，不得已思採用立憲制，一以粉飾臣民之要求，一

以爲他日限制攘奪君權之地步。至本年六月，因袁世凱等之奏請立憲，遂宣諭允之，而先派親貴分赴各國考察政治，以爲改革之預備。是年六月，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四人爲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分赴東西洋考察一切。秋七月，續派紹英爲考察政治大臣，與載澤等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此云慈禧之允行君主立憲，其目的一在預防光緒之攘權，而由思敬所撰大盜竊國記見之，則謂其事全出於袁世凱之慫恿，其目的蓋因「孝欽年逾七旬，衰病日增胡，有髦期倦勤之態，恐皇上親政後修戊戌前怨，日夕焦慮，遂倡議立憲，冀新內閣立，權歸總理，天子不得有爲。私擬一奏，使載振上之，大旨言：救亡非立憲不可，立憲非取法鄰邦不可。朝廷不悟其奸，立派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鐸分赴東西洋考察憲政。」據此云云，則慈禧之允行立憲，則又是採納袁世凱之建議兼爲敷衍國人立憲願望而行之表面文章了。張謇文集中載有他在此時寫給袁世凱的一信，說：

「自朝廷宣布立憲之詔流聞海內外，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吳武壯有知，必爲凌雲一笑。而南壇漢城之間，下走昔日之窺公，固不足盡公之量也。」

觀此，更可知袁世凱的立憲建議，對于此事確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量，蓋其意見不但能順應當時的時代潮流，兼能猜測慈禧之意向，所以纔能使「朝廷不悟其奸」而墮其術中。到了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五大臣由歐美考察回國。由於他們對于外國的君主立憲政治實在沒有認識，所以袁世

凱就越俎代庖，以他自己的意見代撰考察意見報告書，交由五大臣回京呈遞，其主要內容卽在改革官制。胡思敬所撰大盜竊國記記此云：

「五大臣歸至天津，世凱勞以酒，曰：『此行勞苦，將何以報命？』皆愕然莫會其意。世凱出疏稿示之，曰：『我籌之久矣，此宜可用。』遂上之。孝歌自西巡後不敢堅持國事，見五大臣疏，躊躇莫決，急召世凱入商。世凱卽日入京，奏言變法須先組織內閣，組織內閣須先從官制入手。孝欽許之。尚書張百熙新與世凱聯姻，卽具疏密保奕劻爲總理，世凱爲副總理，疏稿蓋北洋幕客沈兆祖筆也。遂定議假外務部公所爲厘定官制局，召二三儇薄好亂喜事之徒，若吳廷燮、汪榮寶、金邦平、陸宗輿、章宗祥、張一麐等分類起草，門外盛陳兵衞，譏察甚嚴。」

以上所說，就是袁世凱奏請厘定官制以爲實行憲政預備之由來。袁世凱所主持的新官制案中，議裁吏部、禮部、翰林院、都察院、宗人府，併工部爲法部，分兵部爲陸軍海軍二部，又增設資政院、審計院、交通部，舊有各部惟一沒有變動的只有學部。這些變革，所招來的誹議與不滿，可以分三方面來說。

由于新官制案將很多舊機構都作了裁撤或合併的建議，原來在這些機構中供職的官員，難免會發生恐懼，深恐將來的前途會有不利的影響。例如吏部向來握有全國官員任免及考核的大權，部中的書吏財利滾滾，主其事者也大有利潤。一旦將吏部裁撤，卽刻就將失去大批財利，勢必要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又如翰林院，向爲高級知識份子的「讀書養望」之地，缺分雖苦，因出

身華要之故，將來的仕途極爲貴顯。一旦栽撤，原來在翰林院中熬過數十星霜的大小翰林，都怕已有的「資望」會歸於無用。這是屬於第一方面的反對力量，由於人數衆多，未可忽視。

自古以來，專制皇帝無不視御史爲朝廷的耳目。御史官職雖卑，但因職係「言官」之故，糾舉不法，彈劾失職，是其本分內事。正因爲朝廷中有這些不怕事、不怕死的御史敢於仗義執言，所以即使是權傾百僚的大憝巨奸，亦因顧忌御史的劾奏而不敢顯然作惡。袁世凱勾結奕劻，把持朝政，這在當時已使很多人爲之側目而視。現在他居然在新官制案內建議裁撤都察院，使皇帝所仗以制衡行政權力的監察權無可行使，因此不免更使人懷疑，袁世凱的這一建議，是否因懷有不臣之心而在此時預作安排？這番話如果傳入慈禧太后的耳中，慈禧太后能不爲之動心嗎？這是第二方面的反對意見，雖言者不多，而力量遠爲堅强。

至于來自第三方面的反對意見，就應該是當時的實際執政人物——軍機大臣了。清代自雍正時設立軍機處以來，內閣的政權就逐漸移歸軍機處。軍機大臣直接秉承皇帝的指示，擇擬諭旨，獻替謀議，薦舉重要官員，所以軍機大臣實際上就是前朝的宰相，地位崇高而權任甚重。新官制建議實行責任內閣，內閣設總理大臣一人，協理大臣二人，總理大臣雖對皇帝負責，却有直接任免官員的權力，無需事事徵得皇帝的同意。而且內閣總理與協理都由現有軍機大臣中遴選充任，也勢必要有三個軍機大臣因此而被迫交出政權。他們爲了顧及自己的地位與權力，如果認爲自己沒有出任新內閣的總理或協理之

望，必然要反對新官制案的實施。持此一反對意見的人數較前一種更少，但也更有力量。如當時在軍機處擔任軍機大臣的瞿鴻禨，就是反對者之一。

瞿鴻禨入軍機處，是光緒二十七年四月間的事。那時，慈禧和光緒還在西安逃難。因爲庚子拳亂之故，原來的幾個軍機大臣端王載漪和剛毅、趙舒翹、啓秀等人先後被革職問罪。軍機處祇賸下榮祿和王文韶二人。二十六年冬，添了一個鹿傳霖，但人數還是不够，因此在二十七年的四月再添了一個瞿鴻禨，當時他的本官是工部尚書兼督辦政務大臣，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六月以後，改爲外務部尚書，學習二字也去掉了。光緒二十九年三月，榮祿病卒，奕劻代爲軍機領袖。九月，榮慶入軍機。到光緒卅一年，王文韶以老病告退，徐世昌和鐵良先後入直。所以，到光緒三十二年草擬新官制案時，在職的軍機大臣共計六人：奕劻、鹿傳霖、瞿鴻禨、榮慶、鐵良、徐世昌都是因袁世凱的關係而被奕劻引入軍機的和徐世昌。奕劻是袁世凱的傀儡，榮慶、鐵良、徐世昌都是袁世凱的黨羽，不是袁黨的只有鹿傳霖與瞿鴻禨。鹿傳霖耆髦無能，。這樣一來，軍機六人中就有四人是袁黨，惟一可以與袁世凱相對抗的，也只有瞿鴻禨。

前引高樹金鑾瑣記詩注中已曾說到：「項城在湖園入覲，衛士如虎如熊，有桓溫入覲之概。王、瞿兩相國在玻璃窗內觀之，觀後憑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王文韶和瞿鴻禨此時的感覺，必定是覺得袁世凱的聲勢氣燄實在太囂張、太跋扈，此人的勢力如再繼續發展，必定不利於清朝的社稷。專制時代的臣下講究對皇室效忠，他們既然顧慮到袁世凱有不臣之心，當然就得設法

防範裁抑。王文韶不久告退，反對袁世凱的只剩下一個瞿鴻禨。新官制案提出後，責任內閣，必定以奕劻爲總理大臣，袁世凱爲協理大臣，袁世凱也必定以協理大臣而實操總理大臣之柄。如此則不但瞿鴻禨的軍機大臣地位不保，將來的滿清政權，也必將落入袁世凱之手。曹操和司馬懿生加九錫，封爵封王，到了他們的子孫手裏，就有了篡漢篡魏的基業。袁世凱的勢力一旦發展到此，還不就與曹操司馬懿的情形一樣？所謂「漸不可長」，正當在此時預先加以抑制。所以，瞿鴻禨需要反對新官制案。

據劉厚生撰張謇傳記說，當慈禧太后以新官制案徵詢瞿鴻禨的意見時，瞿鴻禨指出，責任內閣成立後，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權，都由總理大臣召集各部大臣會商決定後請旨頒行，皇太后的用人權從此旁落，即使太后放心，臣愚却不能放心，還請太后三思。就是這樣幾句淡淡的話，提醒了慈禧太后防範新內閣覬覦政權的警覺心。再加上一、二方面的反對意見，更使慈禧太后覺得袁世凱所擬的新官制案窒礙難行。胡思敬撰大盜竊國記記此，云：

「事寖播揚於外，朝論大譁，部院彈章鑠起。內閣學士文海直詆世凱指鹿爲馬。孝欽爲羣言所動，心亦弗喜。官制草案上，詔孫家鼐瞿鴻禨爲總裁，召見世凱，盡以參摺示之。世凱言：『築室道謀，安能成事？請嚴懲一二人以息衆囂，盡誅之？』孝欽大怒，曰：『汝兵柄在手，何不執言者而不敢遽發。』世凱股栗不敢對，次日即請訓出京，盡辭兼差，知天威猶在，人口難防，蓄勢待時，

後一段話，在張一麐所撰的古紅梅閣筆記中亦有類似的記述，說：

「光緒末年，清廷倡言立憲，實無誠意。袁世凱上奏請先改革官制，以爲預備立憲之張本，內閣成立，袁又將所練北洋六鎭奏請以四鎭還諸練兵處，僅留二、四兩鎭於北洋，以寒攸德秋操爲名出京，操畢卽回天津。及名義上之新朝中洶洶，幾釀大變。袁世凱急急以欽派往閱彰。其時之袁世凱，蓋亦岌岌可危也。」

袁世凱此時之形勢岌岌，實在是因爲當朝的慈禧太后尚有充份權力可以控制政局，袁世凱雖然兵柄在握，自揣尚不足以當慈禧之一怒，所以不得不知難而退，以待及時。試看一年以後慈禧身死，攝政王載灃當國，雖將袁世凱逐出政府，他却一無所畏，施施然地回到河南安陽城北的洹上村去釣魚吟詩，完全不怕載灃等人或有進一步的不利企圖。這就因爲他深知當時祇有慈禧纔是能够對他駕馭鈐束之人，餘皆庸駑之才，不足爲慮也。果然，辛亥武昌革命事起，北洋軍兵將皆不用命，迫得載灃非再度敦請袁世凱出山不可。這就可以知道，當袁世凱的勢力發展到了光緒末年時，清朝中國只有慈禧一人對于袁世凱尚有駕馭之力，等到慈禧一死，就是袁世凱的世界了。

正因爲在光緒三十三年時慈禧太后尚是大清帝國的實際統治者，袁世凱的勢力尚有制壓之力，所以，在新官制案的失敗打擊之後，還有人希望再進一步扳倒袁世凱的後臺老板慶王奕劻，以便徹底清除袁世凱的勢力，這就是丁未大參案與丁未政潮的發生由來。

所謂「丁未大參案」，參劾的對象就是慶王奕劻與他的兒子載振，參劾的事由則是段芝貴購獻歌伶楊翠喜予貝子載振，進一步論劾奕劻收受段芝貴的巨額賄賂，使之出任黑龍江巡撫一案。這一事情的大略緣起，前引凌霄一士隨筆記述袁世凱藉東三省改制以實行其大北洋計劃時，已經約略提及，但述而不詳，需要在這裏爲之補充說明。

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卷四，「楊白花」一則內引「菊影錢」所記，述楊翠喜與丁未參案之始末云：

「以一女優，而於一代興亡史上居然占有位置，而牽動一時之政局者，當數楊翠喜矣。楊翠喜者，直隸通州人，幼以貧窶，鬻於陳姓，展轉之津門，遂墮樂籍，其假母曰楊李氏。翠喜善淫靡哀豔之曲，出其技，在侯家後協盛茶園演劇。嘗一至哈爾濱，繼反津，構香巢於河北，受大憩園、天仙園之聘，聲價重一時，爲富商王益孫、道員段芝貴所賞。會貝子載振奉節東省歸，道出津沽，置酒高會，一見翠喜，傾倒不置。段方有求於貝子，乃託王益孫名，以萬金購翠喜爲使女，即車送之京，進之貝子，翠喜則年十九矣。無何，段芝貴以道員授黑龍江巡撫。御史趙啓霖獨揭而劾之，段遂奪職。貝子懼，遣歸翠喜。上乃派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查辦，覆無實證，趙啓霖亦褫職也。此清光緒丁未年事。夫以翠喜一身，時而臺榭，時而宮府，時而姬，時而伶，

時而妾，時而婢，極却曲眯離之況。山陽書騐角之楊花詩，亡友鄒亞雲之楊白花傳奇，均爲翠喜作也。謂非宦海之佚聞，故京之豔史歟？」

鄒亞雲所撰的楊白花傳奇雖然早已亡佚，段芝貴獻楊翠喜而得黑龍江巡撫的故事，傳下來了。其原因當然是因爲這樣的故事太荒唐，不但足以反映清末官場之黑暗，亦可見清末吏治之敗壞。據光緒東華錄所記，趙啓霖劾疏中曾併劾奕劻，謂：

「上年貝子載振往東三省，道過天津，段芝貴夤緣充當隨員，所以逢迎載振者，無微不至。以一萬二千金於天津大觀園買歌妓楊翠喜獻之載振，其事爲路人所知。復從天津商會王竹林措十萬金，以爲慶親王奕劻壽禮。」

但載灃和孫家鼐雖奉旨前往查辦，覆奏中却爲奕劻與載振洗刷，以爲並無其事。據凌霄一士隨筆所記，其經過情形如下：

「西后派載灃孫家鼐查，世凱等亟爲釜底抽薪之計，即秘送翠喜回津，由張鎭芳（按係袁世凱之妹夫）挽王益孫出面領去。益孫名錫鋆，天津鹽商綱總，鎭芳時以候補道充全省財政總滙處總辦，兼辦永七鹽務，二人關係素密也。及載灃家鼐派恩志，潤昌二員至津訪查，而布置已定，錫鋆自承係參案前瞞爲使女，翠喜亦如之，並有人證物證。家鼐載灃不敢深究，雖又提傳至京面訊，亦官樣文章。既據以覆奏，遂以『汚衊親貴重臣名節』褫啓霖職，而西后實不能無疑。故於案結之前，即撤銷芝貴布政使銜，命無庸署理黑龍江巡撫。奕劻不自安，命載振之案結後自請

開去農工商部尚書及各項差使，后許之。載振疏詞令頗工，有『不可爲臣，不可爲子』等語，其師唐文治所草也。」

段芝貴獻楊翠喜以結歡載振，其事極似宋朝時錢塘知縣程松壽之買妾進獻於當時的權相韓侂胄。「慶元黨禁」記其事云：

「侂胄有愛妾小過被譴，錢塘令程松壽亟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且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之所由。居數日，侂胄復召之，知爲松壽所市，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之去外郡，某忝爲赤縣，故爲王匿之舍內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待以禮，侂胄大喜，即日躐除太府寺丞。踰年，進諫議大夫，猶快快不滿意，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

惟其因爲有此典故，所以後來有人將楊翠喜的照片送與趙啓霖，就以此爲喻，題詩其上云：

「將軍巧計奪勛封，松壽變名强唉儂。乍出花叢香未散，裙邊袖底幾遊蜂。」

「啁啾翠羽戲朝暉，天上珠巢護碧衣。怪怯昨宵春夢惡，蒼鷹側翅擊空飛。」

前一詩詠段芝貴之獻媚載振，後一詩則詠趙啓霖之彈擊，讀之頗爲有趣。

趙啓霖參劾奕劻父子未成，反被指爲『汚衊親貴重臣名節』，革職。表面上看來，反對慶袁一派人物在這一參案上是落在下風了，而其實不然。因爲段芝貴藉獻楊翠喜得署黑龍江巡撫，本是

千眞萬確的事實；而趙啓霖之敢於搏擊權貴，不計安危，更是人人共欽的英勇行爲。如今只因袁世凱奕劻等人之巧於彌縫，載灃孫家鼐之畏葸鄉愿，竟致是非顚倒，黑白不分，而直言敢諫之趙啓霖反因此而遭污衊親貴之革職處分，這樣的處置，如何能不使旁觀者爲趙啓霖表示不平？於是，在此案行將結束之時，另一位直言敢諫的御史江春霖也奏上一疏，就載灃及孫家鼐之查案疑竇及供詞之支離恍惚，指出其中有六點可疑，云：

「買獻歌妓之說，起于天津報紙，而王錫鋂則天津富紳，楊翠善又天津名妓，若果二月初卽買爲使女，報館近在咫尺，歷時既久，見聞必確，何至誤登？可疑者一。使女者，婢之別名。天津買婢，身價數十金，至百金而止，無更昂者。以三千五百圓而買一婢，是比常價增二三十倍矣。王錫鋂卽揮金如土，擲於虛牝，愚不至此，可疑者二。翠喜色藝，傾動一時，白居易琵琶行所謂『名在教坊第一』者，無過是矣。老大嫁作商婦，尙訴窮愁，豈有少年紅顏，甘充使女？可疑者三。王錫鋂稱，在天津榮街買楊李氏養女，不言歌妓。而翠喜則稱，先在天仙茶園唱戲，經過付人梁二與身父母說允，又不言養於李氏。供詞互異，揑飾顯然，可疑者四。既爲歌妓，脂粉不去手，羅綺不去身，其不能勝操作也明甚。謂在家內服役，不知所役何事？可疑者五。坐中有妓，心中無妓，古今惟程顥一人，下此雖十年浮海之胡銓，不免動情於黎倩矣。而曰買爲使女，人可欺，天可欺乎？可疑者六。」

以上各點，純就王錫鋂楊翠喜二人之供詞矛盾及不合情理處逐一舉其可疑，袁世凱段芝貴等

人的彌縫雖周，至此却破綻顯然。因此，江春霖在他的奏疏中續說：

「臣以情理斷之，出名頂領之說卽使子虛，買妓爲妾之事更無疑義。伏查大清律例戶律內載，『樂人』，注『爲妓者』。案經王大臣查無實據，本不敢倡爲異說。惟是趙啓霖業經革職，載振亦復開缺，而兵部候補郎中王益孫名錫鍚，以職官而納歌妓，顧獨逍遙法外，未免落人物議。若非照娶樂人律科斷，不惟國法未申，實無以塞都人士之口。」

這一段話，其重點雖然在請求將王錫鍚按職官娶妓之律依法處斷，其目的似乎有藉此而希望逼迫王錫鍚據實供出其中眞情之意。究竟江春霖是否確有此意，固然難以推測，而此疏中所論王錫鍚不可能買楊翠喜爲婢的觀點，却十分清楚。慈禧太后老於政事，看了這樣的奏疏，豈有不了然於心的？何況她自己也有一批太監、侍衞等人作爲耳目，心中對此若有所疑，吩咐還些耳目親信去細細探聽一番，事實眞相，自然就可明白。因此她不久便知道趙啓霖所參確有其事，段芝貴謀得黑龍江巡撫，不但獻妓是實，卽獻金奕劻之事亦屬實在。於是慈禧降諭令趙啓霖復職，奕劻事前並不預聞，甚爲惶悚。這一事實顯示出了慈禧太后對奕劻之不滿。奕劻爲求自保，勢必需有進一步之安排——設法排除朝中反對慶、袁勢力的首腦人物，以爲拔本塞源之計。當時奕劻和袁世凱認爲，朝中的反慶、袁人物以軍機大臣瞿鴻禨爲其領袖，欲謀消除反對慶、袁勢力，須先除去瞿鴻禨。但瞿鴻禨在慈禧太后面前的「簾眷」甚隆，輕易不易搖撼，究應如何方能使瞿鴻禨倒臺？也還是很棘手的事。却不料天假其便，瞿鴻禨自己出了毛病，奕劻和袁世凱乘機落井下石，

終於使瞿鴻禨銼羽而歸。關于此事的經過，凌霄一士隨筆中記述甚詳，可以參看。今爲之引述如下：

「瞿鴻禨以勤敏見賞於西后，軍機大臣中力能與奕劻抗者，惟鴻禨一人，而尤與世凱不洽。朝士之惡慶、袁者，隱戴爲宗主。啓霖湘人，與鴻禨同鄉，其劾芝貴，說者謂實欲藉此牽動慶、袁也。奕劻世凱以爲非去鴻禨不得安枕。加以岑春煊亦爲后所喜，方留京爲郵傳部尚書，每於后前痛論奕劻之罪。瞿、岑相合，而慶、袁益懼。乃借廣東邊境不靖，由世凱於入對時謂：非知兵有威望者督粵，不能鎮懾，而擠春煊改外，以孤鴻禨之勢，而去之尚無善策也。會鴻禨獨對，后言及奕劻，謂：『他是我一手提拔起來的，遭幾年我看他也足了，可以叫他休息休息吧！』蓋其時后實不慊於奕劻。鴻禨因對以『太后聖明，如罷其政權，正所以保全其晚節。』后謂：『予自有辦法，汝姑待之。』鴻禨喜甚，退而以告汪康年，謂奕劻行卽罷政矣。（原注：康年爲鴻禨門生，且有姻戚關係，時辦一京報爲鴻禨機關，與祖慶之北京日報各張一幟，旗鼓相當。）康年轉告其友倫敦太晤士報訪員高某，高遽發電報告。駐京美國公使接倫敦電，知其訊，嘱其妻謁后探虛實。（原註：后自辛丑回京後，以媚公使夫人爲媚外之要訣。公使夫人隨時請見，均慇懃款接。）后愕然曰：『無之。』因詢此說何來？答謂倫敦太晤士報所載之北京電也。后仍謂此謠言，請勿信。美使夫人既去，后思此准對鴻禨言之，必所洩漏，因怒甚，自語曰：『瞿鴻禨混帳！』奕劻女隨侍宮中，聞其語密告奕劻。奕劻商之世凱，世凱謂后方怒鴻禨，機不可失，宜亟圖之。於

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糾劾鴻禨之疏上。劾瞿之疏，羅列交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布黨羽等款，楊士琦所草也。后命孫家鼐、鐵良查，覆上，詔鴻禨姑免深究，着開缺回籍。后本擬罷奕劻，乃一變而爲逐鴻禨，政情奇幻，殊有波詭雲譎之勢。奕劻雖快意，而以后意難測，不無惴悚，旋卽自請退出軍機，藉爲嘗試。后以曾對美使夫人辦謠，不便遽罷，故降諭慰留，而命載灃入軍機以分其勢。」

瞿鴻禨被斥，清代史上稱爲光緒三十三年的「丁未政潮」。此一政變的始起，本爲瞿鴻禨謀逐慶王，不料因爲他言詞不愼之故，洩漏了最重大的機密消息，致使慈禧發怒，反倒使他自己被摒出軍機，其結果實在大出意料之外。而瞿鴻禨既斥，岑春煊又遠調廣東，慶、袁勢力再無敵手，似應可高枕無憂矣，而揆之事實，則又不然。其原因由于慈禧對奕劻的恩眷已衰，奕劻的地位已不復能如從前之穩固了。

十八

慈禧太后對奕劻的恩眷漸衰，可由光緒卅三年之謀逐奕劻一事中看得出來，據說其中原因在李蓮英之挑發中傷。費行簡慈禧傳信錄記此云：

「李蓮英以劻得賄多，分潤特其些微，漸不能平，頻爲后言劻貪黷，特朝臣附之，故曏察不得實。后深信之。設不死者，劻必罷矣。」

奕劻貪庸瑣鄙，其惟一所恃以爲固寵之計者，無非通賄宮闈，以博太后及李蓮英等人以爲奕劻自得太多而進獻太薄，奕劻的地位自然可危。更何況當時的朝中親貴人人都存有發財之心，目睹奕劻利權獨擅，妬嫉萬狀，奕劻因此而成衆矢之的，形勢當然更加可危。

劻在慈禧將死之前雖因寵眷遽衰而形勢岌岌，及至攝政王載灃繼慈禧而出膺大任之後，朝中的情勢却大有變異了。載灃之入軍機，不啻爲奕劻被斥之先聲。不過，形勢之變化往往出人意外，奕劻之權。關茸無恥之徒，趨之若鶩，朝政日益混亂。人謂奕劻在光緒末年招權納賄，罪固可惡，而載濤載洵載澤溥倫等一班皇子皇孫盡出專權，分類結黨，各專予奪，謂其受賄尚循資格，不若濤洵輩之不擇手段也。因此之故，奕劻反能在宣統年間的黨爭夾縫中生存下去，到後來又再成爲袁世凱東山再起的謀主，實在更是使人難以逆料。

小醇王載灃入軍機後，接着，袁世凱和張之洞也被派爲軍機大臣。據胡思敬國聞備乘所說，袁世凱入軍機，係出于奕劻之舉薦。而慈禧太后覺得袁世凱雄驁猜狠，需另有人加以制衡，故令張之洞與袁世凱同入軍機。其思慮固極周密，但因此時的慈禧太后業已年老多病，精力日衰，對于內外政事不能一一詳察，所以奕劻和袁世凱也還是可以聯合起來對付張之洞。胡思敬國聞備乘說：

「世凱入，陽以禮貌尊事之洞，推爲老輩，凡朝廷不甚經意，視爲迂闊可緩之事，如崇祀三

先生，推行金幣等案，悉讓之洞主政，而各省疆吏，各部要臣，盡安置私人，內外聯爲一氣。太后年老多病，方以後事爲憂，日漸廢弛，外事亦不能盡達也。」

袁世凱入爲軍機大臣之後，繼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袁世凱所保薦的楊士驤。此人與其弟楊士琦同爲袁世凱的心腹，北洋系官僚的重要人物。所以袁世凱雖然交卸直督，直隸總督衙門仍可供給他鉅額的經費，以供袁世凱通賂權門，收買黨羽之用。而涌觀當時的內外大僚，屬於袁黨人物的，僅只卿貳督撫方面，就有郵傳部尚書陳璧、外務部左侍郎梁敦彥、民政部右侍郎趙秉鈞、學部右侍郎嚴修、陸軍部右侍郎蔭昌、農工商部右侍郎楊士琦、郵傳部左侍郎吳重熹，直隸總督楊士驤、兩江總督端方、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山東巡撫孫寶琦、奉天巡撫唐紹儀、吉林巡撫朱家寶、浙江巡撫馮汝騤等十四人，其他三、四品以下的各部丞、參及外省監司，更多。所以，此一時期的袁世凱，可說是因政爭獲勝的全盛時代。假如慈禧不死，這種情況大概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不幸而慈禧、光緒先後於光緒三十四年的十月間崩逝，醇王載灃之子溥儀繼立爲帝，載灃以攝政王的身份監國。載灃一上臺之後，立刻就向袁世凱開刀。此年十二月，以皇帝名義降旨，命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痾。旨云：

「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夙承先朝屢加擢用，朕御極復加懋賞，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馳驅。不意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袁世凱著卽開缺，回籍養痾，以示體恤之至意。」

袁世凱無病而降旨令其回籍養病，其意義就是將他逐出政府而令其返回原籍居住，不許在京逗遛。昨爲寵臣而今遭斥逐，這當然是很難堪的屈辱。據傳說，載灃的本意是要將袁世凱殺掉，幸賴張之洞力救，始得此從寬處分。張文襄公年譜記此云：「先是，監國攝政王承皇太后命，飭軍機擬旨，禍且不測。公反覆開陳，始命回籍養痾。」此皇太后，不是已死的慈禧，而是新因宣統嗣立而被尊爲皇太后的光緒之后隆裕。隆裕爲什麼要載灃殺掉袁世凱？據傳說，是因爲光緒死之前，恨透了袁世凱當年的告密賣主，在他所住的瀛臺寢宮內，寫了很多「袁世凱著卽凌遲處死」之類的字條。及後載灃攝政，秉承隆裕旨意，欲爲光緒復仇，於是乃有此項舉動，只因張之洞的力勸阻，方纔從輕發落，僅將袁世凱放逐回里了事。這種說法，清末以來的野史中都有記載，且言之鑿鑿，一似確有其事者然。凌霄一士隨筆的作者徐一士論此，以爲不然。他說：

「光緒帝逝於腰昧，自身且不保，縱有殺袁之遺命，誰且聽之？袁之黜蓋不由是也。」

其說甚是。王照方家園雜詠紀事詩論隆裕之不忠於光緒，亦嘗以嬉笑怒罵之文字出之，曰：

「隆裕自甲午以前卽不禮皇上，雖年節亦無虛文，十五六年中從未改行。上崩之數日前，隆裕忽以侍疾之名來守寢宮，令瑾妃避去。上暴崩後，隆裕仍守床畔，頃刻不離，雖太后大漸亦不顧。直至奉移乾清宮大殮後，始離去。赴太后宮，太后已不能語，承嗣兼祧之事，問諸他人始知之。隆裕對光緒之惡感甚深，至於甘心執行慈禧之命，置光緒於死地，然則還要說她能爲光緒報

仇，豈不是太離奇了嗎？至於載灃，雖爲光緒之親弟，其人實庸懦無能，又且早受慈禧之收買，日頌慈禧之聖明。他本人既與光緒十分疏遠而全無兄弟之感情，自然也談不上爲光緒報仇的話。凡此云云，無非是揣測附會之談而已。比較正確的可能性，還應該從載灃與袁世凱二人的關係中去探尋。

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一，「岑袁氣燄」一條說：

「戊戌政變，袁世凱首發逆謀；庚子避兵，岑春煊沿途擁衛入關；由是皆有寵於太后。余觀二人舉動，亦各具恣睢叱咤之才，非盡恃寵也。張翼以小吏給事醇邸，不數年官至侍郎，駸駸大用。世凱參其私鬻開平礦產，解職，涉訟英廷二年，快快歸，遂一蹶不起。溥善以吏部侍郎兼左翼總兵，本近支宗親，兄弟子姪布朝列。奸人盜賣陵地，用左翼印押契，世凱復劾罷之，其鋒芒亦可畏矣。……」

張翼因盜賣開平礦產被袁世凱所劾罷，復以朝旨督責，迫其前往倫敦與英商開平礦務公司對質於英國法庭，由於盜賣有據，英國法庭判決英商開平礦務公司勝訴，袁世凱又再參張翼責令賠償，案懸多年不決，張翼因此而苦累不堪。由于張翼本是醇王府中的舊人，因此張翼乃挽請醇王載灃向袁世凱說項，求緩其事。這其間，張翼是否曾有獻賂於載灃，以求載灃出面爲之關說的可能，當然無法知道。不過，載灃確曾爲張翼請託袁世凱勿爲渦甚，則是事實。却不料袁世凱竟然拒絕載灃的請託，而且一直爲開平礦產之事追究到底，這一來，就使載灃十分難堪了。其後載灃

與袁世凱同入軍機，袁世凱復自恃慈禧之寵眷與奕劻之支持，視載灃爲少不更事，每不假以辭色，於是載灃對袁之蓄怨愈深。一旦慈禧病死，袁世凱失掉了靠山，而執掌國柄的監國攝政王就是與袁世凱素有不快的載灃，袁世凱如何還能安居朝中呢？袁世凱之被逐，還是一項重要原因。其另一項重要原因，則大概與當時的親貴爭權有關。

劉厚生撰張謇傳記，曾有一段話論及載灃罷斥袁世凱之事，說：

「我研究載灃的罷斥世凱，並非個人的主張，亦非倉猝所決定。他早與親密信任的皇族經過長時期的討論，而後有此行爲。一般人都知道，載灃是一個膽子很小，性情很懦而沒有主意的人。他之決然罷斥世凱，一定經過若干人之策動與鼓勵。據我推測，至少必有肅親王善耆，鎭國公載澤、貝勒載濤、載洵、毓朗五人在內。而他們罷斥世凱的目的，決非僅僅報復戊戌之怨，而是打算收回世凱的兵權歸滿人統轄。……」

劉厚生所舉的皇族親貴五人之中，善耆後爲民政部尚書，毓朗後爲軍諮大臣，載濤掌軍諮府，載洵掌海軍，載澤掌度支，都是宣統朝皇族中最爲顯赫有力的人物。其中載濤與載洵是載灃的親弟，載澤有隆裕太后爲其靠山，在五人中又爲實力最强者。看這五個人在排斥袁世凱之後有三人出掌兵權，可知劉厚生的分析不無道理。

袁世凱在清代末年以訓練新軍之法創建北洋新軍六鎭，其將校人事悉出自袁之拔擢安排，無形中已將六鎭新軍作爲袁的私人武力，環顧海內，更沒有相似的力量足以相抗衡。鐵良最初與袁

世凱同時練兵，受其提挈而陞至尚書。但因他說甚熾，深恐袁世凱以漢人而久握兵權，非滿清皇朝之福，所以在他漸得慈禧倚信之就以軍隊當歸陸軍部統轄爲名，迫使袁世凱將直轄，陸軍部統轄爲名，迫使袁世凱將袁世凱的小站舊部，其潛勢力依然不是藉改制之勢，亦更是深具種族思想的滿人排滿之權的說法，很有成立的可能。當然，其最後的目的，更在藉此而剷除袁世凱跋扈不臣之心願。

十九

由於以上這種種的因素，總而言之，袁世凱是被解除政權與兵權，逐歸故里，閉門養疴去了。政治人物難免會因政治環境變易而遭受難堪的打擊，袁世凱此時的遭遇，正是如此。不過，袁世凱此時不僅是失意而已，若非載灃、張之洞等人的庸懦畏葸，袁世凱此時，簡直有殺身之危。這只要看袁世凱遭斥之時，他的親信人物如楊士驤楊士琦的反應態度，即可知其一斑。胡思敬國聞備乘卷四，「三楊」一條說：

「楊士驤之兄士燮，使酒好罵，以御史出爲嘉興知府，後升浙江巡撫道。弟曰士琦，工筆札，詭譎多智，由載振引謁奕劻，遂充慶府謀主。三楊惟士驤才最庸，官位最高，博蒲六博彈唱狎遊賭酒無所不好，不擇地而入，亦不擇人而交。袁世凱既內用，虧公帑過多，賚保士驤繼北洋任，與之約，有過相護，有急難相援。士驤奉命唯謹，雖例行小事必請命而行。及世凱解職，微服至天津，招士驤密語，士驤匿不敢見。外議洶洶，皆云監國痛惡袁黨，楊氏兄弟且敗。士驤大懼，益縱酒近女色，百事盡弛。一夕，宴客於庭，酒半，命客操絃，引吭高聲大唱，曲未終，氣絕仆地，痰哽不能言，遂卒。如皋冒廣生有東閣詩一首，即紀其事。詩云：東閣宵深罷送迎，重燒巨燭擘銀箏。田荒下濮歸無計，鐵聚神州鑄已成。尚有綺羅憐少婦，自將游俠了生平。堂堂開府千秋事，唱到回簧是尾聲。」

這所說的，是楊士驤，另一段則記楊士琦。同書卷三，「北洋捷徑」一條說：

「世凱已酉罷職，星夜奔天津，士驤匿不見。其子克定撰一疏，求士琦代奏，士琦有難色：……」

楊士驤楊士琦是袁世凱的親信死黨，親信死黨在此時的反應如此，可以想見袁世凱此時處境之危。只是載灃畢竟是願慮太多而決斷太少的無能之人，張之洞自己，更怕這些少年親貴的行事太辣而「行將及我」，所以在載灃面前竭力爲袁緩頰，於是，袁世凱得以安然回到洹上村去「養晦待時」了。此時的袁世凱，其心情及行事如何？可以抄一段「袁世凱軼事」中的記事：

「袁自歸田後，與朝貴往來不絕，而慶親王尤其所媚事者也。時王爲軍機大臣首領，朝廷事無大小必咨之而後行。厲思爲袁言於攝政王知袁一出，必不利於皇室，隆裕太后尤惡之，故袁伏處河南彰德三年餘，絕無出山之望。而其雄心不死，常卑辭厚幣以結老慶，又令徐世昌蔭昌等爲之疏通。遇有達官貴人往來於京漢鐵道者，袁必令其長子克定至車站迎送，故官僚派中人多譽之。……」

袁克文撰「洹上私乘」，說袁世凱在斥歸之後，在洹上築養壽園，「種花移木，築石誅茅，觴詠其間，輒忘歲月」，由上文看來，所說顯然不是事實。洹上私乘書後附有袁世凱此時與沈祖憲、凌福彭、閔爾昌等人所作的「圭塘唱和詩」，時作躬意漁樵，忘情物我之想。但柴夢梵天廬叢錄中却收有一首譏諷他的詩，對比而讀，亦殊有趣。袁詩云：

「乍賦歸來句，半畝闢荒園。雕倦青雲路，魚浮綠水源。漳洹猶覺淺，何處向江村。」

又一首云：

「曾來此地作勞人，滿目林泉氣象新。墻外太行橫若障，門前洹水喜爲鄰。風塵萬里蒼茫繞，波浪千層激盪頻。寄語長安諸舊侶，素衣早浣帝京塵。」

集中諸作，大都類此口吻。梵天廬叢錄所收詩，卽是和答袁詩之第一首，仍用原韻，詩云：

「漁父本非忘世客，幾時錯入武陵源？卅年未醒夢中夢，萬里猶留園外園。百戰山河雄主去

，一簑煙雨釣舟存。花開花落春如故，莫問當年舊水村。」

此詩不知爲何人所作，詩中意旨，不但語涉譏諷，而且寓有警告之意，足以想見當時人實在很少相信袁世凱眞能甘心以林泉歸老。所以，袁的詩中雖然竭力描摹掩飾，聰明人却決不相信。袁世凱本是一個功名事業之心極重，而權力慾望極强之人，他在被斥放歸之後，不得已而故作淡漠之狀，以示與世無爭，這本來也是一般政治人物之常態。說穿了，這些詩也只是如此而已。眞實的情形是，袁世凱此時雖然退隱彰德洹上，在京中仍有他的許多耳目，例如在光緒宣統之間一直擔任民政部右侍郎的趙秉鈞，在宣統元年閏二月雖因袁黨身份而被迫休致，但此人長於情報與組織，經由他一手建立並訓練而成的警察系統，仍有他的勢力，運用此一勢力，便可充分刺探重要軍政人物的動態，以供袁世凱的瞭解研究。而袁世凱雖罷，他的另一個替身人物徐世昌却於宣統二年七月再入軍機，在朝中充任他的耳目，於載灃及親貴人物的一舉一動，觀察得更爲明白清楚。凡此，對于袁世凱的將來出處，自然可有充份籌畫計議的機會。何況北洋新軍係由袁世凱一手訓練而成，軍人的思想比較單純，他們平素視袁世凱爲首領，即使袁世凱政壇失意，他們也不會像楊士驤兄弟那樣現實得但求自保身家，毫不顧及昔日的「故主」之情。袁世凱有這些政治本錢，也儘可以在洹上假作忘情世事，養晦待事，觀釁而動。何況攝政王載灃和那班少年親貴們識見寡陋，輕躁無謀，凡所舉措，在有意無意之間往往爲袁世凱製造再次出山的機會。如宣統二年二月之罷免鐵良，以蔭昌代爲陸軍大臣一事，即是。

清代末年的滿人，才識明敏而思想開通的極少。鐵良不但是這少數幾個開明人物之一，而且曾留學德國，諳習軍事學識，在排除袁世凱之後，很可以作爲繼統北洋新軍的首領。但是當時出任軍諮大臣的載濤，却以爲鐵良的氣度褊狹，不能容人，由他來擔任陸軍大臣，很可能因排斥袁系人物過力之故，反而促成北洋新軍中袁世凱勢力之團結，實爲無益有害之事。所以，照載濤的想法，要使軍權集中於政府之手，必須採取雙管齊下的辦法，即一方面懷柔北洋新軍中的袁系人物，使他們能够聽命中央，另一方面則多方延攬外國留學生回國，大事擴建新軍，使北洋軍不致惟一的軍事勢力。基於此一考慮因素，所以載濤不但在各省成立督練公所訓練新軍，也成爲把鐵良從陸軍大臣的寶座上換下來，另外叫親袁的蔭昌去擔任。在他的想法，蔭昌與北洋新軍的關係比較好，稍假時日，當可收北洋的軍力爲己用，到了那時，袁世凱就沒有翻身的機會了。殊不知道，這一計劃的立意雖好，其奈蔭昌非其人選何？

蔭昌是清末的留德軍事學生，與鐵良同爲滿人。只是鐵良富有種族思想，念念不忘於排漢强滿，而蔭昌似乎沒有。清亡之後，袁世凱先作總統，繼爲皇帝，背叛民國，成爲國家民族的罪人。而蔭昌則因本爲袁系人物之故，雖然因身爲滿人而理應效忠清朝皇帝，却在洪憲朝廷中做起高官顯要來了。劉禺生所撰的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有一段關于蔭昌在洪憲朝廷中的描寫，說：

「帝制議起，項城在西苑成立警衛團，自爲團長，副官營運長皆以中少將領之，爲帝國軍隊模範先聲。初，項城尚著戎服，黎元洪則終日全身披掛。自警衛團組成，項城每週著大元帥服親

臨訓練。一日，蒞該團行大閱兵禮，將校士卒，均著軍禮服。校閱禮成，護送大元帥回居仁堂，行全團照像典儀。項城升帳，高踞寶座……座側鵠立大禮官蔭昌，雉冠白羽，紅甲金緞，其威嚴猶兵部尚書時奉兩宮閱南苑火器營內操大典也。……」

這一段話的後面幾句，把蔭昌描寫得實在太不堪了些，但也十足寫出了蔭昌之貪戀權勢利祿而不識廉恥爲何物的實際情形。蔭昌的品德如此，其人之貪生怕死而臨難苟免的情形又可想而知。何況他本人實在並無駕馭北洋新軍之能力。於是，當武昌革命事起，攝政王載灃命蔭昌率新軍二鎮南下「討伐」，而蔭昌却無法完成使命時，袁世凱的出山機會就到了。白蕉撰袁世凱竊國記，對此事有一段頗爲簡明扼要的敍述，說：

「八月二十一日，清廷命陸軍大臣蔭昌督師南下，袁暗中發了一聲冷笑。不久，馮國璋過彰德請訓，袁授以『慢慢走，等等看』六字要訣，蔭乃深感尾大不掉之苦，遲遲不敢出發。慶親王乘機入奏，請起用袁世凱會同蔭昌調遣各軍，清廷乃於二十三日授爲湖廣總督。袁說：『要我幹呢，難肩重任』却之。慶親王叫徐世昌於二十九日微服到彰德探詢袁的意思，袁說：『不成不成。我未嘗不可；要我幹得好，須聽我的。』徐跑回北京，假裝一副不樂意的表情說：『他們叫蔭督師快赴前線吧，沒有他不見得不能打仗。』他把袁的條件說出，要總攬兵權，要召開國會，要組織責任內閣，要寬容革命黨及武漢起事人物。袁的用意是：利用革命黨對付清朝，再留着清朝對付革命黨，造成『洹上釣徒』的第三者地位，清朝一天不答應，我就一天不出山。徐的

用意是，叫蔭昌到前線碰碰釘子，不愁清朝不乖乖繳入袁的天門陣。清廷已採取懷柔政策，但是袁的條件太苛，乃促蔭昌出馬一試。自八月下旬至九月初，蔭的號令不行，在孝感急的滿頭大汗，同時南方各省紛紛獨立，清廷慌了手脚，不得不接受袁的一劑苦藥，於九月初六日解除蔭昌督師總統，第二軍交段祺瑞總統，命袁以欽差大臣節制水陸各軍。……。」

上面所記的日期，都是陰曆。按，武昌新軍起義，在陽曆十月十日，陰曆則爲八月十九日。自革命事起至袁世凱受命爲欽差大臣，中間整整相隔十八天，亦就是蔭昌以陸軍大臣督率北洋新軍二鎭南下討伐而號令不行，停滯不進的時候。由于蔭昌之號令不行，南下的北洋軍頓兵不進，武漢方面的革命軍得到了充份的準備，而且各省紛紛響應，以致原本單純的情勢因此而變得十分複雜，攝政王載灃束手無策，自然只好接受袁世凱所提出的條件。所以，袁世凱在此時由湖廣總督一變而爲欽差大臣督師，就是迫使攝政王載灃實行報復的初步勝利。再下來的，就是迫使攝政王載灃以藩王身份歸邸，國政歸由他以責任內閣總理身份行使的事了。其實行的步驟與其中秘辛，則可以從陳夔龍夢蕉亭雜記所述見之。

「辛亥八月武昌發難，總督出走，余適在病中。警報傳來，以鄂係舊治，深悉彼中情勢，密電樞垣，謂川督岑君春煊帶隊入蜀，計時已在鄂中，請旨褫鄂督職，以岑調補，責令收復省會。鄂垣兵變，僅一小部份，速電飭帶兵統領督率南湖一帶各軍，並漢口駐紮軍隊力圖規復。陸軍第二鎭第一協全部現駐保陽，即時下動員令，京漢快車兩日一夜可達漢口，直逼武昌，以壯岑軍聲

勢。彼係烏合之衆，人心未定，收復不難。而樞府不報也，但責令陸軍部編一混成鎭，有此軍步隊參以彼鎭馬隊者，有彼營輜重參以此營馬匹者，混沌雜糅，故緩師期，卒致兵與兵不相習，將與將不相識。遲之又久，始報啓程。迨抵漢口時，鄂中叛黨佈置完備，羽翼已成，公然誓師抗順，大局不可問矣。項城賦閑已久，乘機思動，其門生故舊偏於京師等處，不恤捐集鉅款，輸之親貴，圖謀再起。監國惑之，未能一意堅持。項城一出，而淸社遂屋矣。當其奉命督師也，徘徊於豫楚之間，不能直入鄂境，卒以貪緣組閣，逗留京師，大權獨握，修前日之怨，力排監國去之，政由己出，東朝但司用璽而已。……」

這一段話，對於當時的「責任內閣」總理奕劻及協理大臣徐世昌二人甚有貶詞。果如所說，則當武昌革命事起時，奕劻與徐世昌之應付失當，誠然有故意爲袁世凱製造機會之嫌。至于下一段文字中所暴露的袁世凱與英國公使朱爾典互相勾結，藉革命軍之聲勢自重身價，逼令載灃退位歸藩，尤爲一般官書所不載，續爲引述如下。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

「當項城之由鄂北上也，行使內閣權力，前方軍事責成馮國璋督辦。馮軍先佔據漢陽赫山，拊龜山之背，漢城收復，指日間事。項城京寓電話處學生與津署電話學生本係素識，私電傳來，余喜甚，以正式電話詢之項城。詎復電云：『未得鄂中確息』。其志不在恢復，可爲駭異。遲之又久，始悉漢陽業已克復，余急電馮，請其率得勝之軍直搗武昌。馮覆電謂，漢口江岸缺少船隻

，不能逕達省城，且奉京電，已有英國公使出任調和，北軍暫在漢陽駐紮，不得越雷池一步。余聞之憤甚，急電項城，略云：『所謂調和者，兩方居同等地位，始各有開議資格。現今革黨皆我臣民，作亂犯上，自取屠戮之戚。我軍已得漢陽，與武昌僅一江之隔，黨人已聞風喪膽，漢江沿岸，船隻何止千艘，頃刻即可飛渡。武昌若復，中外人心大定，沿江下游各行省亦得所屏蔽，不至望風而靡。即爲應酬調人起見，何妨俟武昌收復後再行開議，聲勢既壯，折衝尊俎，尤易爲功。』項城無從置喙，但云：『既經英使調處，不宜徑行用兵。』事機一失，連江若贛若皖若蘇若寧若滬紛紛獨立，遂致不可收拾。又以監國臨朝，不便爲所欲爲，賄通貴戚脅迫東朝勒令攝政王退位。以余現任北洋，凡事作梗，密遣使以甘言相餌，謂余坐鎮津地，於各省獨立之會，獨能捍衛疆土，最著勤勞，行將有宮銜黃褂之錫。但大勢羣趨共和，一方豈能立異？與余交誼最敦，近因政見稍歧，各行其是，不能相强。所慮津沽一帶黨人密佈，手槍炸彈，防不勝防，竊代爲憂之。余謂與項城比肩事主，現值國家多難之秋，正我輩竭忠受命之日。內閣關係全國，項城任之，北洋領袖各行省，余任之。項城謂與余政見不同，誠爲知言，余始終惟知有國家，期不負三朝恩遇而已。項城雖日以暗殺爲能，偵騎密布，卒亦無如余何也。」

廿

當時的陳夔龍，乃是清朝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駐節天津。他雖然也是奕劻的黨羽，但還

抱着「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的老觀念，覺得袁世凱不應該以滿清臣子而挾革命黨人以自重，所以對袁不免有所責難與期望。殊不知道，此時的袁世凱了。光緒卅四年時，袁世凱雖有專權跋扈之迹，究竟尚無不臣之心，而此時則已顯然有此傾向，其中原因，凌霄一士隨筆中曾有記述，說：

「嘗聞人言，袁氏入都組閣，日使某氏與袁有舊，首請見，密詢意志。袁盛指天日爲誓。某氏辭出，遂以達之於其政府之死靡他，忠誠溢於言表。某氏曰：『信乎？』袁氏曰：『信，與袁交最深，比來見，但敍契闊，初不及他。且云：『憶曩者政府以三寸紙逐公出，吾以爲從此不獲相見矣，不圖今更相晤於此也！』袁爲之變色，自是以計覆清。而日使某則恚袁見欺，交誼遂絕。民國成立後，袁猶數與通書，竟置不答云。斯亦足備治舊聞者之參考。（原注：袁之入都，對往晤者均自矢忠誠，義形於色，故說者或謂，初意猶非必欲覆清云。）」

袁世凱在與革命黨的和談中，以促成清室之退位爲條件，交換革命黨人之推袁爲大總統。在與對清廷交涉時，又挾革命黨之聲勢爲威脅利誘之資本。終於他在兩面取巧的情勢下，使滿清皇室與革命黨雙方面都覺得袁世凱是有功之人，於是他乃由清朝的內閣總理大臣，一變而爲民國政府的大總統。由上引凌霄一士隨筆的記事看，似乎袁世凱之決定要利用革命情勢爲自己謀取政治利益，便是由朱爾典的這番挑撥性談話所促成，揆之事實，似乎又不盡然。劉厚生撰張謇傳記，曾經說到張謇在宣統三年五月由江蘇轉道漢口，乘京漢鐵路火車前往北京時，曾順道前往彰德訪

袁，他在當時與袁世凱所作的談話，就對辛亥革命以後的袁世凱，發生了極大的啓發作用。這一段記事極爲重要，關心袁世凱歷史者不可不知。下文摘敍張謇傳記中有關此事的記述，以便與其他資料互相研究比較。

張謇傳記中說，光緒末年，張謇已被選爲江蘇省諮議局的議長，不但在地方上極負重望，尤其是各省諮議局視爲泰山北斗般的人物。江蘇諮議局中另有雷奮、楊廷棟二人，皆是留日學生中主張實行憲政政治的優秀份子，與張謇的交誼亦極爲深厚。當時的各省議會，覺得清政府空言立憲，毫無誠意，自宣統二年起，數度向清廷請願，要求速開國會，實行憲政，措詞甚爲激烈。清政府一方面斥爲「危詞聳聽，居心叵測」，一方面實行徒具形式的新內閣，以換湯不換藥的把戲欺騙輿論，敷衍了事。這就是宣統三年四月所成立的奕劻內閣，其中成員，皇族親貴多至五人，以致人民普遍失望。直隸諮議局於這年六月呈請都察院代奏，謂皇族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公例，要求另行組織，以重憲政，而固國本，尤足代表各省諮議局之公意。在此之前，有某省諮議局派代表二人至南通訪晤張謇，要求張謇親至北京一行，藉以觀察實際政治情況，交換意見，以決定各省諮議局對國是應取之態度。張謇同意了此一邀請，又約同雷奮、孟森、劉厚生等一同北上。由於劉厚生的建議，他們的北上行程取道漢口轉京漢鐵路，中間經過彰德，因此而有宣統三年五月下旬張謇袁世凱之會。此時的袁世凱，尚蟄居彰德，而距辛亥革命之發生亦尚有三月之久。

劉厚生主張張謇此次北上時，應順道往彰德訪晤袁世凱，雷奮亦絕對贊同，這是基於什麼理

由呢？據劉厚生所說，當時他和雷奮都深深的感到，大將妥傾覆。假如愛好和平的各省諮議局議員大家都不肯出頭管事，勢將造成天下大亂，人民塗炭，屆時的局面必定不可收拾。爲了預先顧慮此一可能情勢的發生，因此他們認爲一個可以出當大任的政治人物，由全國民意機構給予充份的支持，要求他善用此一力量向滿清政府爭取憲政之實現，庶可避免國家之陷於混亂，其於社會元氣之保存，功勞不小。張謇接受了劉厚生和雷奮的意見，當五月十四日下午七時車抵彰德時，袁世凱派了副官和輛子在車站迎接，直到翌日凌晨三時方纔回到車中。就因爲張謇和袁世凱曾有這一番晤談，使得袁世凱深深瞭解，假使他以實行共和，推翻滿清爲目的，必可得到各省議會的普遍支持。下面抄錄張謇傳記中的原來文字，以見袁世凱此時的態度及後來反應如何。

張謇傳記第三章第五節：

「讀我此傳記的人，或者會疑心，張謇不過是一個書生，並沒有多大勢力，而當時諮議局的議員，確是各省社會的優秀份子，確能有領導當時一般社會的能力，而張謇的聲望又足以領導各省諮議局。世凱雖身居彰德，其蓄養的政客甚多，豈有不知近情。至於袁世凱呢，自身有一手訓練的精兵十餘萬人，世凱雖在彰德，仍有猛虎在山之勢，亦爲張謇所十分明瞭。當謇初晤世凱時，世凱對謇的來意不明，談吐之間，一味閃避。後來完全

不由得不把自己的意見略略吐露，說：『有朝一天，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也就是說，遵從您的意志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須在各方面把我的誠意告訴他們，並要求您同我合作。』……」

這一番話在表面上看不出十分明顯的意義，那當然是因爲雙方面都爲自己的身份和立場所拘束，不敢有公然「叛逆」的言論之故。事實上則袁世凱在那時已明白了張謇所帶給他的民意支持，欣然表示接受。在張謇，或者以爲袁世凱已經被他說服，願意爲國家和社會貢獻他的力量了；殊不知道此時的袁世凱，心中所想的並不與張謇一樣。所以張謇所帶去的民意支持，後來恰好被他利用來挾制清廷的政治資本，所以大總統，有了這一保證，然後他又可以用各種手段去脅迫清室退位，以獲得他自己的政治利益。如此說來，他在接見日本公使時所表示的「力言報國，之死靡他」，完全祇是他的做作，惟有英國公使朱爾典的話，恰恰刺中他的隱痛，所以不自覺地流露出他的切齒痛恨。若要說到他的立志覆清，便是因此事而決定，顯然不能完全符合事實。

以上所述，是袁世凱在辛亥革命發生前後，他的政治立場與態度。至於他如何利用雙方的關係以達到他之政治目的，亦可以張謇傳記中的敍述來代作說明。張傳上述文字之後，續云：

「由於世凱基於個人陰謀出發，所以對於張謇所允許之諾言，倒是表現得絲毫沒有反悔。一，他把漢口漢陽攻破之後，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沒有這樣做。二，當張勳在南京受攻

時，他若派清江、徐州的軍隊兩路過江援救張勳，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也沒有這樣做。三，派唐紹儀到南方議和時，他很秘密的叮囑紹儀，到上海後，必須想法先與張謇見面，你得告張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見行事。唐紹儀先到漢口與黎元洪晤談一次，不得要領，遂到上海，另派蔡廷幹在漢口與元洪接洽。紹儀到上海時，首先訪問趙鳳昌，要求鳳昌密約張謇在鳳昌宅中見面。紹儀先述世凱誠意，但已吐露南方須舉世凱爲總統之要求。後來黃興與中山先生先後到滬，亦即在鳳昌宅中會談，甚至革命軍方面全權代表伍廷芳亦每晚到趙宅晤面。至於雙方代表之公開會議，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

以上文所說與前引陳夔龍夢蕉亭雜記相互對照，當可知道，袁世凱之所以按兵不動，正是因爲他與張謇及革命軍方面都有了默契之故。在這種情形之下，袁世凱挾持了他的北洋軍作爲實力後盾，以與革命軍討價還價，又以革命軍的聲勢向清廷多方要脅，自然可以予取予求，變清朝內閣總理爲民國之總統。民國肇建，人稱袁世凱亦是大功臣，說穿了，祇不過是他一貫的欺詐手法之運用而已。

廿一

袁世凱的一生，慣以權謀欺詐之術爲自己升官發財之用。試看他由朝鮮發迹以至民國總統，凡是他所經歷的大小事情，無不藉此手法以達到其結交權貴、欺世惑人之目的，結果乃使他的政

治事業日見飛黃騰達，不但在最後由總統而變爲皇帝，並且以一身而爲北洋系人物的首領，影響民國政治者達十餘年之久。這樣一個重要人物，在近代史以至現代史上的關鍵性影響，當然很大。只是，敍述袁世凱在民國以前的歷史，即使極力以簡潔的方式敍述，亦已長達七萬餘字，看起來仍不免使人覺得累贅。因此之故，我想再在文末抄錄一通梁鼎芬參劾袁世凱的奏疏，以作爲本文的綱要式說明。因爲梁鼎芬之目的雖在參劾袁世凱，其奏疏內容却無異是袁世凱的生平簡介。奕劻的養廉銀每月三萬兩，以便奕劻可以屏絕苞苴，專心政務。至於劾袁之奏，則語極鯁直，云云：

「直隸總督袁世凱，少不讀書，專好馳馬試劍，雄才大志，瞻矚不凡。以浙江溫處道鑽營得驟升侍郎巡撫。撫山東日，能辦事，安奠境內，有聲於時。我皇太后皇上回鑾，迎駕有功，擢至今職。其人權謀譎彙，城府阻深，能諂人，又能用人，卒皆爲其所賣。初投拜榮祿門下，榮祿歿後，慶親王奕劻在政府，三謁不得見，甚恐。得楊士驤引薦，或云，以重金數萬，又投拜奕劻門下，不知果有此事否？然自見奕劻後，交情日密，言無不從，袁世凱之權力，遂爲我朝二百餘年滿漢疆臣所未有。奕劻本老實無能之人，當用途浩繁之日，袁世凱遂利用之。老實無能則侮之以智術，日用浩繁則濟之以金錢，於是前任山東學政榮慶，北洋練兵委員徐世昌，袁世凱皆以私交薦爲軍機大臣矣。樞府要密，出自特簡，而袁世凱言之，奕劻行之。貪庸謬劣，衣冠敗類之周馥

，袁世凱之兒女姻親也；奢侈無度，聲名至劣之唐紹儀，市井小人，膽大無恥之楊士琦，卑下昏聵之吳重熹，亦皆袁世凱之私交也；使之爲總督，爲巡撫，爲侍郎，而袁世凱言無不從，尤可駭者，徐世昌無資望，無功績，忽爲東三省總督，其權大於各省總督數倍；袁世凱自握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重兵權財權，又使其黨在署吉林巡撫；皆袁世凱爲之也。縣耳，不數年，直隸而奉天，而吉林，皆袁世凱奉天，吉林皆有，皇太后皇上試思，自兵力所可到之地，能不寒心乎？款數百萬兩，鐵路餘款數百萬兩，供其揮霍，故幸段芝貴不到黑龍江耳！袁世凱揮金如土，交結朝官過客與出洋學生，有直隸賑如漢末曹操，一人稱之。臣嘗讀史，見漢晉已，人人稱之，當其北伐時，亦有大功於天下，不知篡晉者裕也。前者微臣來京賜對之時，親聞皇太后皇上屢稱資治通鑑，其書甚好，時時閱看。今此兩朝事，往往流涕。治亂興亡之故，粲然具陳，開卷可得也。袁世凱之雄，不及操裕，而就今日疆臣而論，其辦事才，恐無有出其上者。如此之人，乃令狼抗朝列，虎步京師，臣實憂之。且聞其黨羽頗衆，時有探訪，故無有敢聲言其罪者。今新內閣將成，時日無多，安危在目，臣不敢自愛其性命，無所畏懼，謹披瀝密陳。」

梁鼎芬在清亡以後過着標準的遺老生活，不做民國之官，惓惓不忘故主，雖如袁世凱之先則計騙滿清孤兒寡婦之手，繼則背叛民國，節則頗有可稱。帝制自爲，固不足論；即以清朝大官而後來又爲洪憲朝廷的從龍之臣相比，梁鼎芬的操守高尚多了。他奏劾袁世

凱的此疏，在現在看來，宛如在爲袁世凱的前半生事蹟作一總評，而預見其將來必有不臣之心，在當時不啻是燭見機先，睿謀敢言。只是當時的慈禧太后似已老朽糊塗，對于如此直率的讜論危言，竟然若罔聽聞，那就難怪慶、袁勢力之籠罩一世了。

袁世凱做了民國總統以後的事蹟，已屬於民國史的範圍，本文因爲限於全書之體例，不再深談。謹下來所應予補述的，乃是奕劻方面的未完事蹟。

辛亥革命發生以後，攝政王載灃爲了預防袁世凱對他的報復，本來不敢再起用袁世凱；只因奕劻的一力舉薦，並保證袁世凱忠誠不二，這纔使載灃和隆裕解除戒心。却不料袁世凱掌握政權以後的舉措，完全與奕劻的保證背道而馳。於是，奕劻在皇族中被視爲出賣祖宗，自親貴以至宗室，無人不加詬罵。於是，奕劻趕緊到天津去買屋避居，以免日夕與皇族中人相見。由于他的宦囊甚豐，積貲千萬，因此一直可以在天津租界中過着富貴自如的寓公生活，與滿清皇室的休戚，互不相關。民國六年病死，遜帝宣統賜謚曰「密」。按謚法，「追補前過曰密」，於其人之功績無可稱，所以「密」字實在是謚法中的「下謚」，不但毫無褒美之意，而且只比惡謚稍勝而已。

以奕劻一生貪庸瑣鄙的事蹟而言，不蒙惡謚，還算是宣統不念舊惡，皇恩浩蕩哩！至於他那個寶貝兒子載振，則因奕劻生前曾得「世襲罔替」的親王之封的緣故，宣統小朝廷在奕劻死後，也封了他一個「慶親王」。只是，這已是民國時所封的清朝爵位，雖好聽却無尊榮可言。奕劻的遺產雖多，由于載振之浪費無度，及其子溥鍾溥銳之不善經營，在費行簡撰寫近代名人小傳時，就據

說「其貲已罄盡」太沒有意義了麼？悖入之財，類多悖出；奕劻一生貪財務得，其結果如斯，說起來豈不是也

瞿鴻禨與岑春煊

一

在沒有進入本題之前，筆者需要引敍康有爲題在瞿鴻禨遺像上的三首詩，以作爲本文的緣起。詩云：

「清癯風骨過來人，巖電光芒爛有神。風度樓前頻仰望，長沙如見曲江春。」

「十年黃閣事艱關，去佞之難過拔山。若使劾袁功得就，豈看龍刼血斑斑。」

「三犯龍鱗敢擧仇，愛才愛國有深憂。頻陪綠野鬚眉古，遺像清高憾未酬。」

康有爲題這幾首詩的時候，是民國九年的二月，那時清朝早已亡了，袁世凱的洪憲帝制也已成爲歷史名詞。由於袁世凱的狼子野心，不但使清朝因此而傾覆，即是新建立的中華民國亦大受其害。撫今思昔，不由得使康有爲在看到瞿鴻禨的遺像時，回想起他當年與岑春煊聯合起來希望扳到慶、袁的那一段往事。「若使劾袁功得就」，滿清政權之覆亡與否固然是另一回事，至少，袁世凱因帝制自爲而致爲禍民國的那許多罪惡，就不大可能在民國史上搬演了。由于瞿鴻禨當年

曾與岑春煊有過這一番計劃遠大的政治活動，以，雖然他們當時並不是政壇上的第一號重要人物，他們的事蹟，仍然值得提出一說。又因爲瞿、岑二人此時是聯合在一起對抗慶、袁的戰友，所以即使他二人的出身、仕履、思想、事功都迥然不同，也還是需要把他們放在一起來寫，以免重複敍述之弊。至於康有爲的第一首詩中所描寫的瞿鴻禨容貌，讀者仍可從書前所附的相片中見其形狀。第三首中提到瞿鴻禨在秉政以後，曾三次向慈禧太后保薦康有爲，後來更是造成瞿鴻禨政爭失敗的重要因素。康有爲雖然在這件事上對瞿深致欽佩，我們在談到瞿鴻禨倒袁失敗的往事時，對此更應特別注意。

說過了開場的簡史，藉以說明他的家世、出身、仕蹟、以及進入政治中樞的大致情形。

瞿鴻禨，字子玖，號止盦，湖南善化人。說得具體一點，瞿鴻禨應該可以算是湖南長沙人。長沙是湖南的省會所在地，文風最盛。所以瞿家之選擇以「儒」爲業，冀求在讀書應舉中謀得顯親揚名的榮身之路，正是十分普通的事。不過，瞿鴻禨父親一輩的事——鴻禨之父元霖，曾中咸豐元年辛亥科舉人，雖然世世讀書，其發達還是在此以前的瞿家先世，一般的科舉功名，不過只是生員（秀才）而已。到了瞿鴻禨時，由于老父督責極嚴，居然在十七歲就進了府學，二十一歲中舉人，翌年，更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時爲清穆宗的同治十年辛未，少年詞林，在瞿家來說，自是十分光榮得意之

事，然而瞿鴻禨之所以能致此，正復不易。朱啓鈐撰「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中有關于這方面的記述，說：

「瞿氏先人之穆行，積德累仁，鬱而弗昌者，再世始光大於文愼之身，其來有自，而成之實艱也。魯青先生及兒叔季兩子登賢書，叔子春陔先生即文愼贈公，懷才卓厲，屢上春官不第，入貲爲刑部主事。值咸豐庚申淀園之變，百官星散，先生雖屬下僚，感憤不已，觸發肝炎，淹至失明，棄官歸田，一意以課子爲務。文愼甫當舞勺之年，徧課羣書，必以成誦爲程，小不當意，嚴譴隨之。常以天曉爲盥櫛伏案之候，既有目眚，往往誤以殘月爲曙光，家人憚，弗敢進言也。……」

文愼，是瞿鴻禨後來的諡號，魯青先生則是指的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之役。這一段話，說明文中所說的南陔先生；咸豐庚申淀園之變，則是瞿鴻禨的父親元霖在喪明之後，由於望子成名心切，督責極嚴，至以半夜之殘月爲黎明破曉，以致瞿鴻禨早年時的讀書異常辛苦。雖然後來功名得就，這種異乎尋常的勞瘁，畢竟是難以忍受的。

瞿鴻禨在同治十年中二甲進士，庶吉士教習期滿後，散館考試及格，照例授職爲翰林院編修。光緒元年大考翰詹，瞿鴻禨考列一等第二名，超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這年，適逢清德宗的登極恩科，派充河南鄉試的正考官。翌年，更授爲河南學政。光緒五年，鴻禨之母

殷太夫人病故，循例丁憂。光緒七年服闋入都，仍補翰林院侍講學士。至第二年，父元霖亦卒，於是瞿鴻禨又丁父憂，直到光緒十年服滿起復，方綾回京供職，仍補原官。光緒十一年五月，奉派爲浙江學政。自此以後，到光緒二十六年，瞿鴻禨曾一充福建鄉試正考官，一任浙江學政，再任江蘇學政，他的官職，亦由四品的侍講學士漸陞至二品的禮部右侍郎。

清代的翰林，以點考差及派學政爲最好的官職，一則宦囊豐盈，二則不碍陞轉。陳三立撰瞿鴻禨墓誌銘，說他在二十餘年之間，「奉使按試，及五行省，所至以研經籍，通時務，課士得才爲盛。而黜供張，絕請謁，嚴止胥役索擾，尤以清德孤操稱天下。」由於他的清德卓著而學識優良，漸漸地使他具備公輔之望。光緒二十六年拳亂事起，兩宮西狩，隨扈的軍機大臣載漪、剛毅、啓秀、趙舒翹四人因袒拳助亂的罪名同時被罷黜，在軍機當值的只剩下榮祿和王文韶，樞務需人，因此瞿鴻禨遂因榮祿的推薦，由禮部右侍郎陞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改工部尚書，命之前往陝西行在供職。二十七年正月至西安，即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正式入參樞務。這一年，瞿鴻禨五十二歲。

自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到光緒二十九年三月，當國的領軍機大臣是榮祿。榮祿對於筆墨文翰並不擅長，所以，在軍機中實際擔任承旨撰勅的樞臣，是瞿鴻禨。其後雖然換了慶王奕劻「領軍機大臣又多了庇傳霖與榮慶二人，但由於瞿鴻禨出身翰林，文筆甚好，慈禧太后又對他信任有加，所以瞿鴻禨也仍是軍機中的秉筆。此外則因瞿鴻禨以軍機大臣而兼任外務部尚書之故

，在日俄戰爭結束後主持對日交涉，爲中國爭回權利甚多，亦可以稱得上是識見明敏的人物。不過，這些都不足以構成他在清末政壇上成爲關鍵性人物，還是由是他在清末袁世凱的勢力炙手可熱之時，敢與岑春煊聯合起來與慶、袁二人爲敵，事雖不成，而其影響所及，却是清代末年的政局演變，具有關鍵性的重要因素。因此之故，在約略介紹瞿鴻禨的生平略歷之後，便要再來介紹岑春煊的出身與背景，以便對他們二人的後來行動作合併的敍述。

二

說到岑春煊，其人大有來歷。他雖然不像瞿鴻禨那樣地具有高尚的出身與清貴華要之仕履，但因他是「名父」之子的緣故，很早時便因他的鯁直有爲而嶄露頭角。所以他在早年雖有紈袴惡少之名，到後來却儼然是一個「社稷之臣」的重要人物模樣。與瞿鴻禨相比，瞿穩重而岑魯莽，瞿長於文學而岑嫻於軍旅，瞿文弱而岑勇猛，瞿工於籌畫而岑行事粗率，在性格與行爲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類型。若不是爲了排斥袁世凱的相同目的，這兩個人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成爲意氣相投的同志。這一層，說起來倒是很有趣的。

所謂「名父」之子，意指岑春煊曾有一個聲名烜赫的父親。岑春煊的父親名岑毓英，在同治、光緒之間是頗爲有名的人物，而岑春煊自己的表現也很不差，父子繼美，遂使岑家的聲名更爲

鼎盛。但若以岑春煊的事功與他父親相比，則岑春多似的。就這一方面而說，岑春煊的實際表現，似乎要比他的父親差一些。

岑家的祖先是浙江餘姚人，北宋時隨狄青平蠻土著。岑春煊的上代，本是上林峒長官司的土官，因此就成了廣西的流，上林峒長官司被取消，岑家成爲廣西西林縣的時統率鄉勇赴雲南助剿回匪叛亂有功，逐漸由縣丞赫赫武功。

滇回作亂，肇因於漢人對回族的歧視，其時間功臣是左宗棠，則與當時的西北回亂相配合。平定雲南回亂的功臣則是岑毓英。要軍隊的士氣昂揚，戰力強勁，亂事必有可平之日時雲南全境糜爛，巡撫潘鈐被殺，總督張凱嵩不敢故，沒有能力再支援雲南方面的軍事，所以亂事繼秀，至於在大理建號立國，儼然將雲南變爲化外。歷任的總督巡撫都因無兵無餉而無法平定亂事，最後調來的一個總督名叫劉嶽昭，他倚重統帶粵勇前來雲南打仗的岑毓英，以募練滇勇及附征穀釐的辦法解決了兵餉兩方面的困難，而岑毓英本人更十分勇悍善戰。這樣，終於使岑毓英能以雲南本省的人力和財力戡定亂事。自咸豐六年至同治十二年，岑毓英在雲南境內轉戰十八年之久

，他的官職，由縣丞歷陞至雲貴總督，其一生功業，都在此奠定其基礎。至光緒十子太傅，賜謚襄勤。毓英有子五人，岑春煊居第三。由於他早在光緒五年就曾捐官當差，到光緒十一年又考中舉人，奉旨以郎中在部候補，一旦岑毓英病故，諸子例故，所以，岑春煊居光緒十八年服闋回京之後，就奉旨補授爲光祿寺少卿，再遷太備了四品京堂的官職，頗曾得其父毓英之餘蔭代末年的捐官制度甚爲浮濫，捐貲候補的郎中、員岑春煊若非叨其父之餘蔭，要希望由捐官中獲得出授爲京堂的實缺官外、主事等官，充斥各部，數十，此後的陞遷，就很快了。

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不久，北洋岌岌可危。兩江總督劉坤一奉旨授爲欽差大臣，節軍機大臣李鴻藻以前方軍情瞬息萬變，僅恃文書奏報，苦難得其眞相，欲派岑春煊前寄耳目。岑春煊慷慨請行，在關外前線很吃了一些去布防，使山東半島未爲日軍所侵。這兩件事使岑春煊在當政大臣的心目中留下頗，以爲岑春煊雖然出身紈袴子弟，而遇事極有擔當，也很能負責，並沒有一般紈袴子弟的佻撻浮薄惡習。這對於他日後的仕途發展，無疑會有極好的影響。按，湯用彤所撰的「新說：「光緒中葉，京師有三惡少之稱。三惡少者，岑春煊、瑞澂、勞子喬也。」岑春煊早年被人

稱為惡少。至此乃能盡改往行，足證他的慧根甚深，所以纔不致沉迷不返。亦正因為他返正甚早，所以纔能很快地開拓他以後的事業。

中日戰爭結束以後，接着而來的是戊戌變法。岑春煊在光緒二十一年時因病奏請開缺回籍調養，至二十四年，因其弟蓉蓀中舉會試，由岑春煊陪同入京，循例至宮門遞摺請安，蒙德宗召見，垂詢時事。岑春煊在奏對時慷慨陳言，反覆申述國勢阽危，非發憤圖強不能圖存。而欲求自強，必先興學練兵，講求吏治，信賞必罰，乃克有濟。退出之後，又以所言未盡，復上疏條陳時政。謂賞罰者朝廷之大權，賞罰不明，無以作士氣而振紀綱。舉例言之，如湖南巡撫吳大澂奉命出關禦敵，喪師敗績而不能死國，朝廷又不加以嚴譴。山東巡撫李秉衡力抗德國政府之袒庇教士，祇因內無奧援，遂致罷斥不用。是非不明，賞罰失當，都是由於樞臣失職，蒙蔽聖聰之所致。奏語極為詆直，果敢之臣，以轉移政治風氣。所以舉朝不但未曾因此得罪，反被簡任為廣東布政使。陛辭時，皇帝更再三叮囑一須於到任後切實整頓吏治，肅清盜匪，如有其他意見，儘可隨時陳奏，不必顧忌觸怒總督，凡事俱可有我與爾作主云云。岑春煊以一個未曾銷假補缺的在籍京卿，遽膺特簡為二品的布政使，在當時還真可以說是異常的恩遇。據說，岑春煊之所以能得此異常恩命，乃是因為他在入京以後參加了康有為的保國會，被皇帝認為有新思想的緣故，是否如此，已不可知。這在他自撰的回憶錄中，也沒有蹤跡可查。

布政使俗稱「藩臺」，主管一省的財賦與民政，與俗稱「臬臺」而主管司法的按察使，本是一省中的最高長官。明代中葉以後，各省添設巡撫，藩臬二司變成了巡撫的屬員，而巡撫則成了一省的最高長官。到了清代，在巡撫之外又設總督，巡撫管一省而總督兼管二至三省，於是布政使的地位愈形低落。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維新，裁去眼前無用的官職，藩臬二司與總督同在一城的巡撫，廣東巡撫亦在被裁之列，所以在岑春煊奉派爲廣東布政使時，他的直轄長官，就是當時的兩廣總督譚鍾麟。此人籍隸湖南茶陵，翰林出身，在年青時頗有勤能之稱。只是他在出任總督之時年已老耄，子弟用事而頗通財賄，加以廣東素有膏腴之稱，譚鍾麟在廣州做總督，天高皇帝遠，更多了許多見不得人的事。清代末年，督撫權重，藩臬二司對巡撫猶且唯諾恭謹，更何況乎總督？所以譚鍾麟根本沒有把這個出身紈袴膏粱的岑春煊看在眼裏。却不料岑春煊自恃有皇帝爲其奧援，對譚鍾麟並無忌憚。一來，譚鍾麟與岑春煊此時正感激皇帝的異常恩遇，立志要在到任之後好好爲地方做一些有益的事。這樣有一段記述他在廣東與譚鍾麟相抗的情形說：

「一時廣東有道員王某，素爲譚督所信任，頗多不法，商民無不受其魚肉，有因索詐而斃命者，慴其氣燄，皆噤不敢言。余到後，始有來控者。廉得其實，即詳請撤去該員各項要差，嚴行查

辦。譚督不從。余乃先撤其補抽廠坐辦，翌日復邀集司道同寅，謁譚，請併撤其督署文案。議論抵觸，譚愧且怒，遽拍案詬詈，目鏡墮石棹立碎，勢張甚。余亦拍案曰：『藩司乃朝廷大員，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相容，奏參可也。』擲冠案上，總督不應無禮至此。既不即請病假。譚亦自絀，即令臬、運兩司來衙，遜辭謝過。會未幾，余奉召入都陛見，譚得電旨，立委臬司署理藩篆。余以漏夜備交代。南、番兩縣商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千人，各負薪米油鹽至藩署大堂，堵塞不聽行，更欲分隊至督署爲難。余亟出反覆勸導，至相對泣下，久之始漸散去。所留薪米之屬，爲付善堂，乃得輕裝馳去。譚督知余錄王某控詞全案以行，知入覲日必面陳其事，亟輦金入都，阻勿庸來京請訓』之諭，時余方行抵武漢也。遂自鄂入甘，到任後終以有旨查辦，譚因罷歸，王亦革職。此案以藩司劾罷督臣，爲有清僅見之事也。」

譚鍾麟之罷粵督，據凌霄一士隨筆所記，乃是因爲李鴻章在馬關議和回國後，各項實職盡被開去，只剩下一個文華殿大學士的空銜，失勢無聊，在都中又備受攻擊，亟欲謀一總督外放，故由榮祿爲之設計，藉口廣東革命黨屢次滋事，譚鍾麟無力控馭，所以易譚爲李，以資鎮懾。由此而言，則譚之罷督，主要原因實在由於榮祿之爲李鴻章安排出路，而岑譚相攻，恰好使人相信譚鍾麟官聲不佳，更有理由可以將他換下而已。岑春煊說，譚督之去全由於他的奏劾之力，未免誇大其辭。不過，岑春煊以一個藩司的身份而敢與總督相抗，亦足見他的不畏權勢，風骨崢稜。在

清末政風萎靡，上下習於容悅相安之時，他的這種作風，倒也眞可以廉頑立懦，振奮人心。岑春煊服官地方不久，便能有此表現，卽刻使他得到了骨鯁强直的清譽。岑春煊的一生，瑕瑜互見，但其强直與清廉則最可取。上文已說到他的强直，下文再說他的清廉。

章士釗撰「孤桐雜記」，中間有一段關於岑春煊居官清廉，不貪財貨的記述，說：

「唐韋宙除廣州節度使，陛辭，上爲言曰：『番禺珠翠之地，貪泉足戒。』粤人計岑好賂，自古已然。西林（按卽指岑春煊）言，粤人之賂，均明白致之，號曰『公禮』。與人計事，以不收公禮爲無誠意。彼開藩時，爲米案接商人稟詞，中夾票銀四十萬，駭而還之。繼詢知爲公禮，與平常行賄有別。商人以是大戚，以藩臺無意助己也。而西林卒右商，與總督譚鍾麟互劾之，彼得調往甘肅。米商遮之：不聽其行，自大堂以至東西轅門，皆爲米包嗔咽，林朝服出迎，長跪與衆商對話，稱朝命不可忤，重來有日，暫不必譟。商盡泣，知爲民任事者，尙有人也。未數年，西林果督粤。」

這段話雖由岑春煊的自述而來，但亦確有事實可證。高伯雨撰聽雨樓隨筆說，藩司調甘肅，商民遠送者極多，「萬民傘」更是多到數不清。有一個商人作詩讚頌岑之德政，云：

「仇在寅僚德在民，阮林蔣後此名臣。開藩粵東僅三月，咸道西陲第一人。嚴飭吏員疇有是，只看文告已無倫。使君安得今還我，著手渾生五嶺春。」

詩雖不文，作詩人竟以岑春煊與清代廣東督撫中最有名的阮元、林則徐、蔣益澧相比，誠可謂讚美之甚了。

由於岑春煊強直而清廉的兩項特長爲清末一般官吏所不及，所以他在得到慈禧太后的倚信後，不久便能聲譽鵲起，儼然成爲清末疆臣中之重寄。至於他後來何以能得慈禧之信任，則在於庚子拳亂時的護駕之功。樂齋漫筆記此云：

「在甘藩任半載，即有庚子拳匪之亂。八國聯兵，京師危急。余聞之，亟言於總督魏光燾，願率兵星夜勤王。魏意不欲余行，以餉絀兵單爲辭。余曰：『本司庫中，除正項外，尚存外銷款一百三十餘萬。請以三十萬供兵餉，調馬隊十營，即日可行。若總督故靳其事，本司有權自能出奏，從此辭矣。』即起立欲行。魏見狀，知不可阻，遽離座遮留曰：『且共商行計。』余曰：『事勢至此，豈容安坐細商？以甘省距京遼遠如此，馬隊盡力奔馳，尚恐不及，步隊更不必論。本司之意，現在倉卒召集，又須選擇精騎，萬一十營之數猶不能足，惟有先率在省馬隊三旗同行，一面請公迅調大兵，隨後遄往。』……遂守候魏督立發電奏。時所調兩旗尚未齊集，因留將領隨後開拔，先率衞隊數十人，自蘭州省城取道草地北行，晝夜疾馳，故得於二十八日卽抵都門。入覲之日，兩宮獎諭備至。……」

當光緒二十六年慈禧太后誤信載漪、剛毅等人之言，縱容拳匪，釀成八國聯軍的大禍時，慈禧雖曾降旨令各省派兵來京「勤王」，事實上並沒有那一省的總督巡撫遵旨派兵前來。岑春煊雖

然只是一名布政使，在這件事情上居然表現得如此忠心事主，慈禧太后當然要對他獎勉一番，以作他人之表率。但岑春煊所帶的馬隊總共不過「兩旗」，而且因爲取道沙漠邊緣的草地趲程前進，沿途無處可以補充給養，所以他事實上帶到北京來「勤王」的兵，不過只是他本人以及隨帶的衙隊數十人，其餘馬隊，尙在甘肅來京的路中。慈禧太后在問明此種情形之後，不免感覺到啼笑皆非。吳永所撰的庚子西狩叢談中提到此事，曾說：

「岑本在甘藩任內，聞聯軍入都，自請帶兵勤王。甘督知其人躁妄喜事，意不謂然，而以其名義正大，不便阻遏。因撥步兵三營，每營約四百餘人，合計不過二千餘人，並給以餉銀五萬兩。岑因先行就道，自草地經張家口馳騎入都。陛見時，太后問帶兵若干？以如數對。太后覺事近兒戲，意殊不懌。問兵在何處？曰尙在途中。因有詔令其辦理察哈爾防堵事宜，著折回張家口迎候來兵，即於該處駐紮，備俄人侵入。蓋聊以羈此安頓也。」

由這一段話，更可知道岑春煊的「勤王」，在最初時並未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視。他後來之所以能藉此得邀殊寵，被慈禧目爲患難中的救星，還是在慈禧出都以後的事。所以然之故，亦因爲他所帶部隊的來路，恰好就在慈禧逃出北京的路上，機緣湊泊，十分合適，所以纔能爲岑春煊帶來此後數年中的異常好運。

光緒二十六年的八國聯軍之役，北京爲聯軍所攻破，慈禧挈同光緒在城破之時倉皇出奔，情形甚爲狼狽。其大致情形，可以蕭一山清代通史中的概括敍述顯示其一斑。下面先抄錄清代通史

中的一段文字。

「二十日城破，禁軍皆潰。董福祥走出彰義門，縱兵大掠而西，輜重相屬於道。是日，百官無人入朝者。二十一日，天未明，慈禧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單袷從。至西華門外，乘騾車，從者載漪、溥儁、載勛、載瀾、剛毅等，妃主宮人，皆委之以去。暮至貫市，馬玉崑以兵千餘人從，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獻以麥豆，至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時天漸寒，求臥具不得，村婦以布被進，濯猶未乾也。岑春煊爲甘肅布政使，率兵來勤王，奉命往察哈爾防俄，至於昌平，入謁，太后對之泣。太后倉皇出走，驚悸殊甚，得春煊，心稍安。春煊勤護從，一夕宿破廟，春煊環刀立廟外徹夜。太后夢中忽驚呼，春煊則朗聲應曰：『臣春煊在此保駕。』春煊於危難之中竭誠扈從，以達西安，太后深感之，泣謂春煊曰：『若得復國，必無敢忘德也。』……」

慈禧一生中所感恩報德的人只有三個，一是後來官至四川總督而卒謚清惠的吳棠，因爲他當慈禧父死還京，窮困不堪之時，曾經專程前來弔唁，又致贈厚賻，故而慈禧終生感念，雖其人碌碌，仍舊要把他擢陞爲總督，且屢予美缺，以示報答。二是庚子西狩時途經懷來，懷來知縣吳永竭力辦差，使慈禧從此得脫困厄，因此感其忠悃，後來亦時時照拂，恩眷始終不衰。至于第三個，就是在西狩途中隨扈保駕的岑春煊了。與吳永相比，岑春煊在國家板蕩之時所表現的忠悃，並沒有什麼特別出色的地方，何以吳永在後來官不過四品的道臺，而岑春煊却歷任總督、尚書等要職，位躋一品，權重一時，遠非吳永之能及呢？這其間的差別存在，說穿了並不稀奇，無非是吳

永不善於把握機會，乘機建立他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地位，而岑春煊則長於此道而已。在君主專制時代，最接近統治人物的人，最容易得到權勢和地位。岑春煊懂得此一原則，在沒有機會時尚且要設法製造機會，在機會來臨時又豈肯讓機會輕易錯過？加上他天生具有粗疎豪邁而不畏艱難的勇悍性格，遇有困難，亦毫無瞻顧，直前不顧，於是便使慈禧太后覺得，岑春煊的忠而忘身，確實是可以付託大事的可靠之人。相形之下，吳永秉持儒家忠恕思想所表現的謙恭退讓，便不免着着落後而相形不如了。這只要在西狩途中所經歷的兩件事中，便可見其差別。其一是派委糧臺督辦的事，其二是與宮中大總管李連英相結納的事。

四

據吳永「庚子西狩叢談」一書中所說，皇太后及皇帝一行在懷來縣息駕三日之後起程往西，隨行的官員、隨從、夫馬等等已經爲數不少，加上馬玉崑與岑春煊的扈從兵馬，人數共有數千。由懷來縣一路西行，勢必需要有人在大駕到達次一站之前，預先在前站備辦食宿供應，其名曰「辦理前路糧臺」。大駕啓行之前一晚，忽由宮內傳旨，軍機大臣奉上諭轉知，著吳永辦理前路糧臺。吳永奉旨，錯愕不知所出。其原因當然是由于此去一路向西，所經過的盡是一些偏僻貧窮的小縣，時當兵燹之後，人民流散，商賈歇業，遽然要在大駕到達之時備辦數千人食宿所需的柴蔬鹽糧，實在萬分困難。吳永自己，是以懷來知縣的身分辦過這種差使的，知道其中的苦處。如今

他本人既無兵馬，又無銀兩，如果前站地方以無法措辦爲藉口，地方官本人頂多是奉旨辦理糧臺的人，到了臨時，又從何變出足够數量的柴蔬鹽糧來供應幾千人的食用？第二天到達沙城巡檢司駐蹕，所面臨的果然便是此一情況。安頓大駕甫畢，即有「各王公府箭手，及諸色太監勒索車輛馬匹。京官亦有陸續趕到者，皆紛紮供應　正擾擾間，又有武衛圍逼，問予索糧餉獃料，曰：『爾係糧臺，分當供給軍需，豈能任意推諉？』衆口喧呶，舉檐揚臂，不如向慈禧自念來日正長而自慰。最後他雖然以一哭解圍，然而在慈禧自然樂於同意，可是岑春煊那方面的反應，卻全然出於吳永的想像之外。

「辦理前路糧臺」雖然只是一份臨時性的職務，但因所辦乃是包括太后皇帝在內的供應差使，如果要假借太后與皇帝的聲勢，便儼然是欽差大員的身份，儘可以對地方官指揮呼叱，予取予求。吳永不懂得這正是一個巴結太后的大好機會，輕易就把督辦的名義讓給了岑春煊，在岑春煊自是求之不得。但即使如此，他却不願意領吳永的情。原因是吳永不過只是一個小小知縣，官階太低，將來總不能讓人批評，說什麼「岑春煊枉自做到二品藩司，他奉旨督辦前路糧臺，還是出自吳永的保薦！」因此他不但不肯感謝吳永之保薦，更在處處地方與吳永故爲異之高出吳永，不需要吳永之保薦。至于他受命督辦前路糧臺之後的表現，更與吳永大不相同。「

庚子西狩叢談」記此云：

「岑自得督辦名義後，沿途卽大肆威福，對于地方供應官吏，往往非法凌虐，恣睢暴戾，氣焰至薰灼不可近。天鎭令聞駕至宣化，當卽恭備一切。後以在宣化連駐蹕三日，食品皆臭腐，臨時趕辦不及，岑乃大加逼責，令無奈，至仰藥以殉。及至山陰，情節略同。岑復嚴責縣令，謂：『看爾有幾個腦袋？』山陰令惶急失措，見予卽跪泣求救。予婉詞慰藉之，並爲之向內監疏通，因勸岑稍從寬假，勿再演天鎭慘劇。岑乃大恚怒，謂予久任地方，所以袒護州縣。因此飢至相齟齬。……」

岑春煊與吳永相齟齬，他並沒有佔到便宜。原因是吳永此刻尚隨侍大駕西行，慈禧對他的印象正好，岑春煊沒法說他的壞話。但卽使如此，岑春煊却能以沿途接近的便利，與慈禧所最關信的大太監李蓮英建立了非常親密的關係，稱之爲「老叔」，並且幾次託他在慈禧太后跟前設法中傷吳永。吳永之所以會在後來被外放至廣東，無法再蒙慈禧之恩眷，原因便在這裏。由這些事情中可以看得出來，岑春煊與吳永雖然在這段時間中「比肩事主」，而由於岑春煊之處處力求表現，銳意進取，自然容易使慈禧覺得他是一個竭誠效力的「忠臣」。加上他的「保駕」行爲又使慈禧得到安全的感覺，岑春煊在慈禧心目中的分量，自然一天天地加重了。在君主專制時代，皇帝與臣下的關係，同主人與奴才下人的關係很相像。親貴大臣的地位，很像是一個大家庭的得力幹僕或管家之類，地位雖然重要，其見信於皇帝或主人的程度，却未必就能及得上另一些地位極親

的近臣或寵僕。岑春煊做到尚書、總督之後，本來已經是國家的大臣或重臣了；但因他早年曾因屢從保駕而深得慈禧的信任，在大臣之外，又兼具有近臣的性質，於是就使他的身份與一般的大臣不同，在君臣之外，更有家人一般的情誼。亦正因爲如此，所以岑春煊纔敢在外任督撫之後，以打破情面、不畏權勢的大膽作風從事各種興利除弊的革新，其後更與瞿鴻禨合作，力圖打倒慶王奕劻與袁世凱的聯合勢力，凡所作爲，大有可稱。雖然他的進身未必全由正路，他在掌握權力以後所做的事，却很可以使後人對他刮目相看。岑春煊與清末一班朝中大臣的不同之處，便在這裏。

五

慈禧及光緒逃難到達西安後，岑春煊護駕有功，名正言順地由甘肅藩司升爲陝西巡撫。不久，山西又發生教務糾紛，原任山西巡撫錫良應付失宜，在河北境內的八國聯軍有藉口入侵山西之勢。軍機大臣中本來有人與岑春煊不睦，此時便乘機以岑春煊長於治兵爲名，奏准慈禧太后，將他調爲山西巡撫。這樣做的目的很明顯：藉此將他排擠出外，以免他的政治行情繼續高漲。但因岑春煊的官運亨通，他的幕賓中有兩個極爲傑出的人材，使得他在應付很多棘手的政治問題時都能從容應付，於是，每更調一處盤根錯節的多事之地，愈增加一分他善於應付繁難的聲望。這樣，終於使他在一調再調之後，很快地由巡撫升爲總督——先調四川總督，再調兩廣總督。

說起岑春煊的幕府人才，很容易使人想到張鳴岐。此人在三二九廣州革命之役時官居兩廣總督，黃克強先生指揮的廣州革命後來不幸失敗，主要原因便是革命黨人在攻入督署時捉不到張鳴岐，以致革命軍在清軍的四路包圍下陷入孤軍苦戰，終於全盤挫敗。張鳴岐在清末雖然官至總督，他的出身，却由岑春煊的幕僚得保而來。胡思敬國聞備乘說：

「岑春煊入秦，擢陝西巡撫，寵任甚至。上方供用，日限三百金，內外整飭有法。凡所規畫，多采用幕客張鳴岐之謀。後調撫山西，移督四川、廣東，皆挈以俱行。至桂林，爲捐雙月道員，上疏論薦甚力。旋放太平思順道，遂擢廣西藩司，升巡撫，年甫三十，封圻中所僅見也。」

張鳴岐成爲岑春煊的得力幕賓，其建交之始，還是岑春煊在北京做紈袴惡少的時候。湯用彬撰「新談往」說：

「春煊少弢弛，自負門第才望，不可一世，黃金結客，車馬盈門，宴如也。以狎優之暇識何威鳳，間接識張鳴岐。鳴岐後來事業，俱發軔於韓潭之間，而世人不知也。」

「韓潭」，即是北京的韓家潭，清末的有名戲班均聚集於此。岑春煊在韓家潭玩戲子的時候結識了張鳴岐，以後他外放爲布政使，就把張鳴岐請了去作他的幕賓。張鳴岐後來脫離岑幕，由道臺而藩司，而巡撫，而總督，一帆風順。這固然與岑春煊的故事無關，而張鳴岐在岑春煊幕中的時候，却曾爲岑春煊策劃過一項空前謀議；直到現在，說起來仍可使人聽來極爲震撼。其事見於王照所撰的方家園雜詠紀事詩第九，詩云：

「召亂人知是牝鷄，來蘇我后正同侯。將軍手把黃金印，不許回鑾願向西。」

此詩後所附的註釋，是：

「駐蹕太原多日，上仍求獨歸議和，太后及諸臣堅持不放。其實是時早歸，賠款之數可少，而外人所索保險之種種條件，皆可因倘賴聖明而無須提出，公論昭然，懷悠微欽之擬議，其理至顯。而諸人因識見腐陋，不知此者十之九，明知而佯爲不知者十之一，則爲太后、榮、王、岑諸人也。時岑幕中有張鳴岐者，年少銳敏，力勸奉皇上回京，收此大功，岑詞窮而不語。蓋岑春煊奸人之雄，不論是非，專視多助者而助之，且素以貪緣太監得慈眷，至是因力主幸陝，得升陝撫，與袁世凱寵遇不分上下。高觀宇文泰分道揚鑣，非偶然也。」

王照以保皇黨的身份痛詆親太后的岑春煊爲「奸人之雄」，這是由於他的政治立場使然，無可厚非。不過，高陽從客觀的立場隨筆中對此就有比較客觀的論評，說：

「庚子之役，岑春煊以甘肅布政使率師勤王，護駕西行，遂邀西后特賞，遷任封疆。相傳其時春煊初擬助帝收回政權，或以孝治及利害之說動之，乃不敢發，而益自結於后。封疆重臣、統兵大將多戴后，帝則勢處孤危，舉事不愼，將有奇禍，春煊縱欲建能兒義勇爲，然亦苦不足耳。」

就事論事，張鳴岐所建的計策雖奇，究不免有太多的冒險成分；岑春煊自顧力量不足而未敢

行險徼幸，亦不能說完全不對。只是，張鳴岐以少年幕僚而能爲岑春煊畫此奇策，足見其見解十分高超；而岑春煊幕中能有張鳴岐這樣傑出的人才，亦可見岑春煊之善於用人。在張鳴岐之外，另一個傑出的幕賓人物，乃是岑熾。

黃濬所撰的花隨人聖盦摭憶，收錄有岑熾的傳記資料兩種，介紹岑熾的生平事蹟甚詳。據陳灨然所撰岑熾軼事說，岑熾與岑春煊同出餘姚岑氏，春煊籍廣西而岑熾世居餘姚。早年時，以捐職的縣丞服官陝西，曾居陝西藩司陶模及甘肅藩司曾鈺幕府，有聲於時。及岑春煊繼任甘肅藩司，仍禮聘岑熾居幕中。其後岑春煊帶兵勤王，升巡撫、升總督，及內調爲郵傳部尚書，岑熾皆在春煊幕中，前後歷時幾有十年之久，舉凡岑春煊的一切重要行動，大多出自岑熾的策劃。其情形略如下述：

「己亥，西林岑官保春煊官隴藩，聞其狀，丞禮致幕中，佐岑幾十年，名益重而迹益奇。庚子，兩宮幸山西，岑公謁師入衛，先生極贊之。岑公乃以眷屬託先生，兩人揮淚而別。未幾，岑公以衛駕功，擢秦撫，屢電乞佐之。先生復書曰：『公能興禮樂，某當馳驅以報其意。』蓋以諷之也。岑公曰：『唯命』。先生乃入秦。辛丑，岑公移撫晉，而聯軍方入固關，晉危甚。先生爲畫策却之，敵乃退。壬寅，岑公督蜀，平巨亂。移督兩粵，平桂疆，輒任先生總文案。內則室家，外則印旗文電咸屬焉，禮誼在師友間，情益篤。倚任之重，近世寡儔，顧未有因其參樞而一肆譏評者。清季大府幕賓，爭納餽，高者亦希薦擢，爲進取階。張制府鳴岐，即以岑幕起。先生處

大幕二十年，寮采餽遺，未嘗一納，聞者怪之。久之，岑公重其奇節，勞苦功高，屢思薦擧，以爲己副，先生輒峻却之。客曰：『公參帥幕，獨却薦賓禮，始克諫諍，薦則一屢僚耳，尙能行吾志哉？』先生復笑曰：『幕之爲職，合則留，不合則去。縣丞雖末吏，五斗米尙足贍吾家。吾之不棄原官，猶農之不棄其產也，去此奚爲？』其高潔如此。天性淸直，見親貴貪黷，嘗扼腕憤嘆，深懼國祚傾移。獨見岑公當重寄，嫉惡太嚴，則切戒以防其過。當岑公之移郵傳部尙書也，勢駸駸入樞府。先生嘆曰：『過剛則折，微特不克報國家，且恐爲僉壬所中。』瀕行，諄諄以『疎不間親，相機而動』相儆惕之。及岑公入覲，劾親貴，親貴貪黷，常扼腕憤嘆，爲，西林尙能赴粵耶？』急致書請退，岑公納之。既退，而先生亦返姚江，不復與人家國矣。」

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劉備之所以能成就三分天下的局面，完全得力於諸葛亮與龐統的贊襄謀議，在伐蜀之前的聯吳、拒曹，一切奇謀秘計，悉出此二人的籌畫，劉備不過拱手受成而已。其後龐統死於伐蜀之役，當劉備決心大擧伐吳之時，諸葛亮力諫不從，被留在成都輔助世子留守，結果劉備就在伐吳之戰中大敗而回，終於病死在白帝城。演義的敍述與正史當然有距離，但三國演義所寫的劉備，倒很像是這裏所說的岑春煊，而岑熾就是岑春煊的諸葛亮。由上文所引的岑熾軼事可以知道，岑春煊生平所作的重大施爲，凡是有岑熾在旁爲之畫策定計，其最後的結果必定十分圓滿，反之就必無把握。尤其是在光緒乙未政潮未曾發生之前，岑春煊以調職四川而

中道突請入覲，於奏對時面劾慶王貪黷亂政，及奉旨調補爲郵傳部尚書，又以未到任在職的郵傳部侍郎朱家寶，都是岑熾所曾頻頻勸誡生的結果十分惡劣，而爲岑春煊不納其諫，方有後來的蹉跌。岑熾其人在岑春煊預期之中，只因岑春煊早在岑熾政治事業中的重要性。說得更具體一點，我們很可以認定，岑春煊巡撫及升調四川、兩廣等地的總督之後，所以會有後來那些轟轟烈烈的功勳，大概都出於岑熾之後所招致的失敗，亦正因爲不肯接受岑熾的隨時匡正之故。由此而言，岑春煊之所以成功及失敗，其所產策劃；而岑春煊入京春煊的成功，大致不有良好的建樹；二是岑春煊的倚信，所以凡事都能而且又能知人善任，能有岑熾張鳴岐這樣的人才爲之輔佐，終於一個肯做好官的人，也能做出一番事業來。明乎此，我們對於岑春煊之所以失敗，亦就可以有一個大概的認識，不致因他前後行事之優劣迥異而感到訝異了。

六

岑春煊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由山西巡撫調補廣東巡撫，尚未及入都陛見，即因四川事方定，廣西匪亂又熾，於是岑春煊又被調爲兩廣總督，督辦兩廣軍務。岑毓英當年曾有獨力剿平雲南回亂的赫赫戰功，岑春煊既爲「名父

└之子，對于帶兵打仗自然很是專長。所以他在四川總督與兩廣總督任內所建立的功績，都以治兵平盜著稱。此外值得特別稱道的，則是他那種強直勇悍，立志要剷除貪汚，澄清吏治，以奉祿惜與朝中權貴周旋到底的旺盛鬪志。岑春煊在清代末年之得享大名，並不在他的軍功，而在他這種清廉強直，爲人津津樂道的特殊風格。

光緒二十四年岑春煊初任廣東藩司，就曾因立意參劾總督譚鍾麟所包庇的大貪官王某，而與譚督拍桌互詬。雖然岑春煊因此而被調往甘肅，他在廣東百姓心目中所留下的良好印象，亦是永難磨滅。到了光緒二十九年岑春煊奉旨調署兩廣總督，命下之日，廣東百姓歡聲雷動，以爲朝廷果有知人之明，能够讓岑春煊這樣的好官有出頭的機會，無不希望岑春煊到任以後，好讓久受貪官汚吏迫害的窮苦小民出口怨氣。岑春煊到廣東之後，果然不會在這方面辜負老百姓的期望。在粵三年，除了大部分時間在廣西從事剿匪工作外，在廣東就曾做過兩件打老虎式的懲貪案，使人看了十分痛快。由於這兩件懲貪案中的一件牽涉到其幕後的包庇者恰好又正是清朱最有貪庸之名的慶王奕劻。這樣一來，岑春煊在廣東老百姓心中固然博得了好官之稱，他與奕劻間的仇隙，却已到了難以化解的地步。這與後來的丁未政潮亦有因果關係，需要先提出來大致一說。

岑春煊在廣東所辦的兩大懲貪案，一件是南海縣知縣裴景福的貪汚案，一件是粵海關書辦周榮曜侵蝕巨額稅款，並以之通賂慶王，充任出使比利時的欽差大臣，經岑春煊發其姦慝，查追贓銀數

百萬兩，並削奪官職案。這兩大懲貪案中的主角，所貪贓銀各達數百萬兩之巨，在當時可說是駭人聽聞之事。尤其是周榮曜，以一介書辦，居然能在貪得如許巨款之後，搖身一變而爲出使外國的公使，清朝政府的政治腐敗情形，亦可說是事實昭彰了，關於裴景福案，岑春煊所撰的樂齋漫筆說：

「余於戊戌歲開藩粵東，雖僅七十日而去，然於察吏安民，理財禁暴，分所當爲之事，未嘗一刻去懷。粵省本多寶之鄉，官吏有求，俯拾卽是，以故賄賂公行，毫不爲異。其間最以貪名者，當推王某裴某二人爲巨擘，余在任時備知之。方欲依法嚴懲，以謝粵人，會匆匆交代，僅劾罷王，未遑治裴也。及癸卯再蒞兩廣，裴猶官南海縣知縣如故，而其惡益稔。顧心計獨深，工於舞弊，凡所受納，皆無跡可尋，狡猶殆尤有過於他人。余持疏劾其聲名狼藉，請革職看管，出示招告。裴平日能以小惠結民心，竟無人發其罪惡。乃自願罰鍰充餉，冀免久禁。繳款未足，輒伺隙逃入澳門，賄荷蘭人爲之護符，抗不歸案。余以外人庇及刑事罪犯，侵我國權，斷難隱忍，乃派員乘兵艦至澳門守提，迭經據理力爭，幾至決裂，而卒獲引渡。遂治以應得之罪，奏請充發新疆，卽日押解啓程。該犯至是無可逃免，始離粵以去。一時人心大快，卽海外民黨報紙，亦同聲稱道，足徵此事爲國人所共許。迄今粵人有言及王、裴者，猶深惡其爲人也。」

這一段文字中雖未指出此「裴某」是誰，而據清德宗實錄的記述，此裴某實卽裴景福，進士出身，在廣東歷官陸豐、番禺、潮陽、南海等縣知縣，光緒三十年被岑春煊以貪污罪劾罷，發往新疆充當苦差，「永不釋回」。由於裴景福宦囊甚豐，鼎革之後，被他花錢運動了有關方面，竟

然平安釋回。民國三年，且曾出任安徽省公署的秘書長，及政務廳廳長。由於岑春煊寫回憶錄時裴景福已成了民國政府的重要官員，不便顯斥其名，所以僅只稱之爲「裴某」而不名。至於岑春煊奏劾其罪時所臚舉的貪贓事實，僅只收受盧華富等四案陋規而經廣東臬司查出的，即有銀元二十二萬四千二百餘元，其他無法察出者不詳。此事在當時並且被人編寫入有名的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一百〇三回中，裴景福之名被改成福建侯官知縣，其餘大致仍是實事。讀者如有興趣，不妨將書中所寫查出一對，必可得會心之一笑。至於周榮曜案的大致情形，樂齋漫筆中亦有記述，云：

「粵海關監督向爲膏腴之地，承平時恒爲滿人所據，積弊日甚。部定額徵每年五百萬兩，歷任監督，均由內務府奏派，一年一更。旗員視爲利藪，所派之員，每年解部額均在三百萬左右，無一人能解足。余奉命監督，即令奏調之馮嘉錫、朱祖蔭兩人充該關提調，認眞整理，是年即徵得六百六十萬兩，奏明以五百八十萬兩解部，留八十萬兩充本省經費。奏入，即奉命裁除內務府派員，以後即歸總督監督。並查獲舞弊侵餉之庫書周榮曜，侵蝕公帑，積資數百萬，與官紳往還，儼然世祿。當譚鍾麟督粵時，王某倚勢相結，得其重賂，榮曜亦恃有護符，隱其蠹國病商之罪，益自驕縱。遂納賄京朝，廣通聲氣，得慶親王奕劻之援，簡任出使比國大臣，尙未出洋。余發其姦罪，奏請革職查抄，凡積年贓款，達數百萬之多。以一簿書小吏而擁貲至此，並得濫竊名器，貽笑友邦，果誰尸其咎歟？」

按，清代的各處海關稅關，素來是滿清政府用充當。但是，充當海關稅關監督的內務府官員雖有太后以至宮中掌權的太監處，都需要有所「報效」到，海關與稅關都是慈禧所賣的各色差缺之一。既然得到此差需要化錢買缺，則得缺之後的乘機漁利，自是必然之事。只是，關稅能收至六百餘萬而報解只三百萬，則是一半以上的收入已進了私人的囊橐。而監督侵漁於上，書吏舞弊於下，以一名書吏而積貲數百萬兩，悉出於歷年的侵吞舞弊所得，國家與商民的損失亦未免太大了。清代末年，米一石不過銀二、三兩而已。積貲銀數百萬兩，以米價折算今日的幣值，已將近美金五千萬元之譜。以如此蠹國病民的貪污書吏，竟然可以在通賂權門之後，派充爲出使外國的欽差大臣，實在太駭人聽聞。在奕劻主持下的滿清政府，如此蔑視紀綱，罔顧法律，自難免使自詡清直而行事強悍的岑春煊極端痛恨。岑春煊後來之與瞿鴻禨互相結納，因倒慶而希望一併倒袁，其遠因已伏於此。

七

岑春煊作兩廣總督，自光緒二十九年至卅一年，前後歷時三年有餘。爲了整肅貪污，除暴安良，他對於所轄文武官弁中的不肖份子大力斥革，於地方上的豪劣紳矜亦全不姑息，因此博得了「屠官」的惡謚，與張之洞、袁世凱同稱爲督撫中的三大殺手——張之洞屠財，袁世凱屠人，而

岑春煊屠官。斥革貪劣與裁抑豪強所招來的結果如何？可以先看看胡思敬國聞備乘中的一段記述。

國聞備乘卷一，「岑春氣燄」一條說：

「戊戌政變，袁世凱首發逆謀。庚子避兵西巡，岑春煊沿途擁衛入關。由是皆有寵於太后。余觀二人舉動，亦各具恣睢叱咤之才，非盡恃寵也。張翼以小吏給事醇邸，不數年官至侍郎，駸駸大用。世凱參其私鬻開平礦產，解職，涉訟英廷二年，快快歸，遂一蹶不起。溥善以吏部侍郎兼左翼總兵，本近支宗親，兄弟子姪布朝列。奸人盜賣陵地，用左翼印契，世凱復劾罷之，其鋒銳亦可畏矣。春煊氣力更出其上。粵紳有周榮曜者，初由關吏起家，積貲數百萬。春煊瞰其富，折簡招致署中，責報效。榮曜不應，私釐金入都，求通奕劻之門，遂簡四品京卿出使比利時。春煊怒曰：『奴子乃狡獪如是！』即日參其私蝕關稅，請削職監追。榮曜奔香港，盡籍其產入官，奕劻熟視，不敢出一辭救也。既而鐵路議起，春煊請派捐，粵人不允，請招股。春煊曰：『是把持也』，捕倡議道員黎國廉下之獄。全粵紳民皆憤，推前閩浙總督許應騤爲首，聯名上訴。詔周馥按問，亦莫能直也。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糾彈，上下皆股栗失色。」

岑春煊在清代末年所以有「屠官」之稱，乃是由於清末的吏治敗壞已至極點。官職既以賄買而來，既蒞官之後，自必多方搜括以求盈利，而賣官鬻爵的中心即是以奕劻爲主的滿清政府。這種情形，看清末的譴責小說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書即可瞭然。而這些

中所寫的論價買官，以及不顧廉恥，百計營求等官場黑幕，大致都有事實可按。既然官場中所斥的都是這些寡廉鮮恥的闊茸無能之輩，爲了振飭官常，澄清吏治，當然需要大刀闊斧地從事整頓斥革，不能姑息苟且。所以，岑春煊在當時雖有「屠官」之稱，如果所劾罷的都是卑劣無恥的貪庸之輩，則他的大舉澄汰便是正當之舉。所成問題的是，這些被岑春煊大批斥革的貪官污吏，也許正是從奕劻那裏花錢走了門路到外省來做官的人，一旦被岑春煊劾罷，自不免赴闕於他們的幕後支持者奕劻。何況岑春煊在劾罷周榮曜一案中，更曾彰明較著地使奕劻難堪，久而久之，如之何不使奕劻恨之刺骨？奕劻有衰世凱爲之羽翼，而衰世凱又自有其擴張地盤的政治野心，兩大的目標相同，岑春煊自不免要遭受暗中排擠。關於這一層，又可以岑春煊自己所說的話來印證。

[illegible]朝廷自經庚子之變，知內憂外患相逼日隘，故發憤以雪恥自強爲詢[illegible]余曾力陳興教育、明爵制、賡興滬寧鐵路、新設方務內結親睦、外聯強援等事，冀世凱新得北洋，未遽於岑氏要職容無不遍布耳目爲閒，初襲下屬電懇兩廣總督岑春煊自行[illegible]執隱辦[illegible]事，願未能遽允，既罕貴兩省巡撫余誠格與岑氏素開兩粵巡撫張鳴岐與岑氏素洽，調職尚難遽行，一時北洋的勢力南下，自然[illegible]與火車共對開總攬樞要，翦羽任氏，所以圖奕劻將軍勢尚隱禍，當提出五隱禍端願

念邊防安全，自然需要同意。於是，原任雲貴總督丁振鐸被調爲閩浙總督，原任閩浙總督周馥調兩廣，而岑春煊則由兩廣調督雲貴。清代的各地總督，以直隸總督的地位最高，兩廣總督最肥，陝甘與雲貴則是總督中最苦的缺分。不僅如此，兩廣雖遠在南服，自從輪船與火車先後開通之後，與京師之間的幾千里路程已經不算遠，彼此間的消息傳遞，也很靈通，換了雲貴，就不同了。原因是雲貴至京師全恃驛路，最快也得走上三、四十天，不但消息隔膜，來往一趟更不容易，把岑春煊從兩廣調往雲貴，從此可以將他與慈禧太后遠遠隔離，以免他借事與慶、袁爲難。而周馥乃是袁世凱的兒女親家，兩廣總督給了周馥，又無異將兩廣收入了袁世凱的勢力範圍，一舉兩得，再好沒有。由岑春煊的立場看，還不過是袁世凱攘奪兩廣地盤的野心；但如從慶、袁勾結的情形看，將岑春煊貶往邊陲僻遠的貧瘠之地，恰好又遂了奕劻的報怨之心。所以，岑之由粵調滇，事實上應是慶、袁二人聯合排擠岑春煊的第一步。雖然樂齋漫筆中未曾說明，事實上仍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岑春煊奉旨調督雲貴後，第二日續有電寄上諭，大意說：「著周馥即赴兩廣新任。丁振鐸着俟岑春煊到滇後即行赴任，均着毋庸來京請訓。」這一道電旨是個很大的敗筆，它使岑春煊和他的幕賓岑熾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原來奕劻和袁世凱是要設法阻止他與慈禧太后見面，然則調滇之目的自顯然在藉此疏遠太后對他的眷注，這種動機太可惡。惟其因爲有此念頭橫亘胸中，而岑春煊又不能顯違朝旨，惟一的對策就是藉口有病，在行抵上海時逗留不去，以進一步觀察慶、袁

的動向。於是他在交卸粵督之後便由輪船北上，到上海就藉病請假，名曰「就醫」，而且一醫就是半年，所恃的理由是連年在烟瘴之地帶兵打仗，久已有病在身，暫時不能長途跋涉，請俟稍爲痊可後再行赴任。自光緒卅二年九月拖到翌年正月，雲南片馬方面的交涉事件已經不能再等，而岑春煊却仍然沒有病癒銷假的模樣。奕劻看看不能再拖，只好另外請旨，將四川總督錫良就近改調雲貴，而以岑春煊塡補錫良所空出來的四川總督。恰好，在這段時間中先後發生了很多重大的政治變化，政治氣候好像變得逐漸對慶、袁不利，於是，岑春煊的下一步計劃也要改變了。

由光緒卅二年秋間到卅三年春間，朝中所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有二。首先是傳說了很久的新官制案，終於核定公佈了。但新經核定公佈的官制案中，並未實現傳說已久的責任內閣制度，舊的內閣大學士依然存在，許多傳說將要裁撤的機構也依然未裁，而軍機大臣中却有四位因改官制而變成專管一部的尚書，不再兼具軍機大臣的身份。這四人中有徐世昌，一般人都知道他是慶、袁一黨的重要人物。相反地，與慶、袁敵對的軍機大臣瞿鴻禨，却仍以軍機大臣兼任外務部尚書，不受新官制的影響，也仍然與聞樞務。這顯然表示慶、袁所主持的修訂官制案被瞿鴻禨所扼，奕劻和袁世凱請求開去直督兼北洋大臣本職以外一應兼差的奏疏，也已見諸邸報，北京的政治氣候，好像對慶、袁頗爲不利。這是第一件轟動中外的大事。至於第二件，則是東三省建立行省之說行將成爲事實，新行省的一總督三巡撫，據外間的傳說，也將爲北洋系人物所一手包辦。這表示慶、袁派的勢力雖然在新官制案上受到了挫折，在東三

省西關練北著所獲俘虜機關銃數挺×裏面的情
以臺諸聚點綿名間密集去當事以便與京都的探偵系連
絡動甘邊樣和場畫攝藤橋關聯清著政局的巫裝政瀏世就
受降官佈的漫響。也仍然與聞當務。宣誓然支示變、
一蒙的重要人物。日文此、與變、克適接的軍對大臣盟約幾、時仍是軍
變如事着之。據最近的動態生略如下述人猪吸著
內閣天皇主大然其主今稱煙有關機構後裔補授翻傳
官佈案同終不過史超密發表發辦任黑龍江總督
合員千歌擇批給隨章主特林關指錄中蔣顧龍
該段變事着擬就衛理裏龍長派職。所發事件著変由陸親玉載澧及太關
復置廊據奏納對衛前大臣答領
玉商部倘書等各項義儀職即的變對。災害者未不論再訪。只世界大論者、特四川總督
四月十七日、有賓會開質維督周樹模錄全調郵傳部尚書岑春煊爲兩廣總督兼
來任、請求收回成命、奉准、并飭迅赴新任、所請賞假在處、亦來毋庸議不論
治連同日、林陸軍機處總辦補侍郎、林紹年爲度支部右侍郎。林

紹年奏請開去軍機大臣兼差，奉旨毋庸前往度支部到任，仍任軍機大臣。

五月初七日，因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奏參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瞿鴻禨攬權私挾詐等罪，請予罷斥，奉旨：「瞿鴻禨着開缺回籍，以示薄懲，所參事件，交孫家鼐鐵良查復。」旋據奏請毋庸置議，報聞。

七月初四日，有旨，兩廣總督岑春煊久病未痊，員缺未便久懸，岑春煊着開缺安心調理，以示體恤。

同日，調軍機大臣林紹年爲河南巡撫。

按，丁未政潮的政爭雙方主要人物，自然是奕劻、袁世凱，與瞿鴻禨及岑春煊之間的對抗，而載灃乃是奕劻之子，陳璧是袁世凱的黨羽，林紹年則是受瞿鴻禨所支持的。由上面所列舉的這些朝政動態看來，自三月廿一日岑春煊補授郵傳部尚書開始，瞿鴻禨和岑春煊所發動的倒慶計劃似乎頗見成功；但不過只隔了二十多天，情勢就頓起變化。先是岑春煊被擠出外，繼則瞿鴻禨被參奪職，再過了兩個月，岑春煊的兩廣總督也被拿掉了，被視爲瞿黨的軍機大臣林紹年也被逐出樞廷。在這三個月來的升沉變化之中，慶、袁的地位鞏固如故，站在瞿、岑一方面倒慶倒袁的人物，則或斥或革，或調外，或放廢，清除殆盡。這種事實當然可以使人看得很明白，朝廷中反對慶、袁的運動已經完全失敗，慶袁的勢力從此成爲支配滿清政府的惟一力量。這究竟是什麼原因使然？岑春煊和瞿鴻禨所聯合策動的倒慶計劃，何以會從初時的勝利一變而爲後來的慘敗？這正

是我們現在所要探討的問題。

凌霄一士隨筆論丁未政潮事云：

「慶親王奕劻自繼榮祿而爲軍機領袖，直隸總督袁世凱深與結納，爲其謀主，於是北洋遙執朝政，其權力之偉，更遠過於李鴻章時。瞿鴻禨以才敏受知，且有清望，簾眷亦隆，與奕劻同直樞垣，遇事每有爭持，對北洋頗時主裁抑，由是奕劻與之積不相能，世凱尤憾之。而清議以奕劻貪庸，世凱跋扈，多右鴻禨，此爲丁未政潮之張本。」

此云袁世凱「尤憾之」，則是由於袁世凱本欲以籠絡奕劻之法籠絡瞿鴻禨，而瞿鴻禨拒不接受之故。光緒卅三年時曾任翰林院檢討的林步隨，對此曾有記述，說：

「袁督初求媚於文愼（按卽瞿鴻禨），無所不至。嘗自言當修門生之敬，文愼拒之。繼又請爲昆弟交，亦不納。是時，京師親貴家有婚喪，輒由北洋公所供應帳飲之費，已成事例。乙巳，文愼爲次子授室，援例以請，復進賀儀八百金，皆謝却之。袁既絕意於結納，不得不謀排擠矣。」

瞿鴻禨不願做奕劻第二，又要主張裁抑北洋的勢力，這在袁世凱自然無法忍受。拉攏既然無效，另一個可用的辦法就是排而去之。在瞿鴻禨，亦正有類似的想法——慶、袁結黨擅權，朝政日非，若不能將此二人的聯合勢力逐出政壇，滿清政權必亡於慶、袁之手。但是瞿鴻禨一個人的力量絕對扳不倒奕劻與袁世凱，要達成此一目的，他需要借助外來力量的援助，而此時惟一可與

袁世凱相抗衡的有力人士，只有岑春煊。因此他替岑春煊設計，在由上海坐輪船赴川督新任，經過漢口時，發一電報請求入覲，然後不俟批復，逕在漢口乘京漢鐵路火車北上，兩日夜卽可到北京。岑春煊在慈禧太后面前的簾眷甚隆，只要慈禧太后在岑春煊宮門請安之時准予召對，必可乘造膝密陳的時機面陳奕劻的貪黷無能，再輔以其他方面的攻擊力量，奕劻之倒臺，正大有可能。此所以岑春煊在途經漢口時要突然電請入覲，以措手不及之法使慶、袁無法阻撓岑春煊之北上，其初步所得之效果，果然很好。據岑春煊自己所說的情形，是這樣的：

樂齋漫筆：「余居滬上，續假自冬迄春。丁未正月十九日，奉旨調補四川總督，毋庸來京請訓，知仍出慶袁之意。念巴蜀道遠，此後覲見無日，不於此際設法入都，造膝詳陳種種危迫情形，機會一失，追悔無窮，當以權宜行之，縱獲罪朝廷，亦期不負兩宮眷倚之意。乃於啓程赴任，舟次武漢時，電請順道入覲，不俟俞旨，逕乘京漢車北上。抵京之日，卽奉兩宮召見，溫諭有加，並詳詢年來病況，命在京休息，以備續有召對。此行蓋出彼黨意料之外，故無由預爲阻格也。……」

這一段話說明了岑春煊以突然發動的辦法忽然到了北京，達到了「面聖」之目的；由於事出突兀，慶袁無法阻擋，所以岑春煊的戰略是成功了。在這一段話中，岑春煊雖未承認這一計劃是否出於瞿鴻禨的指授，而袁世凱在這年四月寫給兩江總督端方的一封密信中，却曾透露其事實出瞿之安排。袁信云：

「大謀此來，有某樞暗許引進，預爲布置臺諫。……」

此信中的「大謀」，指春煊；「大老」，指慶王奕劻；「某樞」，則隱指瞿鴻禨而不名。由此可知，岑春煊之借口「入覲」，突然北來，及在面對時卽痛斥奕劻之貪庸誤國，都是瞿鴻禨所一手策劃，與後來之趙啓霖參段芝貴同屬有計劃之行動。至於實際上的經過情形如何？仍可由岑春煊的樂齋漫筆見之，再抄一段如下：

「自是入對凡四次。太后語及時局日非，不覺淚下。余因奏言：近年親貴專權，賄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紀綱掃地，皆由慶親王奕劻貪庸誤國，引用非人。若不力圖刷新政治，重整紀綱，臣恐人心離散之日，雖欲勉强維持，亦將挽回無術矣。太后初聞此言，頗有怒容，云：『何致人心離散？汝有何證據，可詳細奏明。』余對曰：『天下事人同此心，事同此理。假如此間有兩御案，一好一壞，太后要好的還是要壞的？』太后言：『當然要好的。』余對曰：『此卽是人之心理。臣請問：今日中國政治是好是壞？』太后言：『因不好才改良。』余曰：『改良是眞的還是假的？』太后又現怒容，曰：『改良還有假的？此是何說？』余對曰：『太后固然眞心改良政治，但以臣觀察，奉行之人，實有矇蔽朝廷，不能認眞改良之據。請問太后記得在岔道行宮時，蒙垂詢此仇如何能報？臣當時曾奏云：報仇必須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學校。旋蒙簡授張百熙爲管學大臣，足見太后求才之切。惟此刻距回鑾已將七載，學校課本尚未審定齊全，其他更不必問。

又前奉上諭，命各省均辦警察，練新軍，詔旨一下，疆臣無不爭先舉辦。但創行新政，今日加稅，明日加釐，小民苦於搜括，怨聲載道。倘果眞刷新政治，得財用於公家，百姓出錢，尙可原諒一二。現在不惟不能刷新，反較從前更加腐敗。從前賣官鬻缺，尙是小的；現在內而侍郎，外而督撫，皆可用錢買得。醜聲四播，政以賄成，此臣所以說改良是假的。且太后亦知出洋學生有若干否？』太后言：『我聽說到東洋學生已有七八千，西洋尙未知悉，想必亦有幾千。』余對曰：『以臣所聞，亦是如此。古人以士爲四民之首，因士心所向，民皆從之也。此去不過數年，伊等皆畢業返國，回國後限見政治腐敗如此，彼輩必聲言改革。一倡百和，處處與政府爲難，斯卽人心離散之時。到此地步，臣愚實不敢言矣。』不覺失聲痛哭。太后亦哭，言：『我久不聞汝言，政事竟敗壞至此。汝問皇上，現在召見臣工，不論太小，卽知縣亦常召見，均勗以激發天良，認眞辦事，萬不料全無感動。』……」

在上面所引的這段召見對話中，岑春煊以政府官員名爲革新政治，實則矇蔽朝廷，並無改良實意；且以推行新政爲名，增派各種苛捐雜稅，以致小民苦不堪言，而官員則反得藉機漁利；政治腐敗，達於極點，一旦民心離散，時局實在不堪設想爲言，簡單扼要地說明了以奕劻爲首的中央政府，大有把淸朝中國帶上絕路之情勢。其最後所達到的結論，當然也就非常明白：欲圖挽囘大局，必須改圖革新，欲求革新，必先去既貪且庸的慶王奕劻。但岑春煊的這番話雖能使慈禧太后悚然動容，而於奕劻所持以結歡固寵的關係畢竟十分深厚，決非岑春煊的三言兩語所能動搖。所以，

慈禧太后與岑春煊之間，接下來就還有一段艱辛的辯難。仍引樂齋漫筆記述此事的原文如下：

「太后云：『汝說奕劻貪，有何憑證？』余對曰：『納賄之事，惟恐不密，一予一受，豈肯以憑據示人？但曾記得臣在兩廣總督兼粵海關任內，查得新簡出使比國大臣周榮曜，係粵海關庫書，侵蝕洋藥項下公款二百餘萬，奏參革職拿辦。斯時奕劻方管外務部，周犯係伊所保，非得賄而何？』太后言：『奕劻太老實，是上人的當。』余對：『當國之人何等重要，豈可以自解？此人不去，紀綱何由整飭？』太后言：『懿親中多係少不更事，尙有何人能勝此任，汝可保奏。』余對：『此乃皇太后皇上特簡之員，臣何敢妄保？此次蒙皇太后皇上垂詢時政，是以披肝瀝膽，不敢一毫隱瞞。惟啓程之時，因應奏之事極多，而牽涉奕劻關係重大，不得不，故特冒昧前來。……』」

岑春煊對奕劻的攻擊，雖然並未能使奕劻倒臺，但也顯然使慈禧對奕劻的信心發生了動搖。也許，瞿鴻禨設計使岑春煊入京面對所希望達到的初步目標，亦只是如此。因爲奕劻畢竟是一株根深蒂固的大樹，輕易不能拔去，必須先加搖撼鬆動，然後方能漸漸拔起。岑春煊的初步工作既有成效，接着便可另換他人前來接力。袁世凱致端方信中所說的，「大謀端發，羣伏響應，老大被困，情形甚險」的，卽是在當時臺諫中素有敢言之稱的御史趙啓霖，所用作彈劾理由的，便是從光緒卅二年十一月間卽已轟傳一時的，段芝貴通賄奕劻父子而得黑龍江巡撫案。

趙啓霖奏參黑龍江巡撫段芝貴以購獻歌妓楊翠喜結好貝子載振，及從天津商會王竹林處措銀十萬兩餽獻奕劻，故能以一候補道員超遷巡撫，其事本屬實在，祇因奕劻袁世凱之巧於彌縫，而奉旨查復之諄諄瞻顧，苟且了事，所以趙啓霖最後反得到一個「污衊親藩」的罪名，被革掉御史。關於這一段史實，筆者已曾在「袁世凱與慶親王」一文中詳細敍述，這裏不須再贅。但趙啓霖雖然革職，他出京回籍時的送行場面却十分風光，原因是輿論對他的勇敢行爲都十分欽佩，自認有氣節的士大夫更相率餞別，既爲趙啓霖增添行色，也爲自己增加聲光。餞別的地點在南城外的龍樹寺，贈別之詩盈篋，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一首，作者是蔣式瑆。蔣詩云：

「三年一樣青青柳，又到江亭送遠行。
我亦懷歸未得，天涯今見子成名。」

言下之意，似對趙啓霖之因劾奕劻而得享大名，十分歆羨。其實則蔣式瑆在三年前也曾因劾奕劻而得過大名，只是他所得的大名是人人知道他分得了奕劻的三十萬存款，以一個御史頭銜而換得偌大一筆財富，十分划算，與趙啓霖之眞的成名並不一樣而已。趙啓霖成了名，相形之下，自然是奕劻的聲名更加掃地。這其中的事實眞相，慈禧太后後來終於也逐漸知道，奕劻的地位，這時纔眞正有了危險。林步隨跋袁世凱致端方密函，有一段說到此事，云：

「西林之入都也，面劾慶王貪黷，詞甚激切。臺官江春霖相啓霖又先後抗章彈其父子，而汪舍人康年主京報，議詆尤力，士論譁然和之，上亦頗爲之動。一日，慶王以疾請假，文悻承旨，太后慨然謂：『奕劻年老，設遂不起，爾試思誰可繼其任者？』文悻請依故事用近支宗親，因舉醇王，太后頷焉。此事爲慶王及袁督所聞。袁慶素相結，朝士趨炎以圖自貴者，京津之間，交午無虛日，聞之大恐。……」

情勢發展到了此一地步，奕劻的地位眞的動搖了。所謂「大老被困，情形甚險」，應卽指此。奕劻貪庸，這樣的人物當然應該教他滾蛋。但是倒慶卽是倒袁，奕劻一倒，袁世凱沒了後臺，也非倒不可。以袁世凱之善於搞陰謀，玩詐騙，逢到這種危險場面，總也會有辦法應付。至於如何應付，那就要看袁世凱的本領了。

袁世凱以戊戌政變時背叛光緒皇帝而得慈禧之寵信，他當然知道慈禧太后最恨的就是康有爲、梁啓超等一班維新派人物。他決定用來反擊瞿鴻禨和岑春煊的辦法，就是從這一方面入手。

丁未政潮，由岑春煊之突然由漢口入覲，突然對奕劻發難攻擊開始。瞿鴻禨拉攏他，是因爲他在慈禧太后面前的寵信程度，不下於袁世凱。所以倒慶倒袁計劃的第一步，是要先設法能够讓岑春煊入京「面聖」。「面聖」之時，不但要公開指摘奕劻之貪庸不法，並且要能爭取到留京供職，以便進一步相機而動。這一層，在岑春煊入京之初的幾次召見以後，便得到了成功。樂齋漫筆記述岑春煊此時對慈禧所奏的話，說：

「『……今在京數日，尚覺所懷未盡，又須遠赴川省。臣不勝犬馬戀主之情，，爲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惡犬，未知上意如何？』太后卽云：『汝言過重。我母子得汝照料，恐將餓死，焉有今日？我久已將汝當親人看待。近年汝在外間所辦之事，故未能叫汝來京，汝當知我此意。』余對曰：『臣豈不知受恩深重，內外本無分別。惟譬如種樹，臣在外，係修剪枝葉，樹之根本，却在政府。倘根本之土被人挖鬆，枝葉縱然起，根本推翻，樹倒枝存，有何益處？故臣謂根本重要之地，不可不留意也。』太言極是。好在外邊現已安靖，我亦望你在京辦事，明日卽可下旨，汝先下去。』明郵傳部尚書之命。」

岑春煊對慈禧太后表示，他願意留在京裏，爲皇太后與皇帝做一隻看家的惡犬很明白，他要爲慈禧和光緒趕走一切貪污不法的腐敗份子，好使朝廷根本之地，有的一段尾巴。樂齋筆漫記此云：

「余既奉旨，尚未謝恩，先請見太后，面劾本部侍郎朱寶奎，以市井駔儈，工滬寧鐵路，勾結外人，吞沒鉅款，因納賄樞府，得任今職。若該員在部，臣實羞與爲伍。」太后曰：『朱某既然不肖，可卽予罷斥。但據何罪狀以降諭旨？』余對曰：『可言係臣面參。』太后首肯，始謝恩退下。是日特旨褫寶奎職，都人士羣相驚告，詫爲異事。」

當時都中人士之所以會「羣相驚告，詫爲異事」，是因爲兩種原因。第一，按清代官制，尚書與侍郎同爲一部中的尚書參劾侍郎的「堂官」，侍郎並非尚書的屬吏，而且也從未聽說過同一部中的尚書參劾侍郎的事情。第二，岑春煊之空言奏劾罷朝中的大僚高官，必須有實際罪狀。侍郎官居正二品，品秩甚高，今只因名，看來更不免使而遽予罷斥，未免駭人聽聞。而岑春煊之當時的朝旨，朱寶奎之罷斥，全不需有罪人詫爲異事。清德宗實錄中所記載的朝旨原文如下：

「諭內閣：據岑春煊面奏，郵傳部左侍郎朱寶奎聲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寶奎著革職。」

官居二品的侍郎，竟可因「聲名狼藉，操守平常」的兩句話而革職，此一案件所給予人的第三種感覺，便是岑春煊的氣燄實在太使人可怕，比之袁世凱，似乎更有過之。岑春煊爲什麼要奏劾朱寶奎？因爲朱寶奎是袁黨；朱寶奎怎麼會是袁黨？可以看胡思敬國聞備乘一書中的記述。

國聞備乘卷三：

「常州朱寶奎游學西洋歸，貲緣入盛宣懷門。同知捐升道員，遂充上海電報局總辦，凡各局弊竇，無不知之。窺宣懷有婢絕美，求爲簉室，宣懷不許。由是離交，私發路局積弊，並抄錄累年洋商交涉案牘歸袁世凱。世凱久涎鐵路、電報、招商三局之利而不詳其底蘊，至是得所藉手。遂參宣懷，盡撤其差，以鐵路局交唐紹儀，招商局交楊士琦，電報局交吳重熹，而保朱寶奎爲郵傳部侍郎，後爲岑春煊劾罷。」

朱寶奎以所欲不遂而叛盛歸袁，又盡發盛宣懷之私而使袁世凱可以對盛宣懷下手，這樣的行

爲，當然是十足的反覆小人。岑春煊劾之罷職，一方面固然是要爲盛宣懷報仇。但是，岑春煊的此一著棋，看起來固然大快人心，實際則犯了輕因爲這一來更加暴露了他對慶袁的敵視態度，非迫使袁世凱更加依附奕劻以求自世凱的陰謀更加積極，岑春煊不久就吃了大虧。袁世凱致端方密札中有關於此云：

「大謀發端，羣伏響應，大老被困，情形甚險。幸大老平時厚道，頗得多助攻之厄，伯軒、菊人甚出力，上怒乃解，而聯合防堵，果泉亦有力焉。十六日，議遣出。上先擬遣，次日卽發表。大謀不肯去，十六日亦曾議及，當有對待之術勢大衰，無能爲矣，不如不來爲愈也。舉武進鄭張，上均不以爲然，人得藉口繼之。伊眷漸輕，亦有人言及，恐從此黃鶴一去矣。……」

袁世凱致端方的此一密札，信尾所署的時間是四月十九日，恰是岑春煊由郵傳部尚書奏旨外調兩廣總督的第三天。由信中所說，可知岑之外調，完全由四月十六日那天奕劻之「獨對」而起。按，所謂「獨對」，乃是領軍機大臣的特權，卽在軍機全班叫起之後，獨自一人留下來單獨奏對之意。軍機全班進見，所談論的事有全體軍機大臣同時聽聞，若是獨對，就無法知道所談何事了。且依常例而言，獨對所奏，必係絕對機密之事。奕劻在一番獨對之後就決定了岑春煊之外調，可知此番獨對中的談話內容對當時政局有決定性之影響力量。此影響力量從何而來？是卽上引

袁世凱致端方密札中的後一段話。

要了解前引密札中的後一段話，需要先對信中的若干人名作一註釋。袁信中所說的「果泉」爲，乃滿人世續，時官東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菊人」卽徐世昌，時爲東三省總督；「鄭」卽鄭孝胥，「張」則張謇，滿人成勳，時官吉林副都統；「武進」卽盛宣懷，當時均有新黨之稱。奕劻被攻危急，賴世續、徐世昌等人爲之陳說而得解，其事並不值得注意。值得注意的，乃是其中所透露，袁世凱用來中傷瞿鴻禨和岑春煊的方法。

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一，「岑雲階粗莽」一條說：「岑春煊性極粗莽，戊戌服闋入京，結交新黨，入保國會。」又同書卷三，「袁世凱謀傾岑雲階俱有寵於太后。世凱之寵由戊戌告變，春煊之寵由庚子護駕，皆從患難中奮翅而起，雖有外言，莫能間也。世凱惡春煊權勢與己相埒，與奕劻比而讒之。及朱寶奎黜死黨，不可信。」又，康有爲題瞿鴻禨遺像詩：「三犯龍鱗敢擧仇，愛才愛國有深憂。」詩後有跋，云：「西狩間，公三擧鄙人。后怒公擧其仇，幾不測。」將這幾條資料合起來看，可以知道，岑春煊和瞿鴻禨都有過和康梁接近而鬻薦康梁的紀錄，而慈禧則因戊戌政變之故，恨透了康梁的。

朱啓鈐撰，「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中說：

「戊戌前後，啓鈐往來吳會，頗與其邦賢士大夫遊，益憤切，喜改革之說。文愼雖持重，而

師學所主持，在當時號爲新激，與陳右銘、江建霞二公在湘，有桴鼓之應。戊戌事敗，法網嚴苛，啓鈐在湘，猶與張劭希、楊篤生、章行嚴諸君私購禁書，交相傳習，意氣未稍衰。故啓鈐在文慎門垂承深知文慎所以卒遭親貴之忌者，由來非一朝夕也。」

「就中文慎最爲僉邪所惡者，惟主持輿論一事。汪君康年之在滬辦中外日報也，遠在庚子以前；汪君，文慎門下士之夙邀賞拔者也。不唯汪君，其時吳越兩省名流以言論繫時望者，類皆著弟子籍，有知遇感也。文慎柄政，上海輿論於政府措施抨擊曾無假借，而文慎訪問得失，未嘗不虛懷以聽焉。京師初無報館，江南人士來者漸多，頗開清議之門。甲辰乙巳之間，京師文字之禍興，朝貴銜報館切齒，必欲得而甘心。啓鈐方長譽臚，知其事甚悉，嘗屢以去就爭。朝貴既無如何，遂以怒報館者怒文慎。加以朝官奔競鑽營之風，素爲文慎所深惡，言官舉其醜穢，攻彈不已，又以怒言官者怒文慎。」

上面的這些記述，不但說明瞿鴻禨自戊戌政變以來，一直傾向新學，並且對於清議及輿論亦極爲左袒，以致引起權貴人士及卑劣朝士之切齒。其中所謂「甲辰乙巳之間」的文字獄，大概指奕劻父子的醜聞被報紙宣傳騰播中外之事而言。甲辰是光緒三十年，乙巳則卅一年。光緒三十年冬，御史蔣式瑆因奏參奕劻存款於滙豐銀行一案而被開去御史職務，但報紙之報導與批評却對奕劻甚爲不利。翌年，奕劻之子載搜又有挾妓宴飲於京市桐花莊之事，酒酣耳熱之餘，

載搜自登戲臺演劇，所挾妓名謝珊珊者爲之傅粉，人爲刀俎而我爲魚肉，天潢貴胄，居然全無心肝至此，這事當然成了極好的諷刺材料。報紙乘機渲染，更使奕劻和載灃父子的顏面掃地以盡。奕劻和載汪康年又恰好是瞿鴻禨的得意門生，於是瞿鴻禨的罪名又多了一筆。凡此種種，在平時也許還不致如何，但若到了算總賬的時候，當然會一起都加上去的。

袁世凱在寫給端方的密札中說，岑春煊曾向慈禧推薦盛宣懷、鄭孝胥、張謇而未被接納，所以「人得藉口謂其自道，說出了奕劻因而大中傷。」這些話不啻是袁世凱的夫子自道，說出了奕劻在獨對時向慈禧密奏的岑瞿罪狀，原來便是指證他們的所作所爲在企圖引進維新派人物，陰謀篡奪慈禧政權，好爲戊戌政變的舊事翻案，而這些話正是慈禧所最驚心動魄的。所以即使奕劻所說的只是一些虛構誣砌的莫須有之言，在慈禧却不敢相信其必無。於是，獨對時的定議是先將岑春煊調出，即使岑不肯去，亦別有「對待之術」。至於瞿鴻禨，雖然「大老決不能動，同班中或不甚穩」云云，分明已預示瞿鴻禨亦將被逐出軍機，只是留作第二步的行動而已。林步隨說：「此事本由密謀，外間雖能揣知其情，初無佐證。及見此函，和盤托出，遂成千古信讞矣。」可謂信然。

九

奕劻在一番獨對中，以虛構的謊言中傷岑、瞿，既挽回了他自己的劣勢地位，也徹底排除了他的政敵，一舉兩得，可謂大獲全勝。此一毒計的進行情形，在岑、瞿二人自然無法想像得到，所以他們也未曾預防及此。這一層，只要看瞿鴻禨對於奕劻獨對一事的反應態度即可知道。林步隨說：

「光緒壬寅以後，兩宮歲常以春夏園居。三十三年丁未，西林入都，授郵傳部尚書，余時方以詞曹兼部屬。一日，西林幕客同里高君嘯桐走告曰：『聞昨日召見軍機之後，慶王單起，此何事也？故事，樞廷獨對，必有非常處分，君常在瞿相邸中，寧有所聞邪？』余愕然無以對。高君謂：『此事關繫至鉅，宜急往淀園面叩其詳。』余如高言以叩。文愼喟然曰：『爲賛帥耳。』蓋林文直在樞廷，以方鯁取厭同列非一日，上意亦不悅，慶王獨對，即爲承旨擯文直出軍機也。旨下，授文直度支部右侍郎。故事，軍機大臣本秩已躋二品，出授卿貳，顯爲左降，乃收回退出軍機之大駭視聽。文直以邊省巡撫驟入政地，實文愼左右之。及是，文愼爲之力請，更降旨令不必到部。不知者以爲文直危而獲安，爲文愼得君未替之證，而不知非也。……」

按，林紹年字贊虞，卒謚文直，上文所說到的「賛帥」與「文直」，都是指林紹年而言。由林步隨的這段話中可以知道，在奕劻獨對之後，岑春煊由郵傳部尚書外調爲兩廣總督，林紹年由軍機大臣左遷爲度支部侍郎。瞿鴻禨並不知道這都是奕劻獨對所造成的結果，還以爲獨對的目的

只在商量擯林紹年出軍機。然則林紹年之事，不過慈禧與奕劻所用的障眼法，其作用在轉移瞿鴻禨的注意力，使不知岑春煊之外調更有重大的意義而已。瞿鴻禨既不能察覺奕劻猶對時的眞正內容，岑春煊粗率無謀，自然更難察覺。所以他在行至上海之後，依然使用以前的老辦法：藉口有病就醫，在上海逗留不去，以覘後命。殊不知道此時的慈禧，對岑春煊的觀感已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不但「眷漸輕，勢大衰」，而且還懷上海的「不如不來爲愈」哩！就在岑春煊逗留上海的期間，對瞿鴻禨的攻擊亦已開始。這次出面攻擊的，令人非常意想不到，竟是與慶、袁毫不相干，而平素頗矜氣節的翰林學士惲毓鼎。

趙炳麟撰柏巖感舊詩話說，御史趙啓霖因奏劾奕劻父子而遭革職，出都之日，士大夫餞別於城南之龍樹寺，至者數百人，贈詩盈篋，發起者即是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未一月，徵採（按即惲毓鼎字）受奕劻指，以『授意言官』劾退瞿相國鴻禨，時論非之。」惲毓鼎之所以攻擊瞿鴻禨，據說疏稿出於袁黨人物楊士琦之手。最初欲賄買一御史上之，因懼得罪清議之故，無人敢應募，而惲毓鼎貪其重賄，竟悍然不顧，出面具奏。由於這本是慈禧與奕劻所早已商定的決策，所以惲毓鼎之劾疏奏上之後，並不須明白查究所劾是否眞實，便即降旨將瞿鴻禨開去本兼各職，罷斥不用。清德宗實錄中記載此時所降的諭旨如下：

「光緒卅三年五月丁酉，諭內閣：惲毓鼎奏參樞臣襲私挾詐，請予罷斥一摺，據稱協辦大學士外務部尚書軍機大臣瞿鴻禨，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佈黨羽。余肇康於刑律案未

嫻習。因案降調未久，與該大學士兒女親家，託法部保授丞參等語。瞿鴻禨久任樞垣，應如何竭忠報稱。頻年屢被參劾，朝廷曲予寬容，猶復不知戒愼。所稱窃權結黨，保守祿位各節，姑免深究。余肇康前在江西按察使任內因案獲咎，爲時未久，雖經法部保授丞參，該大學士身任樞臣，並未據實奏陳，顯係有心廻護，實屬徇私溺職。法部左參議余肇康著卽行革職，瞿鴻禨著開缺回籍，以示薄懲。」

看了這一道上諭，再將奕劻屢次被御史參奏所奉的歷次上諭相比，覺得慈禧處分惲毓鼎奏參瞿鴻禨一事，與她之屢次包庇奕劻而重懲言官的情形，簡直有霄壤之別。彈劾之奏章如果未經查實，只可說是莫須有之事。奕劻屢被彈劾，而且所劾的罪名甚重，從未有不經交查而逕予處分的，在查復者矇矓奏復而得悉所查不實時，受處分的仍是原參之人，而與奕劻前例。而且卽使交查，則奕劻無非貪毫無關係。以此相比，慈禧待奕劻何其寬厚，待瞿鴻禨又何其刻薄？所以然之故，卽庸誤國，不致背叛慈禧，瞿鴻禨則被奕劻指爲意圖篡奪政權，爲慈禧所深惡痛絕，故竟因自私而致失去理智，不知不覺之間墮入了奕劻與袁世凱所設計的圈套。瞿鴻禨個人的榮辱得失固不足惜，袁世凱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力，則從此有如附骨之疽，全在慈禧的一念之間，說起來實在深可慨嘆。

瞿鴻禨被罷斥之後，對於惲毓鼎所參各節，慈禧太后祇有形式上的一番交查，其實則對瞿之去留無關。因爲卽使查無事實，瞿鴻禨也早已開缺回籍，決不可能召回復用了。其後，奉旨查辦

的大學士孫家鼐、陸軍部尚書鐵良二人所上覆疏，果然不能爲惲毓鼎證實瞿鴻禨的罪名。此一覆疏對於丁未政潮的幕後秘辛頗有關聯，值得一讀。原疏不見於清實錄，却在趙炳麟所撰的柏巖集附錄中看到，抄錄其主要內容如下：

「臣等伏思，暗通報館，授意言官，必須問明何處報館，言官何人，方能據實查核。因令原奏官惲毓鼎開具節略。旋據開呈，汪康年爲瞿鴻禨密黨，曾廣銓爲鄉里私交等語，授意言官，則指出已革御史趙啓霖奏王夫之從祀一案。臣等窃謂原奏官一面之詞，恐或有所偏重，因復博訪周諮，詳愼考察。如曾廣銓乃原任大學士曾國藩之孫，與瞿鴻禨同鄉而有世交，難禁其不相熟識。汪康年係浙江人，曾經中式進士，與瞿鴻禨有文字之交，往來亦所難免。開張報館，曾廣銓入有股份，汪康年爲之主筆，人言多係如此。臣等反復推求，惲毓鼎所奏雖出有因，尚未能遽定此案虛實。開張報館，未有不欲售報之多，則假一有勢力之人以張其消息靈通之效，報館積習，大抵如此。謂曾廣銓汪康年借瞿鴻禨之勢力在外舖張，恐所不免；瞿鴻禨擇交不愼，防閑未能周密，或亦有之；若云用人行政大端，敢於預爲洩漏，恐瞿鴻禨斷不致糊塗至此。如以平時偶有往來，即指爲暗通消息，似尚未爲允協。瞿鴻禨業經奉旨開缺回籍，可否免其置議之處，恭候聖裁。至言官趙啓霖平素以能言自命，未必肯受人指使。且王夫之從祀一節，事屬因公，亦無所用其懷私挾詐及暗通報館等等情節，並請一併無庸置議。」

瞿鴻禨被斥逐放廢，表面上的理由是被人參劾有

慈禧太后中了奕劻與袁世凱的離間計，以致慈禧把瞿鴻禨和岑春煊當成了仇人。但因骨子裏的眞正原因不能公開示人，所以在孫家鼐和鐵良的奏疏上陳之後，表面上的理由也已站不住脚，奕劻和袁世凱只好另編一套說詞來向社會輿論作交代。那就是筆者在「袁世凱和慶親王」一文中已曾引用到的，凌霄一士隨筆所說，慈禧有意罷黜奕劻，而瞿鴻禨不愼洩漏消息，以致慈禧震怒，奕劻乘機令惲毓鼎奏劾，故而瞿鴻禨旋卽罷斥云云的「幕後秘辛」了。關於此一說法，林步隨曾亦指出其中之虛僞不實。他說：

「說者多謂汪舍人洩漏文愼奏對之語以致禍，其實當丁未春夏之交，慶王眷已稍衰，覩西林之留京，載振之開缺，朝士已微知之，無待於洩漏。此蓋若輩中傷之計已售，特假某詞臣一疏，撫暗通報館一事，以爲發難之端耳。文愼忠謹素著，得君最專，豈有倘信七年之久，忽因漏一言而獲罪？況文愼之與慶王不協，上意亦非不知之耶？」

這段話再度强調說明，瞿鴻禨並無可以罷斥的罪名。他之所以不免罷斥，卽是由於奕劻與袁世凱所進行的密謀，其事不足爲外人道。所以在孫家鼐鐵良查覆惲毓鼎所參各節並不實在之後，慈禧對此並無表示。所批「依議」，亦只是依其「可否免其置議」之議。柄國大臣之寵黜不以其罪，可知其中別有隱情。瞿鴻禨此時有詩誌感，云：

「臣罪邱山負至尊，捫心豈獨畏人言？
愚忠未效青蒲益，曲貸猶深羽扇恩。

十駕蹇蹶羞峻坂，九關孤夢隔重閽。
偶遊轂外初衣遂，息盡塵機老灌園。」

「青蒲」乃是皇后寢宮專用的地蓆，「羽扇」則指侍從之臣。這一聯用來借喻他樞密近臣的身份；「蹇蹶」意指病足之馬；「羞峻坂」則是自謙他在職時對國家政治並無裨益。這雖然也可以說是他對太后和皇帝自覺負有重若邱山之罪，然而，「捫心豈獨畏人言」云云，豈不便是他自問並無可爲人攻訐之陰私麼？瞿鴻禨的感慨如此，對於罷黜上諭中所加於他的那些罪狀，自然更可知道那只是外表形式，與眞正的事實無關。說來說去，瞿鴻禨和岑春煊，實在都不過是光緒卅三年政治鬪爭中因失敗而被犧牲的不幸者而已。

最有趣的是，罷黜瞿鴻禨的上諭中，指責他雖然屢次經朝廷曲貸其過，而最後仍是「猶復不知戒愼」。孫家鼐鐵良的覆疏，亦說瞿鴻禨之爲汪康年所利用，是由於他之「擇交不愼」。然則「不愼」二字，顯然已是瞿鴻禨生平之最大缺點。但在經過了十年之後，瞿鴻禨以清室遺臣的身份病死上海，宣統小朝廷却對他十分軫悼，恤贈之外，更賜謚曰「文愼」。瞿鴻禨出身翰林，依照清代謚法，上一字，則所選擇的往往最足以表示其人一生言行事功之特徵。至於下面一字，依例可以得「文」。瞿鴻禨生前屢被斥爲「不愼」，而此時竟得「愼」字，豈不表示瞿鴻禨一生即是以愼密小心得慈禧之信任的麼？準此而言，宣統謚瞿鴻禨爲「文愼」，看來還眞像是特意爲他當年的罷黜案雪冤洗謗，藉以彰露奕劻袁世凱之陰謀陷害。瞿鴻禨死而有知，眞應該感謝宣統對他

的這番知遇。

十

翟鴻棨被罷黜的消息傳佈之後，在上海逗留觀望的岑春煊大感震驚。政局他意識到已不可能再繼續從事倒慶倒袁的政爭了。然而，究竟是就此自甘屈服，老老實實地到兩廣去做他的總督，還是再在上海觀望一時呢？就在他躊躇未定的時候，新的變化又發生了。原因是奕劻與袁世凱感覺到翟鴻棨雖已擯出國門，岑春煊在慈禧心目中究竟還有若干分量，斬草如不除根，將來仍是難測之患。因此他們又進行了一個新的陰謀，其辦法比上一次所造的謠言更爲毒辣。劉成禺撰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卷二中有一條說：

「陳少白先生曰：岑春煊督粵，捕巨紳黎季裴、楊西巖等二十餘人，有籍其家者。粵人懸賞十萬金，謀能逐岑者酬之。少白手揭紅標。知春煊與項城有隙，西后西幸，寵又知西后痛恨康梁，乃賂照相師，將岑春煊、康有爲、梁啓超、麥孟華四像合製一片，廣售京津，由蔡鍔鉅金謁袁，轉李蓮英，密上西后。西后閱之大怒，遂有調岑離粵之命。乃煌得上海道。此奇計，少白得有陳平之目。」

又，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三，「袁世凱謀傾岑春煊」一條中亦有類似的記載，說：

「粵人蔡乃煌失志居天津，偵得其情，思媚袁以求進。因入照像館覓得春煊及康有爲影像各一，點景合成一片，若兩人聚首密有所商者，獻於世凱。世凱大喜，交奕劻密呈太后，證爲交通亂黨，春煊之寵遂衰。未幾遷粵督，未及履任，中途罷歸。乃煌以此擢上海道。」

比較上面的兩條記錄，胡思敬的記述得之於傳聞，而劉成禺的記述得之於當事人陳少白所說，自當以劉記較爲可靠，而胡記亦足以證明其事爲實有。若以時間而論，岑春煊初次由郵傳部尚書外調爲兩廣總督，逗留上海，藉病不去，而慈禧太后對岑並無嚴旨督促，反而准岑一再續假，足證此時岑春煊在慈禧太后面前的「眷」雖漸經，勢雖大衰，而尚未到屏絕斥逐的地步。但到了光緒卅三年的七月初四日。亦卽是岑春煊奉調粵督的兩個半月之後，情勢忽然劇變。這天所頒的上諭，說：

「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請開缺，疊經賞假。現在假期已滿，尚未奏報啓程，自係該督病尚未痊。兩廣地方緊要，員缺未便久懸，岑春煊著開缺安心調理，以示體恤。」

在岑春煊屢次給假，溫諭慰勉；現在岑春煊並未稱病奏請開缺時，慈禧並不准許，反而屢次給假，溫諭慰勉；現在假期已滿，尚未奏報啓程，自係該督病尚未痊。兩廣地方緊要，員缺未便久懸，岑春煊著開缺安心調理，以示體恤。」

奏請開缺，慈禧忽以「員缺未便久懸」爲詞，主動將他解除了粵督之職，名義上雖說是可以使他安心養病，「以示體恤」，其實當然不是那麼一回事。所給予他人的感覺是，岑春煊這次眞的栽了，不但失官，而且丟臉，從此以後，滿清政府中恐怕再無岑春煊的位置。既然事實的眞相如此，促成慈禧太后斷然下此決定的，必定有極爲重大的原因。推測起來，應當卽是袁世凱在這時送

上了這張要命的照片，然後才會使慈禧太后在急怒攻心之餘，毅然決定，從此將岑春煊斥逐不用。否則的話，以慈禧自己所曾說過，岑春煊對慈禧當年曾有大恩，又何致在此時有此決絕的措施呢？

另有一說，謂袁世凱所奏上的此一照片，係出於袁黨人物端方所媒孽。費行簡撰「慈禧傳信錄」紀此云：

「春煊方居滬上，聯絡報館，攻擊慶袁無虛日。袁乃以密札達樞廷，稱春煊近方與梁啓超接晤，有所規畫，以二人合拍影相附之。后覽相片無譌，默對至時許，嘆曰：『春煊亦通黨負我，天下事眞不可逆料矣！雖然，彼負我，我不負彼，可准其退休。』於是傳旨准春煊開缺調養。而相片實方以二人片合攝之，以誣春煊，后不及知也。」

此云袁世凱所呈上的照片係端方所僞造，由於我們已從陳少白的自述中得知此事的經過，以及其經手送達袁世凱的情形，當然可以知道費行簡之說不確。不過，費行簡所述，慈禧太后在見到此一照片時的反應及談話，與她對岑春煊的態度頗爲一致，因此亦可以使我們知道費行簡在這一方面的記述頗能接近事實。引述如上，以補前說之不足。

說到這裏，仍需一述岑春煊與李蓮英的關係。李蓮英是慈禧太后所最親信的大太監，在清末政治上的影響力極大。當年岑春煊隨扈太后及皇帝西幸，與李蓮英的關係極好，吳永所撰庚子西狩叢談一書中曾有極多的記述，何以在袁世凱呈進此一重要照片時，李蓮英竟不爲岑春煊設法廻

護呢？這一層，我們可以看看江庸所撰趨庭隨筆中的記述：

「岑雲階當庚子之變扈從行在，與閣宦李蓮英結交甚密，其受知孝欽，即由於此。迨入爲郵傳部尚書，自以爲歷任封疆，聲名已著，且方面奏慶親王奕劻貪黷不職，故餽李酒食亦拒絕之。李因大恚。其不久遽外出，雖奕劻擠之，李亦與有力焉。」

據此云云，則李蓮英當年雖與岑春煊結交甚密，此時却已因岑春煊之自矜身份而致交惡。於是，李蓮芙雖然還不是岑春煊的政敵，却也不再是岑的朋友。既不再是朋友，當然也就不會在緊要關頭時自動給予助力。由此可知，一個人的立身處世，開始時決不能走錯一步，否則便有無法同頭之苦。如岑春煊當年之結交閹宦，其目的自然是爲固寵之計。在他聲名已著之後，覺得這種關係足爲自己的盛名之累，很想從此改絃易轍，勉爲正人。然而李蓮英却不能諒解他的苦衷，終於也使他無法實現其願望，說來是很可惜的。

岑春煊失職之後，仍在上海僑居，頗以游讌徵逐自遣。宣統卽位後，袁世凱被放歸里，奕劻亦告失勢，朝局變革，岑春煊又有了出山的機會。因此當宣統三年四川爭路風潮發生之後，由於載澤及盛宣懷的薦舉，攝政王載灃決定起用他。這年七月，就降旨命岑春煊卽刻自上海由水路入川，會同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這時的岑春煊，雖然只是以「開缺兩廣總督」的名義入川襄辦剿撫，然而若以同時一般督撫的聲望而言，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與督辦四川鐵路大臣端方，無論誰都不足以望岑春煊之項背。所以這兩人一聽到岑春煊將要到四川來會辦剿撫，就

深恐自己的位置會被岑春煊所取代，百計設法阻撓。這年八月，岑春煊到達武漢，湖廣總督瑞澂就幫着端方和趙爾巽阻撓他。正爭議間，武昌新軍起義了，岑春煊在戰亂中匆忙逃回上海，後來雖然奉到調補四川總督的旨意，亦已無法到任。清廷遜位後，岑春煊還在上海。

按，岑春煊在光緒卅三年七月被開去兩廣總督職務，乃是出於慈禧太后的意思，其原因是慈禧認定岑春煊已與保皇黨的康、梁相勾結，不能再用了。慈禧死後朝局雖變，而柄政的隆裕皇太后與攝政王載灃乃是承受慈禧政權的舊派人物，如何可能拋棄前嫌，再度起用岑春煊爲封疆大吏呢？這裏面另有一段故實，不可不述。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卷二，在記述陳少白僞造岑春煊與康有爲等人的合攝相片之後，續云：

「春煊知爲像片所紿，自輦鉅金求計於蓮英。蓮英又以西后扮觀音，自扮韋陀，同坐一龕，上像片於西后曰：『老佛爺何嘗命奴才同照此像？足見民間僞造，藉觀朝綱。從前岑春煊康有爲等照片，想亦類此。』西后對岑意解。」

李蓮英所設計的辯論法十分巧妙，雖然慈禧不懂照片攝製技巧，亦必能窺破其間的秘奧。亦正因爲慈禧不久之後便已對岑春煊在光緒一朝雖無起復機會，到後來却仍然大有後望。只可惜大清帝國的壽命到此已經終結，時不我與，岑春煊即使仍有效忠故君之心，亦已失掉機會。岑、袁相爭，最後的勝利終歸於袁，這眞是無可奈何的事。

入民國後，岑春煊一度接受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委派，先任福建巡按使，繼任粵漢鐵路督辦

，屈身事仇，宛若前嫌業已盡釋。及袁世凱稱帝，岑春煊被南方推爲討袁軍的都司令，又與袁世凱站在敵對的地位。　國父在廣州組織軍政府，岑春煊起初與　國父同爲總裁，其後却又與政學系合作，反對　國父。似此朝秦暮楚，反覆無常，眞使人懷疑他當年何以能與袁世凱同享大名，號爲清末督撫中之翹楚？是否岑春煊當年有張鳴歧、岑熾二人爲其靈魂，所以纔能處處顯出他的才氣與魄力，而如今則已不然？至此，我們需要再來看看，當年的幕府奇才岑熾，此刻是否仍能爲岑春煊之臂助？

前面已曾說過，岑春煊官甘肅布政使時，已將岑熾羅致幕中。自此以後，岑春煊之勤王、衛駕、撫晉、督蜀、平盜，舉凡一切建功立業之事，幾乎都出於岑熾之畫策。而自岑春煊由郵傳部尙書出爲粵督以後，岑熾知事不可爲，卽致書乞退，不再參與岑幕之謀議。至於岑春煊入民國以後之諸般作爲是否與岑熾有關，則可以參看陳灨一所撰的岑熾傳：

「熾於煊之舉措，適於情合於理無不贊成，反是，面諍不少怨。煊平日於諸人之言，言之當否，皆不屈，獨視熾爲良師益友，言聽計從。糾彈奕劻等疏，俱出熾之手。辛亥鼎沸，煊再起爲蜀督，電召熾往，不赴。固請，乃渡輪之漢皋，語煊曰：『天下將大亂，是不過微露其苗耳。進退出處，公自決，吾老矣，不能相從。』遂歸。歸後易裝爲道士，徜徉山林泉石間，吟詩高歌爲樂。年七十有幾而卒。」

據此云云，則岑熾在岑春煊罷斥後便已離開岑之幕府，民國以後岑之反覆無常，都只是岑春

煊個人行動，與岑燡無涉。亦正因爲岑春煊失掉這一個惟一可共大事的智囊而兼諍友，所以岑春煊此後的行爲纔會變得如此錯謬顚倒，乖戾可笑。由此更可知道，岑春煊前半生事業之所以能卓然有所樹立，也都是出於岑燡之大力襄贊。

說完了岑春煊的故事之後，應再將瞿鴻禨的後來事蹟作一交待，以爲全文之結束。

瞿鴻禨卒於民國七年，壽七十歲，他沒有像岑春煊那樣再入民國政局，而且甘以遺老自居，不再過問實際政事。他的詩集有詩甚多，大都是罷政家居以後所作，而且有半數以上是和同時遺老們組織詩社時的酬唱之作，雖則念念不忘故君，也只是舊式士大夫的封建思想形式使然，不足厚非。綜其一生，瞿鴻禨可說是清末高官大僚中的獨立特行之人。他本人的風節峻厲，操守廉潔，完全不與當時的腐敗政風同流合汚。柄政之日，更希望竭盡所能，改造政治環境，爲國家開創新的機運，雖然所願未遂，而其志向極可欽佩。假如丁未政潮的結果不是後來那樣，也許近數十年的中國歷史竟會完全改觀。所以，縱使瞿鴻禨和岑春煊在實際政治上的建樹並不十分輝煌而特出，即此一事而言，他們所作的努力，在歷史上的影響便可能很大。讀史論世，不能以成敗論人。所以，瞿鴻禨和岑春煊在當年的一番努力，也還是值得稱道的。

盛宣懷（一）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這一系列的專題寫作，到現在已經首尾三年。選入這一專題範圍內的清末人物，不外是一些帝后王公、宰執大臣，以及若干功業彪炳，其事蹟足以垂諸後世的著名將帥。三年中所寫的總人數雖然不過二十餘人，而自太平天國以來的清末歷史，差不多都已包舉在這些人的生平事蹟之中。由於這一緣故，再要從「關鍵人物」的標準上選取合格的對象，已經很不容易了。例如本文所要寫的盛宣懷，看起來就難免予人以斤兩不稱的感覺。因爲盛宣懷在清代官不過尚書，除了多財善賈與長袖善舞之外，似乎別無所能。論名位，論事業，高過盛宣懷的清末人物何止百數？例如張蔭桓與劉坤一的生平，就要遠較盛宣懷來得熠耀有光。然而筆者之所以選取盛宣懷作爲關鍵人物之一，亦自有說。

筆者選入此一專題系列的人物對象，大致由下列各項條件着眼。第一類對象當然是最高的統治人物，因爲只有他們的意向纔是決定國家大政的最高力量，不明瞭他們的性格行事，很多事情

都無從談起。第二類對象是在國家民族面臨危機時，具有中流砥柱之力的將帥名臣，如曾、左、胡、李等；表彰他們的生平事功，等於就是在爲歷史作解釋。劉銘傳雖然不大够格，但因他在臺灣歷史上的影響很大，而臺灣現爲民族復興的基地，所以也從寬列入。第三類對象，則是在某一些時間內足以對當時的實際政治發生頗大之支配影響的。如恭王之翊贊同光中興，醇王之導引清末政治走向下坡，慶王與袁世凱之操縱光緒末年的政局……等。第四類對象，則是某些特出事件中的策動人物，如翁同龢之於甲午戰爭，載漪剛毅之於庚子拳亂，瞿鴻禨岑春煊之於丁未政潮……等。掌握了這些人物的當時動態，對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也就有了具體的瞭解。依據此一構想，張蔭桓與劉坤一的事功雖有可稱，却不能寫入這本「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之中。

張蔭桓在光緒二十四年以前，任職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後來之外務部），在對德外交及對俄外交上都有很大的影響力量。但因這些外交事務亦與同在總理衙門的翁同龢有重要關連，並且亦已在「翁同龢」一文中提到，如果另爲張蔭桓寫一傳記，在這些方面勢必要與翁傳重複，殊非適宜。劉坤一爲晚清的重要疆臣，與張之洞同享大名。其生平事蹟之可稱者有二：一是反對慈禧之廢立陰謀，足稱社稷之臣；二是在庚子拳亂時實行「東南互保」，爲國家保存元氣不少。但因前一事已經在光緒的傳記中提到，後一事實由趙鳳昌、何嗣焜所發起，盛宣懷所出面倡導，劉坤一雖有主持之功，究竟不能將主要功績歸之於劉。由於這些緣故，劉坤一反而變成無特殊事蹟可寫之人，爲之專撰一文，看起來也就覺得無此必要了。但是，盛宣懷又能以何種資格，入選爲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呢？

論到盛宣懷的政治地位，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宣統二年）方纔做到郵傳部尚書及郵傳大臣，有如今日的交通部長。交通部長所管的不過是交通行政，論理應不致影響及於全盤政局。但因他在郵傳大臣任內推行鐵路國有政策，引起四川爭路風潮，於辛亥革命之發生甚有影響，因之他這個郵傳大臣的身份也就很不尋常。這是他的第一項特點，因爲舉足輕重之故，足以入選爲「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其次，則他在清代末年以官員身份從事實業建設，舉凡鐵路、電報、輪船、礦冶等項事業，都有他的關係介入其中。到了後來，由於積貲千萬，而被人稱爲豪門資本，這也是他人所無法比擬的一項特點，足可使他傲視儕輩。以此而言，張蔭桓與劉坤一，看起來就不免相形失色了。所以，盛宣懷的政治地位雖然只是一個「二等」人物，他的重要性却非二等政治人物的身份所能具備。所以他的事蹟值得提出來一說。

在沒有提到盛宣懷的生平事蹟以前，我需要先將盛宣懷在當時最爲人所攻擊的特點指出來加以說明。那就是關於他的財產問題。

盛宣懷的出身，不過是中人之產的官宦家庭，世居江蘇武進，而從未以財富聞名於鄉里。但是在盛宣懷做到郵傳部尚書以後，關於他的財產傳說，便已十分駭人聽聞。據說，他的全部財產，值銀數千萬兩的財富，在當時沒有第二個人能够與之相頡頏，譽之爲富可敵國，並不過分。也許當時曾有人懷疑這是不

可能的事，但在盛宣懷死後，由於剖析遺產，其實際情形便逐漸透露出來了。

盛宣懷共有八子五女。但當他在民國五年去世時，活著的兒子只有五個。盛宣懷在臨死之前，曾將他的遺產按四六分析，規定以十分之四設立愚齋義莊，真辦慈善救濟事業，其餘十分之六，則分爲六股，五個兒子各得一股，另一股留作其妻莊氏養老之用。根據盛家傳出的總數，計有武進縣城內周線巷住宅一所，共計房屋二百四十餘間；愚齋義莊田產三千餘畝，則尚有蘇州杭州等地的地產，嘉定常熟等地的數十家當舖。現金及有價證券方面，計的「頤養費」銀七十萬兩，財政部捲煙庫券銀元七十萬元。輪船招商局老股一萬一千股二萬二千股，每股票面值銀元一百萬兩。漢冶萍公司股份二萬零股，每股票面值二百兩，共計值銀四百六十七萬兩，財政部捲煙庫券銀元七十萬元。輪船招商局老股一萬一千股二萬二千股，每股票面值銀元一百萬兩。漢冶萍公司股份二萬零股，每股票面值二百兩，共計值銀四十萬兩。漢冶萍公司股份二萬零股，每股票面值二百兩，共計值銀四百六十七

會，積聚到如此鉅大的財產，足見他的手腕實在高明之至！既然他的鉅額財產都是由做官辦實業而來，他的升官發財與政治恩怨，便一定會在實際政治上發生大大小小的影響。只此一點，他便有研究討論的價值。因此我們需要專寫一文來瞭解他。

（二）

盛宣懷，字杏蓀，號愚齋，晚年又號止叟，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人。祖父盛隆，舉人出身，曾官浙江海寧州知州。父盛康，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進士出身，官至湖北鹽法道。按，李鴻章亦是道光二十四年甲辰鄉試恩科的舉人，而盛宣懷也是在這一年出生的，由於這些淵源，盛宣懷之父盛康雖是李鴻章的科舉前輩，後來却與李鴻章結成金蘭之交。因此，盛宣懷在後來也成了李鴻章的世侄。盛康官不過道臺，對盛宣懷沒有太大的幫助；但因有李鴻章的照拂，盛宣懷後來就能在北洋得到了發跡的機會。

說到盛宣懷的出身資格，其實卑不足道——他雖然也曾讀書應科舉，却只能中一名秀才，想考一名舉人，也連應三次鄉試不第；在最後一次參加鄉試時，他已因參與李鴻章的幕府得有勞績，被累次保舉至加銜布政使的候補道了。道員四品，布政使則二品，帶布政使銜的候補道，已經算是「大員」了，如果再去參加鄉試考舉人，給那些年輕秀才們看了實在太笑話。爲了這一緣故，他終於只好放棄科舉之路，專心從事以官員身份而辦理工商的實際利益。據野史傳聞，盛宣懷曾

拜李鴻章爲義父，所以李鴻章纔對盛宣懷倚信有加。這一傳說是否屬實，固然很難得知，但如以盛宣懷所得自李鴻章的特別照顧而言，也未始沒有這種可能。

盛宣懷入李鴻章幕，是同治九年二月的事；這一年，盛宣懷二十七歲，已經具有秀才身份。同治初年，太平天國及捻亂相繼平定，全國治安逐漸恢復，惟一成爲禍患的，只是西北的回亂。同治九年，李鴻章奉命帶兵由直隸入陝，協助左宗棠討伐回逆，原在李鴻章幕中的楊宗濂函招盛宣懷前來相助，被李鴻章派充行營文案兼會辦營務處，由此得有功名，從候補知縣逐漸保升至道員，並賞加二品頂戴。李鴻章入陝剿回的時間很短，不久便因天津發生教案，中法兩國間的外交關係緊張，而仍調回直隸；所以盛宣懷在李幕中的一段時間內。同治十二年，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札委唐廷樞與徐潤二人創設輪船招商局於上海，唐廷樞和徐潤都是上海洋人的買辦出身，熟悉航運業務，不久便因天津發生教案，中法兩國間的外交關係緊張，而仍調回直隸；所以盛宣懷在李幕中的一段時間內。同治十二年，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札委唐廷樞與徐潤二人創設輪船招商局於上海，唐廷樞和徐潤都是上海洋人的買辦出身，熟悉航運業務，不久便因天津發生教案，中法兩國間的外交關係緊張，而仍調回直隸；所以盛宣懷在李幕中的一段時間內。同治十二年，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札委唐廷樞與徐潤二人創設輪船招商局於上海，唐廷樞和徐潤都是上海洋人的買辦出身，熟悉航運業務，是盛宣懷却並非這樣的人才，他之充任會辦，乃起源，終於使盛宣懷插足於上海的工商界，成了一個具有官僚身份的實業界人物。了。由於此一淵源，終於使盛宣懷插足於上海的工商界，成了一個具有官僚身份的實業界人物。充總辦而徐充會辦。過了不久，李鴻章又添派了另一個人來充任會辦，這個人就是盛宣懷。唐廷樞和徐潤都是上海洋人的買辦出身，熟悉航運業務，是盛宣懷却並非這樣的人才，他之充任會辦，乃起源，終於使盛宣懷插足於上海的工商界，成了一個具有官僚身份的實業界人物。

在清朝的同治、光緒年間，李鴻章是主持自強運動的要角。經由他所創辦起來的「洋務」事業，大至耗資數千萬兩的新式海陸軍，小至培植翻譯人才的「廣方言館」，項目極多；屬於通信及運輸方面的鐵路、輪船、與電報，亦是其中之一部分。我們不能懷疑李鴻章之創辦這些新

興事業有什麼不正當的意圖，但是，他和他手下的一大批人曾因創辦這些新興事業而無論如何，總是不爭之事實。例如向外國造船廠訂購新式的鐵甲兵艦，每艘動輒費銀洋鎗大礮等等新式軍械的費用也很貴。照外國商家的規矩，訂立合約購買這些船艦鎗都有一定的佣金可拿，英文稱爲「康密新」。李鴻章耗資數千萬兩建立北洋的新式海他不想賺取回佣，外國人也一定照規矩致送「康密新」，這筆收入，就十分可觀了。鴻章之命會辦招商局，經手購買輪船的銀錢往來，其後又以「官督商辦」的名義糾集報，及與外國資本家訂立合約，借貸大批款項建造鐵路，其中亦同樣有一定的酬勞可以這些地方的巨額收入，分出一部分來結交權貴，路遺當道，而將大部分納入自己的很容易博得上級長官的垂青，他自己的私囊，也很快地充實起來。此眞是所謂既得銀子，天下最便宜的事情，莫過於此。李鴻章的財產能够達到千萬之數，盛宣懷受李獻。亦因爲有李鴻章的大力支持，盛宣懷當然亦商股創辦電業，可說以招商局起家，以鐵路致富，以辦電報而得享大名，以投資礦冶事業而得以如此這般地交相爲用，多財善賈而長袖善舞，終於使他由一名不第秀才逐漸陞遷爲主行政的郵傳大臣，他的財富，也遠超於李鴻章之上。

招商局的創辦動機，起於海運漕糧。同治初年，浙江地方當局派候補知府朱其昂，負責將浙江省應運的漕糧在上海雇覓輪船，由海道直運天津，試行數年，不但安全迅速，而且

比河運節省運費很多。事情非常湊巧，盛宣懷也恰好在這段時間內，在上海結識怡昌洋行的買辦徐潤，知道經營輪船運輸有大利可圖，共同合夥買船兩艘，從事沿海航線的客貨攬載。此時見浙江漕糧亦用輪船海運，便以爲不妨將運載漕糧的範圍擴大，而由民間專門組織一個輪船公司來承運，不但可以抵敵外國勢力的侵入，並可乘機發展國人自營的航業。他將此一構想向李鴻章提出，李鴻章大爲贊成。因爲香港方面的英、美兩國船公司，如怡和、太古、旗昌等洋行，此時正在大舉開拓中國的沿海及內河航線，業務日益發達。李鴻章目睹中國的航利被奪，中國商民從事帆船航業的生計日見窘迫，正苦於無策應付，聽到盛宣懷的建議之後，便覺得此正是發展中國航業以抵敵外國航業的大好時機，便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名義正式札委唐廷樞爲總辦，徐潤爲會辦，命他們招集商股，成立航運公司，以開拓航運業務。這樣，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便誕生了。

招商局成立之初，名爲「輪船招商公司」，預定招集商股銀一百萬兩。但最初的成績並不理想，一年中所招到的商股，只有四十七萬六千兩，尚不足半數，所擁有的輪船，也只有伊敦、永清、福星、利運四艘，不但資本不足，運輸能力也很有限。但這家公司有兩項條件是洋公司所不能及的。第一，是清政府規定，政府官物的運輸必須交由這家公司優先運載，洋公司不得有所異議。由江浙運往北京的漕米，每年有四百多萬石，即使分配海運的漕額只有十分之四五，亦可得運費銀三十餘萬兩，乃是一筆極大的生意。由於漕米亦是政府官物之故，由招商局獨家承運，這

一筆運費就是招商局的穩定收入，足以使招商局在船公司所經營的沿海航運，對中國乘客的待遇極爲惡劣，中國人花費了很多錢買票坐船，還得受外國人的氣。自從招商局成立之後，很多人都因爲對外國人的敵視態度而自動搭乘招商局的船，因此使招商局增强了對外國船公司的競爭力量。由於這兩項有利的條件，僅有四條船的招商局經營一年結算盈虧，居然賺了很多錢。這一來使外國船公司大爲眼紅，嫉恨之餘，便使出跌減運價的殺手鐧來與招商局競爭，希望把立足未穩的招商局一舉擠垮，好讓他們繼續把持中國的航運利益。却不料招商局有漕米的運費收入爲主要財源，即使跌減運價吃了虧，仍然支持得住，倒是美商旗昌輪船公司旗下的大小輪船共有十六艘，經常開支極大，因跌減運價而致收入劇減，加上攬載生意亦大不如前之故，竟至無法支持，不得不減價出讓。招商局在兩江總督沈葆楨的大力支持之下，一舉籌撥公款銀一百萬兩，作爲「官本」。有了這一筆新增的巨額資本，招商局竟然有勇氣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出資旗昌公司轄下的全部輪船及碼頭棧房等一起接買下來。這樣一來，招商局即刻由四條船的小公司變成二十條船的大公司，不但根基穩固，與洋公司競爭的力量也增强了不少。

招商局買受旗昌輪船公司轄下的輪船十六艘，以及該公司設在上海、天津、寧波與長江沿岸各埠的碼頭棧房，耗資二百二十餘萬，這筆數目不能說不大，經手交涉及過付銀錢的，就是盛宣

懷。據當時傳說，盛宣懷在這項交易中頗曾得到一些好處——即是外國人習慣中的回佣。盛宣懷以政府官員的身份出任招商局會辦，竟然在輪船買賣中收受回佣，自然是有玷官常之事。物議沸騰的結果，便是御史上章彈劾，及奉旨交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及直隸總督李鴻章查覆。李鴻章雖然爲盛宣懷開脫罪名，劉坤一却不肯代人受過。由於李、劉二人的覆疏內容互不一致，再有諭旨查詢，劉坤一便直捷了當的上疏劾奏盛宣懷了。光緒七年三月廿六日，劉坤一在「復李捷峯」的信中提到此事，說：

「招商局一案，合肥力庇盛道，迫弟再疏劾之，始奉旨交譯署查議，看來無非含糊了結。似此遷就姑息，天下將無是非之公。弟之第二篇實爲紀綱起見，非斷斷求勝也。」

又在同年四月三十日的「復李勉林」信中說：

「招商局一案，昨經譯署主稿，僅將盛杏蓀交北洋察看，仍令弟與合肥調取卷宗帳簿，查明有無私得洋人中金。不知此等中飽之資，決無自留字據在局之理；即有，亦誰肯交出？弟第二摺業將此層聲明，譯署無非借此敷衍了事，不值一笑也。」

「譯署」，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簡稱；「合肥」，則指「合肥相國」李鴻章。李鴻章一力爲盛宣懷護航，總理衙門又受到李鴻章的關說囑託，其結果當然可以使一天大事化爲烏有。但是事實總是事實，即使李鴻章有辦法可以一手遮天，也總無法禁止人們之口語流傳。其中的實情，大致可以在劉坤一寫給李鴻章的信中見其梗概。信云：

「招商局之事，治晚先經請示左右，旋奉覆令各自覆奏，以杜人言。敝疏所叙該局員私得中金一層，係據芝田諸君稟揭，並非別有搜求，發摺後即經鈔呈氷案，可見治晚初無成見。現經尊處查出，行用即芝田諸君所謂中金，此六、七萬鉅款，保無染指分肥。此係取自洋人，於我何損？治晚決不再效豐干饒舌。……」

據此云云，則旗昌輪船公司之出讓，洋人在這次交易中共曾交付銀六、七萬兩的回佣，此款究係盛宣懷獨得，還是尚有他人共同分肥，已經是一個不容易了解的問題，而且事實上也不需要再作深一層的推敲研究。因爲我們從此一事件中，已經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盛宣懷不但工於心計，善於趨附逢迎，而且深知發財要訣。舊時的官僚，專門以貪贓枉法的行爲黷貨營私，這種行爲不但容易招致民怨，而且也很容易敗露。清代法律，對於貪贓枉法案件的懲罰極重，殺頭充軍，都是極尋常的事，對於所貪污的贓銀，如果追賠不足，更需抄沒家產抵償。但自「洋務」勃興之後，向外國購買的船艦槍砲及器材物料，動輒價值銀數十百萬兩，照外國規矩坐享回佣，不但得來極易，而且不能被指爲貪贓枉法，眞可說是最新穎也最安全的發財捷徑。在當時，懂得這一發財門徑的人極少，除了那些在外國洋行中充任買辦的華人之外，再有就是在外國銀行中做職員的中國人，就中又以久居香港，慣與外國人交易的爲多。盛宣懷在上海結識了洋行買辦唐廷樞、徐潤等人，又和他們合夥買輪船經營航業，漸漸地也熟悉了其中的巧妙。於是，他便可以用他肆應官場的本領，到工商活動中大展身手。旗昌輪船公司的回佣事件，只是一連串同類活動中的一例

，以後的同類事件正多，只要我們細心鑽研探討，便可以發現很多的證據。

（三）

上文說到盛宣懷出任招商局會辦之後不久，便因收受旗昌輪船公司的巨額回佣而致引起告訐彈劾，雖然因李鴻章之大力支持而得告無事，畢竟足以影響盛宣懷的名譽。但若以盛宣懷長期涉足於招商局所得的全部利益而言，這區區五、六萬兩銀子，即使全歸盛宣懷所得，爲數亦甚爲有限。試看他後來的財產中擁有招商局股票一萬一千股，佔該局的全部股分二分之一强，總值銀四百四十萬兩，便可知道他在招商局所發的財有多少。這些股票，有很多是他以不正當的方法巧取豪奪而得。股票以外，他在上海租界內所擁有的很多地產，有許多亦是以類似的方法得來。這在徐潤所撰的年譜中，有很明白的事實可查。至於他所以能够取得這些機會，則與他之握有招商局的大權有關。

招商局創立之初，原派唐廷樞爲總辦，徐潤爲會辦。盛宣懷後來雖然也成爲會辦，他的主要工作，只是辦理漕糧運輸，無權干預局內的主要行政業務。其後盛宣懷被參，交由北洋察看，唐廷樞又受李鴻章之命前往天津照料開平煤礦的業務，招商局的行政大權，便由徐潤一人執掌。徐潤以會辦總管招商局的行政業務，其時間直至光緒九年底；接下來繼續掌權的，就是督辦盛宣懷了。徐潤之離開招商局，是因爲他在招商局會辦之外，自己同時經營很多房地產及股票茶莊等生

意，投資數目很大。光緒九年，中國因越南問題與法國交惡，雙方情勢緊張，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上海商場的感覺靈敏，一遇到這種情形，信用收縮，頭寸調度不靈，徐潤所經營的商業，便有瀕臨破產的危險。盛宣懷在這時候乘機向南、北洋通商大臣各上一稟，強調徐潤的生意失敗，勢將牽動招商局。於是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直隸總督李鴻章就據此詳文撤換徐潤，而以盛宣懷繼其事。李鴻章札飭招商局的原文如次：

「爲札飭事。照得上海輪船招商總局規模日擴，事務益繁，前經飭派唐道廷樞、徐道潤總理局務，並委張道鴻祿、鄭道觀應幫同籌辦運漕，攬載各事。茲查唐道既須往來津滬，現又遠赴西洋，徐道駐局總理銀錢，未能愼重調度，以致挪欠過多。茲須從新整頓，收緊局面，議立經久規條，責成各員妥愼經理。除已於盛道等會議局務稟內分條明晰批示外，該局員等務當恪遵謹守，必信必果，以期持久，而圖自强。查鄭道篤實正派，向在太古公司專辦輪船，熟悉利弊，應飭於攬載之外，會同唐、徐二道總辦局務，實事求是，務使衆商悅服，船務起色。其提綱挈領，調度銀錢大事，暫令盛道宣懷會同鄭、徐二道認眞秉公商辦，俟唐道回滬後，隨時察酌飭遵。除分行外，合行札飭。」

創辦於清代末年的招商局，其組織體系非常奇特。它雖然是一個招集商股而成的民營事業，由於其中有甚多的官發銀兩供其週轉之故，所以其名義謂之「官督商辦」。意思是說，此公司的股份雖由商民湊集，主事者却是政府所派的官員；如上文所提到的唐廷樞、徐潤、鄭觀應、張鴻

祿等，都是捐納而來的「候補道」，雖主管招商局之事，却又需接受北洋通商大臣的監督指揮。北洋大臣爲什麼會有監督指揮招商局之權？則又因爲此局係由北洋大臣札派唐廷樞等人出面招集商股而設立，在理論上屬於北洋體系之故。當時的北洋大臣就是直隸總督李鴻章。李鴻章與盛宣懷有特殊淵源，早年雖因參劾事件而被迫不能過問招商局之事，此時時機來到，爲盛宣懷安排復出之機。這其中的關係，在徐潤自撰的年譜中有極明白的記載，說：

「按癸未上海法越之變，市面閉塞，寶源祥公司却有不可收拾之勢，於招商無恙也。盛杏蓀借端發難，個人具稟南北洋大臣，以該局本根不固，弊竇滋生，挾孤直之行，素無奧密之援，致奉參革，彙以泰山壓卵，誰敢異言？致潤有屈莫伸。查商局歷屆帳略，自同治十二年癸酉至光緒九年癸未六月止爲十屆，統共除支外，實餘銀一百五十一兩九錢五分三厘，則該局之穩固實情，可大白於天下，不知杏翁當日何所見而云然？其居心尤不可解。偏聽獨任，痛心千古，付之一歎而已。」

上文所說的「奧密之援」與「偏聽獨任」等等的話，大概都指李鴻章倚信盛宣懷之事而言；所謂「泰山壓卵」，亦就是指李鴻章以北洋大臣的身份干涉招商局事務，而使盛宣懷繼徐潤總理招商局全部「銀錢大事」的事了。不過，盛宣懷雖然挾李鴻章的勢力攫奪徐潤的總理大權，在徐潤總理局務之下的招商局業務措施，確實也不無可議之處。鄭觀應所撰的「盛世危言」後編，載有他在此時上呈李鴻章指出招商局的「利弊管見」十條，其中兩條說到，招商局過去所購新船，

並未按照公開招標的辦法登報公告，以致價格吃虧，而經手人得以浮開價格，從中漁利。修理船隻的情形亦復如此，以致各種油漆、鐵工、木工等皆被人把持，任意虛報價格，不無徇情之弊。另外幾條提到購料之糜費，客票之走漏，添煤之以少報多，煤棧之偷賣虛報，都是屬於財務方面的漏扈。至於管理方面的疎忽，如各船各棧的司事人員官場習氣太重，事不躬親監督，以致船上的茶房水手携帶私貨太多，而客商交運各物反因錯淆混亂而屢次需由公司賠償，無形中亦增加了公司的損失。這些事實頗足以使李鴻章相信，徐潤總理招商局局務，似不無因外騖太多之故，以致不能將全部精神投注於局務之管理整頓，再加上挪用招商局銀錢的可能嫌疑，當然需要另換他人接管了。但如李鴻章所換的不是盛宣懷，由於他與李鴻章的關係極爲密切，而他的操守又十分可議，我們便不能不認爲有此嫌疑了。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覆張君弼士書」云：「迨至癸未年，徐會辦因買地欠莊鉅款擱淺，牽動招商局，李傅相札委觀應與盛君杏蓀總辦。甲申中法之役，馬眉叔將局產全售旗昌洋行。中法事平，李傅相札委盛君爲督辦，向旗昌贖回。」據此云云，可知招商局的管理大權，在光緒十年的中法戰爭結束之後，就由盛宣懷獨掌了。盛宣懷繼徐潤之後管理招商局，對於徐潤總理時代的招商局業務情形所上的調查報告中看來，似乎並未有所改善。而馬相伯在當時更曾指出招商局的一項重大缺點，便是對於船隻的增添擴充

漫無計畫，以致招商局所負擔的成本太重，相對地減少了應有的盈利。他在報告書中說：

「總局之弊，失之太浮，舉措無當，全憑私臆。有如南洋船隻方苦虧耗，忽造致遠、拱北、圖南、普濟四艘，銀五十一萬兩，更無望餘利矣。又添造廣利、富順鋼身快船兩隻，銀四十餘萬兩，不知是何用意。長江輪船本足駛用，又添造江裕一船，銀二十四萬兩，喫本如此巨大……」

馬相伯報告書中所提到的招商局新建各船，都是徐潤總理招商局時代所建造的，雖然耗資甚鉅，並且徐潤亦因此而大遭謗議，但在徐潤手中所大力擴充的招商局資產，在後來却變成了盛宣懷藉以獲利的憑藉。綜計在徐潤離開招商局的時候，招商局所有的船隻是江輪八艘，海輪十八艘，合共江海輪二十六艘。盛宣懷接掌招商局，一直到光緒二十九年，這時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已換了袁世凱，袁世凱知道盛宣懷在輪船、電報、鐵路各項交通事業中得利太多，決心要將他撤換。除電報與鐵路另由他人接管外，招商局的總辦一職，袁世凱找了他的親信人物候補道楊士琦本身需在京中供職，上海招商局的局務勢難兼顧，因此又由袁世凱委派盛宣懷的敵對人物徐潤充爲會辦，代理總辦職務。根據徐潤在光緒卅二年報陳北洋大臣的招商局所有的江海輪船，自光緒十年至二十九年爲止，共祇添造過兩條新船。他在光緒二十三年，也曾爲招商局的舊事上呈合肥相國李鴻章爲自己分辯，其中說：

「光緒十七年，職道蒙李傅相札委，會辦開平等處礦務，迄於今日，久不問招商局之事。習聞該局獲利富厚，成效昭彰，固皆後來諸公調度經營之力，然回念疇昔，苟非將旗昌輪船公司併

入，以及自保船險，與金利源碼頭各口岸碼頭房產立基於前，豈能收效於後若此！所謂見功於成事之後，必先致功於創事之日者也。」

照徐潤的說法，招商局在後來十數年中之獲利富厚，是由於他在總理招商局的期間已將一切根基做好，盛宣懷接掌以後，纔能因緣時會，坐享成功。如果說得更明白一點，則盛宣懷擔任督辦時代的招商局，以不添新船的方式從事經營，即使積弊不除，也理應包賺不賠。因爲照任何一家輪船公司的經營慣例來說，要希望開拓業務，必須從減低成本及增加收入兩方面入手。減低成本的方法之一，是逐年提撥一定的盈餘收入，用來建造航行快速而節省燃料的新船，相對地減少舊船的消耗；增加收入的方法之一，則是以舒適而安全快速的新船來招徠主顧，以增加本身的競爭力量。所以，無論從減低成本及增加收入兩方面而言，營運所得的盈利，必須以一部分用再投資的方式從事汰舊換新，必不可以將盈利全部分配於股東，而使船公司喪失競爭的力量。徐潤造船太多，其步驟也許操之太急；但是，盛宣懷執掌招商局十九年之久而只添新船二艘，坐視船隻日趨老舊而年年盡分盈餘的做法，也未免太短視，太現實了。招商局的全部股額只有兩萬股，盛宣懷一人持有一萬一千股，乃是招商局的最大股東。逐年盈餘完全分配，最大的得利者便是盛宣懷自己。他的這種做法，一方面固然可以迎合大多數股東的願望，一方面也不無圖利一己之嫌。

雖然我們不能判道，盛宣懷的這種做法，究竟爲自己賺了多少，但若從他後來爲了圖謀興建平漢鐵路的督辦一職，竟至不惜投資數百萬接辦張之洞所建的漢陽鐵廠一事看來，便可知道，他在招

商局所賺的錢實在太多。至少，那幾百萬兩銀子便是他在招商局督辦任內所得的利益。至於招局的全部股額不過只有兩萬股，創辦人如唐廷樞、徐潤、朱其昂等都握有相當多的股份，盛宣懷如何能在後來獨有一萬一千股之多，那就是不可知的謎了。

（四）

盛宣懷初任招商局會辦，因經手買受旗昌輪船公司的棧、埠、船隻而涉嫌收受回佣，致被參劾一案，發生在光緒六年。自此以後，直到光緒九年，他有三年多的時間不曾過問招商局的內部事務。但是，他雖然在招商局方面暫時失意，由於李鴻章的支持，他在另一方面又有了新的創獲，那就是他一生中所辦實業工作的第二項——電報。此正是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在盛宣懷來說，正大可欣慰。

中國之設立電報，亦像輪船火車一樣，都是先由外國傳入，又幾經爭議，等到完全瞭解其價值之後，方纔急起直追，汲汲然惟恐不及的。招商局創辦於同治十二年，爲時最早；鐵路之興建，遲至光緒廿餘年方纔開始，爲時最遲；至於電報則介於二者之間，開始於光緒六年，其後決定仿照招商局的辦法「官督商辦」，則已是盛宣懷暫時脫離招商局以後的光緒八年。時間上的配合如此湊巧，我們如果要說，中國的電報是由於盛宣懷的創辦而得推廣，固然不錯；如果要說是李鴻章爲了要替盛宣懷安排新的出路之故，而特地在這一時間內指派盛宣懷擔任此一職務，以致他

適逢其會地在此時獲得了此一美譽，似乎也並無不可。不過，無論怎麼說，在中盛宣懷創辦電報的美譽，總是要永久流傳下去的了。

蕭一山清代通史記述外國電信技術傳入中國的情形說：

「中國電信之開創，始於大北（丹麥）大東（英國）兩公司海底電線之架設。同治八年，英使阿禮國欲由陸路修電線，總署嚴詞峻拒。次年，英使威妥瑪由香港循廣州達天津，線端在船內安放，不牽引上岸。許之，是爲中國境內有一完全電報線路之始。陸線方面，則丹麥商人開始架設淞滬線，英國亦於同治九年架陸線達九龍。章於大沽北塘海口砲臺設電線達天津，始爲中國自設陸線之始。」

由英國公使阿禮國請修陸路電報線，中間相隔的時間整整十年。爲什麼中國政府最初不准洋人架設電報線路，到李鴻章自設大沽北塘海口砲臺至天津的陸路電報設起來了呢？其後來却又自己架人基於迷信的思想，認爲電線不可架設。如光緒元年九月，工科給事中陳彝奏請修海底電線，是當時還有很多的疏片中說：

「銅線之害不可枚舉，臣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華洋風俗不同，天爲之也。耶穌，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毀其家木主。中國事死如生，千萬年未之有改，而體魄所藏爲尤重。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

爲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藉使中國之民肯不顧祖宗邱墓，聽其設立銅線，尙安望尊君親上乎？……」

這種迷信荒誕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固然十分可笑，在當時却有絕大的阻擾力量。例如光緒元年福州英國領事未得中國政府之許可，擅自架設電線，不久卽被當地百姓拆毀，便是明白的證據。電報通信的眞正價值，只有少數具有新式知識的軍政要員，纔能由軍事學的觀點加以體認。亦因爲有他們的呼籲，政府當局方纔知道電報的重要性而亟亟謀求推廣。光緒六年八月，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請開辦電報，在他所上的奏片中就曾極力强調電報在軍事方面的實用價值，說：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爲貴。是以泰西各國於講求槍砲之外，水路則有快輪船，陸路則有火輪車，以此用兵，飛行絕迹。而數萬里海洋，欲通軍信，則又有電報之法。於是和則以玉帛相親，戰則以兵戎相見，海國如戶庭焉。近來俄羅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國以至上海，莫不設立電報，瞬息之間，可以互相問答。獨中國文書尙恃驛遞，雖日行六百里加緊，亦已遲速懸殊。查俄國海線可達上海，旱線可達恰克圖，其消息靈捷極矣。卽如曾紀澤由俄國電報到上海祇須一日，由上海至京師現須輪船附寄，尙須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驛必以十日爲期。是上海至京僅二千數百里，較之俄國至上海數萬里，消息反遲十倍。倘遇用兵之際，彼等外國軍信速於中國，利害已判若逕庭；且其鐵甲等項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里，勢必聲東擊西，莫可測度，全賴軍報神速，相機調度。是電報實爲防務必需之物。現自北洋以至南洋，調兵饋餉，在在俱關緊要，

亟宜設立電報，以通氣脈。如安置海線，經費過多，且易蝕壞。如由天津循運河陸路以至江北，越長江，由鎮江達上海安置旱線，即與外國通中國之電線相接，需費不過十數萬兩，一年半可以告成。約計正線支線橫亙，須有三千餘里，沿路分設局棧，長年用費頗繁。擬由臣先於軍餉內酌墊籌辦，俟辦成後，仿照輪船招商章程，擇公正商董招股集資，俾令分年繳還本銀，嗣後即由官督商辦，聽其自取信資，以充經費。……」

李鴻章是清朝同治光緒年間推行自強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他以軍事必需的理由建議創辦電報，雖然執持迷信思想的頑固派依舊要反對，可是當國的慈禧太后和恭王却不能不贊成他。何況他所提出來的辦法，也同招商局一樣地是由「官督商辦」，政府雖然暫時墊下資本，日後仍可由商人集貲繳還，則是不需支用公帑而仍能收到使用電報之目的，政府當局自然更不能反對他了。這個「官督商辦」的好主意，由盛宣懷傳記資料中看來，也是出於盛宣懷的設計。盛用頤撰「顯考杏蓀府君行述」云：

「時文忠督直久，內政修舉，海內帖安，恒思效法歐西，爲自強大計。知府君夙以開通風氣自任，輒垂問商榷。府君以爲欲謀富強莫先於兩大端，兩者維何？鐵路電報是已。路事體大，宜稍遲緩，電則非急起圖功不可。文忠懼然曰：『是吾志也，子盍爲我成之。』府君唯唯，是爲辦理電報之始。當同治之季，日本窺臺灣，沈文肅諸公即屢言電報之利，奉廷諭飭辦而不果行。往歲文忠始招丹麥人設線於大沽北塘礮臺，傳令通信，莫不稱便。其時英國海線已由香港至廣州，

循通商各口以達天津者十年矣，至是復援前案引線達上海，且先在香港對岸設龍地方，丹國水線亦由吳淞上岸，設陸線抵上海，勢將延入內地。庚辰秋，府輪船局辦法招集商股，奏設津滬陸線，通南北兩洋之郵，遏洋線潛侵之患。並育人材，備任使。……」

庚辰，就是光緒五年。盛宣懷於光緒五年秋間建議李鴻章倣照招商輪船公，李鴻章也就在這年八月奏請由北洋先行墊款架設津滬陸線，然後招商設立電繳還所墊資本，以後即由商人收費經營。由盛宣懷的傳記資料中看來，這一整盛宣懷的設計，而由李鴻章付之實施。「官督商辦」的辦法開辦電報局，由商人集資開設的電報局亦旋即成立，主持此一電報局的「總辦」，由商人分期鴻章的關係創辦實業，又利用「官督商辦」的名義取得所辦實業的領導地位，自然更是非盛宣懷莫屬了。

如此。

在上引盛用頤所撰的盛宣懷行述中，有一點很值得我們注意，即是他與李鴻章所談到的開辦鐵路、電報兩大建設項目，其時間究在何時？假如盛宣懷在同治十二年以前就已看到這一需要，那末，他的高瞻遠矚，確實值得後人欽佩；假若他的此一構想，在同治十二年以後方纔成立，那時他已奉李鴻章之派遣，在招商局充任會辦了，他在那時方始有此想法，便與大有關係。由於招商局的成功，使他體認到交通建設是有大利可圖的新興事業，由於當時國內尚

缺乏這些新興的交通工具，而上海得風氣之先，早有外國人爲之宣傳媒介，自不難使日光敏銳而頭腦靈活如盛宣懷之亦官亦商者流，憬然了悟到此正是大力推廣的有利事業。於是他在往來南北洋之便，向李鴻章提出了他的構想。由於盛宣懷不是最先接受西洋教育之人，我們不能想像他在全國風氣未開之先，就能預先看到現代化交通建設對於中國社會的需要。所以我們很可以這樣猜想，他對於鐵路與電報的認識，大概也還是在上海擔任招商局會辦工作之後所逐漸建立起來的。

清代末年的各項新式交通事業，在開辦之初，都有很大的利潤。這是因爲中國過去的舊式交通工具極爲落伍，行旅往來惟有帆船車馬，通信則專恃驛遞，不但曠時費日，旅費昂貴，而且時虞刼盜，生命財物皆無保障。一旦有快速而安全的交通工具出現，無不羣趨而往。掌有這些交通工具的機構乘機抬高價格，自然可以利市百倍。徐潤年譜中有一段話，說到咸豐十一年上海寶順洋行經營長江輪運獲利情形如次：

「當時有長江輪船四隻，一總督，二飛似海馬，三氣拉度，四哥多索摩禮。另申港輪船二隻，小夾板船二隻。各船之中，以總督一船獲利最厚，蓋成本輕，載貨多。該船在香港多時，無人過問。適漢口開埠，寶順行主聞該輪價甚便宜，因卽置買修飾，來申放漢，往返一次所收水脚，足敷成本。緣彼時客位每客價銀七十五兩，往來一律。加以下水時拖帶本

地釣鈎船四艘，或帶鎭江，或交上海，每艘裝貨五、六百噸，每噸水脚銀十五兩，故獲利最厚。」

清代末年的白銀購買力高，一兩可以值到現在的美金三十元左右。由漢口搭乘寶順洋行的長江輪至漢口，每一乘客的票價高至白銀七十五兩，折合現在的幣值約爲美金二千二百元，足夠買飛機票到美國去了。就事實而論，當時的輪船客運成本，何嘗需要這麼多錢，無非是船公司老闆基於供求關係不能平均而趁機高抬價格而已。招商局成立以後，即使外國公司因競爭而削價，仍是有「大利存焉」。至於盛宣懷後來所設立的電報局，因爲國內並無外商所設的電報局可以競爭之故，無異具有獨佔性質，所以利潤也是很高的。盛宣懷奏疏內，有一件查電報局收支數目摺，開列自光緒八年至二十四年的歷年收支數目，所收電報費，自第一年的銀元六萬餘元逐年遞增，到光緒二十四年，一年所收已增至銀元一百十四萬六千餘元，十七年間所增加的倍數是十八點八倍。雖說他已將逐年盈餘中的極大數目都用到開闢新線的用途上去了，但到光緒二十四年以後，新增的路線已年少一年，逐年所得盈餘就是純利潤了。何況新路線增加則收入亦相對遞增，其利潤之穩固可靠，並不遜於輪船與鐵路。盛宣懷以大股東而兼爲督辦大臣，當然更可以握定利權，充盈囊橐了。

盛宣懷自創辦電報之時開始，即被李鴻章派委爲「官督商辦」的督辦大臣。自此直到光緒二十九年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盛宣懷所掌握的交通事業逐一爲袁世凱所奪，督辦大臣的寶座亦讓予袁黨人物吳重憙爲止，前後擔任電報局督辦大臣凡二十二年之久。在這一段長時間

內，他藉經營電報而賺大錢，雖然十分使人嫉視，但却也曾憑藉電報通信之便利，在國家面臨空前危難的時候，發揮他居中聯絡的力量，達成一項救國救民的偉大功績，在歷史上頗會留下美譽。這就是庚子拳亂時由盛宣懷所策動，而由劉坤一、張之洞等人聯合主持的「東南互保」事。

（五）

發生於光緒二十六年的庚子拳亂，直接引起八國聯軍的武裝入侵。當京津各地區慘遭戰禍之時，上海方面的英國商民爲藉口，企圖駛入長江，進佔沿岸商埠。這種情勢所可能產生的後果將會非常惡劣——入侵的英國海軍將會與中國軍民彼此敵視，北方的戰禍很可能在長江沿岸各省蔓延開來，屆時不但地方慘遭荼毒，人民慘遭殺戮，而在全國情勢普遍混亂的局面之下，後來的辛丑和約也就很難在短時間內簽訂，中國的元氣將更加艱難困苦了。在這十分重要的關鍵性時間裏，忽然有人出來策動長江各省的督撫與各國駐滬領事談判，適時地阻止了這一情勢的出現。此人對於國家社會的貢獻爲何，也就不言而喻。盛用頤所撰的盛宣懷行述，記述此事的經過情形說：

「庚子五月，拳匪事起。府君在鄂途次飛電榮相裕督，『拳民已燬路戕官，當以匪論，請痛剿，勿養癰貽患。』抵滬未旬日，詔令沿江沿海各省招拳民禦外侮。府君心知其矯僞，以所關至重大，飛飭各電局但密呈督撫，勿聲張，又電告各疆帥勿轉行，不則釀巨變。粵、江、鄂、閩四

督帥皆贊成，李文忠自粵來電，亦有『亂命不可從』之語。時各國紛調兵艦，江海各口，人心惶惶。府君首倡東南互保之議，密電各帥，既得同意，遂昌言於各領事曰：『各國公使現在圍城，各總領事應從權主持辦事。各督撫已奉詔自保疆土。今與諸君約，長江及蘇杭內地外國人生命財產，由各督撫保護之，上海租界中外商民生命財產，由各國公同保護之，此疆爾界，各不相擾。』越日，即偕滬道余撝珊中丞聯沅、暨江鄂代表道員沈藹滄中丞瑜慶、陶渠林京卿森甲、與駐滬領事商訂辦法九條，即世所稱東南保護約款也。」

盛用頤的這段敍述，文字內容不免稍涉誇誕，尤以前半段爲甚。其實在情形，應該參看另外一些當事人的敍述，庶幾可以窺見其時的事實眞相。趙鳳昌所撰的惜陰堂筆記敍東南互保事，則云：

「庚子拳匪之禍，當日中外報章，事後官私奏記，亦已詳盡，惟東南互保之議如何發生，則無人能言之。予既爲發議之人，更從事其間，迄於事平，應撮其大要記之。

「自五月初良鄉車站拳匪發難，京津響應，各省人心浮動，或信以爲義民，或迷其有神術。上海遠隔重洋，忽傳城內已有拳匪千人，飛渡而至，旅滬巨室紛紛遷避內地，有剛首途而被刼者。其時南北消息頓阻，各省之紛亂已日甚，各國兵艦連檣浦江，即分駛沿江海各口岸保護僑商。英水師提督西摩擬入長江，倘外艦到後與各地方一有衝突，大局瓦解，立召瓜分之禍。憂思至再，即訪何梅生老友商之云：『事已至此，若爲身家計，亦無地可避。吾輩不能不爲較明白之人，

豈可一籌莫展，亦坐聽糜爛？』其時各省無一建言者，予意欲與西摩商，各國兵艦勿入長江內地，在各省各埠之僑商教士，由各省督撫聯合立約，負責保護。上海租界保護，外人任之，華界保護，華官任之，總以租界內無一華兵，租界外無一外兵，力杜衝突，雖各擔責任而仍互相保護，東南各省一律合訂中外互保之約。梅生極許可，惟須有任樞紐之人，盛杏生地位最宜，謂卽往言之。並云此公必須有外人先與言，更易取信，當約一美國人同去。旋杏生約予往晤，尚慮端、剛用事，已無中樞，今特與外人定此約，何以爲繼？予謂此層亦有辦法，可由各省督撫派候補道員來滬，隨滬道逕與各國駐滬領事訂約簽字，公不過暫假名義，非負責之人，身已凌空，後來自免關係。卽定議由其分電沿江海各督撫，最要在劉、張兩督。劉電去未復，予爲約沈愛滄赴寧，再爲陳說。旋得各省復電派員來滬，盛卽擬約八條，予爲酌改，並爲加漢口租界及各口岸兩條，共成十條，並迅定中外會議簽約之日，其會議之所，卽在新建會審公廨。盛既不在簽約之列，對外卽不便發言。又慮滬道余聯沅向拙於應付，卽爲定中外會議座次——外人以領袖領事在前，以次各領事；中則以滬道在前，盛以太常寺卿爲紳士，居次，與余道坐近，再次各省派來道員。先與余約：倘領事有問，難於置答者，卽自與盛商後再答之，庶有轉圜之地。議時，領袖係美國古納總領事。果因五月二十五日上諭飭全國與外人啓釁，開口卽云：『今日各督撫派員與各國訂互保之約，倘貴國大皇帝又有旨來殺洋人，遵辦否？』此語頗難答，遵辦則此約不須訂，不遵辦卽係逆命，逆命卽無外交，焉能訂約？余道卽轉向盛跼蹐，盛告余：『卽答以今日定約係奏明辦理。

」此四字本公牘恒言，古領向亦解之，意謂予之先見，預與余道有約，幸波危境。予亦極稱其迅答四字之圓妙。自此互保簽約後，西摩及各外艦停止入江，內地免生外釁，不致全國糜爛，難於收拾，亦云幸矣。」

趙鳳昌出身張之洞的幕府，與張之洞的關係甚爲密切；沈愛滄卽沈瑜慶，盛宣懷行述中寫作沈藹滄，當時方以候補道身份在劉坤一幕府計劃方能得到張之洞與劉坤一的贊同。當時長江中下游的湘、鄂、贛、皖、蘇五省。既有劉張二人主持在先，其他各省督撫自然聞風響應。所以，東南互保條約自設計以至訂約，始終以趙鳳昌、何嗣焜（卽上文所說之何梅生）、沈瑜慶諸人出力最多。趙鳳昌何嗣焜之所以要邀請盛宣懷出爲樞紐之人，乃是因爲他身爲全國電報局的督辦大臣，適宜於居中聯絡之任，如此而已獲俞允，卽諾諾，而兩方簽約散會。盛同來，深服。看趙鳳昌的記述，盛宣懷在最初尙因身爲政府官員，不敢故違中樞決策爲疑，頗有畏縮趑趄之狀，賴有趙鳳昌何嗣焜之解釋，方敢暫爲擔當。然則盛宣懷行述中所說的「首倡東南互保之議」云云，未免亦有掠美之嫌了。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當此之時，也幸虧盛宣懷已經辦好了許多電報局與有線電報，所以纔能在危機一髮的重要時刻，藉電報連絡的便利徵得各省的同意。若是中國在當時還沒有如此便利的電報網，趙鳳昌何嗣焜卽使有東南互保的構想，亦無法使之實現。就此一事而言，盛宣懷所辦的電報事業，還眞是保全東南半壁的大功臣哩！

庚子東南互保，爲國家保全元氣不少，所以慈禧太后在第二年回鑾北京以後，也很覺得當年幸虧有此一保，否則將更不知增加幾分縱拳庇匪的罪孽。爲了有此覺悟，所以對當時的一班立功之人，都有加銜宮保的賞賜。蒙此榮褒的當時共有三人——保全山東的袁世凱，扈從西幸有功的岑春煊，與倡議東南互保的盛宣懷，一律賜予太子少保的宮銜。袁世凱岑春煊都是二品實職的巡撫，加銜太子少保，與他們的本官都能相稱；盛宣懷此時的本官只是三品的宗人府府丞，看起來便覺得他的恩命更不尋常。事實也確實如此，庚子東南互保，使盛宣懷的聲名一時顯赫起來。很多人都以爲他本來只是李鴻章的得力幹部，想不到他居然頗有政治家的擔當與識力，當然要使慈禧太后以下的王公權要們都得刮目相看。我們現在當然已經知道，盛宣懷的此一儻來富貴，無非是因緣時會，因人成事而已。不過他既然有這一份好運，未來的前途當然更會充滿著美好的遠景。所以他在辛丑和約簽訂以後，一再得到逾越尋常的超遷，幾年之後，並且攀升到了主管全國交通行政的郵傳部尚書，達到他一生事業的頂點。關於這一方面，我們且留待後文再詳；現在還需要補述的，是他在輪船、電報以外的另一項交通建設——鐵路。

（六）

在盛宣懷所從事的各項交通事業中，招致謗議最多的，便是鐵路。其原因由於鐵路建設所耗費的資金最多，而當時的清朝中國在屢次戰敗之後，民窮財盡，無法籌集大量資金來建築鐵路，

不得已只好出之以借貸外債的方法。而盛宣懷奉派爲鐵路總公司的督辦大臣時，又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的國力衰微已極，外國資本家深恐鐵路借款無法收回，在談判借款條件時總是多方要索，誅求無厭。爲了達到借款築路之目的，他自己又在其中得到太多的好處，終於使他的辛苦經營成績亦被叢積的謗言所埋設，功不抵過，說來誠然深可嘅嘆。凌鴻勛先生所撰的「盛宣懷與中國鐵路」一文，對於盛宣懷建造鐵路的成績頗致推崇，以爲盛宣懷在光緒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擔任鐵路總公司督辦大臣期間，共計造成鐵路二千一百餘公里，其長度超過民國成立以至民國二十年所造成的鐵路里數，其成績甚有可稱。但我們若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便不難發現，盛宣懷之熱心造路，其眞正動機並不純正——不在福國利民，但求營私自肥。這裏面的關係，可以從他謀求鐵路總公司督辦大臣所使用的手法看出其中之端倪。

要知道盛宣懷用何種手法謀得鐵路總公司的督辦一職，可以先看胡思敬國聞備乘一書中的記述。國聞備乘卷一，「盛杏蓀辦洋務」一條說：

「盛宣懷辦洋務三十餘年，電報、輪船、礦務、銀行皆歸掌握，攬東南利權，奔走效用者徧天下，官至尚書，貲產過千萬，亦可謂長袖善舞矣。其始起推挽，由李鴻章。鴻章內召，王文韶繼爲北洋大臣，倚之如左右手。北洋京畿左輔，爲洋務總滙之地，湖廣總督張之洞忌之。是時盧漢鐵路議成，南端由之洞主政，北端由文韶欲保用宣懷，恐之洞不從，遣宣懷詣武昌探其

意旨。之洞辦武昌鐵政，虧空過百萬，方窘迫莫知爲計。宣懷至，許爲接辦，任彌補。之洞大喜，遂與文韶合疏保薦宣懷爲督辦蘆漢鐵路大臣。……」

盛宣懷爲謀求獲得鐵路督辦大臣而付出的代價，是答應替張之洞設法彌補漢陽鐵廠的虧空，並且接下他的爛攤子。如果我們不作進一步觀察，還不能够知道，盛宣懷答應接辦漢陽鐵廠遺個爛攤子，所需投下去的資本是多少？所需要冒的風險有多大？關於這一點，盛宣懷在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奏上「漢冶萍煤鐵鑛現籌合併擴充辦法」一疏中曾有說明，可以窺見其經過情形之概略。疏云：

「竊維湖北漢陽鐵廠前因官費難籌，經前督臣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二年五月遵奉諭旨招商承辦，奏明飭將湖北鐵廠歸盛宣懷招集商股經理。臣謬膺艱鉅，勸集商股。當時煤鑛未成，化鐵甚少，外狀顯危，人情觀望。尙賴輪電兩局各華商，及通商銀行、紡織公司各華商力顧大局，陸續湊入股分銀二百萬兩，以立根本。臣不自量力，一身肩任，初謂籌款數百萬卽足辦理，實不知需本之鉅，有如今日之深入重地者。蓋東亞創局，案未經見，而由煤煉焦，由焦鍊鐵，由鐵鍊鋼，機鑛名目繁多，工夫層累曲折，如盲覓針，茫無頭緒。及至事已入手，欲罷不能，惟有躬冒奇險，精思銳進，艱危困苦，絕不瞻顧，期於必成。於是重息借貸，百計騰挪，開闢萍鄉煤鑛以濟冶鐵之需，添造新式機鑪以精鍊鋼之法，鐵路輪船，碼頭棧駁，處處鉤連，無一可缺，借貸利息，愈久愈增。查自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奉飭招商接辦起，截至三十三年八月爲止，鐵廠已用商本銀一千

二十萬餘兩，煤鐵輪駁已用商本銀七百四十餘萬兩。……」

即使說，盛宣懷對於漢陽鐵廠在後來需要投下如此鉅大的資金，是他當初所未曾料到的事；但他在奏疏中既說，接收之初就已準備「籌款數百萬」，來爲湖北鐵廠作起死回生之計，而且該廠在當時顯已呈現「外狀顚危，人情觀望」的情形，則盛宣懷願對此廠投資數百萬兩，顯然也是極大的冒險行爲了。爲了希望獲得張之洞的支持，以求得到鐵路督辦大臣的位置，竟至願冒虛擲數百萬兩的危險，當然意味鐵路督辦大臣所能得到的利益，遠勝於此了。就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情況來說，盛宣懷的動機，確實有可能是這樣的。

據凌鴻勛先生所撰的中國鐵路志說，盛宣懷出任鐵路總公司的督辦大臣以後，先後與比、英、美等國簽訂修築漢口、蘆溝、汴洛、正太、道清等五條鐵路，借款條約大致都包括如下各點：

一、按借款總額的九折交付現款，即是回扣一成。

二、築路所需材料，必須向借款國家購買。

三、借款係分爲二十年或三十年償還，在未償清債務之前，鐵路的行車管理之權由借款公司管理，並每年分取百分之二十的盈餘。

四、鐵路的總工程師及總會計均由借款銀公司推薦外籍人員充任，以致全路的用人行政之權，亦操於洋人之手。

上面所舉的三、四兩點，也許祇是路權損失的問題，盛宣懷於此，並無好處；但若以一、二兩點而言，其中的可能花樣，就多了。凌鴻勛先生所撰的「盛宣懷與中國鐵路」一文中曾經說到，滬寧鐵路於光緒三十一年完成蘇州上海段之後不久，盛宣懷的督辦大臣一職便被袁世凱所奪去，由唐紹儀繼任其事。該路原訂合同借英款三百二十五萬鎊，至此，因原預算超出，由唐紹儀與英國銀公司商定，續借六十五萬英鎊，合計總工程費爲三百九十萬鎊。但是，唐紹儀與英國銀公司所商定的借款條款，與盛宣懷時代稍有不同，除二、三、四款仍照舊規外，第一款所定的借款同扣，却由原來所定的九折實付，提高爲九點五五折實付。亦就是說，由于唐紹儀的交涉，中國方面所能實際收到的借款，比原來的條件增多了百分之五點五了。在這剩下的百分之四點五當中，唐紹儀與經手的外國人仍有利益可得，並不至於吃虧，所減去的百分之五點五，很明顯地卽是盛宣懷所加的虛頭。滬寧鐵路的借款情形如此，其他四路的情形當然相同，基於此一標準，試爲盛宣懷算一算他在這些借款中所額外多得的利益究有多少，便可知道盛宣懷之所以亟亟謀求鐵路督辦大臣，究是爲了何種企圖。

盛宣懷擔任鐵路督辦大臣九年，經造鐵路五條，悉以借款築路的方法築造。總計這五條鐵路的全部借款總額，約爲英金一千零六十五萬鎊。以百分之五點五計，盛宣懷在應得同佣之外所增加的虛頭，共計英金五十八萬五千七百五十鎊。以當時的鎊價計算，英金一鎊約值中國的白銀七

兩五錢至八兩，以此換算中國的貨幣，全部價值約爲銀四百四十萬兩。這還只是額外多取的回扣部分，除此之外，尚有購買材料方面的花樣，與督辦大臣的鉅額薪酬。

民國初年，在北洋政府中有「財神」之稱的梁士詒，曾經在盛宣懷離開督辦大臣一職後做過「五路提調」，所管的便是盛宣懷築造的五條鐵路。據梁士詒年譜所說，這五條鐵路的借款合同內都規定，鐵路督辦大臣月支薪水公費銀一二千至三四千兩不等，照例在總工程費內開支。五路合計，督辦大臣的月支薪水公費，在銀二萬兩以上。月銀二萬，在盛宣懷來說，也許是甚麼小數目，但若以當時一般官吏之薪額而言，就是駭人聽聞的大數目了。至於材料購買方面的花樣，雖無具體資料可指，但若以他的親信幹部朱寶奎在後來與他反目成仇一事而言，其中的弊竇，顯然也是十分嚴重的。

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三，「朱寶奎叛盛歸袁」一條說：

「常州朱寶奎，游學西洋歸，賓緣入盛宣懷門。宣懷以鄉誼，處以鐵路局小差，人頗機警，漸被親任，不數年，由同知捐升道員，遂充上海電報局總辦，凡各局弊竇，無不知之。窺宣懷絕美，求爲簉室，宣懷不許，由是離交。私發路局積弊，並鈔錄累年洋商交涉案，叛歸袁世凱。世凱久延鐵路、招商、電報三局之利，而不詳其底蘊，至是得所藉手。遂參宣懷，盡撤其差，以鐵路局交唐紹儀，招商局交楊士琦，電報局交吳重憙，而保寶奎爲郵傳部侍郎。後爲岑春煊劾罷。」

國聞備乘的這一段紀錄，大致正確，但亦不免稍有錯誤；例如朱寶奎在充任盛宣懷的親信時

期，不止做到上海電報局總辦爲止，否則他又何能知悉鐵路局中的積弊？由盛用頤所編的盛宣懷奏疏電稿「愚齋存稿」卷七中見之，在光緒二十八年九月，盛宣懷奏報「淞滬鐵路工竣造銷」一摺，其中曾有朱寶奎的名字，當時他的職銜，乃是鐵路總公司的「購料處道員」。可知朱寶奎在做過上海電報局的總辦以後，又曾擔任過鐵路購料處的美差。當時的鐵路材料，都從外國買來，其中的浮報價格及收取回扣，弊竇百出。朱寶奎以盛宣懷的親信而膺此要職，在總工程費八千餘萬兩中經手購買材料，其作用何在，不問可知。亦正因爲朱寶奎在深悉電報局的弊竇之外，又知道借款中的回扣之弊及鐵路購料之弊，所以纔能以這些有用的材料，作爲叛盛歸袁的進身之階。如其不然，袁世凱縱能知悉電報局之弊，亦絕不能同時知道鐵路方面之弊，其事理殊爲明白。至於國聞備乘所說，袁世凱在知悉盛宣懷的營私舞弊內情之後，「遂參宣懷，盡撤其差」，亦不無錯謬。因爲袁世凱的「養壽園奏議輯要」中並未見有參盛之疏，光緒東華錄中亦沒有這樣的記錄、愚齋存稿、及梁士詒年譜等有關史料中看來，袁世凱之奪取招商局輪船及電報、鐵路諸利權，乃是逐步實現的行動，並非在短時間之內所一舉完成的。

（七）

愚齋存稿卷前附有盛宣懷行述，其光緒二十八年之記事云：

「九月，大父疏薦，府君哀慟太過，疾又劇作，隨即電請開去各差缺，俾安心守制。旋奉諭

旨：『盧漢、粵漢鐵路總公司及淞滬鐵路籌款、購地、買料、修工事宜，仍著盛宣懷一手經理。』欽此。文襄復力陳鐵路不可易人，府君三辭不獲。十一月，直督袁公蒞滬臨弔。府君爲言：電報宜歸官有，輪局純係商業，可易督辦，不可歸官。某本不願利權久操，爲世指目。袁公入都謀之榮相，卽另簡電政大臣，但改官辦而不還商本。輪局亦由北洋派員接替。」

盛宣懷於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丁父憂，袁世凱亦適於此時請假回河南原籍葬親，事畢之後，卽由河南取道武昌乘兵艦沿長江而下，到盛宣懷的武進老家來弔祭盛宣懷之父喪，時間上的湊合如此巧妙，眞是不可思議之事。光緒東華錄卷一百七十六，光緒二十八年九月甲戌條記云：

「諭：朕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袁世凱著賞假四十日回籍葬親。該督之母劉氏，著加恩賜祭一壇，著河南巡撫派員前往致祭。」

袁世凱在此時請假回籍葬親，然後紆道前往南京上海一帶，很可能是一種有用意的安排。是不是朱寶奎的叛盛歸袁，便是在袁世凱出京以前發生的事？是不是袁世凱之來到上海，便是因爲尋覓機會而圖趁此對盛下手？由許多事情之發生時間來看，似乎正有此種可能。因爲袁世凱此時的身份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輪船招商局及電報局都歸他所指揮監督，借盛宣懷丁憂守制之名而撤掉他的招商局督辦之職，當然是袁世凱權力範圍之內的事。至於電報局之收回官辦，並非同時發生之事。光緒東華錄卷一七七，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己巳條記云：

「諭：各國電務，多歸官辦，凡遇軍國要政，傳遞消息，最稱密捷。中國創自商辦，諸多窒

碍。亟應收回，以昭鄭重。著袁世凱張之洞迅將中國所有電線核實估計，奏請籌撥款項發還商股，即將各電局悉數收回，聽候遴派大員認眞經理，以專責成，而維政體。」

這段諭旨中的「聽候遴派大員認眞經理」一句，最堪注意，其中的用意，分明在說，盛宣懷以「官督商辦」方式所辦的電報，經理殊多不善，雖未說其中多弊，意思亦很明顯的了。所以接下來的諭旨，便是：

「前因電務爲軍國要政，應歸官辦，已諭令袁世凱張之洞籌還商股，將各電局悉數收回，候派大員經理。著卽派袁世凱爲督辦大臣。直隸布政使吳重憙，著開缺以侍郎候補，派爲駐滬會辦大臣。該局改歸官辦之後，其原有商股不願領回者，均准照舊合股，朝廷於維持政體之中，仍寓體恤商情之意。該大臣等務當統籌全局，認眞辦理，將從前積弊，一律剔除，以期上下交益。」

由這段諭旨的內容看，其指責盛宣懷管理下的電報局積弊甚多的意思，更是明顯的形諸文字了。盛宣懷管理之下的電報局積弊甚多，袁世凱並未明白參劾，祇是藉改商辦爲官辦的方式，將電報局的管理權從盛宣懷手中收回，顯然還是顧慮盛宣懷在慈禧太后跟前的「簾眷」尚隆，慈禧太后也許還念着盛宣懷當年藉電報局的樞紐地位倡導東南互保，甚有功績，袁世凱不敢冒昧從事，所以纔需要出以這種紆廻曲折的手法吧！這種情形，在盛宣懷的傳記資料中也可明顯的看得出來。盛宣懷行述：

「癸卯二月，兩宮謁陵，道經所管鐵路。袁公約北上襄辦大差，因在制不入覲。或勸從權易

吉，府君執不可。旋奉旨，准素服冠頂，在保定迎駕請安。三月初十日召見，先垂詢病狀，後述蒙塵情形，且謂非汝等力保東南，恐無今日。命賞福字疋頭，餙餙肉食。並奉懿旨，以承辦大差一切周妥，交部優敘。」

但是這種情形並不能維持得很久，原因是蘆漢鐵路在光緒二十四年開工建造之後，到光緒三十年便已分段通車營業，三十年一年中所得的淨利是銀二百三十七萬五千餘兩，三十一年一年所得淨利是銀元三百四千餘元。按照盛宣懷與借款公司所立合約，借款建造的比國公司可以在借款未曾償清以前，逐年分取鐵路盈利的百分之二十。在訂約之時，一般人都不相信此路造成之後能有盈餘可得。現在路尚未成，一年所得淨利即達銀元三百萬元以上，而比國公司約分享盈餘，每年可得銀元六十萬元之多。加上借款同扣與逐年所須負擔的利息，以及比國公司把持路政等等的不合理現象，許多人都覺得，盛宣懷與比國公司所訂的借款築路合約損失利權太多，不無出賣國家權益而圖利個人之嫌。與此同時發生的，還有滬寧鐵路的用途浮濫，借款太多的問題。於是，不但與論之指責繁興，各地士紳更紛紛上書抨擊，一時之間，盛宣懷竟成了萬矢羣集的攻擊對象。爲了平息謗言起見，他在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奏上一摺，以「五路以次奉准訂約，各處分別開工，深恐顧此失彼」爲言，請求添派會辦大臣，一駐京會辦蘆漢鐵路，一駐滬會辦滬寧鐵路，並保薦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堪以充任。奏上之後，奉旨交與商部會同直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議奏。袁世凱乘機提出建議，蘆漢、滬寧二鐵路卽派唐紹儀以會辦大臣的名義接辦。由於唐

紹儀的介入，鐵路方面的內部底蘊完全暴露了出來，於是，盛宣懷的鐵路總公司和督辦大臣名義，都保不住了。盛宣懷行述記其事云：

「乙巳（光緒卅一年）十月，遵旨自滬赴榮澤，會同唐公紹儀驗收橋工，並舉行全路落成典禮。未及覆命，因觸發咯血舊疾，奏明回滬就醫。比歲以來，維新志士本其愛國熱誠，視借款造路如鴆毒蛇蠍，不加研求，一倡百和，至有路成地亡之說。寧滬、蘇杭甬皆踵粵漢而起，爭議收回自辦，風潮勃興。府君既重違輿論，又以路約借約悉根於朝旨部令，未嘗絲毫自專，然不能盡人而喻之，殊覺進退維谷。幸唐公奉命接替，遂奏請裁撤總公司，併歸辦理，以一事權。報銷既竣，如釋重負。……」

粵漢與蘇杭甬鐵路，亦是盛宣懷主持鐵路總公司時，所擬議借款興造的未成鐵路。由於五路的既成事實在前，人們深恐他所簽訂的合約一如蘆漢、寧滬，所以不但反對借款興建，並且要求收回自辦。在這種情形之下，盛宣懷的借款造路辦法勢必要改絃易轍，他的鐵路總公司當然也非撤銷不可。這是他自辦實業以來所栽的最大跟斗。而且不僅此也，由於唐紹儀的介入鐵路，而唐紹儀又將精於綜核鈎稽的梁士詒請到鐵路督辦公署來做總文案，無形中等於又培植了另一個鐵路專家出來。梁士詒出身翰林而曾居袁世凱的幕府，與北洋的關係極深。袁世凱自從有了梁士詒這一鐵路專家，便更加可以放心大膽地與盛宣懷作對，盛宣懷的利益，到此時便更加岌岌可危了。

三水梁燕孫年譜有一段話說到此事，云：

「吾國鐵路，創始於李鴻章劉銘傳，主其事者，則以唐景星（廷樞）、伍廷芳爲先進。盛爲後起，逢迎李意，掠美擅權，坐擁厚貲。自設立鐵路總公司，內容尤深秘不可言。先生佐唐鈞稽清厘，欲掃除蕩滌一切。舊日有關係人聞之，大懼。先生之與盛結怨，亦自此始。」

梁士詒後來在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被郵傳部奏派爲新成立的鐵路總局局長。卅四年三月，朝中有旨，命中外大臣保舉人才以備任使，袁世凱上疏薦舉梁士詒，疏中對他的評語是：「心精力果，學術兼優。經郵傳部奏充鐵路總局局長，將歷年與各國所訂借款造路合同，鉤稽得失，於事權利益，挽回不少。」唐紹儀與梁士詒竭力清厘鐵路公司的積弊，固然爲國家挽回不少利權。而其眞正目的亦並不在此。劉成禺所撰的世載堂雜憶，有一條說：

「袁世凱既爲北洋大臣，勢寖寖盛。欲練兵，辦新政，而苦經費不足。袁之智囊楊士琦乃獻策，盡收盛宣懷所辦事業，以給用度。楊遂以候選道而爲候補四品京堂，督理招商局及電報局矣。厥後入商部，爲左丞，洊升侍郎，皆由於此。」

劉成禺說楊士琦曾接管盛宣懷的電報局，當然不對；但他指出袁世凱收奪盛宣懷所辦的各項交通事業，是爲了覬覦這些事業的獲利優厚，希望藉此增多利源，以充實北洋的勢力，則是很能道破袁世凱之政治野心的。由於這一緣故，盛宣懷與袁世凱成了政敵。所以不但袁世凱要利用唐紹儀與梁士詒來清查盛宣懷的鐵路積弊，盛宣懷也要在瞿鴻禨與岑春煊計劃倒袁時，在幕後出力支持。袁世凱在丁未政潮時所寫給端方的密札中，曾說：「舉武進鄭張，上均不以爲然，人得藉

口謂其推翻大老，爲歸政計，因而大中傷。武進供給，亦有人言及，恐從此黃鶴一去矣。」信中所說的「鄭、張」，指鄭孝胥與張謇，「武進」，就是盛宣懷的代名。所謂「武進供給」，意思是說，瞿岑二人所密謀的倒袁計劃，金錢方面的來源，是由盛宣懷負責供給的。由此可知，袁世凱借事攫奪盛宣懷的輪船、路、電利益，到後來已發展成爲政治上的恩怨鬪爭了。這種關係繼續發展下去，無疑會對實際政治發生影響。後來的事實演變，亦正是如此。

（八）

袁世凱在光緒二十八年被任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其時榮祿還是領軍機大臣。到光緒二十九年三月榮祿病死，慶王奕劻入領軍機。自從這時開始，直到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慈禧和光緒相繼病卒，袁世凱被逐出軍機，放歸洹上爲止，前後六年之間，正是袁世凱勢力的全盛時代。盛宣懷既然成了袁世凱的敵人，在袁世凱當權的時候，當然不會有他的出頭機會。何況輪船、電報、鐵路的幾個「督辦」大權盡爲他人所奪，盛宣懷即使於心不甘，亦只好隱忍待時。好在政治人物的升沉榮辱往往隨時而變，袁世凱的時代不一定能永遠繼續下去，盛宣懷的翻身機會，總是有的。

盛宣懷前此所辦的輪船、電報，都是「官督商辦」性質，鐵路總公司的督辦大臣亦出自政府所派。如以當時的政治制度來說，都是屬於官員的「差使」，與本人的官位是兩回事。譬如說，

盛宣懷在開始參加輪船招商局時，他的官職是候補道，由北洋大臣札委爲招商局的會辦。候補是「官」，招商局會辦是「差」。後由招商局會辦變爲電報局總辦，仍只是差使的變更，候補道的官員身份如舊。由於他是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親信，在光緒十年時，又由李鴻章奏署天津海關道，攝篆四月，這就不是「委差使」而是做官了。清末官場的習慣，凡是督撫大吏的紅人，在本官之外兼上許多個差使，乃是常有的事。所以盛宣懷在光緒十二年簡授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後，雖然說已由候補道變爲實缺官，他所擔任的招商局督辦輿電報局督辦二差，一樣可以兼領遙攝。至光緒二十二年，王文韶張之洞合疏保盛宣懷督辦鐵路，於是清政府便降旨，將盛宣懷開去津關道實缺，作爲「四品京堂候補」，無法以天津海關道兼津海關監督後，官運愈見走紅，地位也愈見重要。光緒二十八年，因爲清政府認爲鐵路督辦的工作重要，盛宣懷充任鐵路總公司的督辦大臣。這是道遙領，所以開去實缺而改爲候補，俾能專心從事；此時的鐵路督辦大臣，也仍是差使。由於鐵路及電報方面的勞績，北洋大臣王文韶一再奏保，盛宣懷的「四品京堂候補」，不久便補到太常寺少卿的實官。京官到了「京堂」的地位，陞遷就很容易。何況他在庚子拳亂時，還有「倡議東南互保」的特殊功績。所以在光緒二十七年兩宮回鑾以後，宗人府丞出缺，慈禧便以盛宣懷指名補授。按照慣例，宗人府府丞正三品，由正四品的通政司副使或大理寺少卿循序陞轉，向來不需要另外請旨補授。盛宣懷由太常寺少卿越次得此，顯然是慈禧太后對他的「殊恩」。京官中的再上陞，就是二品的侍郎或副都御史，有資格

被稱爲「卿貳」大僚了。而盛宣懷之由宗人府府丞陞工部左侍郎，也不過只是隔了一年多的事情。宗人府府丞和工部左侍郎也都是實官，雖然無碍於他所兼領的輪船、電報、鐵路諸差，但袁世凱在此時業已漸露頭角，盛宣懷的好運不久便要遭遇挫折。及至諸差先後被袁所奪，工部左侍郎的本官又因父喪丁憂之故而被開去，孑然一身，百無聊賴，其境況之落寞，看來也頗爲可憐。不過，由於盛宣懷此時業已具備二品大僚的身份，此時雖然不幸頓挫，遇到時機來臨時，就不愁沒有翻身的本錢。因爲侍郎去尚書不過一階，只要朝裏有人，何愁不能升官？一旦官位到手，大權在握，到時候還怕不能揚眉吐氣麼？

胡思敬國聞備乘說，盛宣懷「服闋還朝，徧交朝貴，皆不得其歡心，臥病僧舍幾不起。後數年，度支部辦預算表，梁士詒與唐紹儀把持郵政，皆粵黨也，澤公謀欲去之，莫能窺其底蘊。盛宣懷乘機進賄，遂起用爲郵傳部尚書。」按，盛宣懷之升任郵傳部尚書，已是宣統二年十二月間的事。其時袁世凱早已被逐歸里，朝局早已變革，而盛宣懷却並無進用的機會。其原因由於此時正是親貴用事的時候，袁世凱倒臺之後，政治大權落入貝勒載濤、載洵、與鎭國公載澤等一班少年親貴之手，非攀附這些人的關係不能進用。而袁世凱雖然暫時垮臺，他與慶王奕劻所結合的勢力，仍在當時的政府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所以唐紹儀與梁士詒也仍然可以把持交通事業，使得度支部尚書載澤對之無可措手。盛宣懷後來之能够復出，一方面固然由於載澤之立意要整頓交通事業方面的收入，盛宣懷能够投合其需要，另一方面也還是金錢運動的力量。凌霄一士隨筆記述

此事，另有更爲詳盡的探討，云：

「唐紹儀之議印藏條約，梁士詒爲隨員之長，甚見倚任。比歸，督辦鐵路，所轄鐵路凡五，以士詒充提調。旋設郵傳部，紹儀爲侍郎，復引士詒入部，授參議，後遷右丞，主鐵路局。仕膴權重，謗亦隨之，馴有五路財神之號。其受攻擊始此，後之大著財神之名，亦以此爲權輿焉。載澤長度支部時，在政府中獨樹一幟，以集中財權爲務，猶載濤之集中軍權也。盛宣懷希進用，厚結載澤，志在郵部。載澤以郵部爲富有收入之機關，爲擴張勢力計，遂言於載灃，召用宣懷，授郵部侍郎。宣懷既受事，即以裁抑鐵路局爲第一著。沈雲沛以農工商部右丞署郵部侍郎，且晉署尚書，與宣懷旗鼓相當。蓋雲沛以奕劻爲奧援，而宣懷則挾載澤之勢以敵雲沛，其勝負之判，決於尚書之誰屬。與雲沛之進退有密切關係者，首爲士詒。士詒爲雲沛謀眞除尚書，即所以自救，而尚書一席，卒爲宣懷所得。

「自載灃監國後，北府（原注：俗稱醇王府爲北府）聲勢驟隆。太福晉（原注：載灃生母）頗暗中干政。宣懷謀擢尚書，介府中管事人某通殷勤。士詒爲雲沛畫策，亦留意斯途，且欲爲特別設法。而宣懷捷足先登，兼有載澤之助，雲沛僅恃奕劻，遂相形見絀。宣懷擢尚書，雲沛乃授吏部侍郎。吏部昔稱六曹之長，而此時已成閑署，且行將裁撤矣。雲沛由絢爛而平淡，鬱鬱寡味，未幾即乞休。宣懷如願以償，意氣發抒，遂貫徹其主張。以侍郎李經方接收鐵路局，並澈查士詒歷年經手之五路款目，風行雷厲，不稍寬假。迨袁世凱入京組閣，士詒始恢復已失之勢力

，且以葉恭綽承其衣缽，交通系之名詞，乃漸成立焉。」

如上云云，則盛宣懷之由起復而至升任郵傳部尚書，中間還着實費了許多氣力。盛宣懷因進賄載澤而得用爲郵傳部尚書；凌霄一士隨筆亦說，盛宣懷之進用，由厚結載澤及交通醇府太福晉而來；然則盛宣懷爲了達此目的，所化費的代價一定不少。胡思敬的國聞備乘卷四，另有一條記此，云：

「盛宣懷既失鐵路之利，鬱鬱不伸者累年。已而袁世凱黜，載澤與粵黨爭權，窺其有隙可乘，遂賄載澤六十萬金，起用爲郵傳部尚書。」

如果胡思敬所說的確有其事，則盛宣懷所用於通賄載澤的，便已有六十萬金之鉅，再加上醇王太福晉方面的費用，合起來便更有可觀了。盛宣懷多財善賈，百十萬兩銀子，在他並不算是大數目。只是，他之亟亟謀求得此一官，究竟是爲了恩怨報復還是另有目的？這倒也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九）

盛宣懷於宣統二年十二月升任郵傳部尚書，翌年四月，清政府實行「責任內閣」制度，奕劻爲第一屆的內閣總理大臣，盛宣懷亦由郵傳部尚書改爲郵傳部大臣。再過了四個多月，辛亥革命就因武昌起義而爆發了。袁世凱再度出山，繼奕劻組閣，盛宣懷則在奕劻下臺之前就已被革職，

從此退隱不仕。綜計他以郵傳部尚書及郵傳部大臣身份綰領全國交通行政的時間，不過只有九個月而已。「盛宣懷行述」記敍他在這段時間內的具體政績說：

「計自受事數月，若收回郵政，接管驛站，規畫官建各路，展拓川藏電線，釐不燦然畢舉，逐件施行。又加以幣制改革，細極毫芒，振鬙追求，急於星火。銀行借款，川粵漢鐵路借款，商訂合同，尤爲繁重。府君向以勇猛精進任事，當應之以整暇，雖不遑寢處，而未嘗言勞。……」

盛宣懷出生於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也就是他父親盛康中進士的那一年；到宣統三年辛亥，他已經六十八歲了。以一個望七之年的衰耄老翁，而且素患痰喘咯血之病，這時爲了做官，竟不惜以衰暮之餘年孜孜兀兀，不遑寢處，究竟所爲何來？據梁士詒年譜所說，盛宣懷在此時之所以要再度出山，其處心積慮之目的，就是要報復當年的政治仇怨。抄錄一段年譜中的記載如下，以供研究比較之用。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宣統三年正月廿四日記：

「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奏撤先生鐵路總局局長職，並請派員調集該局歷年帳册及收支憑證，逐一查核其中有無弊端。在先生交郵局長後，將經手帳目送交清查款項處，竟數十日夜鉤稽册籍，凡三閱月，無絲毫出入，事遂白。在盛宣懷未長郵傳部以前，已有給事中及各道御史七人奏參任用私人，虛糜公款等詞。及盛到任，參揭益厲，發蹤指示，固昭然若揭也。」

又宣統三年四月記云：

「自先生被革去鐵路總局長後，盛宣懷得發舒其意，與載澤、鄭孝胥等相結，欲大有所爲，而先從鐵路收歸國有入手。時清廷當積弱之後，威信久失，革命運動潛滋暗長，將一觸卽發。盛氏憯焉不察，欲倚以有成，結果反成亡清之導火線，實亦盛氏之所不及料也。然盛之所以堅持鐵路國有主張，其意不過在復前此所綰鐵路被奪於唐紹儀之仇，且藉以恢復勢力，固無所謂政策也。特畫策者爲之緣飾推衍，勾結以成其事耳。三月中，給事中石長信奏，鐵路亟應明定幹路國有，枝路民有，俾維大局，奉旨交郵傳部議奏。盛覆奏稱：『該給事中所言，係國計民生兼顧，所有明定統一之法，似不可再事因循。應請明降諭旨，曉示天下。』至是，遂有所謂鐵路國有政策之宣布，其中布置，固早定之豫也。」

梁士詒既然也是盛宣懷的政敵，他的話就是「讐口之言」，不可以完全相信。不過，梁士詒年譜所說，鐵路國有政策乃是載澤、盛宣懷、鄭孝胥諸人所籌之已熟的「大計」，石長信的奏摺不過是互相呼應的發動信號，這話大概不錯。凌霄一士隨筆亦有相似的說法，云：

「澤、盛分據財政交通，高掌遠蹠，實奕劻之勁敵。慶內閣成立，載澤羣卽謀倒閣。其時諸者以厚聲勢。如張謇、鄭孝胥等，載澤皆竭力羅致，預儲爲新閣大臣之選。謇、孝胥以在野之身於政情者多謂，繼奕劻爲內閣總理大臣者，必載澤無疑。載澤既思組閣，則延攬當時有名流之目，均特蒙召對，載澤力也。張系健將孟昭常，在京辦一『憲報』，攻擊慶內閣失政最力，其言論頗見重一時。嗣以贊成鐵路國有政策，爲清議所不滿。及川、鄂事起，宣懷罷斥，憲報亦停刊

。」

這一段話與梁士詒年譜所說的內容頗相符合，可知當時的事實大概卽是如此。宜懷以郵傳大臣的身份提出鐵路國有政策，並能得到內閣及攝政王載灃的贊同，與持大有關係。盛宣懷縱或有假借此事以報復於唐紹儀梁士詒的用心，亦是因事勢順水推舟的助力，論到此事的主要策動力量，固不在盛宣懷個人也。

按，清代末年的政治腐敗，朝綱濁亂，自從老醇王奕譞在光緒十年柄政之後，坡之勢，歷經戊戌政變及庚子拳亂，到慶王奕劻入主軍機的時代而達於極點。當時之士希望能够加以挽救改革，如康有爲梁啓超輩所領導的維新運動，瞿鴻禨岑春煊倒慶倒袁計劃，都是此類；雖則他們所希望達到之最後目的並不一樣，其出發點都良政治，則是一樣的。宣統年間攝政王柄政而親貴攬權，其中亦不乏識見明敏的有領財政的度支部尚書載澤，卽是。他在此時計劃推翻慶內閣而自爲之代，其目的未得政權之後，能一展其救國救民之抱負。這是因爲載澤幕下頗多才智之士，目睹國思變，很希望能以改良政治的方法爭取人心之向附，從而消弭政治革命之出現，其確而遠到。他們所提出的鐵路國有政策，縱使在當時甚爲人所詬病，論其方針，固，我們應該順便在這裏談一談載澤之爲人。

載澤乃是清仁宗嘉慶帝第五子惠端親王綿愉之後，降襲鎭國公。因爲他的妻子乃是光緒皇后

隆裕之胞妹，隆裕在宣統朝成了皇太后，所以載澤在財政大權以後的具體政績，在楊壽枏所撰的「覺花寮雜記」中頗有介紹，摘引兩條如下。其一條云：

「戶部之權以北檔房爲最重，司員中才望卓著者，始派此差。光緒末年，改爲丞參議二，各司公牘，先送廳核定准駁，丞參畫諾，然後呈堂。宣統中，澤公以貴胄爲尚書，威權最重。其人剛毅廉正，不受請託，親貴如洵、濤，樞臣如慶、那，亦懾其威稜。度支部奏請之事，內外官奉行惟謹。故清理財政、實行預算、提陋規、剔中飽，嚴核浮濫，雷厲風行，節省至一萬元以上，雖部臣疆吏不便其所爲，未有敢公然抗令者。鼎革以後，整理內外財政，猶以宣四預算爲藍本。袁項城置諸案頭，手自批注。嘗語余曰：『前清預備立憲，惟度支部事爲榮，公牘皆自辦，不假手吏胥，故非才最有成績，餘皆敷衍耳。』時部中司員以兼清理處差不得入選。民國以來，居財政要職者，半爲清理處舊僚也。」

又一條云：

「余任度支部參議時，尚書爲鎮國公載澤，左侍郎爲紹陳二公明練財政說明書。第二年試辦各省預算，令各省造送財政統一於藩司。第三年試辦全國預算，劃分國家稅地方稅。第四年實行預算，辦理決算。第五年施行會計法，金庫制度。第六年各省設立

財政司。自此事權統一，法制嚴明，使全國財政如輻在轂，如綱在綱，度支部通盤籌劃，調劑盈虛，而清理之事畢矣。惜試辦三年，僅成立預算，劃分兩稅。鼎革後，所定計劃盡付東流。今則財政雜糅，征斂繁重，政府恣其掊克，計吏肆其侵漁，余所抱政策與時枘鑿，不敢復談財政矣。」

楊壽枏在前清度支部任職時，受載澤之命清理全國財政，正是載澤所推行的財政改革計劃之一。如果清理財政的計劃能如楊壽枏所說，在六年之內分期完成，不僅全國財政可納入統收統支的預算規制，各項興革措施方有實施之可能。立憲維新，改良政治，此實爲首要之圖。由袁世凱對載澤整理財政措施之推挹，可知載澤對於革新財政，不但有計劃，而且有貫徹執行之決心與毅力。清理財政方面的工作成績既有可稱，假如鐵路國有政策不因遭遇意外的糾紛而致挫折，相信亦可以在載澤的堅強毅力與決心之下產生良好的結果。至此，我們應該回過頭來觀察一下，載澤與盛宣懷所計劃推動的鐵路國有政策，其本身是否有可議之處？

（十）

全漢昇撰「鐵路國有問題與辛亥革命」一文，在檢討了清代末年商辦鐵路歷久無成的情形之後，認爲鐵路國有的政策並無錯誤。文中說：

「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一年設立鐵路總公司，派盛宣懷爲督辦鐵路大臣。因爲當日國內資本缺乏，故建築鐵路所需的鉅額資本，不得不倚賴外債來應付。自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蘆漢、正太、滬寧、汴洛、粵漢、津浦、道清等鐵路的借款合同，以及蘇杭甬、浦信、廣九各路的借款草約，都由盛宣懷以鐵路總公司督辦的資格，來與外人訂立。盛氏大借外債的結果，路權喪失，自然要引起國人強烈的反感。因此，自光緒二十六年至宣統二年，全國各省都普徧發生拒借外債、廢棄成約，而把鐵路收回自辦的運動。在當日收回自辦的鐵路中，以自美國合興公司贖回自辦的粵漢鐵路最爲重要。此外，當日由國人集資商辦的，有川漢、贛路、閩路、粵路、浙路、西潼、新寧、豫路、桂路、騰越、同蒲等組織。可是，這些由國人集資商辦的鐵路，由於股本籌集的困難，管理效率的低下，和組織的不健全，建築的速度非常之慢，或甚至長期不能開工。例如光緒三十四年上諭說：『鐵路爲交通大政，紳商集股請設各公司，奏辦有年，多無起色，坐失大利，尤礙交通。』又如汪康年在宣統三年五月初一舘言報發表『論鐵路國有與民有』一文中說：『夫所謂民有者，謂其招股商辦也。今各省皆於未招股之前，舉紳士爲總協理，而學界中人爲之羽翼，後卽招集巨股，而前之總協理盤據如故也，雖有股東會不能伸其意見也，是於商辦二字不合矣。……況各省籌款難，不能動工者，其總協理以下，坐耗薪水如故也。籌款易者，則爭角劇烈，糜費尤甚。於是七八年之久，集款一、二千萬，僅成路一二百里者有之；集款數百萬，僅成路數十里者有之；採辦之侵蝕，與官辦無異。夫如是，吾安能主持民有之說乎？』

又宣統三年八月，御史史履晉說：『夫各省商辦鐵路爲世詬病，授人以口實者，不足而先事舖張，竭小民之脂膏，供個人之揮霍。或款已集而互爭權利，因私家之水火，誤公事的惡劣，促使滿清政府改變他的鐵路政策，即由商辦改爲國有。而在當日鐵路政策改變的過程中，粵漢及川漢鐵路商辦情況的不能令人滿意，尤其是最重要的關鍵。」

粵漢及川漢兩鐵路的情況如何不能令人滿意？這在盛宣懷的愚齋存稿中亦有具體記錄可查。引敍兩段簡單的文字，就可以大致概括。一是宣統三年五月，盛宣懷奏上「遵籌川粵漢鐵路收回辦法摺」內所說到的粵漢路商辦情形，云：

「鄂湘商股，固甚微薄。瑞澂電稱，鄂路並無尺土寸料，湘路雖有米捐鹽捐田租房租，然路線甚長，民計甚窘，竭力搜索，告成無期。」

川路方面，則宣統三年五月初五日，盛宣懷在寫給護理四川巡撫王人文的信中，引敍四川京官甘大璋等人的話說：

「現開工二百餘里，九年方能完功，全路工竣，需數十年。後路未修，前路已壞，永無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後款不敷股東付息，款盡路絕，民窮財困。」

商辦鐵路的成績惡劣如此，爲了希望能把攸關國家經濟發展的交通命脈——鐵路——從速建成，除了把商辦鐵路收回官辦以外，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而收鐵路爲官辦，即是改商辦爲國有

的政策改變問題了。但這裏面所牽涉的問題甚多。第一，是改商辦爲官辦之後，商股遭受損失。如果退還商股的辦法被認爲不公平，受損失的商民勢將羣起而與政府爲難。第二，是當初之所以要將商借外債的鐵路收回自造，原爲防止路權落入外國資本家之手。如果在收回官辦之後，政府仍因無法籌集資金而借貸外債，無疑又將引起輿論之責難。清政府在宣佈鐵路國有政策之後所引起的種種糾紛，事實上也就是因此而起。

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宣佈於宣統三年四月十一日。這一天所頒佈的上諭，說：

「中國幅員廣濶，邊疆遼遠……必得有縱橫四境諸大幹路，方足以資行政而握中央之樞紐。從前規畫未善，並無一定辦法，以致全國路政錯亂紛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行批准商辦。乃數年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帳甚鉅，參追無著，湘鄂則開局多年，徒資坐耗。竭萬民之脂膏，或以虛糜，或以侵蝕。恐曠時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貽誤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諭，昭示天下，幹路均歸國有，定爲政策。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各省集股商辦之幹路，延誤已久，應卽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築。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從前批准幹路各案，一律取銷。至應如何收回之詳細辦法，著度支部郵傳部懍遵此旨，悉心籌畫，迅速請旨辦理，該管大臣毋得依違瞻顧，一誤再誤。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卽照違制論。將此通諭知之！」

這一道上諭頒佈之後不久，郵傳大臣盛宣懷便卽與英、法、德、美四國的銀行代表簽訂合同

，借款英金六百萬鎊，約合銀四千七百萬兩，以供興建粵漢、川漢二路之用。這宣佈鐵路國有政策之後不久，便立卽商借外債興建粵漢、川漢二路？其中原因，自然因粵漢路籌議已有基礎，著手較易，川漢路的問題最多，必須早日爲之解決，而粵漢爲南北之幹線，川漢爲入藏的重要通路，清政府此時正在亟亟經營康、藏一帶，此路的軍事價值極大，更必須提早完成。與宣佈鐵路國有政策及大借外債同時見諸行動的，則是郵傳部所訂定的退還粵漢、川漢二路商股的辦法。這在粵漢路方面，還不致引起太多的困擾；在川漢路方面所引起的麻煩，就太大了。

粵漢鐵路的籌款，主要得力於廣東華僑的僑滙。兼以廣東的富庶情形亦比川漢路所經過的四川湖北二省爲優，所以不但股本籌集的情形較有可觀，退還商股，也不致引起太多的麻煩。而川漢路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一方面，由於民間缺乏寬裕銀錢之故，自由認購根本不可能，於是乃不得不出以隨租穀派購的强迫性質。這些「商股」，一旦要退還，計算起來就很困難。造路需買材料，這些千辛萬苦地籌措起來的資本，有三百五十萬兩銀子存放在上海銀行生息，不料却被經手的保管委員施閏章私自用來投資營商，以期獲得利潤。結果這筆存款被錢莊倒帳，損失將近三百萬兩。郵傳部所訂的退還商股辦法，因租穀難以分還而意欲以塡給股票的方式換發舊股，而不肯償還現金，對於被施閏章所倒的三百萬兩鉅款則不願由公家給予補償。四川紳民認爲，郵傳部的這種作法，是「倒款固永不歸還，路本亦必折扣」，老百姓吃虧太大，不能承認。正在爭持不下之時，盛宣懷與四國銀行團簽約借款英金六百萬鎊的消息亦傳播出來了，四川各地的紳民團體一

時大譁。鐵路公司召開臨時大會，到會者有數千人之多，都以爲「收路國有，川人可從；收路爲他國所有，川人死不能從！」可知盛宣懷以借貸外債築路的辦法所引起的激憤，達到何種程度！四川的鐵路風潮後來愈鬧愈兇，政府既堅持原有主張，不肯讓步，護理四川總督的趙爾豐素有「屠戶」之名，更專用軍警的力量從事殘酷的鎭壓。於是，由「爭路」演變到「起義」，四川境內騷動頻傳，清政府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調派端方爲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在湖北省選派新軍入川「平亂」。湖北的防務空虛，四川又禍亂方興，正是革命黨圖謀起事的大好機緣。於是，霹靂一聲，武昌的起義行動發生了。其時間是辛亥年的陰曆八月十九日，亦正是端方帶了湖北新軍入川之後不久的事。

辛亥革命發端於湖北新軍的武昌起義，此事所引起的廣大反應，恰如銅山西崩而洛鐘東應，醞釀已久的全國革命運動，即刻在長江中下游各省得到普遍的影響。不過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已有十五個省分先後宣布起義獨立。所以，武昌起義的晴天霹靂，好像是滿清皇朝的喪鐘，愛新覺羅氏的氣運，從此走到了他的終點。到了戰亂愈見擴大，局面愈形不可收拾的時候，朝中羣臣檢討革命運動之所以勃發，都以爲盛宣懷實在是罪魁禍首。例如御史王寶田的奏疏中說：

「此時鄂事決裂，實由川民之變。其致變之由，由於收回鐵路國有之政策。而主持此事者，則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也。」

又，御史史履晉的奏疏中說：

「窃自鐵路國有政策宣布以來，全國譁然，民心盡失，以致四川糜爛，湖北遂乘機起事。趙爾豐之放變，瑞澂之潛逃，固罪無可逭，而罪魁禍首，則爲盛宣懷。夫幹路國有，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借款造路，亦未可厚非，然其中須有手段，非徒恃强權即可冒昧從事也。乃盛宣懷昧於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之理，欲快其獨攬利權，調劑私人之計，一旦發難，未經閣議，遽先將先朝諭旨一概取消。所定接收給票之法，又不一律，以致人心憤激，大起風潮。而猶不悔悟，迨事變猝起，復主持嚴辦。壓力愈大，反動力亦愈大，革黨土匪遂乘隙煽惑，釀成大亂。盛宣懷之肉，豈足食乎？」

這兩道奏摺，將武昌起義的釀變遠因歸咎於盛宣懷，雖然也曾指斥他意在獨攬利權的具體事實。至如下面的奏疏，就說得更明白，也不客氣了。宣統三年九月初五日，御史范之杰疏云：

「臣以爲亂之作也，不作於作之日，則必有所由生。就川鄂變亂既生而言，督臣誠不能無罪。然便一己之私圖，激萬民之公憤，敢爲禍首，不恤人言，神奸巨蠹，橫絕今古，推厥罪魁，蓋莫如郵傳部尚書盛宣懷者。盛宣懷負國務大臣重任，主張鐵道國有，事前既無準備之方，臨事又無應變之術，禍延至今，大局岌岌，所謂政策，固如是乎？……況川粵同是國民，待遇應無歧視。乃盛宣懷於發還路股，故爲區別，不予一律。其原因實由鐵路國有命下之日，即遣心腹赴粵，以賤價收買股票，凡得十之三四。發還六成，所贏已鉅，今更以十成給付，獲利實屬不貲。若川

漢之股，盛宣懷向未收得，遂不惜種種剝削之計劃，偪勒川民，以致釀成巨患。此實盛宣懷之藉實行鐵路國有政策而趁機自營私利，不但有失國務大臣之風格，更應對四川鐵路風潮之發生負其責任。因此之故，即使鐵路收歸國有的政策在當時確有其必要，但因盛宣懷挾私徇利之故而使事理之措施不得其平，則盛宣懷之推行鐵路國有政策，便不能辭卸處置不當的咎衍。清末推行各項新政，往往因主事者不得其人之故，而使良法美意成爲虐民的暴政，盛宣懷之於鐵路國有政策，大概也屬於這一類的情形。亦因爲有這種情形存在的緣故，即使鐵路收歸國有是很正當的國家政策，亦難以得到正當的體認了。

（十一）

盛宣懷因推行鐵路國有政策不當，而致點燃了辛亥大革命的導火線，頓時使他成了衆矢之的，所有言路上的彈劾和攻擊，一齊集中於他一人之身。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的郵傳大臣一職，當然無法保持。宣統三年九月初五日，攝政王面奉隆裕呈太后諭旨，「資政院奏，部臣違法侵權，激生變亂，據實糾參一摺，據稱禍亂之源，皆郵傳大臣盛宣懷欺蒙朝廷，違法斂怨，有以致之。此次川亂之起，大半原因，即以該部奏定，僅給實用工款以國家保利股票，不能與粵路商本一律照本發還，又將施閏章等所虧倒數百萬棄置不顧，怨苦鬱結，上下爭持。川亂既作，人心浮動，

革黨叛軍乘機竊發，該大臣實爲誤國首惡等語。盛宣懷受國厚恩，竟敢違法行私，貽誤大局，實屬辜恩溺職。盛宣懷著卽革職，永不敘用。」這一道上諭斷送了盛宣懷的政治生命，代替其職位者又是袁黨人物唐紹儀。又過了六月，慶內閣總辭，袁世凱受命組織新閣，盛宣懷乃狼狽出京，由青島避往大連，最後轉往日本。但是，後來所流傳的一種說法，竟有人相信，袁世凱之再度出山，還是出自盛宣懷的大力推轂哩！這一種說法，可以江庸所撰的趨庭隨筆爲代表，引述如下：

「醇親王攝政季年，凡分三派：載洵載濤兩貝勒分領海軍部軍諮府爲一派，載澤管度支爲一派，慶親王奕劻、那桐、徐世昌任總協理爲一派。武昌兵起，洵、濤以張紹曾首倡十九信條，亟欲拉之，而慶、那、徐皆意在袁世凱，屢言於朝，攝政不從。郵傳部侍郎楊士琦乃屬該部參議林炳章惠亭，冶其婦翁弘德殿授讀陳寶琛伯潛，於攝政前推舉項城。伯潛素不悅袁，弗爲動。惠亭遂就本部尚書盛宣懷謀之，力言時局阽危，非袁不足以救國。軍樞意並如此，而攝政弗聽。公若能忘舊怨，得澤公一言，必可轉圜。盛謂：『果於國有益，何有私憾？』於是由盛說載澤，由載澤說攝政，而項城起用矣。」

這一種說法究有幾分可靠性？很難知道。若由袁、盛積怨多年的情形來說，盛宣懷於袁世凱之圖謀再起，方憂懼之不遑，又何致從旁爲之推挽？何況載澤亦深知慶、袁勾結之深，載澤既反對奕劻，當然也就沒有替奕劻援助袁世凱的道理。所以，這種說法，殊不合於當時之實際政情。黃濬撰花隨人聖盦摭憶，就曾力闢此說之錯誤。他說：

「一昨從友人假得一卷書，題爲『三十年來燕京瑣錄』，署爲『習菴漫筆』。……其言袁世凱某，所言有異於鄉壁構造者。雖間有隨俗雌黃，而采輯略備，聊爲之考訂數事。……其言袁世凱再出，盛宣懷主之甚力，則大誤。力主召袁者，載洵也，盛與載澤，皆不以爲然。及聞旨將下，盛謁載濤於軍諮府。盛年已七十餘，平日喘息甚劇，須兩人夾持之。是日盛馬車至府門下，猶兩僕掖之。及上樓，揮肱去僕，危梯健步，見載濤，屈膝乞賜放歸。濤允爲言，宣懷始頓首謝。下樓時，顏盡赤。蓋袁入京，而盛先數日南行。……識者謂盛不行，必及於禍。兩人久相阨，斷無主之甚力之說也。……」

在「袁世凱與慶親王」一文中，筆者曾經指出，袁世凱雖然涌賂權門而揮金如土，然而他本人却不是一個惟利是圖的瑣鄙之人。他之所以要攘奪盛宣懷轄下的輪船、電報、鐵路等交通事業，主要原因是由於這些事業的利潤極爲巨大，盛宣懷窟穴其中，爲袁世凱所不能甘心。他以收歸官辦的理由，一一攘奪入已掌握，一方面可以多闢利源以實現他的政治野心，一方面則可藉整飭貪污而建立他自己的政治聲譽，一舉兩得，再好沒有。我們知道，袁世凱的狼子野心，固然在清朝末年就已經逐漸爲有識人士所看破，但是一般人士對他的看法，總認爲他是一個有擔當、有作爲，而不事聚斂的幹練政治家。像盛宣懷這樣但知聚斂搜括，處心積慮用一切手段營私自肥的人，在袁世凱眼中看來，祇不過是一個貪得無饜的瑣鄙小人而已。當他在辛亥九月受命繼奕劻組織內閣之時，如果盛宣懷還在京中，他很可能基於振奮士氣人心的理由，要求殺盛宣懷以謝天下之

人。所謂奸雄手段，本來異於常人，盛宣懷深知其中厲害，豈有不及早見機而作之理？他之不可能爲袁世凱再出之事從旁推轂，從這一方面來看，也是十分明白的。

辛亥革命成功（十二）

在武進縣老家及蘇杭各地的巨額地產及當舖等，都曾被當地的革命政府沒收。這使得盛宣懷因不敢回原籍而寄居日本，一面又紛函各地的親朋好友設法爲他隱匿財產。這在北京大學整理出版的一本「盛宣懷未刊信稿」中，可以看到很多具體的事實。他的財產之多，在這裏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這本信稿中，有很多信函是實在無法向人公開的。例如他在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五日寫給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張之洞的信中說：

「前所面奏『內府公股』一節，力籌以公濟公之款，居然得有一百廿六萬兩。姪擬將自己創始股分湊入報效，計可得二百萬元。所有經手零星之款，一概和盤托出。前蒙中堂首贊其成，謹擬疏稿呈鑒，未及面陳。明日邸堂處所留一份，請諒可邀核。邸意先行代奏，如慈意許可，再令具摺。尚乞中堂玉成之爲禱。」

這一封信所透露的內容，是他要以報效內府公股的辦法向慈禧太后呈獻漢冶萍公司的股份二百萬銀元，以爲取悅求寵的手段，而當時在軍機的張之洞和奕劻（即信中所說的「邸堂」）居然

都贊成其事而爲之代奏。舉此一事，可知盛宣懷通路權門的手段如何高明。然則他之能够久掌輪船、電報、鐵路之利，當必也是以類似的手法取得當政人物之容隱的了。又如他在寫給大學士陸潤庠、貝子溥倫、直隸總督陳夔龍、兩廣總督袁樹勛、郵傳部侍郎吳郁生等人的信中，也是以報告漢冶萍公司如何得利，優先股所有無多的語氣向人示惠，一方面藉此結爲黨援。在如此這般的情形之下，漢冶萍的利益，無形中也就成了權要親貴們的共同利益，盛宣懷所推行的各種業務，也就得到很多的助力。民國經世文編載有葉景葵所撰的「漢冶萍國有策」一文，主張漢冶萍公司不應作爲私營的企業。他所列舉的理由中，有一款說：

「漢廠創自張（之洞）氏，而冶礦係盛氏所贈，萍礦則廠成而始發見。盛氏之得冶礦，在有意無意間，其初不過一小部分耳。自歸漢廠後，乃以官力圈購左右諸山，又旁及鄂、贛沿岸。萍礦之關，及萍醴路工之敷設，亦非官力不辦。」

由此可知，盛宣懷挾持官方力量以發展漢冶萍公司，實爲漢冶萍公司在最初得到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這些官方助力之來，則又與盛宣懷之結納權要甚或致送乾股等事大有關係。至於盛宣懷在漢冶萍公司的發展過程中乘機培植勢力，把持業務，則又與他之「督辦」輪船、電報、鐵路等等交通事業所用的方式大同而小異。民國以來，許多人談起盛宣懷其人，莫不視爲藉官辦實業而侵漁發財的腐敗官僚。由上文所舉的種種事實看來，這種批評，似乎並不苛刻。惟一對此曾表異議的，是吳相湘先生所撰的「清末建設與盛宣懷」一文。他說：

「盛宣懷在清末政治上地位之重要，不下於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而所從事建設各端，對於國家關係之大，尤遠非李、張輩所能及。世徒以其鐵道國有政策爲引起革命導火線，乃並其一生業績而忘之。又以其身後頗爲富有，甚至以之與今日毫無建樹而但有貪污之腐敗官僚相提並論，似欠平允。余因次其一生事蹟之有關建設者，以實吾隨筆，俾今日談建設者有所借鏡，而使一班大言炎炎其實毫無事業可稽者得稍知愧怍，或於挽回風氣一點，不無若干裨益也。」

吳先生的話，也許是有所感而發。因爲盛宣懷雖然貪了很多錢，對於輪船、電報、鐵路、礦冶等事業，確實也做了一些創辦建設之功，其勞績亦不可一筆抹煞。但若以他所貪得的巨額財富（請注意，此與「頗爲富有」四字大有差別）與他所辦的實業而言，便不免使人覺得，他所做的太少而所取的太多。然則吳先生對他所作的恕詞，未免還是過分溢美了一點。假若他身後所遺留的財產確實只是「頗爲富有」，而並非銀數千萬兩之鉅，我們對於吳先生的恕詞，應該是有理由可以接受的。如今我們所見的事實既是如此，則盛宣懷之一生，總難以洗盡他惟利是圖而長袖善舞之惡名了。

綜觀盛宣懷之一生，惟一可以稱道的地方似乎只有兩點。第一，是他一生之中所辦的慈善事業頗多。每逢國有灾歉，他總能創捐巨款，爲救濟災黎之用。陳蘧龍爲盛宣懷撰神道碑，有一段話說：

「天性仁厚，勇於爲善，前後所籌大小振務，至不可勝計，捐私帑無慮百數十萬。最後被朝

旨爲紅十字會長，專以慈善爲職志，其規橅皆公所撰盛宣懷墓誌銘亦曾強調此點，云：

又陳三立所撰盛宣懷墓誌銘亦曾強調此點，云：

「生平既盡瘁國事矣，於振災愈引爲己責，屑屑至今無復尸大力號召繼規如公者，方饑黎所託命。

富而好施，有人饑己饑人溺己溺之心，這是很難得的德行。至於第二點，則是捐貲倡辦北洋大學及南洋公學，培養人才，振起教育之事。北洋大學在民國以來建設事業之時，所培養的交通專業人才最多。南洋公學在後來改組成爲交通大學始終辦理不輟，所培養的交通教育不但是百年樹人的大計，新式教育所培養的人才尤爲推動國家進步的原動力。盛宣懷雖然因爲清末以來全國首屈一指的大富豪，若論到他在這兩方面的功績，倒是對國家社會頗有實際貢獻的。

參考書目

甲、專書

清德宗實錄
清史稿　趙爾巽等撰
光緒東華錄　朱壽彭編
清史紀事本末　黃鴻壽撰
清代通史　蕭一山撰
中國近代史　陳恭祿撰
清朝野史大觀　小橫香室主人編
滿清野史　不着編人
國朝掌故輯錄　林熙春編
清稗類鈔　徐珂編
十朝詩葉　郭則澐撰
崇陵傳信錄　惲毓鼎
通鑑輯覽
文獻叢編第七至十八輯　故宮博物院編
近代名人小傳　費行簡撰
近世人物志　金梁編
十葉野聞　許指嚴撰
洋務運動文獻彙編　鼎文書局編印
中法戰爭文獻彙編　鼎文書局編印
中日戰爭文獻彙編　仝右
和圖文獻彙編　鼎文書局編印
湘鄉曾氏文獻　臺灣學生書局編印
曾文正公全集　曾國藩撰
胡文忠公遺集　胡林翼撰
左文襄公全集　左宗棠撰
李文忠公全集　李鴻章撰
張文襄公全集　張之洞撰
愚齋存稿　盛宣懷撰
瞿文慎公文集　瞿鴻禨撰
翁文恭公日記　翁同龢撰
瓶廬叢稿　仝右
越縵堂日記　李慈銘撰
曾國藩評傳　何貽焜撰
曾文正公大事記　王定安撰
曾文正公年譜　黎庶昌撰
胡林翼年譜　嚴樹森撰
胡林翼年譜　梅英杰撰
張文襄公年譜　許同莘撰
抱冰堂弟子記　張之洞撰
宏菴弟子記　沈祖憲等撰
石遺先生年譜　陳聲聿編
石遺先生文集　陳衍撰
張惠愍公年譜　許濟棻等編
中興將帥別傳　朱孔彰撰

湘軍志　王闓運撰
桐城吳先生日記　吳汝綸撰
崇德老人八十自訂年譜　曾紀芬撰
曾胡談薈　徐一士撰
四朝佚聞　金梁撰
方家園雜泳紀事詩　王照撰
意園文略　盛昱撰
庸菴文集　薛福成撰
庸菴筆記　仝右
大潛山房詩草　劉銘傳撰
劉壯肅公奏議　仝右
樂道堂全集　恭王奕訢撰
萃錦唫　仝右
樂齋漫筆　岑春煊撰
盛宣懷未刊信稿　盛宣懷撰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王芸生編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恩科直省同年錄　學生書局影印
李鴻章傳　梁啓超撰
中國海軍史　包遵彭撰
海軍大事記　池仲祐撰
郘潛紀聞　陳康祺撰
庚子西狩叢談　吳永撰
枕經堂文集　方朔撰
蜷廬隨筆　王伯恭撰
掌故零拾　王崇儒撰
金鑾瑣記　高樹撰
荷香館瑣言　丁國鈞撰
茹經堂文集　唐文治撰
退廬全集　胡思敬撰
歸廬談德錄　徐宗亮撰
柏堂師友言行記　方宗誠撰
夢蕉亭雜記　陳夔龍撰
拳禍記　李杖編
祺祥故事　王闓運撰
惜陰堂筆記　趙鳳昌撰
凌霄一士隨筆　徐一士、徐凌霄同撰
一士談薈　徐一士撰
一士隨筆　仝右
可言　徐珂撰
花隨人聖盦摭憶　黃濬撰
蓑楚齋隨筆　劉聲木撰
淡盦錄　李調元撰
瞑菴雜識　朱克敬撰
夢園雜說　方濬頤撰
梵天廬叢錄　柴萼編
人物風俗制度叢談　瞿宣穎撰
漢冶萍公司史略　全漢昇撰

左宗棠故事新編　李少陵撰
晚清宮廷實紀　吳相湘撰
適可齋記言記行　馬建忠撰
張謇傳記附年譜　劉厚生撰
袁世凱與朝鮮　林明德撰
項城袁氏家集　清芬閣編印
洹上詩葉　袁克文撰
中法越南關係始末　邵循正撰
清季十年之聯俄政策　劉熊祥撰
張季子文錄　張謇撰
袁世凱軼事　佚名撰
澗于集　張佩綸撰
太平洋會議前後中外國交內幕及其與梁士詒之關係　葉恭綽撰
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　鳳岡及門弟子編
新建陸軍兵略餘存　袁世凱撰
訓練操法詳析圖說　仝右
古紅梅閣筆記　張一麐撰
南屋述聞　鄧則瀘撰
聲塵偶記　文廷式撰
諫書稀菴筆記　陳恒慶撰
洪憲記事詩本事簿注　劉成禺撰
小說考證續編　蔣瑞藻撰
亞洲回鑾始末記　日本吉田良太郎撰
景善日記　〔題〕景善撰
趨庭日記　江庸撰
聽雨樓隨筆　高伯雨撰
孤桐雜記　章士釗撰
趙柏巖集　趙炳麟撰
中國鐵路志　凌鴻勛撰
覺花寮雜記　楊壽枏撰
蘐園文存　朱啓鈐撰

乙、論文

甲午中國海軍戰績考　張蔭麟撰
清宮瑣記　谷虛撰
診治光緒皇帝秘記　屈桂庭撰
袁世凱戊戌日記考訂　劉鳳翰撰
盛宣懷與中國鐵路　凌鴻勛撰
鐵路國有問題與辛亥革命　仝右
清末建設與盛宣懷　吳相湘撰